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学

下 册

〔美〕萨缪尔森 著





2 019 0331 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 济 学

下 册

〔美〕萨缪尔森 著

高鸿业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 济 学

下 册

〔美〕萨缪尔森著 高鸿业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4017·257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287 千

印数 16,500 册

印张 12 插页 4

(6) 克纸本) 定价: 1.4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目 录

第五编 国际贸易和财政

第三十三章 国际收支平衡表	1
A. 外汇和对外贸易的机制	2
汇率 古典金本位制下的稳定汇率 伸缩的或浮动的汇率 经 过修改的金本位制和美元本位制 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制 度的终结	
B.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平衡	17
国际收支平衡表 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表明该国处于什么样 的发展阶段 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意义	
附录: 国际贸易带来的失业问题和货币定值过高	30
对外贸易乘数 货币定值过高与失业	
第三十四章 国际贸易和相对有利条件论	36
国家地区之间条件的多样化 一个简单事例: 欧洲和美国 相 对有利条件规律 国际贸易的其他原因 对外贸易的供给和 需求的图形 关税和限额的影响 限制条件和结论	
附录: 相对有利条件的扩大和限制	57
没有贸易的美国 没有贸易的欧洲 贸易的开放 最终价格 比例的具体的决定 许多商品 许多国家 成本递增 国 际物品的流动代替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动	
第三十五章 保护关税、限额和自由贸易	71
非经济的目标 显然是荒谬的赞成关税的论点 某些错误较 不明显的谬论 “外国人支付代价”或贸易条件的论点 处 于动态情况下的赞成保护主义的论点 结论	
第三十六章 目前的国际经济问题	90

A. 国际金融的现代趋向和制度	90
1914—1950 年间的趋向 马歇尔计划、军事援助和其他计划 对外放款和布雷顿森林制度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欧洲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较为自由的多 边贸易：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B. 国际制度的崩溃和重建	102
从美元短缺到美元过剩 美国出现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的原因 长期赤字和货币贬值的治疗方法 新的受到管理的浮动 汇率制度 黄金的作用为何？有伸缩性的汇率 处于民族主义 世界中的金融	

第六编 当前经济问题

第三十七章 经济增长论 119

历史的阶段 事实与虚构 斯密和马尔萨斯的“宏大的动态学” 对斯密和马尔萨斯的详细的经济分析 马尔萨斯的发展图形 劳动价值论的终结 技术进步和古典的经济成长论 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 用图形表示的资本的深化 技术进步和工资 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致史实 经济发展的六个基本趋向 对于混合经济的运动规律的分析 新发明是节约劳动还是节约资本？

附录：目前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讨论 150

熊彼特的技术革新 静止状态中的失业？不改变的资本—产量之比？ 哈罗德—多马的经济成长模型 新古典学派的动态经济学 可供选择的理论 补偿性的财政政策 扩大中的宇宙：脱离正题的论述 里昂惕夫的部门间的投入—产出

第三十八章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題 170

不发达的定义 不发达经济的特点 问题的紧迫性 肤浅的发展理论 描述经济发展的最新概念 平衡增长和工业化 对资本的需要和有效率的资源分配 人口问题 自然资源

资本形成 技术变革与发明 五年计划: 如何从这里走到那里	
第三十九章 种族和性别歧视经济学	203
移民和种族熔炉 奴隶制度经济学 推迟的革命 态度的改变 受教育机会的改善 职业上的和经营企业的机会: “黑人资本主义” 贫民窟住房经济学 妇女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 从性别上看职业和行业的变动 有关性别歧视的经济分析: 脱离正题的专门讨论 限制条件和存在的问题	
第四十章 生活质量问题: 贫穷与不平等、生态与成长、博爱与正义	223
为了阐明问题而进行分析 自从伊甸乐园以来: 不平等 沉闷的科学的不能避免的规律? 福利国家 公平与效率 不平等的原 因 针对贫穷和不平等的直接的方案 负所得税新微观经济学 环境污染 政府法令、赋税和计划 能源危机 困难的抉择和自然的生态学 零值人口增长? 零值经济增长? 稀缺性何时終了?	
第四十一章 混合经济中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	260
繁荣与战争开支 没有解决的问题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新类型的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的或卖方的通货膨胀 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和七十年代的衰退 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菲利普斯曲线的互换: 充分就业或物价稳定? 所需要的: 收入政策 为了改善菲利普斯曲线而减少结构失业 人道主义的经济制度	
第四十二章 趋势的改变: 经济理论的演变	288
经济学的史前史 古典经济学: 自由放任的先知斯密 古典经济学: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秋 新古典经济学 凯恩斯的革命 主流经济学 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排斥 制度经济学和凡勃伦 保守主义者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攻 加尔布雷思的批判 新左派和激进经济学 新左派思想 卡尔·马克思传略 马克思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新左	

派和年轻的马克思 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动态学	
附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	316
剩余价值和剥削 节约劳动的发明和失业后备军 对于边际 生产率分配论的否定 简单和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凡俗化	
第四十三章 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	331
资本主义的危机? 新面貌 一系列不同的主义 法西斯主 义 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苏联: 历史 左翼的多样 化: 南斯拉夫 毛主义的中国 苏联经济 东欧经济学的新趋 向? 经济的相对增长: 未来 最后的观点: 企业和人的自由	
英汉人名、机构、术语对照表	362

第五编 国际贸易和财政

第三十三章 国际收支平衡表

普莉塞姆小姐: 塞茜莉,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看一看政治经济学。关于卢比的价格下降的那一章,你可以略去。它有点过分使人感情激动了。就连这些金属货币问题,也有感情夸张的地方。

奥斯卡·王尔德:《诚挚的重要性》

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我们或多或少地把国际贸易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里在第五编中,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个经济社会由于从事对外贸易而引起的各种使人感到兴趣的问题。⁶⁴⁵

本章及其附录论述国际贸易中的货币机制。然后,下两章将集中研究作为国际贸易基础的一些基本的实际因素,这些因素往往被蒙在所有国际贸易上的货币面纱所掩盖。对于关税、限额以及其他国际分工的障碍,任何合乎理性的评价都牵涉到这些基本的实际因素。在第三十六章中,我们要使用所有的原理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国际经济的现实。

国际贸易之所以重要,其基本的原因在于:

对外贸易所形成的“消费可能性边缘”可以比我们自己国内的生产可能性边缘向我们提供更多的各色各样的物品:

例子:日本向我们出售照像机;我们向澳大利亚出售机床;澳大利亚向日本出售铁矿石而完成三角循环贸易。其中每一国家消费的产品都多于它单独生产的产品。整个世界处于它的真正的生产可能性边缘之上——而不在其内。这就是对外贸易的实质。如此简单。然而,对于议

员和选民们而言,它显然又是如此难于掌握和容易忘记。

在第五编中,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各种问题:汇率;国际收支平衡;对外援助和贷款;关税和限额;“相对有利条件原则”(该原则会告诉我们将出现什么样的贸易,为什么出现这种贸易);最后研究七十年代的国际经济问题——稳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由市场上的黄金和官方的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或“纸面黄金”)、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中东和其他国家的石油收入的反循环以及许多其他重要问题。

这些决不是抽象的经济理论问题。它们关系到国际贸易的成功与失败。

A. 外汇和对外贸易的机制

§. 汇率

首先,对外贸易如何进行呢?如果我向佛罗里达州购买桔子或向芝加哥购买氨水,那末,我自然要用美元付款。同时,桔园主人和氨水制造商也期望我用美元付款;因为他们的开支和生活费用都得用美元支付。在某一国家的内部,经济上的交易似乎是简单的。

然而,如果我想直接购买一辆英国跑车,事情就比较复杂了。我最终必须用英国钱即所谓“英镑”付款,而不能用美元付款。同样,如果英国人想买我们的东西,他也得设法用美元来支付美国商人。大多数的美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英镑钞票。只有他们肯定能把英镑兑换成美元时,他们才会接受英镑。

因此,具有不同货币单位的国家之间的物品进出口显然要引起一个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汇率,即用我们自己的货币单位来表示的外国的单位货币的价格。

例如,在1975年末,一英镑的价格一般在\$2.00上下。在美元和其他各个国家货币之间也存在着汇率:每一西德马克为40美分^①;每一法郎为23美分;每一意大利里拉为不到1/7美分;每一日元为1/3美分(或者反过来说,300日元对一美元)。

一旦汇率为已知,我购买英国跑车就是很简单的事了。假设该车的卖价为£4,000(即:4,000英镑)。我所要做的仅仅是在报上找出英镑的汇率。如果汇率是每英镑\$2.00,那末我只要把\$8,000交给一家银行并且告诉它此款系为支付英国汽车出口商之用就可以了。银行付给英国商人什么?当然是他所需要的唯一货币英镑。

我通过一家银行或一家代理银行付款并没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如果英国汽车出口商给我一张账单,要求用美元支付,或者,如果他通过美国经销店和我进行交易,那末,其后果都是一样的。总之,英国出口商最终需要的是英镑,而不是美元,他会很快把\$8,000换成£4,000。(不用说,我们略去了佣金和汇款费。)

现在读者应该知道,如果一家英国进口商想向美国出口商购买\$24,000的粮食,他应怎么办。在这里,英镑必须兑换成美元。当汇率是每英镑\$2.00时,为什么他要付出£12,000的代价呢?

作为个人来说,商人和旅游者为了进口或出口的交易并不需要比上述更多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要掌握汇率这一经济问题的实质,我们就必须研究汇率为什么处于现在的水平。什么经济原理决定汇率?什么是汇率变动的基础?

^① 在英镑和西德马克之间也存在着汇率。但是,这些外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不一定对我们很有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的目光敏锐的套汇者可以保证各种货币之间的“套汇汇率”与现时价格相一致,因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英镑和马克之间的比价可以根据英镑美元比价和马克美元比价而简单地计算出来。例如1965年,一英镑必须按照5马克(=\$2.00/\$0.40)的价格出售。当然,当外汇比价向上或向下浮动时,这个1975年的例子也要加以修改。

§. 古典金本位制下的稳定汇率

这里需要研究以下四种主要情况：

1. 某种纯粹的或改头换面的金本位制的作用。
2. “干净的”浮动汇率的情况。这种汇率可以为交易双方的国家的居民所自由使用，并且按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而随时变动（很象每人都能按照随时变动的市价购买的小麦，其市价取决于竞争的供给和需求）。
3. 受到控制的国际贸易的情况；在其中，每一项交易需要政府的许可证明，并且，不同的交易按照不同的汇率计算，其大小取决于国家的政策。
4. 目前正在使用的“管理浮动”的办法。它仍然松散地和官方的黄金与美元保持联系，为下列二者的混合物：*(a)*具有某种稳定性的维持在固定比例上的汇率，和*(b)*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大幅度波动的浮动汇率。

金本位制是在历史上最重要的情况。作为入门的介绍，它也是最易于分析的情况之一。

金条。假设人们不论在哪里出售物品时都要求买主用纯黄金付款：那么只要保证成色，重量便代表价值的多寡。这样，在英国买一辆车仅仅需要按照若干盎司黄金的价格偿付，而在芝加哥买粮食也按照相同的办法偿付。因而也就不存在汇率的问题。

金币。由于金块和银块携带不便，并且难以检验其成色和重量，所以国家——在早期是君主——通常把一定重量的黄金铸造成硬币的形式，上面具有国家的印记，以保证成色和重量。（硬币边上铸有纹路，以便易于表明轻重和真伪。即使如此，由于黄金在

流通中磨损,商人们还是称硬币的重量。)

把金币用作为交换媒介,对外贸易是否仍然象国内贸易那样呢?是的,基本上一样,只不过稍微有些区别。如果我们用盎司而英国用克作为重量单位,那末,你仅需要一张重量换算表。同样的问题也出现于对外贸易,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用约为四分之一盎司的黄金铸造她的一金镑硬币(“sovereign”),而麦金莱总统用 1/20 盎司的黄金来铸造美元。这样,一金镑硬币,由于五倍于一美元的重量,自然具有 £1 对 \$5 的汇率。

这就是 1914 年以前的金本位制如何在实际上发生作用的要点。当然,国家的荣誉使我们用我们的硬币,英国人用他们的硬币。但是,任何人都可熔化我们的硬币,然后(以极低的费用)把它转铸成英国硬币。因此,除去熔化、海洋运输和再铸造的微小费用以外,一切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都具有稳定的汇率,其单位价值或平价取决于它们货币单位的黄金含量。 648

次要的补充。由于黄金不易携带在身边作为支付购买之用,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发行保证可以兑换成黄金的纸币。人们有权把黄金换成纸币和把纸币换成黄金,而他们实际上也经常是这样做的。还有,在当时,海洋运输缓慢并且运费高昂;因此,存在着围绕着法定铸币比价的“输金点”。在输金点所规定的范围内,英镑和美元的汇率可以上下波动。例如,如果运送 1/4 盎司黄金越过大西洋的单程费用是两分钱(包括保险费和利息),那末,汇率是否可以稍微偏离 \$5 一些呢?是的,可以偏离。在纽约,英镑的标价往往上升到 \$5.02,只有这样,在纽约购买金条并把它运送到伦敦去换取英镑才是上算的。高于 \$5.02 的价格不可能存在,因为,足够多的黄金的流动会使价格不超过输金点的上限。很明显,英镑的汇率也会下降到低于外汇平价(\$5)以下的 \$4.98。当汇率下降到输金点的下限时,把黄金从欧洲运送到美国费用较低。所有这一切都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不过在这里,为了简化数字,我们用假设的 \$5 代替了 1914 年以前的 \$4.87 的平价;同时,运输费用也是大致的数字)。在 1914 年以前,英镑和美元的汇率基本上保持稳定,只在含金量决定的平

价的上下作微小的波动。当波动到输金点的上下限时，黄金便作出相应的流动。

休谟的黄金流动均衡机制。现在，问题的机械部分已经被理解，我们要进一步考察来回答下列问题：

在金本位制度下，什么原因使美国向英国购买的物品总是多于英国向美国购买的物品？而这到头来则要求我们源源不断地向英国输送黄金来清偿债务，可我们的黄金为什么总用不完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在亚当·斯密和他的朋友著名的哲学家大卫·休谟以前，重商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但却是肤浅的回答。重商主义者说：

“除非君主征收关税和规定限额来减少物品的进口，除非他给予补贴来鼓励出口，除非他禁止熟练工人去外国施展他们的技术，又除非他能保证使一切海洋运输都用本国的船只而不论其费用是如何高昂，否则，一个国家便会失掉它的黄金。”作为一种事后想到的明显得用不着说的补充，他们说道：“当然，国家失掉黄金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用不着问为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国家可能遭到的最大的灾难之一。”

大卫·休谟在 1752 年，以及自那时以来的经济学者都对这种说法予以反驳。首先，休谟指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每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失掉黄金。黄金到哪里去了——到大海里去了吗？他还说：一个国家的黄金从一千万盎司降低到五百万、甚至一百万盎司，而永远恢复不到原来的水平，根本说不上是什么灾难。如果保
649 有一半数量的黄金仅仅意味着全部价格正好减半，那末，该国每一个人的处境丝毫不会变好或变坏。因此，休谟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价格和成本的水平仅仅作出相应程度的下降，那末，该国失掉其黄金的一半或十分之九是根本不值得担心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好地回想一下第十五章所论述的货币数量论。大卫·休谟和约翰·洛克以及其他一些早期的经济著作家最早阐述和坚持了货币数量论。该理论认为，一切价格均与货币数量(在这里，M 为黄金)保持一定的比例^①。

关于休谟用古典学派观点来反驳重商主义和坚持自由贸易的论点，我们现在论述它的第二个而且也是重要的部分。他接着说：存在着四重作用的机制来维持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国际收支的平衡。休谟的机制可以概述如下：

每当一个国家进口过多，因而黄金开始减少时，黄金的外流就会降低该国产品的价格和成本水平，从而会：(1)减少外国货的进口，因为外国货现在已经较为昂贵；(2)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因为本国产品现在已经较为便宜。

交易的另一方因为享有所谓“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它的出口大于进口，并且得到在生产上不起作用的黄金作为补偿，因此，(按照货币数量学说)它的价格和成本上升。这就使：(3)它的产品的实际出口数量减少，因为出口货现在已经较为昂贵；(4)它的人民从上述第一个国家购买较多的进口货，因为从该国进口的货物现在已经较为便宜。

由于这个四重作用的有关黄金流动和价格水平的机制，(在正常的情况下)流失黄金的国家的国际收支的情况会得以改善，而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的国际收支的情况变为不利——一直到国际贸易的均衡形成为止；这时，两国的相对的价格使它们的进口和出口相等，两国之间的黄金流动正好相抵。这个均衡状态是稳定的和自行调节的，并不需要关税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

① 他承认：货币数量论所保证得到的均衡不会立即出现。他是最先认识到M和价格的上升需要一段时间的人物之一。当上升的M和上升的价格第一次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现时，它会使价格增长得比成本要快，从而会使工商业人士得到利润。他认为，在短期内，这种情况有利于充分就业和资本形成。

§. 伸缩的或浮动的汇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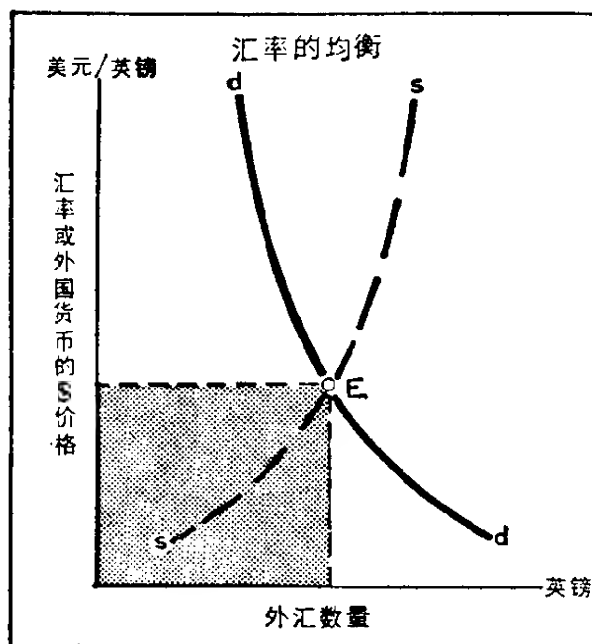
在考察了理想的金本位制如何发生作用以后，我们现在来看听任供给和需求决定汇率的情况。在货币与黄金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英镑在四十年代的平均价格本来可以为 \$ 4.00 或 \$ 5.00；但在这十年中，其平均价格实际上为 \$ 2.00。一旦普遍采用浮动汇率，英镑的价格在下十年中可能会是 \$ 1.50 或 \$ 3.20，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决定事态的结局。当英镑汇率为 \$ 1.90 时，如果美国需要如此之多的英国货而英国又需要如此之少的美国货，以致我们所需求的英镑多于他们愿意供给我们的数量。那末，后果如何？如果不存在金本位制，那末，我们便无法得到黄金并且
650 把它运送出去以便把汇率保持在 \$ 1.90 的平价左右的狭窄的输金点之内。现在，我们的紧急的需求将使汇率上升。上升到多高呢？高到足够的程度，以致在被提高了的价格（譬如说，每英镑 \$ 2）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外汇的缩小了的需求总量再度等于外汇的被扩大了的供给数量。

这里牵涉到两个主要步骤：(1) 当英镑的价格上升时，从英国进口的自行车的成本增加，从而，我们对英国自行车的实际需求量会按照通常的方式下降；(2) 当美元的价格下降时，我们的物品对于英国人而言价格较低，从而，他们企图购买更多的我们的出口货。（如果我们从贸易双方的观点来考察这两种影响，我们看到类似休谟的四重作用。但却具有某些重要的不同之处。我们整个国内的工资和成本水平不一定要变动，而他们的情况也是如此。汇率的变动本身可以直接使进出口的价格水平上升和下降。）

第 33-1 图 物品或资本的供给和需求迫使浮动汇率上升或下降

在我们的 dd 的背后是我们的欲望来进口英国货、购买英国证券、参观莎士比亚的坟墓，等等。在他们供给英镑换取美元的 ss 的背后是他们的欲望来购买我们的出口货和其他东西以及偿付我们过去的投资。如果汇率高于 E 点，他们想提供给我们的外汇就会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外汇。这一供过于求的差额会迫使汇率回跌到 E ；在这一点，用外币和美元交换的市场正好供求相等。（如果我们使国内的货币供给量和一切价格都加倍，购买力平价论认为，曲线也会以加倍的距离向上移动，使 E 表示的价格加倍，即：相对于降值的美元而论，英镑升值百分之一百。）



第四章和第三编论述过的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在第 33-1 图中被用于说明如何决定伸缩的汇率的均衡点。

美国的 dd 曲线来源于我们的欲望，想要在一定的汇率下购买进口货、从事旅游、使用海运及其保险劳务、支付海外驻军费用和对外援助项目、偿付外国人持有的我国有价证券和财产的股息和利息以及支付美国厂商或股票购买者进行的对外长期投资和在外外国近期债券或储蓄账目上的短期投资。

在外国人需求美元的背后——代表他们向我们提供的英镑外汇的 ss 供给曲线——是什么呢？是和我们完全相同的愿望和义务：想购买我们的出口货，必须支付给我们股息等等。

浮动汇率的均衡点处于 dd 和 ss 的交点；这时，不存在从均衡水平上升或下降的趋向。

如果我们在明天向海外派遣更多的军队，更经常地去国外旅游，在其他国家的价目表上发现更多的便宜货并用我们的美元向

它们购买以及由于国内通货膨胀而被迫提高我们出口货的价格，那末，其后果如何？这种变化显然要使我们的 dd 曲线向右和向上移动并且使它们的 ss 曲线向左和向上移动。由此而得到的交点是什么？由此而得到的是汇率的较高的新均衡水平；如上所述，正好高到能诱导出更多的美国出口货和缩减来自英国的进口货。我们据以购买外币的汇率已经上升；美元的相对价值已经下跌。

购买力平价论。对于所有这一切，象休谟那样的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是完全理解的。事实上，为了找到伸缩汇率的均衡水平，他曾研究过各国价格相对变动的情况。李嘉图在1817年左右，瑞典的G.卡赛尔在1917年左右，也曾作过这方面的研究。

购买力平价。假设美国 and 英国已经处于均衡状态，譬如说，每£1为\$2.00。现在，假设美国通过国内的 M 的膨胀，使它的一切价格加倍，又假设英国对它的 M 施加限制，使它的价格水平保持稳定。那末，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例如，保持充分就业，没有新发明，没有农业歉收，没有关税或没有爱好的改变），新的 dd 和 ss 会相交于原有的\$2.00的汇率的两倍之处，即：每£1为\$4.00——美元降值的程度等于它的价格水平上升的程度。

其中的道理并没有特别复杂之处。当我国的全部工资和价格正好加倍时（ M 在这里加倍，以便提供所需资金），按照也同样加倍了的新的汇率，我们能够购买数量完全相同的进口货物和卖出数量完全相同的出口货物。（正如原有的每一美元现在被称为两美元一样。）^①

① 卡赛尔和其他经济学者提出购买力平价论是要预测：当各国的国内通货膨胀使价格上升百分之一百或更多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各国通货会贬值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长期预测比他的短期预测为优，但是，二者都不是完全准确的。在现实世界中，和古典学派的模型不同，其他条件并不保持不变。

在浮动汇率下,从长期来说,最终决定各国的价格水平和汇率的是它们的货币政策。

贬值、升值和贬值。英镑价值的加倍是美元价值减半。根据定义,用一种或其他种货币来表示的某一种货币的价格下降被称为“贬值”。用另一种货币来表示的某一种货币价格的相对上升被称为“升值”。很显然,在我们的例子中,英镑已经升值,而美元却经受了很大的贬值。

“贬值”这一名词往往和“贬值”混淆在一起。贬值的通常定义是:相对于某一种货币而言的黄金价格的上升。

例如,当罗斯福在1933年把黄金价格从每盎司\$21提高到每盎司\$35时,他是在使美元贬值。在1971年,当尼克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黄金的官价从\$35提高到\$38,又在1973年从\$38提高到\$42.22时,我们说,美元贬值。(注意:贬值也可以牵涉到贬值。例如,当法郎的黄金价格不变,而美元的黄金价格上升时,这就是说:相对于法郎而言,美元贬值,或者,另一种说法是:相对于美元而言,法郎升值。

贬值的定义。对于一种货币而言,当黄金的价格上升时——如从每盎司\$38到\$42.22——我们就说该货币已经贬值。

贬值的定义。相对于某一种货币而言,某种外国货币的652价格上升时——例如,西德马克在七十年代的上升百分之二十五,大致从每马克\$0.32上升到\$0.40——我们说:本国的货币已经贬值,而外国货币已经作出相对的升值。

如果所有的国家同时把黄金价格提高百分之一百或二百,那末,就不存在贬值或升值,仅有贬值。

均衡的恢复。当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长期出现赤字时,我们

说，该国把汇率定得太高了。它的成本没有竞争能力。它被认为是具有定价过高的货币。

而同该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势必出现长期的盈余。它的货币被认为是定价过低。

如何消除这种不平衡状态呢？经济学者说：“使定价过高的货币贬值。或者做完全相同的事——再说一遍，完全相同——使定价过低的货币升值。这会有助于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

在政治上，使一个国家升值似乎总是比使它贬值来得困难。例如西德。这个国家在过去十二年中具有最顽固的国际收支的盈余。在它的扩大的出口行业中，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增长。他们不愿意使盈余消失。（第三十六章对此有较多的论述。）

§. 经过修改的金本位制和美元本位制

上面我们概述了两种理想化的制度，即纯金本位制和汇率可随意伸缩的制度，现在我们论述近几十年来实际存在的国际货币制度，为第三十六章论述现行国际货币制度正在发生的变化铺平道路。

金本位制的演变。黄金并没有特别神奇之处。银、白金、铅或甚至纸做的餐巾都可代替它，只要它们便于交换，难于伪造并且供给量具有足够的限度以使价格不致高涨就成。事实上，金本位制的全盛时期不过为 1914 年以前的半个世纪。在十九世纪以前，英国在更大的程度上采用银本位制，而不是金本位制。在这两种贵金属的市场价值被重新调整以后，它不知不觉地采用了金本位制。由于英国当时的巨大威信，法国、美国以及新崛起的德国和日本帝国也先后采用了金本位制。

即使在它的短暂的全盛时期，特殊事件也好几次中断了金本位制（例如，南北战争使我们脱离金本位制十多年之久）。此外，价

格水平全然为金矿的偶然发现所支配。如果全世界的实际产量(即国民生产总值)在1875到1895年之间以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增长,那末,黄金供给量也应该——根据原始的货币数量论——按照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增长,以便保持稳定的价格。但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的采金高潮的结束,金矿在那时并没有生产出这样多的黄金。结果,在十九世纪的后三分之一的时期,全世界的价格水平普遍下降。

这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在价格和工资可以毫无阻碍地自由伸缩而货币数量论又能顺利地向上或向下发生作用的理想世界⁶⁵³里,价格的下降本不会产生多大影响。然而,正如休谟本人所坚决认为的那样,价格和工资在下降时具有黏着不变的倾向;因而一般说来,价格水平的下降往往导致劳动者的动乱、罢工、失业和激进主义运动。在1875—1895年人民党主义猖獗的时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正是这样。(回想第七章叙述的劳工骑士团的兴起。)由于黄金似乎在迫使价格下降,所以农民和劳动者发出呼声,要求用银来补充黄金。这一要求最终导致了W·J·布赖恩在1896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了赞成“复本位制”的历史性发言;在发言中,这位来自普拉特河的童子演说家提出警告,反对把人类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①。

① 复本位制的意思是:财政部可以按照规定的重量比例,如16盎司白银对1盎司黄金,用美元换取黄金或者白银。除非一切国家都同意用16/1这一共同的比例,否则,黄金或白银就会流到其价值最高的地方而流不回来。黄金价值最高的地方,会没有白银,从而最终采用金本位制;而在白银价值最高的地方,会没有黄金,从而最终采用银本位制。结果,每当这两种贵金属的相对的供给和需求发生变动时,两国的汇率就会因之而波动。〔如果两国的两种贵金属的平价各自为16/1和18/1,那末,波动的百分比只能是2/16。即使所有的国家都规定同一的16/1之比,任何相对的(边际)采冶成本和16/1之比的差距也会使各国人民把其中一种金属全部出售给财政部。例如,假设官方的平价为16/1,而市场的比例为20/1(表明20盎司白银的生产成本和一盎司黄金的生产成本相同),那末,在所谓格雷欣规律——“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下,所有的白银均会被出售给各国政府,从而整个世界实际上采用的只是金本位制。在今天,没有人赞成“复本位制”,白银象锡和其它普通物品一样出售。〕

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和金汇兑本位制。在德国和日本采用金本位制之后,迫使价格下降的压力甚至还会进一步增加,如果不采用新的方法来节约黄金的使用的话。仅保持部分准备金的现代银行开始出现,它们创造出来的活期存款 M 意味着: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黄金来与不断增长的总产量保持平衡。此外,采用金本位制的大多数国家并不储备百分之百的黄金来担保它们发行的小额硬币和纸币。例如,如果某一国家仅仅储备四分之一的黄金来担保它的纸币,那末,为了保持世界价格水平不变,它只需要开采相当于其纸币发行总量四分之一的黄金。

各国银行采用的这种节约黄金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将要看到,它为现在国际上通过创造所谓“纸面黄金”来节约和代替黄金提供了先例。“纸面黄金”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另一种方法也帮助节省了黄金。许多国家,特别是小国(如菲律宾),使它们的货币和黄金按照固定的比例兑换。但是,它们只储备很少量的黄金,或干脆不储备黄金。它们的做法是:储备某一采用金本位制的大国(如美国)的货币。只要该小国能维持住这种“金汇兑本位制”,其作用和纯粹金本位制就没有多少差别,然而却大大节约了黄金。

对于赞成金本位制的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当加拿大和南非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现金矿时,当氰化物处理方法大大增加金矿的产量时,价格下降的压力得以缓和。银行准备金比例不断缩小,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金汇兑本位制,由此节省了越来越多的黄金。黄金产量的增长,加上黄金使用量的减少,使得世界继续采用金本位制并且抵御了价格的下降,一直到1929年的大崩溃为止。但是,这一切确实说明国际上缺乏流通手段,而某些经济史学

者实际上把这次经济萧条归之于世界越来越严重地缺乏流通手段。

作为关键货币的美元。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政治动乱和怕遭受德国侵略的恐惧心理，使黄金象决了堤的河水那样流入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有点夸大地说：世界实际上采用的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赖以进行的“关键货币”。私人 and 政府的储备主要以美元的形式（即：现金、银行存款和流动性较大的短期美元证券）加以保存。1914 年以前，英镑居于首要地位，而到了 1945 年，美元已经成为唯一的“关键”货币。

例子：第三十六章将说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1944 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在它的最后决议书中，不仅用黄金而且用美元（那时相当于 $1/35$ 盎司黄金，现在为 $1/42$ ）来规定各国货币的平价。美元是各国政府用来维持它们的法定汇率的所谓“干预货币”。

§. 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制度的终结

1971 年 8 月，尼克松总统正式宣布不能再用美元兑换黄金。美国甚至在口头上不再承担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义务，也就是说人们不能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汇率平价把美元自由兑换成官方黄金、日元、马克或任何其他国际储备。

我们将在第三十六章中，研究用某种新制度来代替布雷顿森林制度和经过修改的金本位制度这一充满斗争的过程。在这里，我们所要说的只是：世界正处在一个并非不舒适的过渡阶段。我们现在采用的并不是 1914 年以前的那种黄金流动可自行调节的金本位制。也还没有采用“干净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比价可以升值或贬值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所需要的程度。

史密森氏学会协议。1971年12月，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大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成员国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矫正十年之久的美元的“定价过高”，因为它使我们的成本和价格如此之高，以致我们的贸易长期出现逆差；相对于马克和日元而论，美元大幅度地贬值，而相对于大多数其他欧洲货币，美元贬值的幅度较为有限，1971年以来的数年，瑞士法郎和西德马克进一步向上浮动，而在较少的程度上，大多数欧洲共同市场国家的货币也是如此。然而，意大利的里拉和英国的英镑则按照它们国内价格的较大的通货膨胀率而在1971年以来作出意料之中的向下浮动。

655

史密森氏学会协议保留了黄金双价制。官方的黄金价格稍加提高，从每盎司\$35提高到\$38，1973年再度提高到每盎司\$42.22。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谁也不按照这个价格买卖黄金。197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最后的行动，完全取消了黄金的官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制度得到保留。正如第三十六章将要详细论述的那样，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每一会员国设立账户以便提取限额内的数量时，它实际上创造了国际货币。这正象在国内我得到一笔银行存款、而可以提取存款支付过多的开支那样，特别提款权账户的价值单位实际上被规定为一个市场篮子的十六种主要货币——若干数量的美元、马克、英镑、日元、法郎等等。现代的制度并不按照毫无意义的每盎司\$42.22的黄金官价而计算出来的含金量来表明一种货币的平价或该货币的日常浮动的价值。它把特别提款权当作“纸面黄金”并用“纸面黄金”来衡量国际储备。即使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也由于惧怕美元的向下浮动而在1975年开始用特别提款权来规定它的石油的垄断价格。

在史密森氏学会协议签订后的七十年代，世界处于(一定程度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之下。第三十六章将论述目前和将来的国际金融问题。

本章的第一部分使用望远镜概括地论述了国际贸易的机制。

在本章剩下的篇幅中，我们要用显微镜来详细考察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

B.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平衡

§. 国际收支平衡表

现在我们要准确地说明：当谈到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时，我们所指的是什么。我们指的是一张报表。该报表登载进入和流出一个国家的一切物品、一切馈赠和外援、一切资本贷款（或者“借据”）、一切黄金和国际储备的价值以及处于第 33—1 图曲线背后的一切项目的相互关系。

国际收支平衡表总结上述的这些重要的关系。如果你理解它，那末，你已经相当成功地掌握了国际贸易。

美国商务部对于一年中的全部国际交易都保持记录并且作出官方的估计，其中包括：进出口的货物、对海外的放款和借款、黄金的流动量、旅游者的支出、从海外收到的和向海外支付的利息和股息、运输费用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国际收支平衡表”——它不过使用复式簿记的记载方法来列出所有的项目，以便使它总是能表示出一个正式的总的净差额^①。

国际收支平衡表通常分为三个部分：

I. 经常账目

私人方面：

货物（或“贸易差额”）

无形项目

旅行（旅游等等）和运输（运输劳务等等）

656

^① 由于走私和其他没有记录的一般交易，有必要设立附加的统计误差项目，类似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统计误差”。

投资收入(利息、版权和专利等、股息、外国债券利息)

其他劳务

政府方面:

政府向盟国出口的军事物品

政府的赠予,等等

II. 资本流动

长期:

私人

政府

短期:

私人

政府

统计数字误差,净值

III. 黄金或储备资产的流动(流出和流入)

经常账目的差额。第 I 部分各个项目的总量通常被称为“经常账目的差额”。这个重要的数量总结我们物品与劳务的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之间的差距。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经常账目的盈余或赤字是如何被“清理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抵消的——被第 III 部分的储备和黄金资产的流动或被第 II 部分的资本流动所抵消。但是,在此以前,我们将简要叙述第 I 部分的在私人和政府下的主要项目。

几世纪以前,当货物占主要地位时,经济学者们只注意这一项目。如果出口货的价值大于进口货,他们就说是“贸易顺差”;如果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就说是“贸易逆差”。两个词使用得并不是很恰当,因为我们将要看到,所谓“贸易逆差”对一个国家可能是好事。

除了所谓“有形的”货物以外，我们还应该记住目前占有重要地位的“无形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向外国人提供的或他们向我们提供的运输和保险劳务、美国旅游者在国外的开支、外来移民送给原来家庭的礼物以及最重要的，我们在海外的收益。稍想一下便可以明白：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喝酒的开支这一无形项目对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最终影响正和他从法国进口酒而在美国喝一样。当我们提供运输保险劳务时，它的作用和出口相同。

借方与贷方。决定如何处理一个项目的好方法是提出以下问题：

象出口货物那样的项目是否向我们提供更多的外国货币？这种出口类型的项目被称为“贷方项目”，向我们提供外币。或者，象进口货物那样的项目是否使我们用掉外币储备，从而有必要得到更多的外币？这种进口类型的项目被称为“借方项目”，需要我们提供外币。

为了说明如何运用上述法则，可以提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美国人从海外得到的利息、版权和专利等等收入以及投资的股息？很清楚，它们象出口货那样，是贷方项目，因为它们向我们提供外币。读者可以把法则用于相反的情况，以便说明：外国人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收入必须作为借方项目来看待——象进口货那样，它们消耗我们的外币。

在这里，仔细看一看第 33-1 表有助于理解。该表提供了美国 1974 年的国际收支的官方数字。注意它被分成经常、资本以及储备和黄金这三个主要部分。此外，它具有一个表明统计误差的项目(第十七横行)。每一横行都被编了号，以便易于检索。这样，在(a)栏中列入每一项目的名称以后，我们在(b)栏中列入贷方项目，即：象出口那样能获得外币的项目的数字。然后，在(c)栏中，

我们列入借方项目,即那些消耗外币的项目的数字,因为我们需要外币来偿付进口,等等。

例如,在1974年,我们的出口货给我们提供\$98,268百万的贷方数字,然而,我们的进口货却给我们提供\$103,796百万的借方数字。在这里,借贷之间的差额为-\$5,528百万。这个“贸易逆差的赤字”被列入(d)栏的第一横行。(读者一定要理解,为什么符号为-,而不是+。)

读者想必能够解释无形项目中的每一横行。他应该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到国外旅行的癖好造成负数值的——或借方净额——旅行和运输的数字。他也应该知道,为什么从海外得到的净收益——第三横行的投资收入——起着给我们提供外币的作用,因而被列入贷方。(当然,在外国的收支平衡表中,它们会把我们的贷方当作它们的借方,从而认为上述项目具有“减少美元”的作用。)

第33-1表说明:以私人的经常账目而论,无形项目的最终影响是抵消第一横行的贸易赤字而有余。

然而,头四个私人横行的贷方净额不能抵消下三个横行的政府项目。政府的军事交易以及各种外援赠款和支付在第九横行中造成-\$9,340百万的借方差额,不但多到可以消除掉私人的正数值的差额,而且使最后的“经常账目的差额”(第十横行)具有一\$3,608百万的赤字。

在计算出经常账目的净差额后,我们便完成了第33-1表中的第I部分。一个国家如何抵消它的经常账目的这种净差额呢?可以用储备资产和黄金资产来偿付(即:我们可以出口特别提款权或外币),如该表第III部分所示;也可以向外借款,如该表第II部分所示,因为,对你所得到的东西,你必须付款或者欠账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这种复式记账法意味着:整个国际收支平衡表

最后必须保持平衡。(如果复式簿记工作人员得不到有关每一项目的准确数字,那末,必须计入统计误差,正和第十章论述国民生产总值时的统计误差一样。但是,这不应该影响双方必然完全相等的逻辑。)

资本流动。现在,我们来看资本流动:(a)本国公民私人向外国公民私人发放或接受的长期或短期贷款(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海外建造一座汽车工厂,或者,我购买法国债券或把款项存入瑞士

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1974 年 (单位: 百万美元)					
横行 次序	(a) 项	(b) 目	(b) 贷	(c) 方 借	(d) 贷方净额(+) 或借方净额(-)
I	经常账目				
1.	(私人)货物贸易额		\$ 98,268	\$103,796	-\$ 5,528
	无形项目:				
2.	旅行和运输				- 2,692
3.	投资收入		26,068	15,946	+ 10,122
4.	其他劳务净额				+ 3,830
5.	私人物品与劳务差额				+\$ 5,732
6.	军事交易				- 2,158
7.	汇款、年金和其他转移支付净额				- 1,721
8.	美国政府赠款 (不包括军事赠款)				- 5,461
9.	政府经常项目差额				<u>-\$ 9,340</u>
10.	经常项目差额				<u>-\$ 3,608</u>
II	资本账目				
	长期放款(-)或借款(+)				
11.	私人				- 8,437
12.	政府				+ 1,119
13.	长期对外投资净额				<u>-\$ 7,318</u>
14.	经常账目和长期资本账目的基本差额				<u>-\$10,927</u>

658

续表

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1974 年 (单位: 百万美元)				
横行 次序	(a) 项	(b) 目	(c) 贷方 借方	(d) 或 贷方净额(+) 借方净额(-)
15.	非流动性的短期私人资本流动 净额			- 12,949
1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配给美国 的特别提款权			+ —
17.	统计误差净值			+ 4,834
18.	短期资本流动			-\$ 8,115
19.	流动性净差额			-\$19,043
20.	私人流动资本的流动 (从外国 人手中到他们的中央银行)			+\$10,669
21.	官方储备交易差额			-\$ 8,374
■ 储备和黄金资产流动净额				
22.	对外国官方机关所欠的债务			+ 8,481
23.	美国官方储备资产外流净额			- 107
24.	总计			+\$ 8,374
25.	形式上的总计净额			0

第 33-1 表

(资料来源: 取自美国商务部。)

659 银行, 或者, 阿拉伯人在美国购买纽约的不动产或财政部短期债券); 以及(b)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渠道的长期和短期的政府贷款和存款。

如果你使用下面的方法: 总是设想美国是在出口和进口资本的有价证券——或简言之, 出口或进口借据, 那末, 就不难决定在资本账目中, 哪些是借方项目, 哪些是贷方项目。这样, 你便能象看待普通货物的进出口那样看待资本的进出口。当我们向海外放款时, 它是借方还是贷方? 很显然, 我们是在进口借据——而进口总是造成借方数字。因此, 它是借方项目。

同样，当我们向海外借款时，这种借据的出口造成贷方数字。如果不采用这个方法，你会感到困惑。当我们向海外放款时，你将误认为我们是在向海外输出资本，从而造成贷方数字。这是错误的。我们这时所做的是进口借据，进口的借据是借方数字的补偿物，使我们能在经常账目中由于向外国提供信贷而得到收入。

第十三横行表明：1974年，美国总的说来是一个向外国进行长期放款的国家。我们在海外进行的长期放款和投资大于外国人在美国进行的长期放款和投资。我们总的说来是进口长期借据的国家，其净额为-\$7,318百万。

基本赤字。现在，我们暂时离开对经常账目、资本账目和黄金账目的简单论述。我们考察美国的基本赤字这一概念。某些短期资本的流动可以被用来补偿或抵消我们的贷方数字的不足。（例子：外国购买我们财政部短期债券和在我们银行存款，或者，急剧变动的购买我们普通股票的数量。）因此，我们把这些短期项目暂时排除在外，以便看出：在可以维持住的长期的基础上，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情况。

第十四横行对我们的全部经常交易和长期资本流动作了总计。政府的经常性的借方数字和私人长期投资的借方数字是如此之大，以致使美国具有一个所谓“基本赤字”的净额。在1974年，基本赤字为-\$10,927百万。

谈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赤字”是有点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复式簿记的恒等性质和习惯做法，整个国际收支平衡表必须在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这种意义上永远保持完全的平衡。那末，当报纸和议员们谈论美国在1958—1973年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赤字时，他们所指的是什么？他们所指的很可能是第十四横行的数字，即经常账目的赤字和长期（不是有价证券的）投资的赤字的总和。

短期资本流动。几乎完全抵消第十四横行的 1974 年的基本赤字的是第二十横行的贷方项目。出现这种贷方项目的主要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生产国最近把石油价格提高了三倍。由于无法在非常短的时间中把雪崩似的大量收入用来购买它们国内的发展和消费所需要的进口货，它们便通过它们的中央银行购买美国财政部的短期债券。第二十二横行表明：美国财政部的短期债券实际上主要掌握在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手里。看一下第十五和第十七横行便可以知道，不论石油情况如何，美国公民继续从事短期放款——如一家美国拖拉机制造商向一家扩充存货的外国经售商提供信用的事例。第十七横行的统计误差数字为数值为正

660 的 \$4,834 百万的贷方数字，这表明，到了 1974 年，无记录可查的大批金钱已不象在 1971 年以前美元定价过高时那样涌入瑞士和其他地方，而开始又被转换成美元。

储备和黄金流动。第十九横行表明，基本赤字被短期资本流动加大以后，达到了 \$190 亿的庞大的净赤字额。第二十横行表明，私人资本的流动（即持有美元的外国人把美元转移给本国的中央银行）额为 \$106.7 亿，这一数字具有抵消作用，最后使第二十一横行的官方储备交易差额具有 \$8,374 百万的赤字。

最后，表格的第 III 部分表明：我们不可避免地失掉国际储备并且欠下第二十四横行的 \$84 亿的负债总额。第二十五横行表明纯粹形式上的复式簿记的平衡。

§. 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表明该国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从历史上说，美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年轻的农业国变成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复习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的学习（但在时间短的课程中可以略去）。

1. 年轻和成长中的债务国。从革命战争到国内战争，我们在经常账目中的进口大于出口，其差额由英国和欧洲给我们的借款所补偿，以便建立我们的资本结构。我们在那时是典型的年轻而处于成长中的债务国。

2. 成熟的债务国。大致从 1873 年到 1914 年，我们的贸易差额表面上是顺差。但是，我们由于过去的借款而向海外支付的股息和利息的增长使我们经常账目或多或少地保持平衡。资本的流动也大致保持平衡，我们的放款刚好抵消我们的借款。

3. 新的债权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大大扩展我们的出口。最初，美国公民私人借款给交战中的盟国。当我们参战以后，我国政府借款给英国和法国，作为军事设备和战后救济之用。战争使我们成为一个债权国。但是，我们在心理上却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债权国的地位。国会在二十年代和 1930 年通过了征收高额关税的法律。由于我们排斥进口货，外国人感到很难得到美元来向我们支付利息和股息，更不用说偿还本金了。

只要我们仍然处于第三阶段，仍然是一个新的债权国——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象在整个二十年代那样，继续从事新的私人放款——表面上的一切就似乎很好。通过在大多数场合使用“赊账”的办法，我们有可能继续使出口大于进口。世界其他国家可以用黄金或借据偿付我们的出超。只要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能使一般的投资者对外国债券发生兴趣，一切就很顺利。但是，1929 年以后，当美国不再向外放款时，崩溃终于出现。国际贸易停滞。欠账被抵赖掉。对此，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应负同样的责任。

日本和西德在七十年代似乎正在重复美国在二十年代的许多经历——以及其错误！

4. 成熟的债权国。若干年以前，英国已经达到这一阶段。正象许多达到这一阶段的国家一样，它的货物进口超过出口。在我们对它的所谓贸易“逆差”表示遗憾以前，让我们看一看贸易逆差的真正意义何在。

英国公民生活得比从前更好，因为他们可以进口较为便宜的食品，⁶⁶¹并且不必为此而支付许多有价值的出口货。英国用它过去的对外放款的利息和股息收入来偿付它的入超。

对于英国说来很好。但是，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说来又怎样呢？它们

是否由于出口给英国的货物多于从英国进口的货物而生活得较坏一些呢？未必如此。在正常的情况下，英国过去借给它们的资本货物增加它们的国内生产——增加的数量大于支付给英国的利息和股息所代表的数量。二者都得到好处。十九世纪的对外放款具有双重的利益：它使放款者受惠，也使借款者受惠。当然，国际贸易和金融并不总是如此顺利地运行。某些投资是不明智的。殖民地和民族主义的政治问题使得情况复杂化。整个过程走了弯路，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停顿下来。

美国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我们从海外得到的收益帮助支付我们的进口以及我们的援外和防务开支。过去的资本流动给我们带来了这些极其重要的投资收益。

§. 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意义

现在考察资本流动的性质。如果民族主义的政治问题和国内的失业问题不被牵涉在内，那末，国际借款的基本之点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可以透过货币和金融的外衣，把注意力集中在物品和资源等实物方面。

在一国内，资本如何得以增长？通过把劳动、土地、机器和其他资源引导到脱离消费品生产的途径，把它们用于种植树木、疏浚河流或建造新机器或新建筑。所有这一切增加我们将来的收入和消费。

我们是在为了将来的消费而推迟目前的消费——为了将来得到更多的消费。将来的消费增长来自何处？正如第三十章所述：资本货物具有“净”生产率。这一事实构成利息率的实际内容。

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数量的资源：劳动、矿藏、气候、技术知识。如果不是由于无知或由于政治疆域的原因，那末，没有人会在北美洲投资到使其收益为百分之五的地步，而与此同时，在其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收益为百分之十的机会。某些资本肯定要被投放于国外。这会使国外的劳动者得到较高的工资，因为外国劳

动者现在会有较多和较好的工具供其使用。这会 增加 外国的生产。增加多少呢？多到不仅能补偿资本货物的折旧，而且还能对我们的投资支付利息或股息。利息会以从海外得到的物品与劳务的形式支付给我们，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一个完全明智的科学家很可能会赞同这个过程。^①在他看来，资本的这种投放是合理的，因为资本流到了生产率最高的地区。

什么时候会把本金偿还给我们呢？只要我们得到好收益，没 662 有理由认为，我们会要求归还本金。然而，一度落后的国家可以最终变为相当富有。它可以在消费上厉行节约并且用它的储蓄来购买我们在它那里所拥有的工厂、农田和矿山。但是，假设我们非常富有，储蓄充足而且在国内拥有如此之多的资本，以致利息率很低，我们也许并不特别愿意出售或者取回本金。我们可能提高我们在海外的农场和工厂的卖价。换言之，我们也可能会满足于较小百分比的利息收益。因此，除非一个国家变穷了，否则它就没有理由一定要收回它过去放的款。

经济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抬头时，事情便发生了变化。在美国领土以内，利息和股息可能从南部流到北部，从西部流到东部，一直到世界末日为止。少数几个人也许会抱怨缺席的所有权；然而，我们有法庭和警察来保证私有财产制度受到尊重。

在国家之间，情况则不然。当一个国家贫困时，它可能急于借款。在借到之后，便不愿意向海外支付股息和利息。它想忘掉，它的繁荣部分地来自过去的借款。其中所牵涉到的不仅是经济负担的问题；而且在政治上它们也不愿意本国的财产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它们常常坚持要去掉它们在国际上的负债——以公道或不

^① 应该对这句话加上限制条件。有的时候，跨国公司可以取得矿山和油井的所有权，即使它从海外带来的款项很少。腐败的政府也可以把一国的资源永久地给予别人。

公道的价格偿付这些债务,或者,往往干脆剥夺“帝国主义剥削者”的财产(如卡斯特罗的古巴那样)。

经济和政治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某些人说:“贸易跟随国家力量前进”。另一些人说,国家力量跟随贸易前进。某些人说,追求经济利益是帝国主义寻求殖民地的主要动机。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权力(进攻的和防御的)本身便是一种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经济利益作出牺牲;寻求资源的目的是为了军事力量(进攻的和防御的)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的需要。

根据这种说法,只要没有战争和民族主义,任何人都可能在任何地方进行投资和从事贸易,而聪明人应该情愿居住于没有费用庞大的国防设施和殖民地行政机构的小国。在另一极端的观点则为:战场上的胜利,而不是舒适的生活,才是生命唯一有价值的目标;和祖国相比,外国人是微不足道的;应该没收外国人的物品和田地,驱使他们为征服者而劳动。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世界处于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间。

总结和复习

A. 外汇和对外贸易的机制

1. 同其他国家作交易必须以本国和外国货币的汇率的存在为前提。两个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具有稳定的汇率,汇率取决于二者据以买卖黄金的稳定的平价——不论它们使用金条、金币或金汇兑本位制,均系如此。

2. 古典经济学家(如大卫·休谟)依靠黄金流动来改变相对价格水平:(a)增加贸易赤字国的出口,(b)减少贸易赤字国的进口以及(c)减少贸易盈余国的出口,(d)增加贸易盈余国的进口。

3. 一旦放弃了金本位制下的稳定的汇率,外汇的供给和需求

曲线的相互作用便决定有伸缩性的汇率。在最长时期中，汇率在其上下浮动的平均水平主要取决于两国中央银行所决定的货币数量：每一国的价格水平都与其货币数量(M)保持比例，然后，通过“购买力平价”，相对的汇率的一般水平得以决定。

4. 金币和金条在国际范围内发展成为金汇兑本位制，在各国内部发展成为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最后，美元取代了英镑而成为关键货币。到七十年代，经布雷顿森林会议修改的金本位制体系最终崩溃了。

5. 七十年代中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后的体系，实质上是某种“管理浮动”的体制。汇率的相对升降取决于出口和进口的供给和需求；然而，政府有时也进行干预，以便限制和加大变动的幅度，因而“干净的浮动”要比“肮脏的浮动”少些。出现了双层黄金市场；在其中，私有公司和投资者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官方储备来说，特别提款权(即“纸面黄金”)起着补充官方黄金储备的作用。

B.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平衡

6. 国际收支平衡表系指消耗和提供外汇的一切交易而言。它把我们物品与劳务的出口和进口总额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物品、劳务、黄金储备和债券的出口是贷方项目，为我们换取外汇。我们的这些东西的进口是借方项目，消耗我们的外汇。

7. 用“无形的”劳务项目对我们的货物贸易净额加以调整并且把我们单方面的政府外援方案计算在内便可以得到我们的经常账目的净额。它和长期资本流动净额构成“基本赤字”。“基本赤字”为短期资本流动以及储备与黄金资产的输送所补偿。比这个数字还要庞大的是官方清偿赤字，该赤字目前包括从美国流出的短期资本和持有美元的外国人转移给他们本国中央银行的

美元。

8. 一个国家从“年轻的债务国”发展成“成熟的债权国”，其国际收支要经历几个各具特点而相互连接的阶段，最终部分地依靠过去的对外投资而生活。

9. 在国际金融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解资本流动在实物方面和货币方面对发达国家和对民族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664

附录: 国际贸易带来的失业问题 和货币定值过高

§. 对外贸易乘数

休谟的古典学派的机制主要依靠相对价格。该学派的基本假设是：无论什么时候就业都是充分的——对外贸易从来不会把社会移动到它的 $P-P$ 生产可能性边缘之内，也从来不会把它从原有的边缘之内的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位置推向边缘。

然而，我们在第二编中看到，自由放任的制度并不永远自动地处于充分就业。除非对它使用稳定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或者，除非存在着比现代的混合经济更为理想的有伸缩性的工资和价格水平），否则，上述的假设条件便不能得到保证。

665 那么，国际经济力量会对第二编的 $C+I+G$ 的均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推测，出口和对外投资的增加同国内投资的增加一样将会对国内的生产和就业产生扩展性影响。

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两者的乘数作用是一样的。新增加的出口对产量确实具有乘数作用。它直接提高收入，而且还引起一连串的进一步的支出和再支出。

例如，\$10 亿的向美国东部的机床制造厂的定货会在最初造成 \$10 亿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然后，劳动者和工厂主也许会把他们的新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购买印第安纳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生产的消费品；由此而增加的收入的三分之二又被花费掉。这个过程只有达到下列的总和时才会终止：

$$3 = 1 + 2/3 + (2/3)^2 + \dots = 1 / (1 - 2/3)$$

这就是说: \$10 亿的最初的开支再加上 \$20 亿的附加的消费开支。

进口的渗漏作用。除了发生出口的乘数作用以外,国际贸易还有第二个重要作用。我们国民总产值的提高将增加我们的进口,假设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一美元使进口增加 $1/12$ 美元。这就意味着: 我们的一连串的引致的国内购买力将要快于上面例子的速度缩小。在每一个步骤,这种进口起着“渗漏”的作用,正象边际储蓄倾向一样。^①

因此,在原有的出口商得到的 \$10 亿的收入中,也许只有其中的 $7/12 (=2/3 - 1/12)$, 而不是 $8/12$, 用来购买美国的消费品(美国本国生产的)。同样的情况存在于任何步骤。整个的乘数现在加在一起,仅得到:

$$1 + 7/12 + (7/12)^2 + \dots$$

或者,仅为:

$$1 \div (1 - 7/12) = 1 \div 5/12 = 2^{2/3},$$

而不是上面的 3。可以看到,数值为我们所添增的收入 ($2^{2/3}$ 个 10 亿 = \$24 亿) 的 $1/12$ ——或在我们的例子中,为 $1/5$ 个 10 亿 = 2 亿——流向海外来购买更多的进口货。一般的法则可以述之如下:

出口可以提高国内的收入,然而,由于引致的进口,所以乘数的数值减少。在每一个步骤中,只要收入的一部分漏入国内的储蓄,每一元新的出口就会提高收入,但决不会把收入提高到足够的高度,以致造成整个一元的新的进口。^②

总之,我们可以说: 对于国际贸易所造成的收入的变动的的影响往往需要加以部分的调整,但是,收入的变动必然使价格或汇率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其原因是: 我们出口的自发的增加决不会造成足够多的进口的扩大来在

① 把外贸乘数的分析应用于小城市或小国家,你会发现: 第一次以后的一连串的作用对于该城或该国的劳动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大部分增加的收入会渗漏到其他地区。

② 假设每一元增加的收入总是被分成为三个部分: c 用于美国的消费品, b 用于美国从海外进口的货物, a 为剩下来的用于储蓄的部分。在该条件下,假设出口增长了一个单位。乘数分析告诉我们,收入增长的数量为 $1/(1-c) = 1/(b+a)$ 。用 b 去乘这个增加的收入,我们得到 $b/b+a$ 的引致的进口,其数量肯定低于我们原先的一元的新出口——原因在于边际储蓄倾向具有正的数值。(如果出现引致的国内的投资,那末,我们可以把它计入 c 之中,从而,对于任何具有正数值“渗漏” a 的“稳定的”社会而言,我们的上述结果都是适用的。)

我们与海外之间的收支平衡表上抵消前者的全部影响。

§. 货币定值过高与失业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两个地区，称之为A和E，顺次代表美国和欧洲。虽然德国仅为欧洲的一部分，但我们假设二者的货币为美元和马克。又假设A和E的外汇处于长期的均衡状态，即：每四马克换一美元，或者说每马克为\$.25。

假设欧洲的生产率开始时远低于美国，但增长率却高于美国。如果E的一切货币工资和利润按照生产率的速度增长，那末，对于均衡，不会产生持续的干扰：因为相对于A的不变的价格而言，E的生产率和货币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的加倍使得它的价格和过去一样。结果，E的实际收入水平
666 作出相对于A的增长，也许会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但是，只要E的收入水平的变动在恩格尔规律的作用下不影响它对A的进口货的需求，就不会出现对均衡的干扰。E的实际收入的增加既不有害于也不有利于A。

然而，更符合于现实情况的假设是：货币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并不在E立即作出和生产率速度相同的增长，即使它们就相对停止不前的A而言还是增长较快的话。在这种情况下，E的物品成为便宜货。即使在A的国内并没有出现工资或其他方式的通货膨胀，A的物品现在也比较昂贵。后果为何呢？E的出口在数量上和（很可能）在价值上扩大；而A的出口则在数量上和（很可能）在价值上缩小。如果收支平衡表在以前是平衡的，那末，A在现在具有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

我们可以说：以前，在1美元换4马克时，美元既不定值过高，也不定值过低；现在，同样在1美元换4马克时，美元肯定是“定值过高的货币”，因为美国具有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和过高的成本水平。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其他国家的技术水平提高较快，这种提高部分地缩小了我们与外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相对降低了它们的成本。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A在经常账目上的赤字很可能由于A的投资者想在E进行投资而加大，因为这种投资也很可能带来很高的利润，其原因在于：(a) E的迅速发展；(b) E在技术上的迅速提高；(c) 由于A的厂商把技术知识应用于E而导致的取得利润的大量机会。

货币定值过高的影响。1. 如果A在过去具有充分就业，那末，我们出口货生产的缩小（以及可能存在的内销货受到较便宜的进口货排挤的情况）意

味着就业量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乘数的方式下降。

2. 我们不能使用联邦准备银行的松动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投资 (I), 因为害怕低利息率会把有用的现款驱使到 E 处来寻求较高的收益。

3. 如果象肯尼迪和约翰逊在六十年代所做的那样, 我们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扩大政府开支 (G) 并且降低税率来扩大消费 (C) 和投资 (I), 那末, 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失业问题; 但是, 由此而造成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会消除掉我们由于过去收入下降而引起的从 E 进口的货物的减少 (从 E 进口的货物的减少会部分地缩小我们国际收支的逆差)。

4. 如果 E 在过去具有充分就业, 那末, 它现在受到过度就业的威胁, 具有需求扩大型和成本提高型的通货膨胀。如果 E 在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萧条, 那末, 它会很幸运地成为货币定值过低的国家, 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量都会有增长。如果 E 在过去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那末, 它现在会沉痛地埋怨: 它正在从挥霍金钱的 A 那里“进口通货膨胀”(同时, 在它的过度膨胀的出口行业中, 滋长出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会在政治上进行顽强的斗争来阻止对 E 的定值过低的货币进行任何调整)。

5. 实际上, 由于 E 的货物的市价现在已经相对地低于 A 的货物的市价, 所以均衡受到干扰的贸易条件——我们的出口和进口价格的比例——变为有利于 A 。可以这样说, E 是在把物品赠送给 A 。 A 不仅仅得到便宜的物品——这正是合乎理性的非重商主义国家的目标——而且, 我们居于 A 的人们还能用没有用处的黄金或美元借据来暂时地换取一些物品 (难怪“仁爱地忽视国际收支的非均衡状态”这一使人感到宽慰的学说能在 A 吸引那么多人呢)。

纠正货币定值过高。怎样纠正这一状况呢? 我们在 A 的人可以等待着 E 的通货膨胀来提高 E 的价格, 从而结束 E 的货币定值过低的状况。如果 E 的生产率继续保持奇迹般的增长速度, 那末, 我们的等待可能时间很长并且令人厌倦。

或者, 在过去的时代中, A 可以试图把自己的工资和成本压缩百分之十五或三十。在具有相当固定的管理价格和工资的混合经济制度里, 如果哪个国家试图通过国内的成本压缩来调整货币的定值过高, 那末, 它的街道上将流着动乱的鲜血。

或者, A 可以祈祷奇迹的出现, 使它的生产率增长。要求我们大家工作辛苦一些和技术提高一些的号召无疑地会大量到来。

或者, E可以使马克升值^①。当马克从\$.25上升到.40时, 德国的出口货较为昂贵, 来自美国的进口货较为便宜。这样, 就会再度出现均衡, 双方货币的价值都不是定得过高^②。然而, 我们假设: 在我们要调整货币价值的年份中, 货币升值恰恰是政治上办不到的事情。

如果A的黄金多到足以应付长期的外流而E愿意接受A的欠账的程度又是足够的大, 那末, 非均衡状态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 也许到了那时, 幸运会使需求之风吹向有利于A的方向; 或者, A的生产率可能增长; 或者, 对于两国的投资者而言, A成为有利可图的从事长期投资的地方; 或者, A国的政府可能勉强地缩减海外驻军和外援开支。

具有定价过高的货币的国家会受到很大的国内压力来干扰自由贸易, 企业家和劳动者会叫嚷着要求征收保护性关税和规定进口限额。国会会考虑, 避免花钱很多的外国旅行, 抑制资本向国外自由流动, 实行全面的外汇管制, 提供出口补贴, “以某种方式限制”外援和要求在本国购买军事装备, 即使其价格两倍于国外。总统会通过“自愿的”或强制的投资方案, 劝告企业界节制向海外进行有利的投资, 同时也会征收所谓“利息均等税”, 对海外的长期投资征收百分之十五到三十的税。

在历史上, 大多数长期定值过高的货币都造成货币自由兑换的停止和国际贸易的控制。一旦以这种方式处理货币定值过高的问题, 就很难把人为的限制去掉, 因为当人为的限制去掉时, 国际收支会重新出现逆差。历史上充满着由于急于恢复自由兑换而造成混乱或恢复人为的限制的事例。

古典主义的致命弱点。在这里, 我们要强调的是对货币定值过高的经济分析。我们会发现, 被否定掉的重商主义的观点——惧怕黄金外流、坚持进口抑制和出口补贴、企图向海外输出失业、希望以较便宜的价格, 而不以较昂

① 或者, 同一件事的另一做法, A可以使货币贬值。

② 如果E的生产率在一切行业中都普遍提高, 那末, 在新的均衡状态, E将处于较好的经济状况, 而对我们而言, 既无好处, 也无坏处。(例如, 相对于我们而言, E的生产率和成本的百分之三十的改善可以为百分之三十的货币升值所抵消。我们用和过去一样的美元的代价来从德国进口同样的物品; 德国人现在可以用同一小时的劳动来购买比过去多百分之三十的国内物品, 或按照比过去便宜百分之三十的美元从我们进口比过去多百分之三十的物品。)但是, 更合乎事实的假设是: 德国的生产率的增长大致偏向于制造它一向从美国进口的物品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推想: 处于新的均衡状态, 相对于我们现在支付的进口价格而言, 我们的出口价格下跌。欧洲的进步使我们稍微遭受到一些损失, 其原因是: 我们现在不再能以如此“有利的贸易条件”进行贸易, 因而失掉了“消费者剩余”。

贵的价格送出物品，等等——在货币定值过高的情况下全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休谟、斯密和萨缪尔森的古典学派的和新古典学派的巧妙的论点已经不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均衡的货币比价这一大前提已经被明确地否定。保护主义蔓延开来。

下两章将阐明赞成和反对关税和限额的论点。我们将说明比较有利条件这一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论证：地区间的分工和贸易对于有关的双方均有益处。如果价格和工资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伸缩自如的，或者，如果汇率可以肯定地处于既不定价过高也不定价过低的状态，那末，这两章中的论点就是不容反驳的。这里有一个例子：

第三十四章指出，货币和外汇的外衣不过掩盖了贸易的物物交换的性质。它说：“一个国家不能在一切物品上都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另一国家出售物品，而只是在前者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物品上，才能如此。与此同时，后者也只是在对自己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物品上才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前者出售物品”。在李嘉图的两国工资比例可以伸缩自如，从而汇率从来不会定价过高或过低的模型中，这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如果一个国家坚持把本国物品的货币价格规定得异常昂贵（由于极高的工资率或利润率），它肯定会由于定价昂贵而不能存在于市场，给自己造成定值过高的货币、失业和国际收支逆差。无论如何，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坚持要求每小时报酬为 \$100,000 而做出同样的事情。如果任何一个地区，如美国东部，坚持使用在市场上不可能卖掉物品的价格，那末，美国南部会在一切物品上以较低的价格占有市场。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某一国家的内部，都会出现定值过高的问题。

第三十四章 国际贸易和 相对有利条件论

国际贸易的益处,在于更加有效地利用世界的生产力。

约翰·S. 穆勒

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专业化如何会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现在,我们必须透过国际金融的表面现象来说明:这在国际贸易的领域中究竟如何得以实现。

为什么美国在一世纪以前专业化于生产农产品,而以此和欧洲生产的工业品相交换?为什么美国在今天能向世界各个角落出口高度复杂的成批生产的物品?为什么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的农业是如此不相同?完全自给自足会使现代国家付出多大的代价?为什么一切国家都会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相对有利条件”论或“相对成本”论,回答了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该理论是由大卫·李嘉图、约翰·S. 穆勒以及亚当·斯密的其他追随者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出来的。相对有利条件论是逻辑严密的学说。如果把它正确地表达出来,那末,它是无懈可击的。根据这一学说,我们可以在目的为限制进口的保护关税的政治宣传中找出明显的荒谬论点。根据这一学说,我们有时可以在坚决要求关税和进口限额保护国内市场的主张中,找出一丝真理。

§. 国家地区之间条件的多样化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起始时,设想两个国家或大陆,譬如

说欧洲和美洲，或者热带和温带。其中每一个均被赋有一定数量的自然资源、资本货物、不同种类的劳动以及技术知识或技能。比较成本的推理过程的第一个环节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条件的多样化。

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不同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是很不相同的。在每一或任何地区中，虽然人们可能试图生产每一种物品，然而，他们显然不会成功；或者，即使成功，也要付出惊人的代价。亚当·斯密指出：用温室和人工培植的方法，酿酒用的葡萄也许会在苏格兰生长；但是，以消耗的经济资源来计算的成本是高昂的，而生产出来的成品未必适合于饮用。⁶⁶⁹

即使由于偶然的原因，两个国家都能生产相同种类的商品，它们一般也会发现：每一国家专门生产某些物品——并用之来换取其他物品是有利的事情。

如果我们考虑，譬如说温带和热带之间的贸易，那末，上述的命题会是平凡的真理。不用说，接近赤道的资源比较有利于香蕉的生长，而北方的资源则较适合于种植小麦。每个人都能立即看出：在这种场合，专业化和贸易会增加这两种物品的世界产量，而且也增加各国消费这两种物品的能力。

虽然并不如此明显，然而，正确性决不稍少的是：

即使两个国家中的一个能以较低的成本（用劳动或一切资源计算）生产每一种商品，国际贸易也仍然对双方有利。每小时工资为\$7的美国和每小时工资为\$3的日本进行贸易能否得到好处？根据相对有利条件论，是能够得到好处的。

一个国家在生产每一种物品上可以绝对地比另一个国家具有更大的效率，也就是说，另一个国家在生产每一种物品上具有绝对的不利条件。但是，只要在生产不同的物品上，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相对的效率差异，我们就可以永远肯定：即使处境不好的国家在

生产它相对的最有效率的物品上也具有相对有利条件；这个处境不好的国家在生产另一些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商品上，具有相对的不利条件。同样，处境优越、效率高的国家会发现：它应该专业化于它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生产领域，想办法进口那些生产条件相对不利的商品。

说明这个相对有利条件之谜的传统例子是一个在某城市中为最好的律师而同时又为最好的打字员的事例。她是否应专业化于法律而把打字工作委之于秘书？她怎么能放弃她的相对有利条件极大的律师业务，而把宝贵的时间用于她虽然具有效率但是缺乏相对有利条件的打字工作呢？或者，从秘书的观点来看，在两种业务上，她都比那位律师缺乏效率，但是，和那位律师相比，她在打字上具有最少的相对不利条件。相对说来，秘书在打字上具有相对有利条件。

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假设美国生产食品需要的劳动为欧洲的三分之一，生产衣服为欧洲的二分之一。这样，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在食品上具有相对有利条件，而在衣服上具有相对不利条件——这是对的，尽管美国在每一物品上都绝对地具有最大的效率。按照同样的道理，欧洲在衣服上具有相对有利条件。

这个概念的关键是“相对”这一名词——它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在某些物品上都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同时又在其他物品上具有一定的“不利条件”。

670

§. 一个简单事例：欧洲和美国

我们用一个简化的例子来说明国际贸易的这些基本原理。让我们考察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 and 欧洲并且集中于两种物品食品和衣服。在美国，相对于劳动和资本而言，土地和自然资源在那时是很充足的。然而，在欧洲，相对于土地而言，人口和资本是充足的。

如果我们观察象比利时那样的国家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对比就会更加明显。在比利时，为了得到尽可能高的产量，许多人使用大量肥料勤奋地耕种小块土地。以此和早期美国的广种薄收相对比：美国的一个家

庭耕种大片的土地，通过把人们的劳动“少量地平均用于”几乎自由取用的土地上，国民产品得以达到最大的数量。在比利时人看来，这是浪费。然而，由于我们相对高的劳动和资本的成本以及相对低的地租的成本，这却是妥善的办法。

当然，如果多余的人口都能从比利时迁移到美国，那末，收益递减规律意味着：这里的实际工资会降低到等于那里的工资上升到的水平；同时，那里的较高的地租会降低到等于这里的地租上升到的水平。^①

但是，假设美国禁止海外来的移民，以便使这里的劳动稀少和工资优厚。从同一自私自利的前提出发，美国是否应该征收保护性关税，以便阻止其他国家的货物进入美国？或者，不应如此？为了回答这一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地衡量在下列情况下，每一国家所生产和消费的食品和衣服：(a)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和(b)如果根据相对有利条件，听任自由贸易发挥自己的作用。

§. 相对有利条件规律

大卫·李嘉图是股票经纪人和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是地租论和货币问题专家。他在1817年雄辩地证明，国际专业化有利于所有国家。这就是著名的相对有利条件论，有时也被称为“相对成本论”。

为了简明起见，李嘉图仅仅使用了两个国家的事例。我们称它们为美国和欧洲，同时作出一个不重要的假设：假设二者的疆域相等。为了简单化，他仅仅使用两种物品。我们称它们为食品和衣服。为了简单化，李嘉图选择劳动时数来衡量一切的成本。我们也依此而行，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把简单化的假设抛

^① 实际上，与此同时，这会使世界的总产量增长。为什么？因为把农民从较穷的比利时农庄转移到较富的美国农庄会增加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世界的总产量。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会使世界的 $p-p$ (生产可能性)边缘向外移动。

弃时，较高深的著作和本章的附录将提供一些必要的限制条件。相对有利条件原理所含有的真理的内核依然存在。

不寻常的常识。当欧洲的劳动者在一种物品上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而美国的劳动者在另一种物品上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时，人们根据常识，可能会同意：在这第一种简单的场合，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很可能对二者相互有利。

671

美国和欧洲在生产上所要求的劳动量		
产 品	在 美 国	在 欧 洲
1 单位食品	1 劳动小时	3 劳动小时
1 单位衣服	2 劳动小时	4 劳动小时

第 34-1 表 相对有利条件仅仅取决于行业的相对效率和行业的相对的缺乏效率

在食品和衣服上，美国都具有较低的劳动成本：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处于欧洲的两倍和三倍之间（在衣服上为两倍，在食品上为三倍）。然而，贸易对我们双方还是有利的：美国出口食品，因为我们在食品上具有最大的相对有利条件（最大的相对效率）；美国进口衣服，因为我们在衣服上具有相对的不利条件（最小的相对效率）。我们的相对不利条件是欧洲的相对有利条件：欧洲在出口衣服上具有相对的“最少的缺乏效率”，在它进口的食品上具有最大的“最小效率”。一切取决于四个劳动成本的数值，特别是 $1/2$ 和 $3/4$ 的比例：我们的 $1/2$ 小于它的 $3/4$ ，我们出口食品。

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生产 1 单位的食品比在欧洲需要较少的劳动日，而在欧洲生产 1 单位的衣服比在美国需要较少的劳动日。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人并不需要李嘉图或职业经济学者来告诉他：美国很可能要专业化于食品生产，出口食品来换取欧洲出口的衣服。

但是，李嘉图所证明的远不止此。他证明：即使在较为困难的第二种情况下——在其中，美国的劳动（或一般资源）在食品和衣服两种物品上都比欧洲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贸易仍然很可能对双方有利。

第 34-1 表按照这个具有一般性的第二种情况来说明相对有利条件的原理。在美国,1 单位食品的成本为 1 小时劳动,而 1 单位衣服的成本为 2 小时劳动。在欧洲,食品的成本为 3 小时,而衣服的成本为 4 小时。通过这四个关键数字所形成的适当的比例,李嘉图能够确凿无疑地证明:如果美国专业化于食品并且出口食品来换取为欧洲所专业化的衣服的出口,那末,美国和欧洲双方都会得到好处。

在考察这一点以前,让我们听听欧洲的普通人在说些什么:

我的上帝!和美国这个庞然大物进行贸易永远不会使我们得到好处。它的效率使它能在每一物品——食品与衣服——上用低价把我们打垮。在衣服上,它的生产率是我们的两倍;在食品上,则为三倍。我们需要进口关税和限额来保护诚实的欧洲劳动者。

现在,听听那些还没有掌握相对有利条件规律的美国小城市报纸的编辑和议员们在说些什么:

欧洲的工资水平无容置疑地远远低于这个世界上最富裕(以及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我们让美国的劳动者和那些每天以比我们低的收入维持生活的贫穷的欧洲劳动者进行无限制的竞争,那末,美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就会猛烈下降。我们迫切需要对付廉价进口货的保护性关税,以便维持美国的生活水平。

李嘉图所证明的是:上述两种论点都是错误的。

在自由贸易的均衡状态下,欧洲的实际工资会处于美国实际工资的一半和三分之二之间——不低到使欧洲能在一切物品上用低价打垮我们,也不高到使我们能在一切物品上用低价打垮他们。但是,这些最终达到的自由贸易的实际工资率在每一地区均比开始贸易以前的自给自足时期的要高——因为每一地区的劳动者均能以较少的劳动小时来换取进口货。

672 作为上述论点的推论之一是：一方的或双方的保护性关税将会减少双方的实际工资。（在我们的时代中，我们还可以继续说：存在着比保护性关税要好的方法来保证双方均有充足的就业机会——即：适当的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以及适当伸缩的汇率政策。）现在，我们来证明所有这一切。

开始贸易以前。我们起始的情况为：极度高昂的关税使所有国际贸易不可能进行。第 34-1 表说明：美国劳动者每小时的实际工资为 1 单位食品或 $1/2$ 单位的衣服。欧洲劳动者的情况甚至还要坏一些；在开始贸易以前，每一小时劳动仅能换到 $1/3$ 单位的食物或 $1/4$ 单位的衣服。

很明显，在两个互不往来的大陆上，内部的竞争使得两个地方的食品和衣服的价格比例不同，因为相对的劳动成本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在美国，衣服的价格为食品的两倍，因为前者的劳动成本两倍于后者。在欧洲，衣服的价格仅为食品的 $4/3$ 倍。

进行贸易以后。现在，取消使贸易不可能存在的保护性关税并且使贸易自由化。衣服和食品的相对价格现在必然具有同一水平，正和在消除阻塞物以后，两节相连管道的水必然保持同一水平一样。为什么？

竞争的商人总是在物品便宜的地方买，在贵的地方卖。由于衣服在美国相对地更加昂贵，孜孜以求的商人很快会把衣服从欧洲运到美国；同时，他们也把食品从美国运往欧洲，因为，那里的食品相对昂贵。我们的服装行业将感到进口货的激烈的价格竞争。如果第 34-1 表的数字没有变动，那末，服装行业的所有的劳动者会进入另一雇用工人的行业，美国的食品行业。相反的情况存在于欧洲：劳动者将离开食品行业而进入欧洲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

服装行业^①。

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得到好处。象任何一个商人一样，它会向其他厂商购买电力，如果它自己不能以同样便宜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话。美国已经利用了以交换得来的衣服比国内生产的要便宜这一事实。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欧洲得到的好处。它的好处来自衣服的专业化并且来自用交换而不是用国内生产得到较为便宜的食品。

得到好处的例子：每一单位的美国劳动仍然得到它在这里所生产的1单位的食物。但是现在，1单位食物可以交换到多于 $1/2$ 单位的衣服。多了多少呢？肯定不多于欧洲的成本所决定的 $3/4$ 。贸易开始以后所达到的同一比例应在 $1/2$ 和 $3/4$ 之间的某一数值。美国劳动者在衣服上得到的好处为任何超过 $1/2$ 的部分；欧洲的劳动用衣服交换食物得到的好处为任何低于 $3/4$ 的比例的部分。（见本章附录的进一步的论述。）

我们承认李嘉图证明了两个国家根据相对有利条件从事贸易都得到了好处。然而，每一国的劳动者的情况如何？第34-1表可以证明：在两个国家中，他们的实际工资都有提高。现在，美国劳动者的一个劳动日可以使他购买和以前相同的食物，但是，一个劳 673
动日可以换取更多的进口衣服，从而，他有能力消费更多数量的两种物品。同样，欧洲的一个劳动日可以使欧洲的劳动者得到更多的进口的便宜食物，而由于他在衣服上得到同样的实际工资，他的收支预算处于较好的情况。使得每一个人改善情况成为可能的原因，是专业化和贸易所造成的两种物品的世界产量的增加。

1. 相对有利条件原理的再度叙述：不论两个地区中的一个是否在生产每一种物品上都绝对地比另一地区更加具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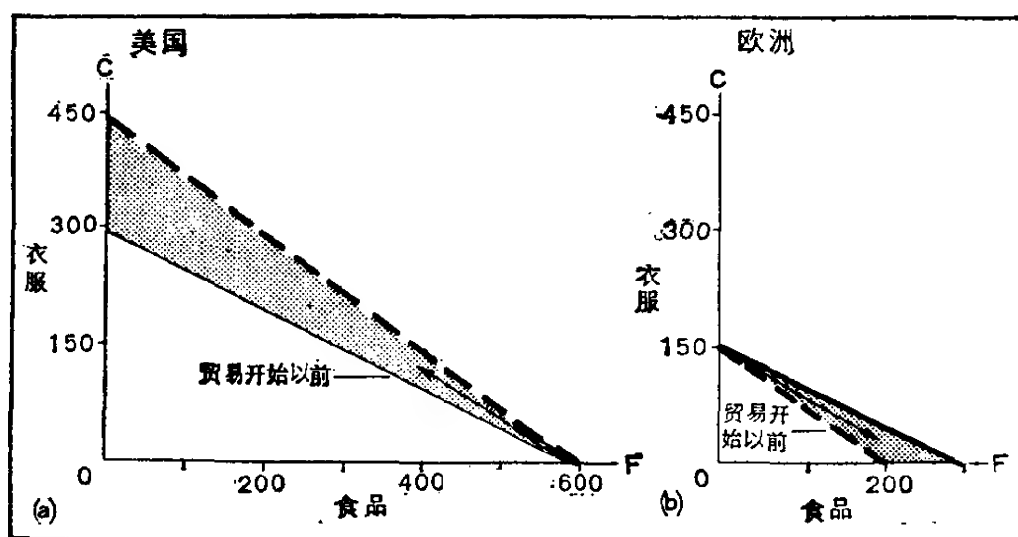
① 一位1970年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亨利·摩根斯顿写给我下列的法则。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竖行数字，写下相对的劳动成本。在这里，为 $1/2$ 和 $3/4$ 。找到具有最小数值的国家：这里为具有 $1/2$ 数值的国家。该国数值的分子表示它将出口的物品。在这里，美国的出口为食物。〔同样，最大数值($3/4$)的分母告诉我们，欧洲出口衣服。〕

率,如果每一地区专业化于生产它具有相对有利条件(具有最大的相对的效率)的物品,那末,贸易对两个地区都有利。两个地区的生产要素的实际工资都将得以提高。

2. 错误地规定的限额或使贸易不可能进行的关税,不但不会帮助被保护的生产要素,反而会减少他们的实际工资,因为限额和关税使进口货昂贵,而且消除掉专业化和分工的最好型式所固有的效率,使整个世界减少生产能力。

上述简单的原理给国际贸易提供不可动摇的基础^①。

① 为了在图形上理解这一点,请看第 34-1 (a) 图。该图说明美国国内的生产可能性边缘。该边缘的斜率表示食品对衣服的 $1/2$ 的价格比例。



第 34-1 图

在第34-1(b)图中,欧洲的国内的 $p-p$ 生产可能性边缘具有 $3/4$ 的斜率。(说来也巧,欧洲的人口大致等于美国的人口,那为什么欧洲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大大“小于”美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呢?因为美国的生产率是欧洲的两倍。)李嘉图说:“使得有利的贸易成为可能的原因是斜率之间的差距。”有利到什么程度呢?其限度(在本章附录中加以解释)被下列两条线段之间的面积表示出来:(a)每一国家的国内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和(b)通过各自的专业之点而和另一国的曲线平行的线段。这样,处于两线之间的相互平行的表示自由贸易均衡的两个箭头(箭头的斜率处于美国的 $1/2$ 和欧洲的 $3/4$ 之间)说明贸易可能带来的后果之一:处于从事贸易以后的每单位食品换取三分之二单位衣服(即为: $2/3$)的均衡状态,美国由于单纯生产食品并且用它出口换取衣服而得到好处;欧洲由于单纯生产衣服并且用它出口换取食品而得到好处。

自由贸易下的充分就业。最后的几句话：只要每一国家的工会和政府的行动不迫使货币工资保持过高的水平，处于自由贸易均衡之下的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在一切的物品上为对方的低价所打垮。例如，美国的货币工资应该处于欧洲的二倍和三倍之间（以美元或英镑来计算——譬如说，在这里为\$7，在那里为\$3；或顺次为£3½和£1½）。但是，应该注意：如果工会、国会或联邦准备的货币(M)扩展把我们的工资提高到每小时\$9，而与此同时，欧洲的工资仍然为每小时\$3，那末，这种工资成本的上升当然会破坏国际收支的均衡，甚至会使所有美国劳动者失业。必须使美元对英镑的平价贬值——如第三十三章所说——才能恢复有竞争能力的货币工资水平。

上述国际贸易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不仅适用于苏联和波兰之间或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而且也适用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本章以下部分，并不是理解这一基础所必需的。

§. 国际贸易的其他原因

成本递减。如果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用发生决定性的作用，那末，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这会加强国际贸易的必要性。实际上，除相对成本的差别外，成本递减是进行国际贸易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它说明了专业化和贸易为什么会带来好处。因为正如第三和第二十五章所论述的那样，只有当广阔的市场存在时，大规模的专业化才是最有成果的。

事实上，即使当两个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着比较成本的差别时，它们用掷硬币所得到的正反面来决定在两种收益递增或成本递减的物品中生产哪一种，也会给双方带来好处。完全的专业化会使两种物品的世界产量增加。这可以用第三章所论述的一对印第安人的双生子的例子加以说明。尽管他们完全相同，但他们发现，用

专业化来取得“成批”生产的效率仍然是有利的。我们将在第三十六章中看到，欧洲共同市场就是为了取得这种扩大的分工的效率而成立的。

此外，在成本递减的状态下，还可以观察到国际贸易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方面。这种状态的独特之点是：完全竞争会遭到破坏而为垄断或不完全竞争所取代。由于能排除国外的竞争，保护性的关税和限额可巩固垄断者的地位。“关税是托拉斯之母”这句老话，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较为自由的国际贸易往往是打破垄断地位的有效手段^①。

爱好和需求的不同。这也许是进行贸易的第三个原因。即使两个国家的生产成本完全相同而且处于递增的状态，由于爱好的不同，也会发生贸易。

例如，对于挪威和瑞典之中的任何一国而言，以相同的比重来利用海域捕鱼和利用土地生产肉类可能是有利的。然而，如果瑞典人比较偏好吃肉，而挪威人又比较偏好吃鱼，那末，对双方有利的挪威的肉类出口和瑞典的鱼类出口将会出现。双方都会由此而得到好处。正如爱吃瘦肉的丈夫用肥肉去换爱吃肥肉的妻子的瘦肉一样，人类的幸福总量得以增加。双方均从交换中得到“消费者剩余”^②。

上面我们透过国际贸易的金融外表，研究了它的实际基础。现在，我们来看第五编剩下两章中的问题。

① 我们仍然必须承认：非常强烈的成本递减在自由贸易下可能导致较大的垄断；还有，成本递减的情况可能含有下一章将论述的“幼年行业”论中的正确因素。

② 偶尔，即使具有相同数量的两种物品和相同爱好的两个人，也会进行贸易。各自持有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各一瓶的两名水手可以按照掷硬币得到的正反面来决定谁持有两瓶威士忌和谁持有两瓶杜松子酒。你可以设想，对于青鱼和巧克力，也可能如此办理，但却不会发生于腌牛肉和洋白菜。类似后者情况下的贸易是异常的现象。（较高深的著作说明：这种异常的现象可以来自第二十二章附录中的无差异曲线的相反方向的弯曲。）

§. 对外贸易的供给和需求的图形^①

上述的相对有利条件论，把国际贸易还原成了物物交换这一基本形式。它没有提到美元、英镑或汇率。对于美国小规模的食品行业或衣服行业中的完全竞争者而言，外贸看起来象什么呢？为什么竞争的价格(p)使美国能出口小麦，而不出口衣服？在欧洲向我们出口的布匹——譬如说，亚麻布——这样小规模竞争的市场上，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形状为何？美国出口的物品如小麦的供求曲线的形状为何？

第 34-2 图首先表明小麦的情况，其中假设欧洲的货币单位——称它为英镑——正好等于 \$2。第 34-2 (a) 图画的是以美元表示的美国小麦的需求和供给曲线 $d_a d_a$ 和 $s_a s_a$ (用 1/2 的比例的单位变换，它们也可用英镑表示出来)。第 34-2 (b) 图说明欧洲小麦的需求和供给曲线 $d_e d_e$ 和 $s_e s_e$ (用英镑来表示，但纵轴具有相互配合的美元和英镑单位，从而二者均可被用作为衡量的尺度)。

假设由于限额、关税或昂贵的运费，贸易不能进行。每一国家的贸易前的均衡点位于何处？在没有贸易的前提下，均衡点为不同的交点， A_a 和 A_e ：美国小麦的价格（每蒲式耳）为 \$2，或 £1；它的欧洲价格为 \$6 或 £3。两国的市场均供求相等。由于不能进行贸易，自给自足状态下的出口和进口当然为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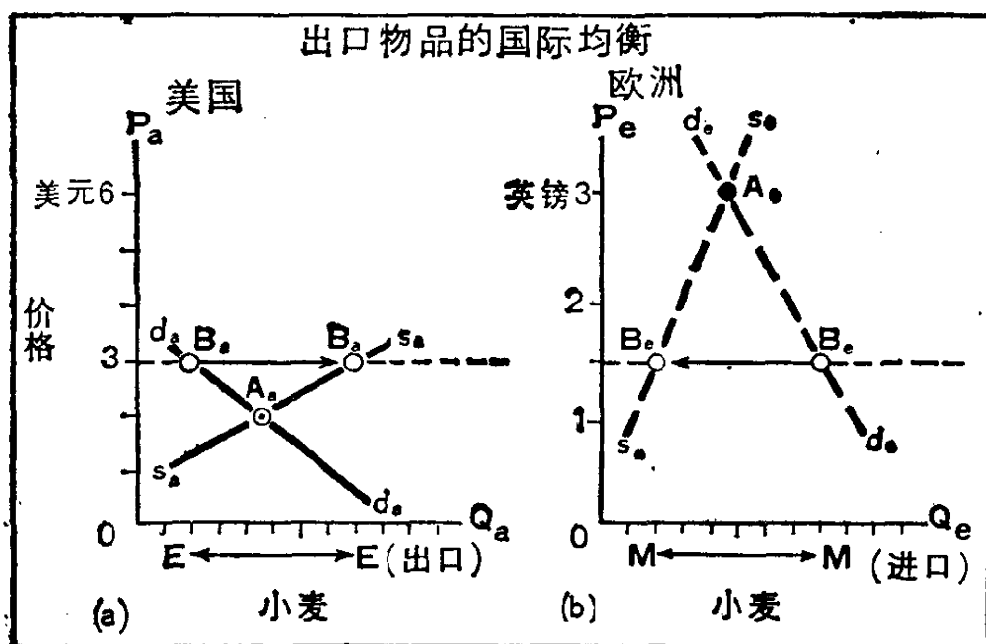
现在，开放小麦贸易。如果运费、限额和关税均不存在，那末，两国的市场必然会有相同的价格。为什么？因为目光敏锐的套利者会从小麦价低的地方买进，向小麦价高的地方卖出。结果如何？很显然， P_e 会下降而 P_a 上升，一直到二者均等时为止。价格的变动是多少呢？答案必然取决于每一国家的 dd 和 ss 曲线的

^① 下两节与本章的其他部分无关，并且不为理解以下各章或本章附录所必需。

斜率。

自由贸易下的均衡条件是：新的共同的价格应该导致出国外对进口的需求量正好等于我们出口的供给量。

676



第 34-2 图 供给和需求曲线决定美国出口物品的美元和英镑的价格

当贸易为零时,美国的小麦价格处于 A_a , 低于欧洲的价格 A_e 。在自由贸易下,物品从低价之处流到高价之处。最终的二者等同的 P_e 位于共同的使出口箭头等于进口箭头的水平。

自由贸易下的均衡处于\$ 3 和£1½的水平; 在那个水平,美国出口的箭头 EE ,或 $B_a B'_a$ 正好等于 (并且具有相反方向)欧洲进口的箭头 MM ,或 $B_e B'_e$ 。其他的均衡状态不可能存在。

第 34-3 图说明完全类似的美进口的事例。假设我们从国外进口石油,主要从中东阿拉伯国家。为了简单起见,假设英镑为它们的货币(当它们是英帝国和“英镑区”的一部分时,英镑的确是它们的货币)。谁决定石油为我们的进口货而小麦为我们的出口货呢? 没有贸易情况下的各自供求均衡的交点,事先规定了这一决

定: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物品流向价格较高的地方:(由于 A_e 低于 A_a ,所以世界其他地区向美国出口石油。)

读者自己可以作出图形,来表示没有贸易时的价格(P)正好相等从而自由贸易并不造成贸易的事例。这是罕见的偶然相等的事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总会存在着妨碍贸易的运输费用。例如,虽然砖头在美国似乎很便宜,如果没有贸易时的均衡交点的差距小于运输又重又多的砖头所需要的相当大的费用,那末,每一国家都会生产自己的砖头,从而既无出口,也无进口。物品总是流向价格较高的地方,然而,运输费用或关税可以完全阻碍物品的流动——使得某些物品在两个国家中均成为纯粹的“国内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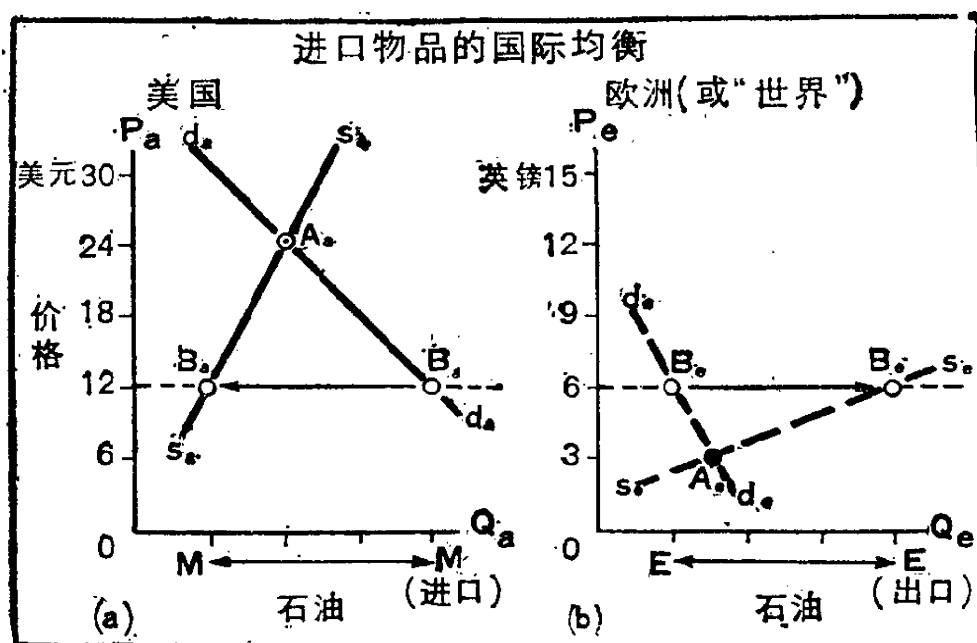
上述的供求分析是第四章(或第三编)的供求分析的简单的推广。这种供求分析是有用的。然而,应该注意:我们必须诉之于李嘉图有关相对有利条件的较深刻的分析,以便解释为什么两个国家的 dd 和 ss 曲线处于使美国出口食品在货币成本方面成为有利这一状态。也需要有这一基本的分析来解释为什么亚麻布的 dd 和 ss 的交点使得欧洲出口它^①。

§. 关税和限额的影响

禁止性的关税。第 34-3 图可以被用来说明福特总统在 1975 年施加于进口石油的关税(“进口税”)的影响。如果我们向进口石油征收的税高于没有贸易时的 A_a 和 A_e 的价格差距 ($\$18 = £9 = \$24 - \$6$),那末,多少石油会被运送到美国呢?绝对为零,因为,超过 $\$18$ 的关税具有禁止性,禁止任何数量的进口。为什么?因为,任何试图以 $\$6$ 的世界最低价格(A_e),或稍高于此的价格来购买石油并以之来在美国出售的进口商不能获得高于 $\$24$ (或 $£12$) 的美国自给自足的价格。然而,进口商所要支付的关税却大

① 经济学者说:马歇尔的这些供给和需求曲线仅仅描述“局部均衡”。它们必须被置之于“一般均衡”的分析之上,而李嘉图的分析仅为其中的特例。

于它们之间的差距！因此，这种关税抵消了一切专业化和贸易的有利之处。



第 34-3 图 供给和需求曲线决定美国进口货的美元和英镑价格

在没有贸易或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较低的欧洲价格 (P) 意味着：当允许贸易存在时，亚麻布将从欧洲进口。共同的价格 (P) 使进口和出口相等。（限额、关税或运费会使两国的价格不相等。）

较低的关税将减少某些（并非全部）石油的进口。以此而论，它部分地“保护了”我们本国的同一行业。

关税的社会代价。对我们本国的亚麻布行业具有何种影响？关税使它的价格比自由贸易下的要高。“保护性的”进口关税的影响，是提高本国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①。

然而，政府所征取的关税收入不是大致等于消费者现在所支

① 价格上升的程度不一定等于关税本身的大小。它可以等于关税本身的大小，但只有在下列的情况下才会如此。相对于我们的使用量而言，国外行业的规模很大，大到使我们能把它的 ss 或 dd 曲线或二者同时被大致当作为水平线，从而，我们的进口量很小，小到不能使价格 (P) 改变很多。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个卡特尔不按照寡头的行为办事，而真正按照第 34-3 图的 $d_e d_e$ 和 $s_e s_e$ 直线行事，那末，我们可以计算 \$2

付的价格提高的差额吗？上述禁止性的关税的例子告诉我们，通常并非如此。在这里，消费者支付较高的价格，而政府什么也征收不到！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同时，它也说明：用关税所征收到的收入来衡量关税的高低和它所造成的害处是如何地愚蠢。还有，任何限制进口的关税会使消费者对全部国内供应的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而支付的数额完全不会出现于政府的收入之中。

较高的价格(P)降低消费者的满足程度和福利。它使谁得到好处？被保护的行业的供给者得到好处。就石油是一个美国的垄断行业而论，垄断者会得到好处，从而支付得起为了关税而在政治界进行的幕后活动的费用。好处的一部分会逐渐落入石油行业的雇员之手，以及特别适用于生产石油的资源的主人之手。如第34-3(a)图所示，即使存在着完全竞争，专业化于生产被保护的行业产品的生产要素也会得到一些好处(较高的石油价格、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率、缺乏弹性的投入该行业生产要素的较高的经济租金)^①。当这些专业化的雇员们之一的妻子对高额关税所造

的福特关税的影响。由于它的数值为\$18的禁止性关税的2/18，它会减少我们石油进口量的1/9，从而使 p_a 增加\$12/9，或从\$12增加到\$13¹/₃。在竞争的条件下，\$2的关税会迫使世界价格降低到\$13¹/₃ - \$2 = \$11¹/₃，或降低到£5²/₃。但是，如果该卡特尔不作让步， P_a 可能在美国上升整个\$2的数量，即上升到\$14，从而减少我们石油进口量的1/6，而不是1/9。现在，当美国进口的石油数量较少时，该卡特尔的某些成员便不能再按照\$12的世界价格来卖掉它们的 $s_a s_a$ 曲线所表示的它们愿意卖掉的数量。

① 如果 $s_a s_a$ 完全是一条垂直线，那末，所有的从消费者那里多取走的钱会以增加的地租的形式转移给生产者。我们可以假设，这是一种从并不特别无价值的消费者到并不特别有价值的生产者之间的转移。较为普通的情况是： $s_a s_a$ 具有某些正数值的弹性，从而，较高的 P (价格)会诱导出较多的国内生产的 Q (物品数量)。这肯定代表一种社会的缺乏效率；因为，资源从美国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领域中取出，而投入美国具有相对不利条件的受到保护的行业。处于极端的 $s_a s_a$ 为一条水平线的生产要素投入一行业或另一行业均无差异的情况，对于生产者的全部好处会零星地消耗于缺乏效率的资源分配之中，从而，即使该行业之内的人也不会从受到严重打击的消费者的损失中得到自私自利的好处。

成的油价和一般生活费用高涨表示不满时，她的丈夫可能要申斥道：“不要再表示不满了。由于关税，我们的所得多于所失。经受石油进口中断的真正损失的是我们以外的整个社会。”

在小麦和其他没有受到保护的行业中，妻子和丈夫双方都有充分理由谴责石油关税。我们可以考虑：(a) 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b) 政府征取的收入以及(c) 供给者得到的好处。假设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不论是有价值的人还是无价值的人都同样地牵涉到问题的各个方面，那末，利弊相抵后的影响是什么？本章附录说明：禁止性的关税在下列的意义上，弊大于利：

禁止性的关税体系会使社会以缺乏效率的方式处于消费可能性边缘之内，而如果利用国际交换和分工的效率的话，社会可以全然处于该边缘之上。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特别是对停止全部进出口并且成为自给自足的国家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①

限额。禁止性关税的目的可以通过对一切进口货施加数值为零的限额而达到。在两国的市场上，价格处于 A_a 和 A_e 的水平，正如上面论述的没有贸易的情况一样。在这里，消费者受到损失；而在上面指出的意义上，消费者的所失大于生产者的所得。

① 对于一个把禁止性关税施加于部分物品的国家，除了罕见的(和不重要的)例外，这也是正确的。例外系指一个大到足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其进口物品的相对价格的国家。通过施加足够微小的计算精明的关税，该国可以利用它的垄断力量“来使外国人支付”它的关税。〔这是一个深奥的论点，可以用第34—3(a)图的曲线下的效用—负效用面积加以说明。阅读第二十五章关于边际收益(以及当垄断者卖掉一个增加单位的 q 时在以前单位上所蒙受的损失)的读者可以用如下的方式理解这一点：自由贸易下的最后一个小单位的进口给我们提供数值为零的边际利益；这就是所以为最后一个单位的原因。如果我们施加小额的关税把它去掉，那末，我们可以强迫减少我们对全部以前单位所支付的进口价格。因此，我们能通过这种手段而得到一点好处(除非 $s_e s_e$ 或 $d_e d_e$ 曲线是水平线)。然而，欧洲可以对我们的 wheat 使用相同的手段。当所有国家都这样做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假定：整个世界的缺乏效率会使所有的(或大多数)国家的境况变坏。〕

假设限额并不被规定为零,而为自由贸易下的进口量的一半。读者可以自由论证:在第 34-3 图的直线的供求曲线的特殊情况下,美国的价格(P)将上升到自由贸易的价格 B_0 和没有贸易的价格 A_0 之间的中点。⁶⁷⁹ (在欧洲, P 将下降到中点。)只有处于这些新的 \$18 和 £4 $\frac{1}{2}$ 的价格 (P),世界石油出口的箭头才等于我们进口的箭头。(读者自行论证。)

限额已经在这里和海外之间造成价格差距。刚才说过,均衡差距被定义为:大到足以使出口和进口相等的差距。(注意:对进口的每一单位石油征收数值和这个价格差距相等的关税可以造成同样的均衡状态^①。)

因此,关税和限额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例外之处为:非禁止性的关税至少给政府提供收入,因之能部分地补偿由于限制进口而给进口国家带来的净损失。另一方面,限额把人为造成的价格差别所带来的利润放入那些幸运到能获得进口限额许可证的人的口袋之中。这些人有足够的钱请发放进口许可证的官员们大吃大喝。或者,如果官员们不是这些人的血缘近亲或政治帮派,那末,他们有足够的钱来向官员们行贿。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者一般认为关税比限额具有较少的坏处的原因。他们劝告说:“如果你必须采用减少效率的限制性的限额,那末,你至少应该保证:政府把为数稀少的进口限额许可证拍卖出去,以便使财政部得到这笔不义之财,以便解除使官僚体制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压力。”

非禁止性的和禁止性的关税或限额的有害影响属于同一范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一般说来,它们对公民整体有害,

① 对于任何处于禁止性和零值的水平之间的关税率,如何计算新的均衡价格的问题,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在第 34-3 图中,把整个出口国的图形向上移动,移动的距离为关税本身的大小(从而,表示价格的纵轴数值和进口国的纵轴数值的差额现在为关税本身的大小)。然后,把水平方向的尺子上下移动,一直到找出有关的曲线之间(箭头)的出口量和进口量正好相等的水平为止。

因为公民们被迫减少他们最需要的物品的消费，并且被迫把资源从具有真正相对有利条件的行业引入缺乏经济效率的用途上。在一般情况下，关税和限额会降低实际工资和平均生活水平。

运输费用。运送大量和易腐的物品的费用会减少区域间有利的专业化的程度。

运输费用的影响类似人为的限制性的关税所造成的影响。以运输费用而论，害处是不可避免的，而保护性的关税或一国之内对区域间贸易的人为障碍却是十足的人造后果。

这就结束了脱离正题的两节论述。它们论述在进行贸易和征收关税情况下市场价格的各种均衡水平。现在，我们回到关于基本的相对有利条件的研究。

§. 限制条件和结论

当然，相对有利条件论适用于任何两国和任何两种物品，并不局限于美国和欧洲以及食品和衣服。（李嘉图在他的例子中，使用了英国和葡萄牙以及布匹和葡萄酒。）下面的附录说明：比较有利条件的原理可以被推广应用于任何数量的不同物品，而较高深的著作可以说明：它能够应用于任何数量的不同国家或地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固定比例的劳动、土地和资本货物的“配合单位”来代替单纯的劳动的例子。我们也可以把生产要素的比例的改变和收益递减考虑在内。关于所有这一切，参阅本章附录。

相对有利条件论的较为严重的缺陷也许是它的静态的假设。李嘉图是用物物交换和相对价格比例来阐述这一理论的。该理论略去了一切价格和工资的粘着不变的性质、一切暂时性的通货膨胀和货币定价过高所造成的缺口以及一切国际收支上出现的问题。它假设：当劳动者从一个行业中退出时，总是能进入另一效率

较高的行业——从来不会长期失业。它不理睬粘着不变的货币工资率；这种工资率经常被规定在过高的水平，以致使在国内雇用工人从事生产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①。

无怪乎这一抽象的理论在 1929 年后的大萧条中受到了人们的冷遇。近来，它已恢复名誉。以我们在将来能避免无伸缩性的汇率和工资率而言，以我们能根据现代货币和财政政策理论来消除长期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在这些前提条件下，原有的古典学派的相对有利条件论保持了它的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如果理论能参加选美竞赛的话，那么，相对有利条件论肯定会名列前茅，因为它具有无比优美的逻辑结构。确实，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一个简单化的理论。然而，尽管有些地方不免过于简单，相对有利条件论仍然对真理作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瞥。象这样富于成果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是不多见的。忽视相对有利条件论的国家会在生活水平和增长潜力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结和复习

1. 在某一国家的内部，一旦出现生产率方面的差距，专业化和交换便成为有利的事情。这也适用于国家之间：国际交换是一个有效率的方式，使我们能（在实际上）把一物品转换成为另一物品，其效率比单纯依赖国内生产要大。

2. 在没有学习很多经济学的情况下，人们看得出，热带与温带之间的贸易对双方有利——或者，在生产一种物品上效率较高的国家与在生产另一种物品上效率较高的另一国家之间的贸易对

^① 关于一国货币定价过高会有害于古典学派的基本原理的说明，参阅上一章附录。

双方有利。但是，需要运用李嘉图的相对有利条件这一重要原理来论证：即使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在每一种行业上都比另一个具有较大的绝对的效率，两个国家（或者，象我们所提到的律师和打字员那样，任何两个单位）之间的贸易也同样对双方有利。

只要存在着效率上的相对差异，每一个国家就必然同时在某些物品上具有相对有利条件和相对不利条件。因而，专业化于本国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物品并用该物品换取另一国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物品，就会导致巨大的益处。

3. 相对有利条件规律不仅规定了专业化的型式和贸易的方向，而且还告诉人们：贸易和它所造成的世界总产量的增加，将使贸易国双方都得到好处，将使实际工资（或者更加具体地说，生产要素的全部收益）得到提高。使自给自足（即：国民经济的自给自足）重新出现的限额和关税会有害于实际工资和全部生产要素的收益——并不会使它们改善。

4. 成本递减（即：按生产规模增加的经济效果）是专业化和区域间贸易的重要原因。爱好的不同也会造成贸易。

5. 完全自由的贸易会使一种物品在各个供求市场上的价格相等。并且使该物品从贸易开始前价格最低的地方出口。均衡的共同的 P 处于使物质的出口量和物质的进口量相等的水平。

6. 关税或限额，由于能减少进口，会使国内的价格 P 上升并使外国的价格 P 下降。（只要某种数量的进口继续存在，不同的竞争的 P 的差额就等于关税本身的大小。） P 的上升、国内消费的下降以及把资源浪费于缺乏相对有利条件的物品而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害处，一般大于生产者所得到的好处。运输费用也减少贸易和福利。

7. 对于相对有利条件这一重要的规律，必须施加限制条件，以便把某些对该规律的干扰考虑在内。例如，如果汇率平价和货

币工资率在两个国家中都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两个国家中都执行不善,那末,便宜的进口货以及国际专业化所带来的益处会变成失业的祸根。运用适当的公共政策,现代国家可以完成宏观经济的管理;在其中,并不需要牺牲贸易的巨大益处,而仅仅需要重新创造出相对有利条件的原理能够运用的环境。

附录: 相对有利条件的扩大和限制

682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相对有利条件的论述系按照李嘉图的方式,也就是用劳动来衡量一切成本。现代经济学者知道,即使我们不采用劳动价值论,相对有利条件的原理也是正确的。

第二章论述大炮和黄油时所使用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或转换边缘是使我们能脱离劳动单位的工具: 有了生产可能性边缘,我们可以使用我们为了得到较多的衣服而必须牺牲的食品来衡量衣服的成本。(有的时候,这被称为“机会成本”。)

本附录的第一部分对美国和欧洲的食品和衣服的事例加以详尽的论述,说明绝对的劳动成本是与题无关的。

§. 没有贸易的美国

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每一个经济制度都具有一个生产可能性边缘,用以表明: 如果全部资源都用于一种物品如食品,那末,它的产量为多少;如果全部资源都用于另一种物品如衣服,那末,它的产量为多少;以及一种物品如何被转换成另一种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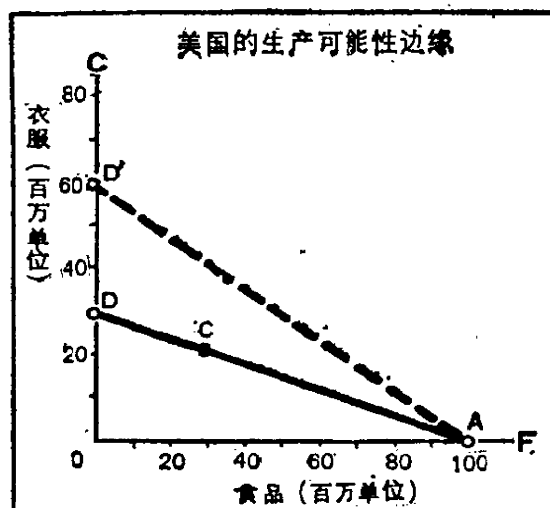
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假设: 在美国,食品总是能以 $10/3$ 的固定比例被转换成衣服。每牺牲 10 个单位的食品,我们总是能得到 3 个单位的衣服。我们进一步假设: 当一切资源都用于食品生产时,美国将得到总共为 100(百万)单位的食品^①。

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一切以表格的形式表示出来,如第 34-4 表所示。或

^① 注意: 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从来不谈劳动。但是,如果读者想把我们的论述和李嘉图关于劳动的论述联系在一起,那末,仅仅需要把第 34-1 表中的数字从 (1, 2; 3, 4) 改变到 (3, 10; 8, 10); 或者,使用一般化的形式,改变到 $(3a, 10a, 8b, 10b)$; 在其中, a, b 为随意假设的正数值,仅取决于单位和绝对效率。

683 者,也可以被作成第 34-4 的图形,如第二章的第 2-3 图的做法那样。实线 AD 是美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缘。这个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是一条直线,而以前的那一个则为一条曲线,从下看来是向上鼓出的。我们使用直线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以便使我们的论述简单化——使读者免于记忆许多不同的成本的比例。正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不会严重影响我们论点的正确性。所需要的几个限制条件,我们将在以后找出来。

美国的生产可能性表 (10/3 固定的成本比例)		
可能性	美 国	
	食 品 (百万单位)	衣 服 (百万单位)
A	100	0
B	50	15
C	30	21
D	0	30



第 34-4 图

固定的成本线 AD 代表美国国内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新的边缘 AD' 表明增加的生产衣服的能力并且意味着: 美国可以从 AD 向右上方移动, 享用较多的一切物品。

到目前为止, 我们谈论的仅仅是生产。然而, 如果美国孤立于一切国际贸易之外, 那末, 它所生产的也就是它所消费的。因此, 我们假设: 第 34-4 图的附表中 C 行的数字代表美国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所生产和消费的数量。或者, 用具体数字来说, 美国在上述情况下生产和消费 30 个单位的食物和 21 个单位的衣服。

为什么这一特殊的配合被决定下来, 而不是其他各种可能性呢? 我们在上面的章节中已经知道: 在竞争的经济制度中, 没有人“决定”这一点, 而是通过物品与劳务的供求发生作用的价格制度来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样, 上述的数量代表生产的东西。除了显然要说的生产食物的农业比大量劳动被投放于其中的衣服生产需要相对多的 (相对于劳动而言) 土地以外, 关于如何生产, 需要说的话很少。关于为谁生产, 我们只需要插入一句话: 美国劳动的稀少性意味着劳动者的较高的工资, 而美国的非常充足的土

地则意味着地主的低数值的地租(每英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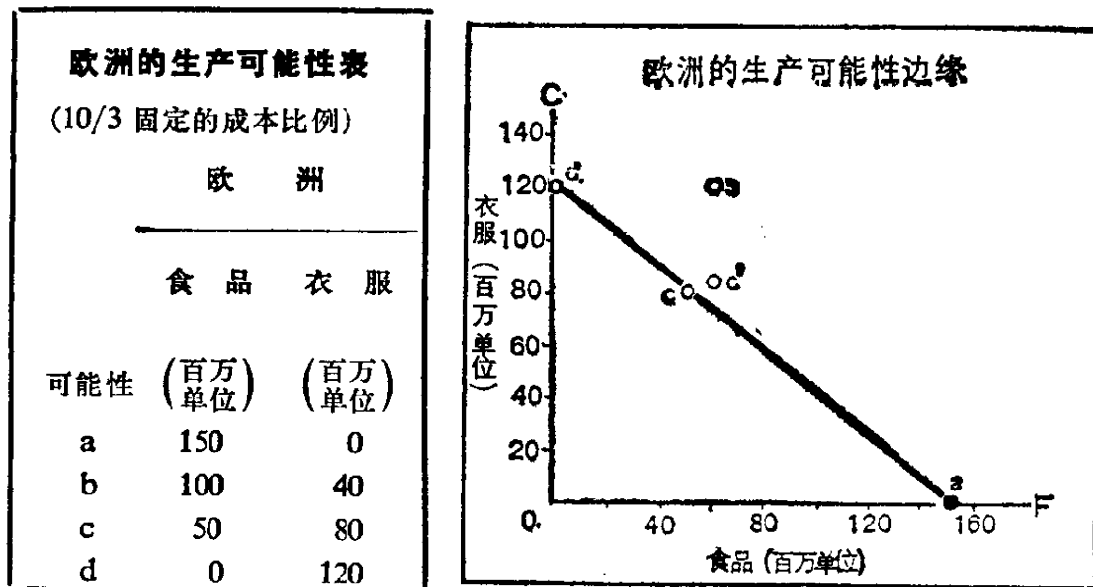
技术进步。现在,我们把欧洲引入论述之中。在引入之前,我们插进一个问题,以便为我们以后的论证铺平道路。如果某些美国人(譬如轧棉机的发明者 E. 惠特尼)作出精巧的发明,能使10个单位的食物转换成为6个单位,而不是3个单位的衣服,那末,后果为何?美国是否将得到好处?

答案显然为:“是”。生产可能性边缘已经向外和向上移动;它现在被第34-4图的 AD' 虚线表示出来。(读者可以自行证明:美国可以从 C 点向右上方移动到同时具有更多的食物和衣服的 C' 点。)

§. 没有贸易的欧洲

对待欧洲,我们可以使用和对美国完全相同的方法,不过具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相对于土地而言,欧洲的充足的劳动供给使得它在食物和衣服之间的成本比例或转换比例具有不同的数值。

第34-5图以及其附表说明欧洲的直线的生产可能性($P-P$)边缘。欧洲的相对有利条件是在衣服生产,而不在食物生产上。对它而言,每10个单 684 位的食物可以被转换成,譬如说,8个单位的衣服。它比美国多得5个单位,因为它在衣服上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然而,以食物而论,美国每牺牲一个单



第34-5图

在国际贸易开始以前,欧洲处于它的生产可能性边缘之上的 c 点,所消费的产品正好是它生产的产品。(暂时不必考虑 c' 点和 s 点。)

位衣服得到 10/3 即 3.33 单位食物,而欧洲在食物生产上的相对不利条件使

它每牺牲一单位衣服仅得到10/8即1.25单位的食物。应该注意的重要之点是这两个成本比例之间的差异:我们是10/3,欧洲为10/8。

我们仍然使两个大陆处于孤立状态。欧洲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具体形状为何?我们假设:欧洲的大量人口和土地使它在贸易开始前处于*c*点,生产和取费50个单位的食物和80个单位的衣服。这一事实和10/8的固定成本比例加在一起使我们具备全部应有的数据来作出欧洲的整个的生产可能性表以及它的*ad*生产可能性边缘,如34-5图及其附表所示。

§. 贸易的开放

现在,我们第一次允许两个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可以按照某一种贸易条件,即:某一种价格比例用衣服来和食物物物交换^①。为了使过程戏剧化,我们假设在大洋之中站着一个无人性的拍卖者,其任务是使供给和需求相等——使愿意出售的衣服和食物相等。他完成任务的办法是向两国喊出一个食物和衣服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价格比例。他接连不断地喊出不同的比例,一直到供给和需求相等时为止。当他最终得到使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均衡价格水平时,他把板子一拍,嘴里说道:“出价,出价,成交!”

他也许早已料想到:欧洲会专门生产它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衣服,同时,它将用衣服产量的一部分来换取食物。但是,他不知道食物和衣服之间的最终的交换比例即贸易条件是什么——可能是10/3、10/8、10/5、10/6或任何其他数值。以此而论,如果拍卖者是个新手或非常愚蠢,他可能认为:最终的均衡交换水平即贸易条件,会是10/1或10/12。

最终均衡受到的限制。实际上,上述两个数字都不可能成为最终的交换比例。他会很快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了解到这一点。如果他告诉美国和欧洲:它们能按照每一单位衣服换取10个单位食物的比例来得到它们所需要的衣服,那末,美国会怎样做呢?使用国内生产,它可以用每10个单位的食物换取3个单位的衣服。很清楚,它不会按照这个比例来用食物换取衣服,而宁可仍然居于自给自足状态。

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为什么美国不走向另一极端,出口衣服来换取食物的进口呢?从拍卖者那里,它可以用1单位衣服换取10单位食物。以国内生产的食物来计算,每一单位衣服能换取到多少?很显然,根据第34-4

^① (譬如说)10个单位食物换6个单位衣服的贸易条件(或交换比例)意味着:衣服比食物昂贵,其价格比例为:(衣服价格)/(食物价格)=10/6=1²/3。

图及其附表,只能换取到 $10/3$ 即 3.33 个单位的食物。因此,处于 $10/1$ 的情况,美国肯定应该把它的一切资源转移到衣服生产上;我们应该出口某些多余的衣服来换取食物。

现在,欧洲怎么样呢? 在它的本土上,每一单位的衣服仅能换取 $10/8$, 或 1.25 单位的食物。处于 $10/1$ 的情况,它也要用衣服换取食物。因此,我们看到,那位拍卖者确实是个新手。喊出 $10/1$ 之比,他使大批的衣服的供给积压在他的身上,而又只存在着对食物的需求。由于他本身无法提供两种产品中的任何一种,他现在必须改变他的策略。他必须提高相对于衣服而言的食物价格。他也许应该试试 $10/2$ 之比,或甚至 $10/9$ 。现在,读者能自行推算,为什么两个比例都不合适:为什么 $10/2$ 仍然会导致洪水般的衣服的供给,而在另一方面, $10/9$ 代表相反方向的错误,会引来暴雨似的食物供给的到来。

很清楚,最终的交换比例不可能处于两国原有的 $10/3$ 和 $10/8$ 的限度之外! 在这个两个限度内的任何数值之比都是可能的——美国遵循它的相对有利条件,专业化于食物生产;而欧洲遵循它的相对有利条件,专业化于衣服生产。

§. 最终价格比例的具体决定

在两国国内的成本比例之间,贸易条件究竟会稳定在什么地方呢? 某些李嘉图的追随者曾经愚蠢到足够的程度,以致说:“把两个比例的差额劈半,取其‘中点’ $10/5\frac{1}{2}$ 作为均衡比例。”^①

实际上,正如第三位伟大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约翰·S. 穆勒(位于斯密和李嘉图之后)稍晚一些时候所说明的那样,贸易条件在两个成本比例之间的具体的最终水平,取决于世界对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的供给和需求。如果相对于现有的食物和衣服的供给而言,人们对食物具有强烈的欲望,那末,价格比例会稳定在接近于 $10/8$ 的上限的地方;如果两个国家都很需要衣服,那末,最终的价格比例将稳定在接近于 $10/3$ 之处。^②

① 或者,他们会说:在 $10/3$ 和 $10/8$ 之间的“中点”,即:在 $110/48$, 相当于 $10/4\frac{1}{12}$? 两种说法都是没有道理的。在第 34-1 图中,我们没有理由说:表明最终的贸易条件的平行箭头处于夹角的一半之处。根据供给和需求的情况,它们可以处于夹角中的任何位置。

② 还有,如果相对于欧洲而言,美国很小,从而,后者的供给量在市场上仅占微不足道的份额,那末,价格比例甚至可能停留于欧洲的 $10/8$ 。这样,美国会专业化于食物生产而进口衣服,但是,美国的全部食物出口量会如此之小,以致欧洲仍然生产它的食物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只有在价格为 $10/8$ 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得到国际贸易的全部好处。有一个大的(不同的!)邻居会带来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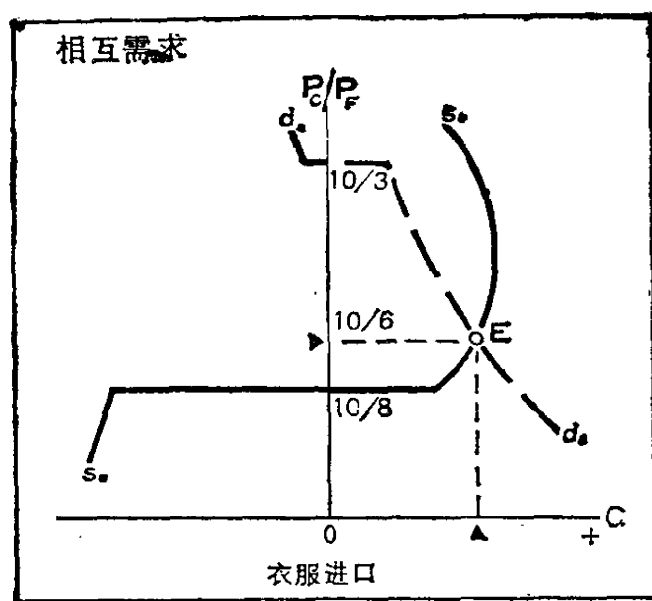
686 穆勒所做的正是我们的拍卖者所应该做的。他作出一张表,说明在每一个可能的价格比例之下的供给和需求^①:美国想出口多少食品和欧洲想进口多少食品;同时表明,在每一种价格比例之下,欧洲愿意出口多少衣服和美国试图进口的衣服数量。

处于一个而(希望如此)仅有一个在二者之间的价格比例,出口和进口才能平衡。处于这一均衡价格,出口和进口会“相互吻合”(或相等);不仅在数量上,在质量上也系如此。那个拍卖者和穆勒将会发出一声宽慰的叹息,而贸易会无休止地进行,一直到爱好和技术改变时为止。

在我们的数字例子中,我们假设均衡的贸易条件的比例为 $10/6$, 在欧洲和美国的贸易开始前的比例中,稍“接近于”前者。

美国完全集中于生产食品。在第 34-7 图中,美国的生产处于 A 点。但是,由于它现在可以自由地按照 $10/6$ 的比例来进行贸易,美国不再受到它原有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限制。通过贸易,它现在能够移动到 AD' 线上去,正如一项富有成效的发明所造成的后果一样。

美国是否从贸易中得到了好处呢?它确实得到了好处。我们可以把 AD' 称为美国的新的消费可能性曲线。它究竟停留在 AD' 上的哪一点,取决于其内部价格制度的作用。我们假设,价格使它停留在 C' 点;在该点,它的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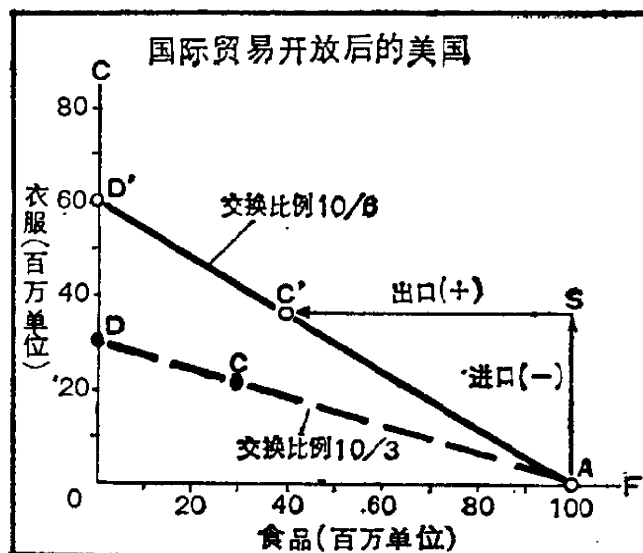
第 34-6 图

① 第二十二章的无差异曲线可以被用来总结每一个国家对于食品和衣服的爱好。这些曲线和生产可能性 ($p-p$) 曲线在一起可以推导出穆勒的相互需求曲线,如第 34-6 图所示。和普通的 dd (需求) 和 ss (供给) 曲线不同, C (衣服) 是和 F (食品) 相交换,而不是和货币相交换;因此,图上作出的是相对的价格 P_C/P_F ,而不是货币价格 P_C 。(如果爱好和收入在一个区域内不相一致的话,那末,必须用较为繁难的分析来得出集体的无差异曲线。)

量为 40 个单位的食物和 36 个单位的衣服。箭头表示美国的出口(+)和进口(-)。

第 34-7 图

AD 线代表美国国内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AD' 代表它的新的消费可能性曲线。后者表示：美国能够按照 $10/6$ 的价格比例自由地进行贸易，从而决定完全专业化于食品生产（处于 A 点）。从 S 到 C' 和从 A 到 S 的箭头表明美国出口(+)和进口(-)的数量。可以看到，作为自由贸易的后果，它最终处于比以前的 C 点具有更多的两种物品的 C' 点。



所有这一切都被总结在第 34-2 表的美国横行中。对该表应该仔细地加以研究。理解它也就理解了相对有利条件论。

由于专业化和贸易，美国得到了好处；它现在拥有更多的衣服和食品供人们消费。欧洲的情况也是这样。

无中生有的魔术是怎么回事？在第 34-2 表中，总括美国和欧洲横行的世界横行告诉我们：

专业化和贸易，增加了两种物品的世界产量。

实际上，第六横行提供了拍卖者最感兴趣的数字。那里的数字向他保证，两件事导致均衡的存在：(a) 世界对每一种物品的消费等于该物品的世界产量——不多也不少；(b) 每一个国家的出口量正好等于另一国家想要进口的数量。由此， $10/6$ 是适当的价格比例①。

① 为了找到这一均衡点，拍卖者可以做出一整册的这种表格，其中每一页的表格相当于一个不同的价格比例。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其中的一页是所要寻求的——因为，按照其他的价格，出口和进口的数量不会相等。例如，按照 $10/7$ 的比例，美国对于衣服进口的欲望超过欧洲愿意出口的衣服的数量。整个世界会因之而试图消费比已经生产出来的还要多的衣服。由于拍卖者没有存货可以动用，他势必要在表格的册子中寻找衣服价格较高和食品价格较低的页数。在所要寻找的那一页上，价格会是均衡的价格，因为出口和进口会相交于第 34-6 图上的 E 点。

总结性表格: 说明由于按照相对有利条件而得到的专业化和利益							
进 行 比 较 的 地 区	用食品交 换衣服的 交换比例 P_c/P_f	食 品 生 产	食 品 消 费	食 品 出 口 (+)或进 口 (-)	衣 服 生 产	衣 服 消 费	衣 服 出 口 (+)或进 口 (-)
贸易开始前情况							
美 国	10/3	30	30	0	21	21	0
欧 洲	10/8	50	50	0	80	80	0
世 界	无	80	80	0	101	101	0
贸易进行后情况							
美 国	10/6	100	40	+60	0	36	-36
欧 洲	10/6	0	60	-60	120	84	+36
世 界	10/6	100	100	0	120	120	0
贸易利益							
美 国	—	—	+10	—	—	+15	—
欧 洲	—	—	+10	—	—	+ 4	—
世 界	—	+ 20	+20	—	+ 19	+19	—

第 34-2 表

国际贸易使世界生产和消费较多的一切物品成为可能。这些净得的利益如何在国家之间进行分配, 取决对竞争的供给和需求。(小地区得益最大。)

以上是我们对相对有利条件论的全部解释。读者可以按照第 34-7 图已经添进的美国数字来在第 34-5 图中添进欧洲的数字, 以便检验自己是否彻底理解了相对有利条件论。

贸易也使欧洲获得了新的消费可能性曲线, 该曲线系以纵轴上的 d 为中心, 向上转动到与 c' 相交。读者自己从 d 到 s 并且从 s 到 c' 作出新的代表出口量(+)和进口量(-)的箭头, 如第 34-7 图所示。应该注意: 欧洲的箭头与美国的相等, 只是二者的符号和方向相反。(为什么在均衡点, 出口量和进口量必然吻合?)

用功的读者可以把劳动单位和工资数字加进我们的例子中去。但是, 应该注意: 这里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相对有利条件, 而不是绝对有利的劳动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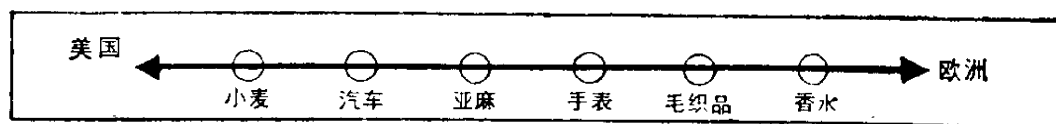
§. 许多商品

我们现在非常概略地说明: 当我们在上述的论述中去掉某些过分简单化

的前提时,其后果为何。结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而且,甚至论述的细枝末节的改变也是次要的。

首先应该指出:迄今为止,为了简明起见,我们仅仅考虑两种商品,食品和衣服。很明显,食品代表许多不同的项目(牛肉、牛乳等等),而衣服也是如此。此外,当我们考虑千百种进入国际贸易的商品时,交换所带来的利益是同等巨大的。

正如较高深的著作所论证的那样^①,当两个国家具有按照不变的成本可能被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时,它们可以按照它们的相对有利条件或成本的顺序加以排列。例如,汽车、亚麻、香水、手表、小麦和毛织品可以按照它们的相对有利条件或成本的顺序加以排列,如第 34—8 图所示。它的意思是:相对于一切其他商品而言,小麦的成本在美国是最低的;欧洲在香水上具有最大的相对有利条件;它在手表上的有利条件稍小于此,等等。^②



688

第 34-8 图

(该图系根据第 34-3 表上的数据排列而成。)

从一开始,我们实际上就可以肯定一件事。开展贸易后,美国将生产小

① 例如,G.哈伯勒:《国际贸易理论》(麦克米伦,纽约,1937年)。在贸易理论上,哈伯勒也是使用 $p-p$ (生产可能性)边缘的先驱者。

② 物品排列的顺序可根据第 34-3 表的数字,其主要目的在于满足程度较高的读者的好奇心,而不是为了上面的论述。和以前一样,我们不一定需要使用货币或劳动来衡量成本,而仅仅需要使用任何物品可以被“转换成的”相对的商品数量。假设我们选择毛织品来衡量两个国家中的每一种物品的成本——选择毛织品并没有特殊原因,而是因为该字的第一个字母应该被排列在最后。这样,我们的数字可以按照第一个字母的顺序加以排列,如第 34-3 表所示。它的意思是:在美国,人们必须放弃 1,000 个单位的毛织品的生产来得到一辆汽车,而在欧洲,一辆汽车的成本为牺牲 3,000 个单位的毛织品的生产。因此,相对于毛织品的汽车成本而言,欧洲的相对成本是美国的三倍;其他物品以此类推。现在,我们可以推论出什么结果?非常明显,欧洲的相对成本的有利之处在香水上最大,而在小麦上最小。在其间的商品被排列成第 34-8 图的串珠似的形式。第 34-3 表中最后一竖行的大多数的数字都大于 1 这一事实决不能反映欧洲的效率。它是由于我们选择毛织品作为衡量成本的共同单位而偶然造成的。如果我们选择了小麦或手表,那末,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然而,不同的结果的意义相同——仅存在着“尺度”的差异(如把英寸转换成英尺或码)。

麦,欧洲将生产香水。但是,二者的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在汽车和亚麻之间?或者,美国将生产亚麻,而欧洲则把自己的生产限制于手表、毛织品和香水?或者,分界线落于一种商品之上,而不在两种商品之间,因此,譬如说亚麻,可以在两地同时生产?

读者会毫不奇怪地发现:答案取决于国际上对不同物品需求的相对的强烈程度。如果我们把不同商品看作是按照它们的相对有利条件而连在一起的珠串,那末,整个的供给和需求的情况会决定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分界线将落于何处。例如,对于汽车和小麦的需求的增加往往使贸易条件有利于美国,从而使美国如此富裕,以致继续生产自己的亚麻成为不再有利的事情。

§. 许多国家

关于商品众多所引起的复杂问题,我们就讲这一些。国家的众多会有何后果?即使美国和欧洲包括许多不同的所谓“主权国家”,它们也并不是整个世界。

技术性的脚注: 任何一个必须引入劳动生产率的人可以把各物品所需要的美国劳动时数分别写成 A, B, C, \dots , 而把欧洲的时数写成 a, b, c, \dots 。这样,整个的分析可以按照 $A/B, C/B, \dots$ 和 $a/b, c/b$ 的相对比例而进行下去;解释贸易的型式永远不需要比较国家之间的绝对有利条件,如 $A/a, B/b, \dots$ 。当然,如果想要比较货币和实际工资,那末,这些绝对有利条件是必要的:通过扩大第 34-1 表的分析,可以证明,欧洲和美国实际工资的比例在 $A/a, B/b, \dots$ 中必然处于最大的和最小的比例之间;究竟在其间的哪一点,取决于相互需求的作用。同样,任何两种物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如价格 a /价格 b ,必然处于 a/b 和 A/B 之间。

(1)	(2)	(3)	(4)
物 品	美国的成本比例 用毛织品来衡量	欧洲的成本比例 用毛织品来衡量	相对的欧洲成本 用美国成本来衡量 (4) = (3) ÷ (2)
汽 车	1,000	3,000	3.0
亚 麻	0.8	1.6	2.0
香 水	5.0	3.0	0.6
手 表	50	75	1.5
小 麦	0.2	0.8	4.0
毛 织 品	1.0	1.0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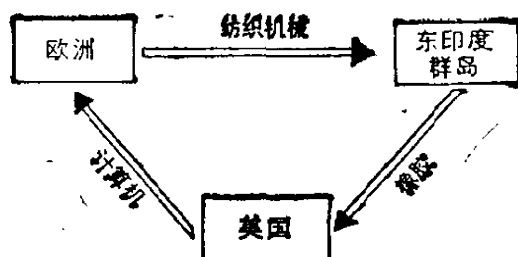
第 34-3 表

引入为数众多的国家不会改变我们的分析。以任何一个国家而论,与该国进行贸易的所有其他国家可以归并成一个总体,统称为“世界其他地区”。⁶⁸⁹ 贸易的利益和国家的疆界并没有特别的关系。已经论述过的原理不仅适用于两组国家之间,也同样适用于同一国家的两个地区之间。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历史所偶然造成的原因,那末,这些原理适用于我国北部和南部各州之间的贸易的程度,完全和它们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的程度一样。

从纯粹的经济福利的角度来看,“买美国货”的口号正和“买威斯康星州的货”、“买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县的货”、“买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县南部的货”等等一些口号同样愚蠢。我们高度的富裕程度部分地来源于在我们的五十个州之间没有关税这一值得庆幸的事实。

三角贸易和多边贸易。现在,处于已经引入为数众多的国家的情况下,美国很可能会发现:和欧洲进行间接贸易是有利的。美国向欧洲出口很多,包括计算机等制成品。美国从欧洲进口很少,然而,它却向东印度群岛购买橡胶和原料。后者通常并不从美国进口物品,然而,它却向欧洲购买纺织机械和其他物品。因此,出现了对各方都有利的三角贸易,如第 34—9 图所示。箭头表示出口的方向。

第 34—9 图
如果要求两国之间进出口数值相等,那末,多边贸易的有利之处要大为减少。



如果所有国家都试图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致使美国不可能,也不会从东印度群岛购买货物,除非对方也从我们这里购买同等数值的货物,那末,其后果如何?假使双边主义存在于任何两国之间,那末,其后果又将如何?很显然,贸易会被大量削减。进口额会等于出口额,但却处于较低的水平。每一地区最终都将遭受损失。

§. 成本递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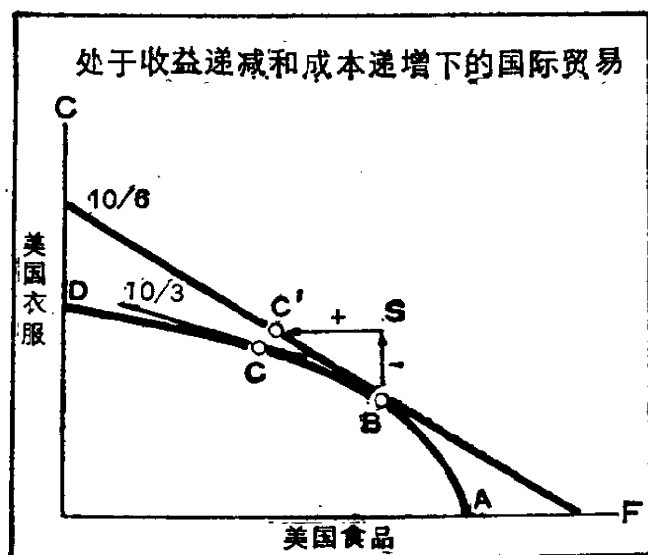
再来看两个国家和两种商品的情况,我们现在去掉那个成本不变的假设。第 34—4、34—5 和 34—7 图的生产可能性($P-P$)边缘应该向外鼓出,正如它在第二章中的一般形状那样。对于每一国家,我们不再能规定单一的成本数字。

总的说来,美国生产食品的条件比欧洲要好。虽然如此,在美国生产了大量农产品之后,追加生产的食品的成本仍然要开始超过欧洲。即使美国的竞争已经使相对于衣服而言的食品价格剧烈下降,欧洲最好的少量土地在生产食品上还是继续有利可图的。同样,即使当国际贸易已经达到均衡水平,在美国具有很低成本的少量的衣服生产仍将继续下去。然而,任何进一步扩大美国衣服生产的尝试必将引起较高的追加成本,会由于竞争而蒙受亏损。

我们可以把由于成本递增而导致的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修正述之如下^①:

690 作为国际贸易的后果,每一国家将和以前一样,会专业化于它具有最大的相对有利条件的商品,而把该商品的一部分出口,以便换取其他国家的多

① 对于愿意通过几何图形来思考的人,第 34-10 图可能是有用的。它表明:处于成本递增的状态,美国开展贸易前和开展贸易后的情况。现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鼓出。国际贸易开始前,美国的消费和生产处于 C 点。国内的价格比例为 $10/3$,正好等于以牺牲一些更多的食品来(在 C 点)得到一些更多的衣服这二者之间的比例。该比例为在贸易开始前的 AD 曲线上的 C 点的斜率所表示出来。这样,在进行贸易以后,当共同的价格比例为 $10/6$ 时,美国的生产移动到 B 点,趋于生产较少的衣服,但并不完全脱离衣服的生产。竞争使生产处于新的 B 点,因为曲线在该点的斜率——即:为了得到更多的食品而要支付的更多的衣服代价之间的比例——是 $10/6$,或者,正好等于共同的国际价格。只有处于 B 点,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用 $10/6$ 价格比例衡量)才会有最大值。



第 34-10 图

图中的直线代表美国由于贸易而导致的新的消费可能性曲线。该线是一条直线,不是一条曲线,因为拍卖者允许贸易自由,使美国能按照 $10/6$ 的比例来随心所欲地用食品换取任何数量的衣服。最终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如 C' 点所示。和刚才一样,具有方向的箭头表明出口或进口。

进行贸易仍然是有利的,但是由于收益递减和成本递增,专业化的程度较前为少,贸易的利益也较前为小。应该注意:处于不可能增加贸易的均衡点,两国的相对的(增加的或“边际的”)生产成本相等,各自等于共同的价格比例 $10/6$ 。

余物品的出口。但是,由于相对成本的递增,并不一定会达到完全的专业化:每一国家仍然会生产两种商品的一部分,因为当产量很小时,即使处于比较不利条件下的商品也可以具有足够低的成本来与其他国家的商品竞争。

§. 国际物品的流动代替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动

对第二章和其他部分所论述的成本递增规律以及对过分简单化的仅有劳动的模型的直线情况加以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考察与上述有关的在每一国家之内的收益递减规律。

开展国际贸易以后,欧洲的资源从食品生产转向了衣服生产。由于衣服要求较多的劳动和很少的土地,人口对于欧洲的有限土地的压力得以缓减。土地不再如此的相对昂贵;和工资相比,地租下降。在美国,开展贸易后的情况则相反:生产集中于食品;在此过程中,使用劳动较少,而土地得到广泛利用。相对于工资而言,这趋于提高地租。

在上述每一种事例中,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的部分影响,就好象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正象劳动力从欧洲移居到美国,会减缓美国劳动力的稀缺和欧洲的土地的稀缺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象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稀少的生产要素不象过去那样稀少。

瑞典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奥林,最清楚地强调指出商品贸易部分地减缓一切国家的较不充裕的生产要素的稀缺性^①。他对古典学派的相对成本论作了以下重要的补充:

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趋于使工资和一切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

即使生产要素并不穿越各国的疆界,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也往往使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

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到:虽然国际贸易增加欧洲的国民产值,但它同时也减少某些集团在其中所占有的份额,从而使它们的处境变坏。例如,一世纪前英国保守党的中坚力量大地主,很可能是由于自私自利而反对谷物法在1846年的废除,但是,后来他们竭尽全力要继续对进口粮食征收保护性关税,并不一定没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① B. 奥林:《区域间和国际间贸易》(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33年)。奥林承认:他从较早的有名的瑞典经济史学者E. 赫克谢尔那里得到了启发。

附录的总结和复习

1. 如果大自然对两个不同地区赋与不同的生产要素,那末,在每一地区的内部把一种商品转换成另一种商品所需要的相对成本很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土地广阔的地区在食品和其他土地密集的物品上具有相对有利条件。劳动力众多地区的相对有利条件在劳动密集的物品上。)

691 2.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物品会按照介乎两个国家在贸易开始前的国内成本比例之间的价格比例来相互交换(取决于相互之间的供给和需求)。

3. 每一国家将专业化于它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商品并且出口该商品的多余部分从国外换取进口。

4. 每一国家均受到贸易和专业化的利益:美国可以从贸易中获得比它在国内用食品转换所得到的更多单位的衣服;欧洲用衣服换取食品比它在国内用衣服转换食品得到更多的好处。

5. 当物品多于两种时,相对有利条件的原理同样适用。当进行贸易的国家多于两个时,或当生产要素的种类不限于劳动时,该原理依然适用。

6. 贸易是间接的生产,而且是有效率的⁶⁹¹生产。有效率的⁶⁹¹生产永远比无效率的生产为好。(注意:贸易的益处与相对的工资率无关。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的工资趋于被提高到它出口行业的较高的生产率水平,而不会被压低到它进口行业的低效率的水平。)

7. 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自由迁移可以使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但是,即使没有生产要素的迁移,物品在贸易中的自由流动也可以减少,有时甚至消除由于在地理分布上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而造成的它们价格之间的差异。

第三十五章 保护关税、 限额和自由贸易

692

致下议院:

我们正受到外国对手的不可容忍的竞争。那个外国对手在生产光线方面享有如此优越的条件,以致它即使削价出售光线,也能占有我们全国的市场。这个竞争者不是别人,正是太阳。我们请求通过一项法律,封闭所有窗户、门洞和孔隙,不让阳光从这些地方射入我们的住所。一接触到阳光,我们的制造业,就会受到损害,利润就会减少。

签名: 蜡烛制造商
F. 巴师夏

为了决定上帝是否存在,如果我们掰着手指计算肯定和否定论点的数目并且根据数目的大小而作出决断,那将是非常愚蠢的。同样愚蠢的是,仅仅根据重要性不同的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的多寡,来确定征收关税或实行限额是否有道理。

正如上一章所说明的那样,支持自由贸易的论点在本质上确实只有一个,然而,它却是一个十分有力的论点,即:

自由贸易促进相互有利的地区间的分工,大大增加一切国家的实际国民产品的数量以及提高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

回想一下:征收关税(即:赋税)会减少进口,从而提高国内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征收关税实际上等于取消富有成效的国际分工,从而“保护”那些相对缺乏效率的国内生产者。进口限额的作用与此相同。

主张征收高额关税来对付外国进口货的竞争的论点具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以下三大类：

1. 在经济学上肯定为错误的论点：其中某些论点的错误性质明显到不需要认真加以论述的程度；另一些则需要运用细致和深奥的经济理论上的推敲才能找到其错误之处。

2. 有几个论点在完全竞争的“古典学派的”静态充分就业的世界中是站不住脚的，但对具有一定垄断（或反垄断）力量的相当大的国家而言，或对经济正在发展并且可能面临就业不足和货币定价过高的国家而言，这些论点却包含某些合理的内核。

3. 一些非经济的论点。它们认为有必要使国家的政策牺牲经济福利，以便资助在经济上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特殊活动。

693

§. 非经济的目标

让我们先来看最后一类论点，因为说明这类论点最为简单。如果读者有朝一日参加一个辩论会并且负有保卫自由贸易的任务，那末，在辩论开始时就承认经济福利并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会加强你的辩论地位。政治方面的考虑也是重要的。例如，由于怕在将来发生战争，在某些活动中，即使代价很高，部分的自给自足还是必要的。

例证之一为石油生产。如果石油储备和生产能力在国防上被认为是必要的，如果必要的生产能力在自由贸易下又不能维持，那末，经济学者不能断言：国家的政策应该反对保护石油工业。如果石油受到卡特尔的控制而且这个卡特尔在将来可能由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中断我们的供应，那末，保护石油工业的论据便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然而，即使在这种战略性的事例中，经济学者仍然可以建议：向国内生产提供补贴可能比征收关税更可取。这会使国内的价格下降到国际水平，而不把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提高到

国内生产的成本水平。还有,补贴款项会明白地显示为国防费用,从而会使公众能更好地决定:打牌赢的钱是否足以偿付蜡烛的费用。此外,采取奖励石油进口的政策并对勘探和储藏石油提供补贴,可能使我们在将来的紧急状态中比简单地征收关税或实行限额拥有更多的地下石油。

扶植美国商用船舶的国家政策是一个类似的问题。无可置疑,美国在建造和经营商用船舶上,并不具有相对有利条件。一旦美国的海员,通过工会或自己,坚持远高于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资,那末,我们就无法与希腊、日本和挪威的船只相竞争。如果我们不顾美国的“光荣的海上传统”——很久以前的事——而考虑纯粹的经济福利,那末,正确的政策是很明显的。如果美国在工厂生产上具有相对有利条件,那末,就应该让人们到工厂里去,因为他们在那里的生产率很高。用别国的船舶运送货物不一定会使美国的国际贸易受到损失。

然而,如果国防上需要有庞大的商船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补贴造船工业。

国家安全和生活方式。在军备竞赛既是各国之间不团结的原因,又是其后果的今天,决定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国防费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经济学者并不能比其他人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他可以指出:自私的经济利益往往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企图以国防的名义来使不经济的活动合法化。经济学者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增加对瑞士钟表的关税真是因为国防上需要精密机械工人吗?还是仅仅因为政治压力的缘故?”最后,经济学者还可以指出:相互有利的国际贸易有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团结,并且指出:政治对于贸易的干扰在过去造成了导致战争和在贫穷地区延长贫穷状态的某些冲突。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其他应予考虑的非经济的目标。人们也许感到农村生活具有特别神圣之处，“壮健的自耕农或快乐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含有某些值得保存的东西。（我们怀疑，这种田园诗般的典型人物是否来自农村。）有些人也许同意苏联将军们的看法，认为应该提倡农村生活，因为农村比城市具有较高的人口出生率。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补贴而不是关税。关税不过是一种间接和拙劣的使人难于看出问题的补贴形式。

不要因此而形成这样的看法，认为凡是政治方面的非经济的论点一般都赞成征收关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位议员都知道：目前美国外交活动的重大任务，就是争取朋友和同盟者。高额关税的名声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有损于我们在海外的友好形象。外国人已经确信，一旦他们割走美国市场的一部分，我们就会施加限额和关税。这种看法对我们过去的行为来说比对目前要更加适用一些。因此，从我们的政治利益来看，我们特别有理由来顶住许多企图限制国际贸易的压力。

§. 显然是荒谬的赞成关税的论点

把钱保持在国内。A. 林肯曾经被认为说过：“对于关税，我懂得不多。然而我确实知道，当我向英国买一件上衣时，我得到上衣，英国人得到钱。但是，当我在美国买一件上衣时，我得到上衣，美国得到钱。”

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说过这句话。然而，这句话的确代表一个流传年代久远的典型谬论，即在亚当·斯密以前的十七和十八世纪重商主义者的谬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给予别人的物品多于它所得到的，那末，这便是好运气，因为这种贸易“顺差”(!)意味着，黄金会流入该国来偿付它的出超。

在今天和今天的时代,已经无需再来反复说明:虽然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量的增加会改善他的经济状况,然而,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每个人手中的货币量的加倍只不过会把价格提高。如果人们不象迈达斯国王那样爱财如命,那末,货币之所以能够改善人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在于货币本身,而在于货币所能买到的或出高价抢购来的东西。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一旦到达充分就业的状态,增加的货币便不能买到任何新物品^①。

为了提高货币工资而征收关税。今天,大家都同意,极端的保护性的关税可以提高价格并且把黄金或外汇储备吸引到本国,如果别的国家不用关税来进行报复的话。关税甚至可以增加货币工资;但生活费用因此而上涨的幅度往往超过货币工资增加的幅度,从而,实际工资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减少。用关税来保护每一个受到廉价进口货竞争威胁的国内行业,决不可能提高一般的生活水平^②。

我们可以继续提供善于思考的人稍加分析便可揭穿其荒谬之处的主张保护贸易论点。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些不值一驳的谬论无足轻重。实际上,它们对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花言巧语的论点不过是橱窗装饰。

为特殊利益集团而征收关税。当保护贸易的立法在国会中讨论时,任何观察国会中的“官官相护”的人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保护性关税的唯一最重要的动机。力量强大的压力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劳方和资方两个方面——清楚地知道,不论其对总产

① 当然,我们可以用黄金在海外购买物品。但是,这个完全合理的用进口改善福利的方法,恰恰是重商主义的变种“重金主义者”所反对的。

② 回想第三十四章关于相对有利条件和关税影响的论述。

量和总消费量的影响如何，对外国产品征收关税会对他们有利。过去，他们通过明目张胆的贿赂来获得必要的选票；今天，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在华盛顿为老式的瓷器、手表或钮扣钩行业制造提供保护的舆论。

从经济上看，争取较大程度的自由贸易具有充分的理由；从政治上看，压力的大部分都来自保护贸易的受惠者。为什么？因为，自由贸易使每人得到一小点好处，而保护贸易却使少数人得到很多好处。从政治上看，保护贸易是否害大于利呢？如果从保护贸易中受惠的少数人（或保护贸易使其免于受到损失的人）在政治上积极地为之而进行宣传鼓动，在政治上就不会害大于利。把大量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组织起来要求从专业化和自由贸易的有效率的型式中得到更多的好处是一件远为困难的事情。如果政治选票与经济利益的总量保持准确的比例，那末，每一个国家的议会将会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而把大多数的关税废除掉。

§. 某些错误较不明显的谬论

关税可以增加收入。第一个论点是：应该使用关税来增加政府的税收。实际上，对进口货抽取关税不过是累退的销售税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很坏的形式。关税之所以是一种特别坏的形式，是因为它使经济资源脱离其最好的使用方式。如果主张用关税增加税收的人果真想增加政府收入，那末，他们应该建议征收一种同样会落在国内产品上的销售税。这种税不会产生任何保护作用。（在某些不发达国家，在行政上可能征收的唯一赋税为进口关税。因此，我们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而征收关税是有道理的。）

为了反对在先进国家中以收入的名义征收关税，只需要记住这样一点就够了：完全使我们避免进口竞争的禁止性的“保护”关

税，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收入；1890年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所谓“财运亨通的国会”处于税收多于开支的状况。由于没有应该归还的公债，国会陷入了尴尬境地。它解决过多的关税收入的最后办法不是降低税率，而是把税率提高到使关税收入得以减少的水平。

关税与国内市场。第二个论点可以表述如下：“农民应该支持 696 对工业品征收关税，因为那会使他们的产品在国内添增很大的市场。”该论点是完全错误的，但错在哪里却不大容易被人发现。使用这一论点长期竞选总统的亨利·克莱，既不“正确”，也未当上“总统”。

这一论点的错误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看出来。首先，减少工业品的进口事实上会同时间接地减少我们农产品的出口。因此，农民会直接受到损失。“但是”，克莱也许会抗议道：“对于农产品的添增的国内市场，你们能说些什么呢？”

的确，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详细的比较成本的例子证明：孤立于国际贸易之外会减少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低水平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条件下的对于农产品的国内总需求，肯定要比高水平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条件下的来得少。因此，如果它不能被我们在以后所要论述的相当不同的论点所支持，“创造国内市场”的口号就会再度被证明是错误的。

廉价外国劳动力的竞争。第三个赞成保护贸易的论点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论点，因为它能得到广大劳动者的赞成。按照它的通常说法：“如果我们听任廉价的外国劳动力——每天靠着几美分的大米为生的中国苦力或工资低廉的日本电子工业劳动者——所生产的物品进口，那末，就不能维持美国劳动者的较高的生

活水平。”以如此方法表达出来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已经看到,按照消耗的资源计算,即使一国比另一国能以较便宜的方式生产每一种物品,贸易还是对双方有利。重要之点是相对有利条件而不是绝对有利条件。归根结底,贸易是双方的物物交换。按照一定的交换比例,一国不能在每一种物品上永远把另一国赶出市场。

我们以前曾经证明,在长期中,一国国内的充分就业并不取决于对外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已在对他最适合的工作上充分就业,那末,假使外国劳动者愿意为了很少的代价而工作,这不是对我们自己有利吗?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就是:

相对成本原理告诉我们:同经济情况和我们差别很大的远东和热带地区进行贸易要比同经济情况和我们类似的英国和德国进行贸易得到更多的利益。^①针对廉价劳动力的论点,关键性的事实是:相对有利条件的分析告诉我们:绝对工资水平与长期中的国民收入由于进行贸易而得到的增长无关。

在理论上,我们就分析到这里。如果我们考察现实世界,廉价劳动力的论点就会暴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欧洲和亚洲,劳动者们乞求关税。他们说:“应该保护我们,免受收入多、效率高的美国劳动者的‘不公平的竞争’,因为他们具有远较我们为优的技术和机器。”世界的其他地区生活在恐惧之中,总是担心受到美国大量生产行业的竞争。英国的保护主义者宣称: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港的每小时工资为\$7的美国劳动者,比每小时工资为\$3的英国劳动

^① 对这一论点必须加上限制条件并且加以进一步说明。落后国家,如果贫穷到具有很小的实际购买力来进口物品,最多只能向我们出口少量物品。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在今天系在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之间进行。当落后国家在工业上取得进展时,它们向工业化国家购买较多的,而不是较少的物品;但是,也许不会成比例地增加。也许双方从贸易中所得到的消费者剩余较少。

者的效率高三倍。这也许是夸大其辞，但也接近于一个重要的真理。

美国的高额实际工资来自高效率，而不是来自关税保护。这种高工资，作为高生产率的后果，不会使我们与外国劳动者进行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

为提高工资的份额而征收关税。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反面批评“廉价、贫穷的外国劳动力”的关税论点。从客观的情况来看——没有客观即没有科学——我们必须承认，它可能具有下列的真理。上一章附录中的奥林的命题告诉我们，物品上的自由贸易可以部分地代替劳动者向美国的移民。这意味着：美国劳动力的稀缺性可以由于在国际上对节约劳动的产品的专业化而得以减轻，从而，我们这里的实际工资可能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降低。实际的国民产值将会上升，然而，劳动在其中的相对和绝对份额却会下降^①。

虽然大多数经济学者承认上述的可能性，但他们认为：在典型的国家中，它所包含的一丝真理远逊于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的考虑。不容置疑，缺乏流动性的劳动者，如纺织工人，可能由于取消关税和限额而遭受损失。但是，由于劳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伸缩性很大的生产要素，所以其他劳动者从贸易增长额中得到的好处很可能大于那些受到损害的人遭受的损失。全体劳动者将分享贸易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为报复而征收关税。某些人承认，自由贸易的世界要比关税

^① 哈佛大学的W·里昂惕夫的研究表明：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是美国的资本，而不是劳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会形成降低关税可以提高实际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的论点。（对于里昂惕夫的这种非同一般的看法，比较好的解释是：美国劳动者在技术上抵得上三个外国劳动者，但是我们按人平均的资本比外国少三倍。）

壁垒的世界好。但是,他们说:只要其他国家愚蠢到或者恶劣到征收限制性的关税,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如法炮制,以便自卫。

实际上,关税非常象运输费用的增加。如果其他国家愚蠢到听任它们的道路毁坏,那末,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挖窟窿会有好处吗?回答为“不会带来好处”。因此,如果其他国家由于征收关税而损害我们以及他们自己,我们就不应该再征收关税来进一步损害自己。

为了确实掌握我们的关税不仅损害外国人而且损害我们自己的论点,读者应该理解:当贸易协定能使另一国家和我们自己相互降低关税时,由此而得到的益处具有四个方面。另一国家降低关税会使(a)我们受益和(b)他们受益。我们降低关税也会添增两个受益之处:(c)我们自己和(d)他们。

因此,当外国提高关税时我们应该报复的论点的唯一有理之处在于:我们报复的威胁可以制止他们提高关税,而我们降低关税的承诺又使他们降低关税。这使我们有理由在偶然的场合征收关税作为一种虚张声势的手段,但是,如果我们的虚张声势不能奏效,我们就应该放弃这个手段。

698 根据研究历史事例,大多数政治科学的学者认为,报复性关税通常招致其他国家进一步提高关税,从而,很少能成为导致多方面的降低关税的有效手段。

“科学的”关税。这是支持关税的虚伪性质最大的论点之一。它之所以是虚伪性质最大,原因在于:它往往听起来是有道理并且是有节制的;然而,它的实际含意是停止一切贸易!用它的通常的形式来说:应该征收关税来“使国内和国外的生产成本均等”。第三十四章说明:贸易的全部利益的基础在于成本和有利条件的差异。如果征收关税,使进口成本等于国内生产的最高成本,便不会

有任何物品进口^①。

这种关税没有任何科学之处。这个在一切保护主义的论点中最没有道理的论点，却在我们的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政治作用，这表明美国人民是何等缺乏经济知识。

危险点关税的论点。按照国会提出的这个论点，美国应该使某一行业的关税处于低水平。然而，如果这种办法造成大量的进口，以致威胁本国行业的生存时，我们就达到了所谓“危险点”。当到达该点时，我们应该增加关税或紧缩限额，以便使我们国内的行业不致消失或者不致缩小到危险的程度。

这个论点怎么样？虽然它听起来是有节制的，然而，应该注意：它的基本出发点完全违背了相对有利条件这一经济理论。我国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是实行专业化的结果，即：放弃某些活动并且把它们的资源转移到我们具有较大的有利条件的行业。那些相对条件非常不利的行业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假设一个行业（譬如说钢铁行业）以前具有相对有利条件，但现在已经丧失了相对有利条件——因为其他行业的技术进步较大，因为该行业所使用的国内的生产要素由于在其他地方的使用更有价值而变得较为昂贵，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那末，该行业就应该受到威胁，就应该被我们的生产率较高的行业挤垮。^②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残酷。没有一个行业甘愿死亡；没有一个地区对改变生产要素的使用方式持欢迎态度。事实上，任何处于

① 当生产者的成本不相同时，科学的关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数值为零的关税可以使外国的成本和我们效率最高的生产者的成本均等；高到几乎为禁止性程度的关税可以使外国的成本和我们高成本的生产者的成本均等。我们如何能科学地找到一个标准？

② 当然，国防或其他正确的论点可以被应用于这一情况。但是，如果它们可以被应用于这一情况，那末，正确的论点是它们，而不是危险点的论点。

危险状态的领域很可能是早已长期枯萎的病态行业。因而，那些早已衰弱的行业和地区会感觉到，它们是被有意挑选出来承担进步的代价。

有鉴于此，最好的政策也许是逐渐降低关税，从而使受到保护的生产要素有时间来进行转移。或者象 1962 年的贸易法那样，由国家提供资金来对生产要素加以保留和再分配。这会加速转变的过程，使强者和弱者共同分担代价，并可能减少对国民生产的必要调整的阻力。令人宽慰的是：在一个成长的经济社会中，相对于有活力的高效率的行业而言，缺乏效率的行业往往自行逐渐缩小。

§. “外国人支付代价”或贸易条件的论点^①

在论述了上面的赞成关税的荒谬论点之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可能正确的论点。该论点认为：关税会使贸易条件不利于外国人。它也许是在静态的竞争条件下唯一正确的论点，其来源可以追溯到一百五十年以前的约翰·S. 穆勒。令人费解的是：正确的赞成保护主义的论点似乎来自主张自由贸易的人，而不来自保护主义者！

如果我们对橡胶征收关税，那末，穆勒会争辩说：那会把国内的价格提高到国外以上。但是，由于我们的需求量现在已经减少，由于我们是橡胶的重要需求者，所以国外的价格将会下降。因此，一部分关税实际会由外国人负担。（读者自行说明：一个很小的国家不能根据这一论点行事，因为它无法改变世界市场的价格。）

总之，适度征收少量的关税可以改善一个重要国家的贸易条件（其定义为：该国的出口和进口价格的比例）。

^① 这一论点和一个提高价格的国内垄断者完全相象。该垄断者把他的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以上，但并不提高到非常之高的程度，而是提高到使 $MR=MC$ 时为止。高深的著作有时把这个最优的关税称为“科学关税”。但是，不要把它和成本均等化的关税混淆在一起。

但是，这里有一个值得警惕之点。适合于真正反对一切贸易的保护主义者心意的禁止性关税，永远不能把这个贸易条件的论点当作论据。为什么？因为，取消一切贸易会取消来自贸易条件改善的一切利益。因此，经济学者坚持：“最优关税”的数值应该大到足以改善你的贸易条件，小到足以使进口和出口的实物交换处于对你最有利的水平。

大多数经济学者认为，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大多数国家应该只征收少量的关税。

§. 处于动态情况下的赞成保护主义的论点

最后，在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论战中，我们来看赞成关税的人能提出的一些有力的论据。属于这一范畴的有三个重要的论点：(a)关税有助于减少失业；(b)关税有利于形成免受风险的多样化的行业；(c)对有发展潜力的“幼年行业”应该提供临时性的关税保护。

关税与失业。在历史上，保护主义的最有力的论点之一便是提供和保存就业机会。以前，我们讨论过出口和国外投资对于国内就业和支出的有利的乘数作用以及进口的有害的“渗漏”作用。因此，在其他国家进行报复以前，以邻为壑的高额关税的政策可以在短期中增加就业。

但是，我们是否能把这种办法当作我们国家的充分就业的方案中的一个有效的部分呢？自由贸易不是很象新发明的机器和方法吗？二者都代表我们实际的国民产量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但是，二者都可能在短期中降低我们实际到达的产量和就业量。虽然如此，不论在短期或长期中，我们没有必要容忍实际产量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缺口的存在，因为那等于不必要地抛弃经济进步带来的

好处。

那么，我们如何回答把失业归咎于关税过低的论点呢？我们反驳这些论点，正如我们反驳“技术失业”的论点一样。我们指出：存在着国内的货币、汇率和财政政策；它们可以成功地和有效率地解决经济萧条问题。（回想第二编的宏观经济学。）如果被进口排挤掉的劳动者可以在强大的劳动市场上找到其他工作，那末，这个保护主义的辩解便不能成立。

“但是”，有人可以争辩道：“对于新的‘停滞膨胀’的现代疾病——就业机会太少，因为充分就业似乎和稳定的价格不能同时共存——你能说些什么？这是否可以认为是征收关税的理由？”经过思考以后，我们的回答为“否”。我们将在第六编中论述的停滞膨胀问题并不会为关税所减轻，不论在短期或长期中均系如此。通过关税创造缺乏效率的就业机会比通过财政和货币的刺激创造具有效率的就业机会要制造出更困难的停滞膨胀问题。

有一点应该加以强调。在今天，我们要求一个合理的经济方案把均衡的汇率包括在内。美元的平价如果“定值过高”，就会造成失业（如第三十三章的附录所示）。当然，征收关税可以抵消一些定值过高产生的影响。但是，降低汇率是一个比依靠限额、关税和外汇管制远为有效率的——也是远为公道的——方法。^①

用多样化来减少贸易条件方面的风险。根据相对有利条件原理，一个国家会孤注一掷，完全专业化于一种或几种物品。如果这些物品的价格下降，其后果为何？如果该国的出口价格波动，其后果又将为何？或者，象被卡特尔控制的石油一样，我们假设，进口

^① 如果一般的货币工资率太高，美元就可能处在“定值过高”的状态（如第三十三章附录所示）。第三十六章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较好的办法是规定新的外汇比价，而不是征收关税。

价格将要上升而且还要波动，那末，后果为何？该国会发现：这种贸易条件的变化会使它的实际收入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它的那个专业化的行业会经常亏损。

为了避免“单一物品经济”，拉丁美洲的经济学者建议使用关税。正象投资者不孤注一掷而购买不同的证券以减少风险一样，国家应该使用关税来促进多样化。

这个论点肯定值得对之加以仔细的考察。应该注意：它假设：普通公民往往忽视将来的价格。他们没有考虑到，如果他们投入资金和劳动技能的行业的产品价格发生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这一论点势必要假设：政府比私人投资者较多地了解情况，或者，在考虑价格变动的危险时，政府至少比私人投资者更加具有远见。如果将来的风险确实存在而又被私人投资者事先看到，那末，私人投资者就不会被暂时的高额利润错误地引导到仅仅投资于几种出口行业。事实上，这些行业根本不具有真正的长期的相对有利条件，从而，实际上也不存在专业化于这些行业的倾向^①。 701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一个有关的赞成拉丁美洲征收关税的论点。长期担任联合国顾问的 R. 普雷维什博士认为，长期的贸易条件总是转向于不利于农产品的方面。因此，专业化于农产品的国家等于买了将要落选的马的赛马票。他论证说：这些国家应该征收旨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关税，因为工业品的贸易条件比较有利。（与这个论点相反的看法是：如果由于农业技术大大提高，食品的实际生产成本下降的幅度大于食品价格以往和未来降低的幅

① 假设私人雇主确实预先看到风险的存在，但认为出口价格下降时，他可以辞退劳动者，从而把失业的重担转嫁给国家。那末，我们便真正面临着所谓“外部负经济效果”，政府因此而有理由用关税、限额和其他方法来进行干预。还有，回想一下：在有限的情况下，“外国支付代价”的论点在贸易条件方面是正确的。普雷维什的追随者也可以宣称：扶植工业会改善劳动者在国民产值中所占有的份额，其数值大于国民总产值的减少。

度，那末，根据长期的相对有利条件原理，一个国家仍然应该专业化于食品生产，以便提高实际收入，或者至少使亏损最少。罗马俱乐部的看法也与普雷维什的看法相反，它的一系列极为悲观的论点可以归结为：食物、纤维和矿产在将来都会稀缺和昂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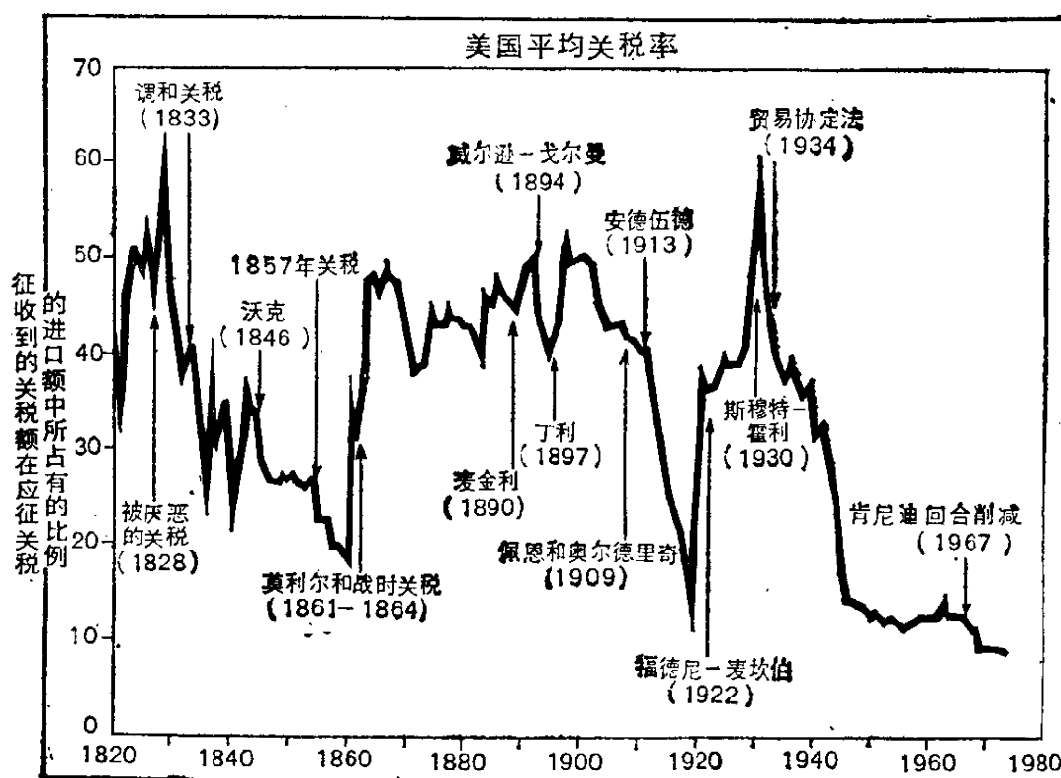
实际上，这个论点是议论某一国家将来的相对有利条件是什么的问题。以政府比私人投资者更有能力来辨别不利于贸易条件的发展趋向而论，我们可以说，对自由市场的力量的干预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政府在它的相对有利条件的预测中犯了错误，那末，整个国家的实际收入将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将放慢。

为保护“幼年行业”而征收关税。这一论点是 A. 汉密尔顿在他的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该论点也与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者 F. 李斯特联系在一起，并且得到约翰·S. 穆勒、A. 马歇尔、F. 陶西格和其他正统的经济学者的有限度的赞同。

按照这一学说，一个国家确实会在某些活动上具备有利条件，如果这些活动得到发展的机会的话。如果面临外国的竞争，这些幼年的行业便不能度过起始的实验和财政困难的阶段；但是，倘若给予一个喘息的机会，它们就会象许多现代大工业生产那样，取得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果和技术上的效率。虽然关税保护最初要提高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然而，一旦这些行业成长起来，它们就会具有非常高的效率，以致实际的成本和价格下降。如果消费者在以后所得到的好处大到足以补偿在关税保护时期的高额价格而有余，那就有理由征收关税。

这里确实包含一些道理，至少是一种可能性。研究一下历史，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些幼年行业成长成了能独立生存的行业；但是，也可以发现更多的相反事例：一些行业永远处于幼年时期，可

叹的是：尽管这一论点有其实际的重要意义，幼年行业却无法争取到许多选票。从国会那里得到保护的不是幼儿们，而是那些多年来一直不肯丢掉尿布的既得利益集团。⁷⁰²



第 35-1 图 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高关税的国家——但最近，关税率却急剧下降

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进口税仍然比大多数国家高，那末，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最新的威胁来自进口限额。纺织、鞋、钢铁、石油以及食品行业企图排除进口货的竞争。它们错误地认为，一个国家可以简单地使用这种手段来提高工资，而不是由于失掉地理分工的效率而压低实际工资。

“青年经济”的论点。幼年行业的论点对一世纪以前的美国而言，要比对它目前的情况而言，具有较大的正确性。该论点对目前的不发达国家而言，要比对已经从农业转变到工业的生活方式的发达国家而言，也具有较大的正确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些国家正在沉睡；不能认为，它们处于均衡状态。从整个世界来看，农民的

收入似乎低于工人。结果,在每一个地方,工业相对增长,农业相对下降。人口向城市流动,但这种流动并没有快到足以使收入和生产率处于均衡状态。因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用适当的保护手段来加速这些在经济上是可取的长期发展趋向。这种支持保护主义的论点,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幼年行业,倒不如说是为了保护“青年经济”。

703 最后,请注意:幼年行业或青年经济的论点并不违反相对有利条件原理。恰恰相反,它们的正确性赖以成立的根据是:生产可能性边缘会由于施加保护手段而向外并且向着暂时需要保护的行业的新的相对有利条件作出有活力的移动。

§. 结论

虽然本章所谈的通常是关税,然而,本章的内容几乎完全可以被应用于对贸易的任何限制。例如,限额具有关税的一切害处,而往往甚至更加有害。一个暗中使用的现行手段是通过政治压力使外国的出口商“自愿地”对他们向我们的出口量施加限额,正如日本人实施的纺织品限额那样。

最后,我们应该提到“无形的关税”。在许多国家中——而美国并非例外——手续繁难的海关行政管理可以和支付金钱的关税同样对贸易起破坏作用。

这就完成了我们对关税的是非所作的论述。任何一个愿意思考关税问题并且不执偏见的读者不能不看到:大多数的赞成保护关税的论点是多么浅薄。唯一真正的例外是幼年行业或青年经济的论点。

因此,我们毫不奇怪,为什么经济学者——他们一般被认为对一切问题的意见都不一致——的绝大多数赞成旨在减少贸易障碍的赫尔互惠贸易协定以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 35-1 图生动地

表明一个很少为国内外所觉察到的事实：美国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现在已不再是一个高关税的国家了。

总结和复习

1. 之所以有必要提高贸易的自由程度，是因为根据相对有利条件原理，国际专业化可以提高生产率。自由贸易还会提高世界产量，从而提高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不同生活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是特别有利的。

2. 大多数赞成关税保护的论点不过是某些压力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寻找的借口，因而经受不住认真的分析。

3. 可以违反相对有利条件规律的例外情况为，有时出于国防上的考虑，需要照顾某些效率较低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政府补贴也许是较好的办法。

4. 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另外一个唯一具有实际重要意义的例外是：幼年行业或青年经济需要暂时性的保护，以便实现它们真正的长期相对有利条件。以国家发展计划能够比自由市场的作用较好地辨别出长期的趋向而论，用干预贸易的办法来扶植工业化⁷⁰⁴可以造成有利的后果。

第三十六章 目前的 国际经济问题

在建造一座围墙以前
应该好好想一想
所圈进的是什么
未被圈进的又是什么……

罗伯特·弗罗斯特

现在，我们必须论述在将来的年份中面对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国际经济问题。如何去理解重要的事实？应该避免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同其他经济问题相比，经济学者对于国际贸易的原理取得了较为接近于一致的意见。然而，在国际金融问题上，一般人的信念和专家之间的分歧却比其他方面的分歧要大。值得庆幸的是：最近几十年来，这种分歧似乎在不断缩小。第A部分将简要论述国际贸易的主要历史趋向和目前的趋向。第B部分分析国际制度的崩溃——维持固定的汇率、美国长期的黄金外流、国际流动资金的短缺以及贸易方面的其他问题。以此作为背景，我们可以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国际金融改革的基本之点。

A. 国际金融的现代趋向和制度

§. 1914—1950 年间的趋向

出口和就业。当战争在1914年爆发时，交战国——特别是英

国、法国和俄国——增加了从美国的进口。这一行动的影响不可能用当时最高级专家所知道的工具进行分析，而正如第三十三章的附录和常识所说明的那样，第二编中的乘数分析却可以解释当时实际发生的现象——国民生产总值的成倍增长。在这里，我们看到，普遍适用的原理在发生作用：进出口的变动对就业数量和价格水平产生宏观经济的影响。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当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许多愚蠢的私人放款并且叫喊着要提高关税以便“保护美国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时，促使我们的经济活动繁荣的一个因素是大量的对外放款。象国内投资或政府赤字开支一样，对外贸易的差额有助于增加货币支出总量和就业数量。

706

地道的工商业者作了如下的总结：“当然，我们的许多对外放款在以后变成了烂账，从而，投资者赔了本。但是，只要我们能将物品运销到国外，就会创造就业机会。不论在十年以后，放款的结果是好还是坏，不论所借出的钱是否会成为公共的或私人的礼品，以二十年代当时的就业和价格而论，那都是无所谓的事情。”或者，象曾任 J. P. 摩根的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总经理的 L. 弗雷泽所说的那样：“与其从来不贷款给人家，还不如贷款给人家而又失掉了贷款为好。”

大萧条和以邻为壑的政策。1929 年股票市场崩溃以后，对外放款变为一文不值，新的对外放款停止进行，而每一个国家均存在着严重的失业和动乱。当国内缺乏就业机会时，保护主义的政治力量猖獗起来。关税被提高、限额被采用、同时许多国家实行了外汇管制。不顾几乎百分之百的经济学者的反对（他们向国会递交了请愿书），国会于 1930 年通过了斯穆特和霍利提出的高额关税法案。愤世嫉俗的人高兴地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美国企图从海外讨还贷款而同时又禁止唯一能提供偿还贷款金额的货物进口。他们也高兴地看到农民在受骗上当——农民是净出口者而不是净进口者，而农民的出口(!)产品却被课征高额的进口关税，以便换取他

们赞成高额的工业品关税的选票。

合成谬误在发生着作用。每一个国家都相信，如果它能取得贸易顺差，那末，它的就业会由于它邻国的失业而增加；实际上就是说：它能成功地把它的一部分失业给出口掉。然而，每人同时都取得贸易顺差是自相矛盾的事情——正和每人都要比其他人长得高一样的不可能。

当然，想要高一些的企图——即：取得出口超过进口的顺差——肯定要减少有成果的分工，而这恰恰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国内和世界生产总量固然降低，国际贸易数量降低得还要多一些。当国家之间只能在双边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时，情况算是达到它的最糟之处。A 向 B 购买的数量只能等于 B 向 A 购买的数量。在希特勒的经济顾问沙赫特的影响下，拉丁美洲国家向德国运送粮食，以换取德国仓库里堆得满满的阿斯匹林。

在今天，即使学龄儿童也要问：为什么人们不采用扩展性的财政和货币方案。做事后诸葛亮当然总是容易的。国家不能单独采取扩展性的方案的原因之一（这正是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问题）在于：如果它增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其他国家仍然使其国民生产总值处于低水平，那末，它害怕它要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使它的进口增长。因此，它会失掉黄金，从而在金本位制下，它必须再度收缩，或者，被迫贬值或面临破产。

实际情况是：到了 1931 年，英国和它的自治领国家以及北欧国家被迫脱离金本位。由于英镑贬值，这些国家便有条件来扩展国内的经济活动。如果看一下当时的历史，那末，你可以看到：瑞典和英国已经顺利地从那大萧条中开始恢复过来，而与此同时，
707 美国、德国和法国依然处于大萧条的最严重的时期。不容置疑，货币贬值国家的所得的一部分是取自仍然坚持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但是，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得以扩展的国家的所得主要

来自贬值使它们取得在国内扩展经济活动的自由。

以往的美德是否得到报酬呢？在三十年代没有得到报酬。即使在罗斯福实行的美元贬值之后，比利时还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中坚持老的含金量的比价。政治动荡和大萧条成了比利时的报酬——一直到1935年；那时，它放弃了坚持金本位的挣扎，不但没有由于其变节行为而受到雷击，它的生产和失业的统计数字反而立即有所好转。法国在二十年代可以说是刚愎的膨胀主义者，由于把老的含金量比价坚持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几乎在政治上把自己弄得四分五裂。

战争。对德国和美国打击特别大的那次大萧条有助于使希特勒取得政权。他的战争准备“解决了”德国的严重的失业问题并且（以不必要的悲剧的方式）证明了凯恩斯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质。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用新发行的货币来维持的国家预算赤字使得每一个国家的 $C + I + G$ 中的 G 都有了大幅度增加。这种增加产生了意料之中的效果：首先，把生产扩大到使失业消失；其次，使需求总量膨胀到如此程度，以致造成通货膨胀缺口和通货膨胀本身。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向交战国出口物资再度把充分就业带到了美国。

“美元短缺”时期。战争结束时，各种资源仍然很稀缺。只有美国没有在物质上遭到战争的破坏。在其他地方，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重建、发展和补足战时的物资短缺。按照当时的汇率，美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定价过低的”。

美元定价过低和美元短缺的定义：为了支付从我们这里进口的货物而引起的国外对美元的总需求量大大超过我们的普通公民所愿意供给的美元总量（用于支付旅费、进口货、直

接投资等等)。如果我们在那时没有执行提供救济和重建资金以及给予借款和赠予的政策,那末,没有一个国家能具备所需要的黄金或信用条件来偿付它与我们之间的国际贸易的赤字。在实行自由贸易和汇率可以自由伸缩的世界中,争购美元本来会把它的价格推向很高的水平。

处于 1945—1950 年间的情况,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美国援助方案以及外国对进口和资本流动的严格限制,第 33-1 图的 dd 和 ss 曲线在当时的汇率下肯定会出现庞大的“美元缺口”,而只有通过使均衡交点下降,下降到以外币表示的美元价格非常昂贵的地步——也许为每英镑二美元,而不是当时规定的四美元,美元缺口才能补上。相对于马克、法郎和日元而言,美元也需要作出类似的升值。

上一段说明了当时人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技术名词的意义,即:什么是“美元短缺”或“美元缺口”。

当时是以何种方式弥补这一缺口的?这一缺口并没有通过战后外币的迅速贬值(虽然以后在 1949 年,英国和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贬值。英镑从 \$4 下降到 \$2.80)来弥补。当时弥补所谓“美元
708 缺口”的主要办法是由“货币定价过高的”国家全面地控制外汇和进口,以及实施我们将要看到的大规模的援助和放款计划。

§. 马歇尔计划、军事援助和其他计划

第 36-1 表说明美国的援助计划是如何巨大。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助解决战后的紧急需要之后,我们开始执行大规模的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以后,我们的援助转移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其他的军事盟国。(例如,当希腊受到共产主义威胁时,“杜鲁门主义”使该国得到财政支援。甚至南斯拉夫也得到了援助。)

美国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外援助						
(单位: 10 亿美元, 财政年度)						
援 助 种 类	1945— 1950	1951— 1956	1957— 1962	1963— 1968	1969— 1974	战后时 期总额
非军事赠款净额						
西欧	10.9	5.4	1.0	0.0	0.1	17.4
亚洲、非洲和近东	4.6	5.0	8.3	7.6	7.6	33.1
世界其他地区	1.6	0.6	1.9	1.6	5.2	10.9
	17.1	11.0	11.2	9.2	12.9	61.4
政府借款净额						
西欧	8.1	0.2	-2.1	0.1	3.7	10.0
亚洲、非洲和近东	0.7	0.8	2.8	8.6	10.1	23.0
世界其他地区	0.6	0.5	1.8	2.5	5.1	10.5
	9.4	1.5	2.5	11.2	18.9	43.5
军事赠款净额						
西欧	0.3	11.0	4.2	1.3	0.8	17.6
亚洲、非洲和近东	1.4	5.1	7.3	8.6	17.4	39.8
世界其他地区	0.1	0.6	0.6	0.3	0.5	2.1
	1.8	16.7	12.1	10.2	18.7	59.5
赠款和借款总净额	28.3	29.2	25.8	30.6	50.5	164.4

第 36-1 表 援助系用于救济、恢复、发展和军事安全

虽然人们敦促先进国家把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用于援助, 但几乎没有国家这样做。美国对外援助在绝对数量上和在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上都在逐渐下降。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这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业务。)

不容置疑, 这些援外计划的重要动机是害怕共产主义的扩张。人们论证道: 吃饱的肚子未必能拯救民主政体, 但是, 饥饿的肚子肯定要使它灭亡。把现代化的武器交给我们的朋友, 目的在于帮助他们保卫自己和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由于其他先进国家——如英国、德国和苏联——也提供对外援助, 我们的动机也含有仿效 709 和竞争的成分。

然而, 对于导致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外计划的仔细研究说明: 美国在战后也断续地具有“与人为善”的动机。可以把它称之为利

他主义,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可以称它为长期的权宜之计。在世界上相应于每一个美国人就有十五个非美国人这一事实,使得我们的前途取决于不太仇视西方社会的稳定的国际秩序。认为我们从事援外是由于那是我们避免国内经济萧条的唯一办法的说法经受不住对事实的仔细的研究。恰恰相反,当我们国内的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提供的援助最多,而提供援助的代价之一就是加重同时并存的国内物资的缺乏。

第四点计划。除了提供相当多物质援助以外,在我们支援外国的项目中,有一项是成本不高的,即:帮助它们获得技术知识以便使它们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这被称为“第四点”计划,因为它最初在杜鲁门总统 1949 年的就职演说中作为第四点被确切地提了出来。

第四,我们必须开始实施一个大胆的计划,使得我们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能有助于不发达地区的改善和成长。……我认为,对于爱好和平的人们,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我们积累的技术知识,以帮助他们实现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我们邀请其他国家在这个……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富饶和自由的奋斗中把他们的技术资源和我们的汇合在一起。

除了这些政府的计划以外,我们的私人也出口技术知识。我们许多最大的公司在外国设立分号;它们往往在国外征集资本,由美国方面提供技术知识。

有些人只要想到我们帮助外国从而使它们成为我们在工业上的竞争者这一事实便呈现出一副恐怖的表情。尽管最大的国际贸易数字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出现在高度发达和落后国家之间,但从长期的自私的经济利益来看,这种悲观的论调却有一些事实的根据——如在马歇尔计划之后的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兴所

显示的那样。然而,从长期的政治利益和利他主义来看,帮助别国发展经济还是应被当作美国的好政策,虽然选民们对此越来越缺乏热情。

§. 对外放款和布雷顿森林制度

由于美国在工业上比世界其他地区发达,所以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和苏联定会利用我们的资本来从事它们的工业发展。这种资本所增加的生产应该在支付丰厚的利息和归还本金之后还会有余。

但是,美国公民很早就不愿放款了。美国公司本来是愿意在国外修建分厂的,也愿意投资于石油和矿产资源。然而,在1929年以后,通过购买冒风险的外国债券或股票而进行的大量放款大为减少。与此同时,美国公民确实具有储蓄,而且乐于把它借出 710 去,如果这种资本交易是安全可靠的话。从这种对外放款中,我国将来的生活水平可能受益。

因此,世界主要国家(除去苏联自愿不参加以外)在1944年聚集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建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它的姐妹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名思义,世界银行的成立是为了提供复兴和开发之用的长期可靠资金。(我们将要很快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关心的是短期信用以及汇率的相互合作的管理。)

§.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了解世界银行是很容易的。世界主要国家认购它的股本,其数量与各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成正比。(美国的股份限额约占三分之一。)该银行可以利用它的资本向从事经济上合理的建设项目,但无法以合理的低利率得到私人借款的人们或国家发放国际

贷款。

世界银行的真正重要性并不是它可以利用银行资本发放贷款,而是它可以发行债券并用由此而获得的资金进行贷款。(它曾经成功地在美国、瑞士、日本和其他国家发行债券。)它发行的债券是稳妥可靠的,因为债券系由所有国家的信用来担保(担保到各国认购股份数额的百分之百)。此外,该银行还可以担保别人的贷款并以此得到小额的报酬。于是,由于该银行的信誉,私人方面就愿意提供贷款资金。

作为这种长期信用的后果,已经可以看到,物品和劳务从发达的国家中流出,用于国际经济发展。如果贷款是健全而稳妥的,那末,它将全部被归还。如果一部分贷款成为烂帐,那末,其损失能够用该银行的利息收入和业务收入来偿付。如果烂帐超过此数,那末,其损失将由会员国共同负担。发放贷款时,发达的国家要放弃一部分当时的资源。当贷款被“连本带利”地偿还时,发达的国家在有用物品的进出口方面应该享有入超。借款地区的生产的增长应该大于贷款的利息而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和生活水平一般会提高,而不是降低,因为外国的资本使借款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世界银行是否在财政上获得了成功?确实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后期 R. 麦克纳马拉(曾在福特汽车公司和五角大楼任职)成为它的领导人以后,该银行急剧地增加了业务活动。它通过国际开发机构和国际金融公司而进行的贷款活动的比重日益增长。国际开发机构系为世界银行所建立,以便向各国提供教育、道路、医院等方面的“软贷款”,而建立国际金融公司的目的则是为了向外国的发展银行贷款,以便向私人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①

① 我们自己的进出口银行向外国放款,使美国出口商能根据信用向巴西或南斯拉夫出售机床等货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起源于 1944 年的国际会议。该基金组织企图保留金本位制的优点,又想避免它的缺点。例如,在起始的时候,该组织曾经设想使汇率保持相对的稳定,用国际间的合作来代替过去的自行调节的机制。此外,也想使各国能避免导致严重失业的通货收缩的调节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希望减少控制进口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通常用自己的出口或长期借款来支付进口。假设某一国家,如英国,需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得到短期信用。该基金组织究竟如何使这种债务国得到美元呢?它通过给予“购买权”而做到这一点。它让英国用自己的货币购买该基金组织持有的一部分美元。当英国的国际收支改善以后,英国就应该用黄金、美元(或用我们将要看到的特别提款权,即:“纸面黄金”)买回它原来卖给该基金组织的英镑。

从 1945 年到布雷顿森林制度完全失效的 1971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抱有幻想,认为它可以在大部分时期中使汇率保持稳定。只有当一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地处于在本质上失掉平衡的极端压力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认为,该国应该使自己货币的汇率贬值。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越来越感觉到:在各地区的成本和需求作出不同变化和投机者能有把握地预计定价过高的货币终将变动汇率这一世界中,维持固定的汇率不可能获得成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主要成员国开展了一次勇敢而绝望的斗争,企图维持稳定的汇率。在六十年代,当作为新的布雷顿森林制度的支柱的美元越来越变为定价过高时,它们还保卫着不可能保卫的事物达数年之久。德国、日本以及其他货币定价过低的

国家长期出现国际收支的盈余,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出现长期和日益增长的国际收支赤字。按照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规定,出现盈余的国家只有两种选择的余地:它们可以使它们的货币升值,从而消除定价过低和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者,如果货币升值由于在繁荣的出口行业中减少就业和利润而在国内变为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事情,那末,德国和日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接受越来越大量的美元欠款——因此,助长它们国内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而,助长它们本国的难于忍受的国内通货膨胀率。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1971年以后,布雷顿森林会议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彻底崩溃了,而作为一种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所代替。

§. 欧洲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

前面几章分析了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消除贸易障碍的办法之一便是由几个国家建立一个关税同盟。在这种同盟之内,可以减少或取消关税和限额,但是,对盟外的贸易而言,它们仍然存在。历史上有过许多例子。美国的五十个州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庞大的关税同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许多独立的邦也建立了一个关税同盟。

712 在本世纪中,最令人兴奋的国际事件之一便是欧洲经济共同体(通常更普遍地被称为欧洲共同市场)的成立。1957年,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西德等六国签订条约,创立了欧洲共同市场。按计划,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到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每一国家将取消在该区域以内的对非农业产品施加的关税和限额;①对共同市场以外的国家的货物征收共同的关税;以及允许资

① 当法国于1975年为意大利的廉价的酒所冲击时,它的酿酒业的抗议使它勉强地对进口施加限制。

本和劳动的自由移动。由于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看来要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自由贸易区。^①

在共同市场带来的好处的诱惑下,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如奥地利、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组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该联盟很松散,其最终目标是实行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性是不能和欧洲共同市场相提并论的。

某些经济学者担心,某一集团之内的国家降低关税是否能真正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同各国独自征收的关税相比,集团之内的低于平均水平的关税是否会使‘正常的’贸易型式发生更大的变形?是否会加大集团内和集团外之间的差距,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变形?”

其他一些经济学者回答道:“两个错误并不造成一个正确。如果你无法普遍地取消贸易的障碍,那末,应该在你能办得到的地方去取消它。这样,几个巨大的关税同盟也许会最终合并成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区。”

具体的答案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大多数经济学者也许会大胆推测:在欧洲降低关税会对该地区的分工造成非常良好的影响,以致使该地区的国家受惠,最终也会使其他国家受惠。

§. 较为自由的多边贸易: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C. 赫尔的旨在减少美国和其他国家关税的互惠贸易方案已经存在了多于三分之一个世纪。与一般的想法相反,我们1930年的高额关税已经大为降低。(在某种事例中,在减少一半以后又减少一半,如前面的第35-1图所示。)结果,如果仔细衡量各国限制贸易的程度,那末,美国在七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居于“贸易相对自由的国家”之首。当然,我们应该(为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利益)继续

^①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采用欧洲货币。例如,在七十年代中期,它的成员国对所谓“地道中的蛇”表示同意。这意味着它们同意:它们各自的货币的相对波动幅度将缩小到史密森氏协议原来规定的百分之二又四分之一的一半。然而,在数月内,英国和意大利遭受国际收支的困难。当英国被迫而使英镑浮动时,上述计划便宣告破产。

进一步降低关税并且取消限额。我们承认,外国人捉摸不定,什么时候美国国会又要提高关税。虽然如此,那些谈论美国的限制贸易政策的人应该研究上一章末所指出的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实际具体数字。

713 如果富有成效的多边贸易得以恢复,那末,大家都会受惠。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成立是实现国际合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所谓“肯尼迪回合”是在总协定的主持下对关税的第六次互惠削减。较早的行动是在1947年以后采取的。在1973年的东京会议上,总协定的会员国同意在七十年代中期进一步削减关税。

B. 国际制度的崩溃和重建

上面我们概括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金融制度,现在我们来考察美国和世界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 从美元短缺到美元过剩

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方案对那些称不上最富裕的国家——日本、德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具有出奇的有利作用。这些国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出人预料地在五十年代获得了生产率的奇迹般的飞速发展。这一奇迹般的发展一直持续到现在。

外国经济的这种竞争能力的增长,加上美国的冷战措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的昂贵代价,加上我们的非军事的援外方案,加上美国公司由于国外的高额利润的机会而大量地直接向国外投资——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美元短缺的逐渐终止和外国货币的缺乏。

五十年代的“美元短缺”变成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的

“美元过剩”(即:美国黄金和储备货币的外流伴随着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美国的相对高的成本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元定价过高”。

最初,我们的黄金外流没有引起注意。然而在1958年以后,可以看出一个新的趋向正在形成。

第36-1(a)图说明:美国在六十年代如何在它的国际收支上变成一个具有赤字的国家。可以看到,到1971年,赤字急剧恶化,以致需要中断该图的轴标。如何弥补赤字?如第36-1(b)图所示,部分地系由输出黄金所弥补。到1970年,我们官方的黄金储备从它1949年最高的\$240亿下降到大约\$100亿——迄今仍然停留于这一数量。但是,国际收支赤字的更大的部分系由外国人接受我们的短期借据所弥补。第36-1(b)图说明,可以向我们随时索取的债款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黄金储备。所以无怪乎美元要在1971年贬值并且在贬值后听任它自由浮动。

§. 美国出现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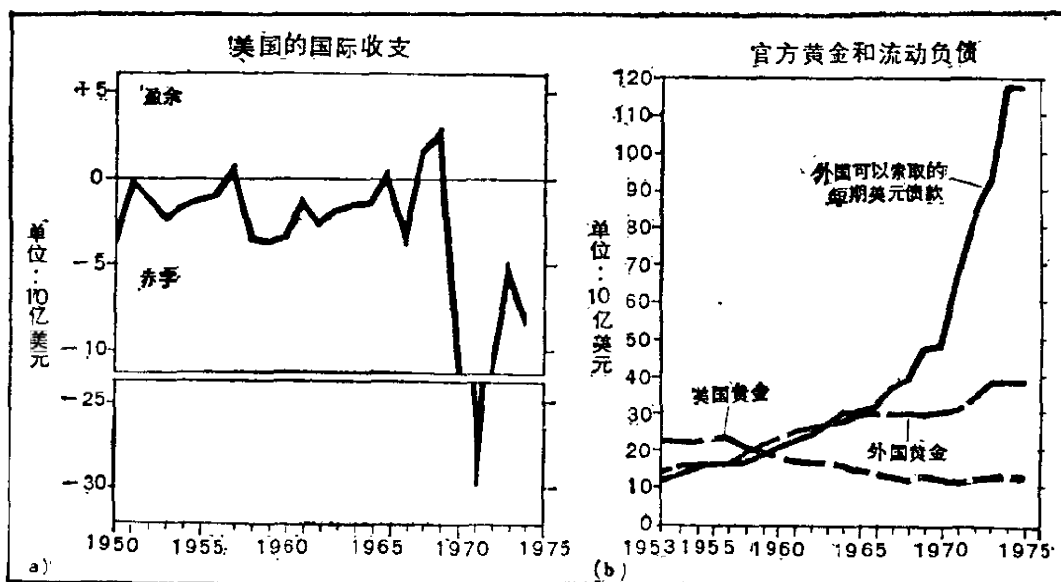
人们提出了许多原因来解释美国的长期国际收支赤字。其中大多数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将要看到,1955—1971年间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的最主要原因很可能在于:近年来外国的技术生产率提高很大,而我们的提高则较为有限。下面是人们经常提 714 到的造成长期国际收支赤字的一些原因:

1. 我们国内过分的通货膨胀。如果一国的工资增长大于其他国家,如果增长又不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补偿,那末,该国确实会具有长期的赤字。^①

1965年以后的越南战争升级,不幸地造成了价格水平的上

^① 关于进一步的分析,见第三十三章附录关于货币定价过高的论述。

升，使得我们当时私人贸易的出超额急剧下降。因此，1965 年以后，美国的基本赤字问题大为恶化。^①



第 36-1 图 美元长期定价过高造成黄金和储备货币的外流以及高额的国际收支赤字

到五十年代后期，“美元短缺”已经终止。美元从定价过低日益转变为定价过高，最终导致 1971 年以后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看到，我们在国外的美元负债的增长有助于增加世界非常需要的流通手段。（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美国官方清算额”。注意：黄金的总量系按照原有的“官方”黄金价格计算，而不是按照七十年代中期远远高于官方黄金价格的自由市场价格。）

2. 我们过于慷慨的军事援助计划。越南战争爆发后，我国政府的对外军事援助计划在相对的规模上有了很大的增长。远为更加重要的情况是：由于私人长期投资的增长，我们私人方面的经常帐目的盈余已经不再大到足以容许象我们过去那样慷慨的援外计

^① 如果读者画出图形，表明(a)我们在世界出口量中的比重的下降，(b)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和外国出口价格的比例的增长，那末，二者对照的结果确实有点象向右下方倾斜的 dd 曲线。我们的价格 (P) 的相对上升可以解释我们的数量 (Q) 的相对下降。

划。^①1965年以后，越南战争成为加大我们国际收支赤字的一个重要因素。

3. 缺乏对于美元的信心。从1933年到1955年，美元普遍地被认为是优于黄金的储备。它是唯一关键性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当各国人民和政府开始认为美国处于不平衡的国际收支状态时，其后果为何？当它们担心美元可能作出相对于马克、法郎或官方黄金的贬值时，后果为何？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政府和个人很自然地要减少手中的美元，储备较多的黄金或其他坚挺货币。这种所谓“国际流动性偏好的转移”有助于说明1955—1971年间我们长期的黄金外流。

4. 国外对美国货物的歧视。当外国缺乏美元的供给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歧视美国货物的措施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当美元地位不再坚强时，就应该取消或减少对美国货物的余留下的歧视。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

5. 国外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美国的国际收支地位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似乎是西欧和日本的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它们的生产技术总的说来仍然落后于我们，但其差距，特

^① 即使专家们往往也说不清：如果我们想在自由进行长期投资的情况下处于健全的均衡状态并且执行政府在海外的意图，那末，美国私人的经常帐目的盈余应该有多大。这样，收支均衡要求我们相对于进口而言，扩大我们物品和劳务的出口，以便造成足够大的也许为数十亿美元的私人经常帐目的盈余。认为具有如此之大的盈余会损害我们的贸易伙伴的想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收支的均衡和相对有利条件的均衡要求我们这样做。就我们因此而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物品与劳务来增加盈余而论，它们在真正的意义上并没有受到损害。不论数量为多大，私人方面的盈余应该大到足以取得全面的均衡。

别是在我们出口和专业化的传统物品上,却一直在缩小。

即使国外的实际工资比我们的实际工资增长得快,国外生产力的提高也使外国人为自己生产的物品比我们为他们生产的物品便宜。因此,在第三国的市场上,他们的销售量日益为甚地超过我们,甚至在我国的国内市场上,他们的销售量也开始超过我们。汽车、钢铁和电视机的进口典型地表明了相对有利条件型式的改变。我们主要在农产品和技术性最高的产品——飞机、电子计算机、自动机床——上,维持我们出口的分额。^①

716 6. 美国厂商在国外的高额投资。国外奇迹般的生产率的飞跃发展为美国公司创造了巨大的谋利机会。最近几十年来,它们不愿意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以很快的速度在欧洲(以及可能的话在日本)建立分厂,因为那里的迅速发展似乎是肯定无疑的。

为了减少这种私人资本的投资向外流动,美国政府在整個六十年代后期实施了对国外投资的直接控制——限额、惩罚性的赋税等等。只有在七十年代听任美元自由浮动并且找到自己的均衡水平时,这些阻挠效率的限制才停止使用。

7.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价格四倍于往昔。1973年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工业国,受到了能源价格急剧上升的猛烈冲击。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也出现了赤字,因为它们现在要为必要的石油进口,要为其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价格的化肥和其他物品的进口,支付远比以前为多的款项。波斯湾国

① 国外生产率的提高往往降低我们进口货的价格,从而增加我们的实际工资。但是,(a)如果外国提高的是我们一向以专业化方式生产的那些物品的生产率,(b)如果国外生产力的提高使美国公司发现:它们的技术知识可以被外国劳动者所利用,那末,到头来会降低我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并且减少美国得自贸易的消费者剩余。参照第三十三章附录。

家每年得到的数百亿美元的“再循环”问题，对世界繁荣以及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的均衡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某些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很快地把它们的新收入用于加速国内发展的进口。（伊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其他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现在得到远大于它们在短期内所能明智地花掉的款项。唯一合理的可供选择的途径便是购买发达国家的有利可图的资产；这样，当增加国内发展和消费的用途变为有可能实现时，购买的资产的利息和股息以及资产价值本身可以逐渐被消耗掉。结果，如果该过程的执行系按照妥善安排的计划，那末，从这些地区所取走的石油会换来工厂、道路和资本结构的改善，从而不断提高那里的生活水平。

在七十年代末期，需要再循环的数以十亿计的石油收入并不象事先所惧怕的那样庞大。然而，却仍然存在着多边平衡的问题。假设石油输出国企图把它们向，譬如说印度或比利时，出售石油的高额收入以美国或英国的债券和股票的形式保存起来，而不购买印度或比利时的资产，美国是否愿意借款给印度和比利时，以便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或者，比利时和印度是否能够在同美国的贸易上取得顺差，从而使整个三角贸易的过程处于平衡状态？很显然，在这里，国际之间的合作是重要的。

§. 长期赤字和货币贬值的治疗方法

经济学者们知道：为了扭转长期的贸易赤字，一般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这些方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

1. 可以促使美国的劳动者和企业提高国内的技术生产率。资助科学研究和投资有助于此。
2. 可以促使美国出口商改善在国外的推销方法。由于外国的推销员也同样受到压力，一般的号召没有多大用处。
3. 对于遗留下来的对美元的歧视，我们可以进一步寻求消除。
4. 我们可以要求自由世界的富裕国家来担负防卫和外援费用的较大份额。

5. 我们可以使我们国内经济处于萧条状态,避免扩展和成长所需要的低利息率,减少对进口的需求并且对出口行业的利润施加压力,以便使它们急于扩充它们的出口量。^①然而,没有一个混合经济制度能人为地造成萧条而又能得到选民的拥护。

6. 可以使美元进一步贬值或其他货币升值。美元可以向下浮动到新的均衡水平。

次优方法。上述所有或任何一种方法的目的在于解决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定价过高的问题。但是,假设美国人非常愚蠢,拒绝使美元贬值,认为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可以维持定价过高的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其他一些令人厌恶的方法来对付货币定价过高。

7. 我们可以进一步“限制”援外赠款和放款的使用范围,要求它们必须直接在美国使用;即使我们的产品价格较高,也应如此。(例如,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军事方面的款项施加如下意义的限制:即使某一物品在美国国内的价格比外国高百分之五十,该物品也必须在美国国内购买。)当美元不可能全面贬值时,这不过是美元零星贬值的表现。

8. 我们可以限制旅游并且减少旅行者可以免纳关税而带进国内的物品数量。

9. 对于向国外的投资,施加限制或征收惩罚性的赋税。规定公司和银行对外投资的限额,或对外流资本征税。

10. 我们可以一般地恢复保护主义。由于在上面几章所看到的原因,关税和限额不会提高实际工资,但是,它们可以对粘着不变的货币工资和定价过高的货币起一点补偿作用。这种解决办法

^① 因为国内就业不足意味着低利润的投资机会,所以就业不足会导致更多的向国外的投资(即:更多的借方数字),从而使我国短期国际收支的平衡恶化。

会为一切重视相对有利条件的专业化所带来的利益的人们所痛惜，也会为一切认为美国的政治利益在于它是否能消除它坏邻居的声誉的人们所痛惜。

11. 当 1971 年 12 月在史密森氏学会所同意的药物——即：相对于日元、马克和其他货币，美元贬值——似乎顶多不过缓慢地发生作用时，许多国家仿效了法国的做法。瑞士、比利时和其他国家开始采用一种分裂的汇率：对于经常的交易，采用平价汇率，但对资本流动，允许汇率浮动。

12. 最后，我们可以盼望：欧洲和日本那些具有盈余的国家将在它们的成本和价格上再度经历一次加速的通货膨胀。

§. 新的受到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些国家试图恢复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度，但这一制度终于在 1941 年彻底灭亡了。布雷顿森林制度力图稳定汇率，这一勇敢的尝试延续了二十五年并且对世界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成本和需求越来越不协调的世界上，在混合经济制度的选民们不愿意为了医治在固定汇率下的国际收支赤字而采用经济收缩或人造萧条的代价昂贵的必要方案的世界上，布雷顿森林制度最终也由于不可能维持固定汇率而覆灭了。同时，现代国家不会由于维持固定汇率的需要而听任通货膨胀存在。 718

当原有的制度运转不灵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手中有一个可以立即采用的完善的新制度。在七十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成员国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企图商定一个新的制度来取代布雷顿森林制度。总的说来，特别是在戴高乐将军去世以前，法国人坚持恢复稳定的汇率——也许在重建的制度中，官方黄金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论，美国在其他几个大国的同意下则反对回到维持固定汇率的体制。

受到管理的浮动。在这种情况下,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因此,虽然没有通过人为的准确计划,但整个世界实际上已经转移到某种程度上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该制度的作用并不太坏。国际贸易额在七十年代不断增长,很象处于布雷顿森林制度之下那样。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大小企业都发现,即使在汇率月月波动的体制下,它们也可以从银行或投机者那里买到“补偿风险的手段”,使得它们能在事前很久的时候制定交货和定货的计划而又能收回成本并且获得利润。对于所有这一切,肯定要付出代价,但事实证明:它们并不是高到使贸易无法进行的代价,对富有成效的国际分工也并不构成严重的无谓损失^①。

人们担心出现混乱,担心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开展以邻为壑的贸易战,但是,它们并未出现,虽然国际贸易制度在七十年代中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专家们心里明白,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

① 为了能保证避免在目前和我进口的德国染料运到时之间马克汇率上升百分之十的风险,我在今天到期货市场去购买九十天以后的马克期货。谁卖给我呢?很可能是一位美国出口商。他想稳妥从事,想知道他今天启运到德国的并且在九十天以后以马克偿付的计算机到底能换取多少美元。然而,即使出口与进口两个方向的交易量并不相等,某些嗜赌的投机者也会出售马克期货,希望届时能以较便宜的价格买进。如果投机者过分乐观,即使他受到亏损,他也会向我提供上述避免风险的劳务。如果承担风险如此地令人厌恶,以致必须为避免风险偿付数值为正号的代价,那末,这笔代价应该加在国际贸易物品的价格之上,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贸易额及其所带来的益处。(第二十一章附录所论述的玉米市场的风险的避免和投机并不完全适用于外汇市场。外汇市场上的投机具有较大的破坏稳定的危险,因为在外汇市场上没有作物生长情况和人们对小麦的基本需要给供给和需求规定的那种自然限度。在外汇市场上,当美元疲软时,所有的投机者都会打击它,从而使它更加疲软。他们会迫使美元贬值并且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因此,美元应有的新水平会永久性地低于过去,使得期望美元降值的投机者的掠夺行动获利。如果行政当局通过严格控制国内货币供给量、价格水平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办法来反对这种掠夺行动,那末,行政当局就会象在稳定汇率体制下那样,受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牵制。因此,批评浮动汇率的人问道:如果你同样要蒙受稳定汇率的不利之处,那末,为什么放弃稳定汇率的有利之处呢?)

织把石油价格提高三倍的前后，要想找到适用于变化前后的稳定汇率是非常困难的，因而他们对有伸缩性的汇率使得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能对这种意外事件作出应有的调整感到满意。

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列举如下：

在国际货币制度中，如果黄金应该具有作用，那末，其作用为何？

汇率的伸缩性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进行不受限制的完全自由的或“干净的”浮动呢，还是应该受到政府的某种干预（即进行所谓“肮脏的”浮动）？

§. 黄金的作用为何？

1971 年以后，各国甚至宣布停止纸币对黄金的表面上自由的兑换。自那时直到现在，实行的是混乱的黄金双层制度。

自由层。在非官方的这一层，黄金天天被拍卖着。南非和俄国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加拿大和美国的金矿源源不断地向该市场提供黄金。谁买黄金？谁持有现有的自由市场黄金？

需求的一部分，很可能是一小部分，来自需要保持金属光泽的珠宝商、牙医以及工程用途。然而，对黄金的最大的需求很可能来自（a）印度人、阿拉伯酋长国、法国农民和那些总是把黄金当作一种财富形式的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们——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纸币和政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上报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的交易；（b）到处流浪的难民、黑社会、逃税者、逃避外汇管制的人以及反对现代福利国家、企图从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人；（c）诚实的公民；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在到来，因而黄金比其他投资——普通股票、债券、储蓄存款、不动产、钻石、名画、古董和囤积商品——要更易于保持其真正的价值；（d）精明和不精明的投机者；

他们自己不一定相信这一切,但却认为:只要有足够的人相信这一切,就值得(如果需要承担风险的话)用一部分资金做黄金投机生意。可以被归入上述任何一类人中的是:(c)那些确信黄金最终会恢复它在官方的世界货币制度中的核心地位的人们;他们确信:当这一事件发生时,黄金官价的大幅度增长会提高自由市场的价格,从而使黄金成为很有价值的投机物品。

官方黄金。在这一层中,各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仍然持有黄金,作为它们的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国际储备还包括它们掌握的特别提款权和它们所持有的能在外汇市场买卖的外国和本国的货币。

720 官方黄金已经不再能和自由市场黄金截然分离开来。一些国家已经多次在自由市场上出售黄金(如美国政府在1975年就出售过两次)。1975年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公开放弃了每盎司黄金42.22美元这一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官方价格。这一名义上的价格和每盎司黄金130到200美元的自由市场价格相差得太远了。各国之间的交易,没有一次是按照如此没有现实意义的价格进行的。实际上,用来担保国家之间各种借贷的黄金,均按接近于现行的市场价格估价。

1975年秋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的会议同意:把成员国交付给基金组织的一部分黄金归还给它们。另一部分则由基金组织用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留待以后解决的问题是:在将来的某一日期以后,是否允许各成员国政府在自由黄金市场上从私人手中自由购买黄金。

那些把黄金看作是人类野蛮时期的残余的人们,尚未实现他们消除掉黄金在国际货币机制中的全部作用的欲望。那些渴望用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来代替政府独断专行的干预的人们,也怀着不愉快的焦急心情看到事态朝着违反他们意愿的方向发展。只有将来的事实才能告诉我们:目前的折衷制度会延续多久。在这一

折衷制度中,黄金仍然是许多国家的重要的官方储备,但它在决定国内货币供给量和价格水平方面,已不再发挥关键性作用。

“纸面黄金”。国家之间的帐目仍然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单位。这种记帐单位不带有“\$”或“£”符号,也不用绿色的和印制精美的票据来表示其面值。那末,它究竟是什么呢?

特别提款权是政府之间、中央银行之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官方记帐单位。^①其价值用世界上十六种主要货币来规定;其中每一种货币的比重取决于它的重要性:美元、马克、英镑、日元、法郎、里拉……等等。十六种货币比任何一种货币,譬如说,美元或马克,具有较大的多样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私人交易也开始用特别提款权作为单位;也就是为什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开始用特别提款权,而不是用美元来规定它们1974年以后的石油价格。

是否长期缺乏国际流通手段?十年以前,专家们常常担心国际贸易额每年将仅仅在名义上增加百分之十左右(百分之六的实际增长和百分之四的通货膨胀)。他们知道,世界黄金的产量仅能维持世界黄金储量按百分之二的比例增长,而其中的很大部分将落入私人储藏者的手中。他们因此而忧愁地问道:“从长期来看,

① 特别提款权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投票而建立,可以为百分之十五的法定选票所否决。每年新创设的数量取决于该基金组织的董事长与有选举权的成员国协商的结果。但是,新的特别提款权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则与成员国在基金组织中摊付的基金份额成比例。例如,截至1976年初,新创设的特别提款权的数量为\$77亿,其中美国得到\$28亿,加拿大\$4.47亿,英国\$13亿,西德\$6.75亿,法国\$6.04亿,印度\$4.06亿,日本\$4.69亿,等等。不发达世界希望能建立一种“环节”,使得较贫穷的国家得到较多的特别提款权,以它们的需要为基础,而不是以它们现在的重要性为标准。上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自由市场出售它所持有的六分之一的黄金以便支援不发达国家的意图,就是为了部分地满足建立“环节”的愿望。

721 我们将从哪里弄到更多的国际流通手段来维持国际贸易体系的健康成长呢？我们不会象 1929 年所面临的危险那样，由于国际流通手段太少而导致世界范围的萧条吗？”

由于世界在七十年代处于有伸缩性的汇率之下，因而人们担心缺乏国际储备的心情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消失。国际收支的差异现在可以通过汇率的调整而得以解决，不需要支出大量的储备来使汇率固定在某一过去的平价上。许多专家确实担心，一些国家滥发纸币，是否会在七十年代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

允许汇率浮动，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个尚待解决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允许汇率浮动到什么样的程度。

§. 有伸缩性的汇率

取代布雷顿森林制度的史密森氏协议制度，继续使用有伸缩性的汇率和某种程度的“肮脏的”浮动汇率。肮脏浮动的意义是：政府偶然进行干预来支持或压低它的货币比价，不允许供给和需求的自由力量使汇率无限制地上下浮动。如果政府的干预是如此的全面，以致把它的货币与黄金或其他货币（如美元）的比价固定下来，那末，我们会在实际上回到稳定的汇率和金本位制。另一方面，没有任何政府的稳定作用和干预的完全“干净的”浮动可能造成汇率的投机性的上升或下降，这种浮动并不具有明显的好处，反而使出口和进口成为不稳定的和无效率的行业。^①

722 地区集团。某些国家需要在它们之间具有稳定的固定汇率，

① 在有关稳定汇率和伸缩汇率的争议取得赞成浮动汇率的结论以前，某些经济学者建议使用下列的“滑动”（或“爬行”）带的制度，作为一种巧妙的折衷办法。在任何一年中，允许汇率作出少量的调整，但不得超过某一事先规定的比例——譬如说，百分之一或二。这样，在十年中就可以作出相当大的调整；他们继续论证说：因此，只要对短期的调整加以如此限制，投机者便不会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附上的第 36—2 图及

与此同时,却对世界其他地区保持有伸缩性的外汇比价。例如,西欧共同市场国家共同使用同一个劳动市场并且具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因此,它们每隔一段时间便达成协议来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以便使它们的各种汇率——里拉对盾、马克对法郎等等——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波动。

这种方法有时被称为“蛇形浮动”。共同体各成员国的货币对于美元、日元、特别提款权以及逐日变动的自由市场黄金价格可以自由浮动。但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的汇率只能在蛇身大小的有限范围内浮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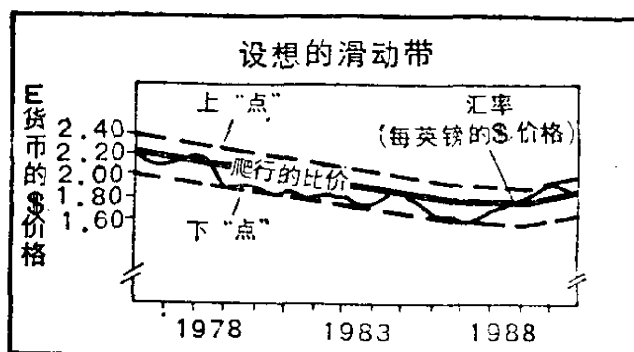
这具有熊掌与鱼二者得兼的好处:法国人和德国人可以很方便地按照变动不大的货币比价来进行交易;与此同时,对于世界事务的任何根本性的变动,如欧洲必须进口的石油价格的巨大增长,共同市场各国可以通过它们的汇率有伸缩地上升或下降而加以调整。

地区性的稳定汇率也具有原有的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不利之处。例如,假设意大利的通货膨胀比德国严重。里拉的汇率会因此而贴到蛇的肚皮上。集团中的其他国家会通过购买里拉而予以支持。它们购买很多里拉以后,会开始怀疑,意大利银行的印刷机

其说明可以自行解释这一办法的道理。

第 36-2 图

在这种办法之下,每 1 £ 并不固定于 \$ 2.00, 而是比价每年可以滑动百分之一或二, 从而, 在十年的时间中, 可以作出由于成本水平的变动而需要进行的百分之十一或二十二调整。此外, 在任何时候, 上“点”和下“点”之间的滑动带都可以稍微再加宽一些, 供给和需求在滑动带内可自由发挥作用。



印制的钞票是不是太多了;最后,它们会拒绝给予支持——这时,蛇形浮动制度便将垮台。当类似的事件每隔几年出现一次时,成员国便感到,公开宣布的稳定办法仅仅存在于纸面,其成功是不能加以信赖的。

§. 处于民族主义世界中的金融

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世界上,我们感到惊奇的是:美国的五十个州能保持一种货币而且不容许各州之间的汇率有所变动。给商业带来的方便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即使阿拉斯加州或西弗吉尼亚州的经济情况相对于其他各州而言有所恶化,它们也不能使其货币贬值,减少它们的货物的成本,从而在损害其他各州利益的条件·下增加一些就业量。使得这一制度正常运行的是:美国劳动者可以在国内自由移居到能提供最好的就业机会和工资的任何地区这一事实,也是我们只具有一个财政部、一个中央银行、一个联邦储备系统(该系统的管理机构设在华盛顿)以及该系统对整个国家的货币供给量统一管理这一事实。

如果有朝一日出现一个世界政府、一个世界中央银行、一个世界劳动市场,那末,过去的金本位制以及它的稳定汇率所固有的优点可能具有某些再度实现的机会。这种乌托邦似乎仍然是遥远的事情。真正的奇迹是:从现实中演化出来的国际金融制度看来确·实在发生应有的作用——使富有成效的贸易并且使投资能穿越国家的疆界。

总结和复习

A. 目前的趋向和国际金融制度

1. 出口的增加——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

——会产生乘数作用，使一国的经济扩张。如果该国过去具有失业和多余生产能力，那末，结果会是增加的就业量和产量。如果它过去具有通货膨胀的压力，那末，结果会是通货膨胀的加剧。在萧条的三十年代，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徒劳地企图向外输出失业，这注定是要失败的。

2.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马歇尔计划和军事援助计划、第四点计划、互惠贸易的削减关税方案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欧洲共同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合理化。

3.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后果是：美元定价过低，因为其他国家迫切需要我们较为便宜的货物。由于马歇尔计划、我们的援助和军事方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努力——以及更重要的国外奇迹般的生产率增长——最初的美元的定价过低逐渐转变为按照布雷顿森林会议所规定维持的汇率比价来衡量的美元的长期定价过高。在多年的黄金外流和大量的国际收支赤字之后，美国 and 整个世界最后在 1971 年不得不放弃布雷顿森林会议要求各国维持固定汇率的临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汇率仅仅在严重的紧急时期才能有所升降。

B. 国际制度的崩溃与重建

4. 七十年代，世界采用的是某种程度上的管理浮动汇率。汇率自由地或“干净地”浮动到什么程度，“肮脏”或政府限制到什么程度，仍然是有待于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尚待解决的问题还有：类似共同市场那样的地区集团在集团内部稳定汇率是否可能。

5. 黄金不再具有它在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时期的那种关键性的官方作用。私人和私有企业现在使用双层制度中的自由层。但是，在政府的官方层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黄金仍然是重要的

国际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即“纸面黄金”)正逐渐地在货币制度中发生重大的作用。特别提款权是一种记帐单位,其价值相当于十六种主要货币的加权平均数,仅在正式的协议和交易中加以使用。虽然在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年代和实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国际流通手段的缺乏看来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但只要将来一旦缺乏国际流通手段,就可以通过创造更多的特别提款权来弥补。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可以部分地来自分配给它们大量的新的特别提款权,部分地来自为它们而出售某些官方的黄金。

第六编 当前经济问题

725

第三十七章 经济成长论

……当你能衡量你所谈论的事并且能用数字把它表示出来时，可以说你对它有一些了解；当你不能衡量它并且不能用数字表示出来时，你对它的了解便是肤浅而不能令人满意的；你的了解可能是知识的开端，但很难说你已经完全进入了科学的阶段。……

卡尔文勋爵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可以动员经济分析的工具来说明它们对我们时代的热烈争论的问题的有用性质。对经济成长论（第三十七章），对不发达国家能够用以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方法（第三十八章），对发达国家中的爬行的通货膨胀问题及其与失业量之间的互换（第四十一章）均系如此。

随着老问题部分地得以解决，新问题便被迫而进入社会的议事日程。第三十九章将大胆地讨论自古以来的歧视的恶习：种族、人种和性别的歧视。第四十章分析经济生活的质量问题：不平等与贫穷、城市中的贫民窟、生态的毁坏以及由于能源缺乏和自然资源枯竭而可能导致的对将来发展的限制。第四十二章论述经济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新动向：老的和新的左派、自由放任或新自由主义、主流派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以及年轻时和成熟时的卡尔·马克思。最后，第四十三章对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加以经济分析：纯粹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

对于这些困难而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使用本书提供的全部经济分析工具。本章将把经济理论的原理应用于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以便为下几章作准备工作。^①

§. 历史的阶段

拿破仑同意伏尔泰的意见：历史不过是“大家同意的寓言故事”。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把经济发展看作是按照时间表进行的过程。医生能够猜测婴儿在若干星期以后可以看到东西，也能对婴儿开始走路和说话的时间加以预测。他往往猜错，但是，值得惊奇的是：生物成长的阶段被证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学者们在过去认为，经济史也是如此。

在他的 1841 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F. 李斯特是最早把经济史划分为阶段的人物之一。特别在德国，这在一世纪以前很为流行。被称为历史学派的一批学者甚至说：“掷掉你那奇妙的理论。发掘事实资料。收集事实资料。把它们加以分类和去芜存菁。让事实来说话。”

对于任何科学家，第一个步骤确实是要尊重事实。然而，它却不是最后的步骤。事实永远不会说话。真理，象美那样，往往随着不同观察者的眼光而存在着差异。同样的积累着史实的文献似乎从来没有向两个著作家说出相同的经济发展情况。在包括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年)在内的某些人看来，历史是单方向行进的演化过程：

原始文化。最初，存在着掠夺成性的猎人和种植谷物的自给自足的部落家庭。(据认为，他们仍然存在于某些孤立的原始森林之中。)

^① 在简短的课程中，可以略去本章，特别是本书第 125—139 页的理论部分。

封建主义。当空旷的地方越来越少时，原始的经济逐渐被典型的专制所代替，后者又演化成为封建主义。在中世纪，主要根据土地关系，固定程式的上下级和剥削体制统治着从贵族到农奴的全部经济和社会生活。

资本主义。不论我们是否认为中世纪具有田园诗意，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来商业和工业革命时，封建主义最终也灭亡了。农民被迫和土地分离并且作为无产者进入城市。堤坝被修建起来，以便控制水的流向，而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木头与煤炭的能量能代替兽力和人力。加尔文教派的伦理观帮助造就了具有经营思想的企业家。

好象是在演戏，帷幕的下落使封建主义告终，人类被认为应该进入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舞台。（当然，象俄国和日本那样孤立的国家并不被认为能在完全相同的时期从封建主义移动到资本主义；但是，当它们的时机到来时，即使时期较为短促，其移动的过程在质的方面也被认为是相似的。）

象麦考利和H. 斯潘塞那样的自我陶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者，把社会的演变看作是人类不断向较高形式的上升。但是，他们认为，由于当时已经达到大致完善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资本主义状态，因而演化已经终结。有待于推进的是进一步削减关税以及消除仍然干预自由市场的少数几个政府法令。斯潘塞以极其肯定的口吻预言：国家必将消亡，自由市场将占绝对优势。他认为，科学发明、群众的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个人的积极性，将在这个无与伦比的最美好的世界中持续提高生活水平。（在我们的时代，奥地利的 F. 海克和芝加哥的 M. 弗里德曼把维多利亚时期辉格党的社会看作是黄金时代，认为应该通过民主手段来使福利国家解体，

从而重新恢复这一时代。)

727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吃了演化之树的果实，为什么人们认为历史的戏剧仅仅具有三幕呢？在一个象德国那样的还没有沾染上个人和企业自由的传统的国家里，哲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也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最终将被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代替，正如资本主义代替垂死的封建制度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的工人……变成赤贫者……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事实与虚构

事实很少符合于寓言故事。^①例如，F. 恩格斯与 K. 马克思在他们相互之间的书信中所预测的法国和德国的革命，并没有象他们确信的那样在数星期、数月和数年之中成为事实；而自从马克思的《资本论》^②于 1867 年出版以后的数十年中，根据统计数字，实际工资不但没有下降或者保持不变，反而在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明显上升。即使利润率也固执地拒绝服从它被预测为下降的规律，而是上下波动和徘徊，没有任何明显的长期趋向。

可以正确地说：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垄断在先进的国家中开始滋长。但是，事实证明，即使是资本主义特征最明显的民

① M. I. 鲁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的社会和经济史》（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26 年）。该书告诉我们：远在中世纪很久以前，就存在着复杂的非奢侈品的国际市场和贸易制度。复利出现于巴比伦楔形文字的文物上，而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某些国家却重复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的最坏的错误。进步和无休止的循环往复都不能正确地解释丰富的经济史的史实。

② 英文名被翻译成为《Capital》，最后包括他去世后出版的第 II 卷（1885 年）和第 III 卷（1894 年）。

主国家美国，也能够并且确实制订了反托拉斯的法律来限制垄断集团的发展；而对几个大垄断寡头瓜分市场的统计数字的研究表明：本世纪七十年代的垄断集中程度低于1900年或1929年的垄断集中程度。（不过，1976年的集中程度超过1950年这一事实提醒我们：经济史并不是一种单方向的运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确实是资本主义制度最严重的危机。但是，同样确实的事实是：在此之后，混合经济制度代替了粗犷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混合经济引入了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缓和经济周期和对付长期萧条。在凯恩斯后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观察者相信：一场萧条可以毁灭资本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先知预言过的世界上！

本世纪中叶的奇迹？在二十世纪中叶，最使人惊奇的经济事件是什么？

共产主义制度下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是。1950年，几乎没有专家认为苏联、中国和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会取得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或发生大倒退。

仁爱的自由放任和自由企业的恢复？肯定不是，因为除了政治竞选的起落以外，并不存在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趋向。当英国、挪威或澳大利亚的保守党把所谓“社会主义”政府赶下台时，混合经济的大部分机构被保留了下来。当肯尼迪时代让位给福特时代时，美国的时代精神只发生了微不足道的变化。^① 728

在我们的时代，最使人惊奇的经济事件是现代混合经济的没有被预见到的充沛的活力。在第二流国家——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整个西欧——生产和生活水平奇迹般地持续上升，但这一奇迹并没有出现在最发达

① 最先实行物价工资管制和造成1972年巨大赤字的是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

的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或亚非拉的不发达的国家。这些不发达国家的较缓慢的增长率正在使相对的差距越来越大。

姑且不论多年以前的凡勃伦或斯彭格勒,即使是我们时代的社会先知,如熊彼特和托因比,也认为混合经济是“氧气袋中的资本主义”。然而,二十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的成长经验告诉我们:为政府计划和宏观经济控制所丰富了市场经济可以比过去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得更好。

我们因之而受到教训,不要过分相信那条据说被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即:历史的一个阶段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特定的下一阶段所代替。当 N·赫鲁晓夫向美国的听众说:“我们要埋葬你们……你们的孙子辈将是共产主义者”时,他不过在重复苏联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内容。

注意:批评苏联的人也要避免犯类似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某些经济学者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争辩时说:“目前苏联的增长率确实比美国快。然而,等到它的经济成熟到我们的程度的时候,它的发展速度必然下降”,这种说法也包含着主观愿望的成分。右翼的宿命论和左翼的宿命论同样是靠不住的。

上面对于混合经济的描述当然是过于简单了,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去所谓“铁幕”这边的历史学者的观点。由于上面对于混合经济的看法完全被共产主义学者所反对,所以伏尔泰和拿破仑都错了,因为很显然,“历史是大家未同意的寓言故事”。

现在,我们来看能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各种经济模型,而不是把历史压缩成为自称能有把握地预测未来的美妙的解释。我们的任务是理解工资与利润、劳动与资本以及国民产值的实际状况。

§. 斯密和马尔萨斯的“宏大的动态学”

在《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简要叙述了经济的发展过程。斯密从实效出发,阐述了专业化、分工和交换带来的巨大效率。他强调指出,必须搬走重商主义政府的瞎指挥的手;培养诚实、热忱和节俭的态度; 解放出竞争的利润动机,而这种动机会 729
——好象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那样——使一切人得到最大的福利。

处于黄金时代的劳动价值论。斯密也具有一个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他和马尔萨斯都从设想的黄金时代——“那个在土地私有权和资本积累尚未发生以前的原始状态”——开始。在那个时候,劳动是考虑的唯一因素,土地可以为一切人所自由使用,而资本的使用尚未开始。在这个简单而漫长的黎明时期,决定价格和分配的是什么? 答案:不折不扣的劳动价值论。

为了理解这一点,再次思考斯密的著名的鹿和海狸的事例。假设两小时的打猎时间可以获得一只鹿,四小时获得一只海狸。那末,鹿和海狸的竞争价格比例单纯取决于相对的劳动时间:一只海狸的价格等于两只鹿。为什么每一只海狸换两只鹿呢? 因为可以根据必要的劳动时间如4小时(体力劳动)和2小时(体力劳动)来计算价格比例。

不论存在的物品种类为多少,劳动成本单独决定价格总是适用的;如果一种物品的价格出现反常的比例并且带来利润,则可以通过从一种物品转移到另一种物品的狩猎,使任何原始市场上的价格得到保证。在这个黄金时代,供给和需求确实在发生作用,然而,情况是如此简单,以致我们并不需要复杂的 dd 和 ss 曲线。各种物品的长期供给(ss)曲线是简单的水平线,其高度为所应有的劳动成本。只要有足够的需求使得物品被生产出来,劳动成本就决定物品的价格。

注意：需求仍然在幕后发挥作用。例如，如果需要 10 小时劳动来猎取一只臭鼬，而又无人从臭鼬中得到效用，那末，没有人会去猎取臭鼬，它也不会按照 10 小时或 5 只鹿的价格买卖。

人口增长。现在考察斯密-马尔萨斯的动态理论。在黄金时代，生活是舒适的。孩子被生育出来，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由于土地充足，人口向西迁移并且散居在较大的土地面积之上。国民产品随着人口的加倍而加倍。鹿和海狸的价格比例和以前仍然完全一样。实际工资怎么样？实际工资仍然占有全部国民收入；到目前为止，并不需要从其中扣除地租和资本的利息。每小时的实际工资为多少？只要土地能和劳动成比例地扩大，收益递减规律就不能发生作用。每小时工资率仍然为半只鹿或四分之一只海狸，如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那样。

全部事情终止于此，一直到某个聪明的发明者找到一个小时的劳动能代替过去两个小时的新方法。新方法会提高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品。这种平衡的改善使海狸与鹿之间的价格比例保持不变，然而，却会使实际工资率加倍。在不折不扣的劳动价值论的粗犷的原始时期，新发明只能提高工资和平衡扩展的速度。^①

① 第二章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图形可以说明所有这一切。对于具有 100 个劳动小时的国家， $p-p$ 生产可能性边缘现在必须被画成一条直线，从纵轴的 50 只鹿的截距到横轴的 25 只海狸的截距。 $p-p$ 边缘的斜率在线上的任何点的绝对数值为 2/1；线上的任何点表示两种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数量。（仍然需要第二十二章的边际效用和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来决定社会最终处于 $p-p$ 边缘上的哪一点。）现在，一切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再一次加倍会把 $p-p$ 边缘向外移动到平行的位置，以表示国民产品的加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表明新发明使猎取海狸的生产率增加两倍，而仅使猎取鹿的生产率增加一倍的情况。这会使向外移动的曲线较为平坦，把价格比例从 2/1（等于每只海狸的 4 小时 ÷ 每只鹿的 2 小时）改变到 4/3（等于每只海狸的 4/3 小时 ÷ 每只鹿的 1 小时）。现在，实际工资率已经提高；但是，如果用不同的物品衡量，会得到不同的数值：用海狸衡量，实际工资增加 2 倍；用鹿衡量，仅为 1 倍。爱好皮大衣的人比爱吃鹿肉的人受惠较大。（注意：假设劳动者并不是同质的。如果

土地稀缺和收益递减。即使黄金时代曾经存在过，一旦所有的土地全都被占用，它也不会延续下去。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马尔萨斯指出那个快乐地不断扩大的经济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一旦处女地已被开垦净尽，新增加的劳动者便开始涌入现有的已开垦的土地。私有土地第一次出现。现在，土地是稀缺的，并且用收取地租的办法加以分配。 730

在黄金时代以后，这个新的斯密-马尔萨斯的古典世界仍然会发展。人口仍然增加，国民产品也是如此。但是，产品不能和劳动按相同比例增长。为什么？因为当新的劳动者加在固定数量的土地之上时，每一个劳动者便具有较少的土地与之发生作用。因此，收益递减规律（第二和第二十七章）自然要发生作用。劳动—土地比例的递增和产量—土地比例的递减意味着每一最后的（或边际的）劳动者对产品的贡献持续降低，从而实际工资率持续降低。

正如李嘉图从本质上所指出的那样：

于是出现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多的孩子意味着较低的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和工资率；较低的工资率意味着较高的每英亩土地的地租。地主随着劳动者蒙受损失而得到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卡莱尔把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

为了理解经济上的不平等的严酷的事实，我们必须放弃简单的劳动价值论并且研究劳动需要与之发生作用的生产要素的稀缺的影响。

妇女的生产率在任何地方均为男人的两倍，那末，马克思和李嘉图会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单位重新下一定义，把1个妇女当作2个基本劳动单位，等等。但是，如果妇女优于男人的程度在不同的工作中有所不同——在海狸上，为1倍；在鹿上为2倍；在马铃薯上，和男人相等——那末，粗略的劳动价值论便要失败。现在，我们必须知道，均衡价格是由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需求条件决定的。）参照第四十二章对马克思的较多的论述。

乐园的失而复得。事情会糟到什么程度？悲观的马尔萨斯至少在他著作的第一版中认为，经济发展的终点可能仅仅是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均衡。在这个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以上，人口会继续增长；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下降。只有处于这一点，持久的均衡才可能存在。（回想第二章关于马尔萨斯的论述。）

生物的繁殖力是自然现象；收益递减也是自然现象。一旦人类离开无比幸福的伊甸乐园，只有感情用事的人才会拒绝正视现实生活中的悲惨事实。恰恰是由于这些原因，亚当·斯密在早些时候曾经说过：迅速增长中的国家是幸运的，因为它还没有到达注定要到达的最低限度生活的均衡点。已经到达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均衡点的国家是不幸的，因为在那个静止均衡状态，人口的死亡等于出生。

731 马尔萨斯（以及斯密）忘掉了，或者至少过低估计了什么呢？马尔萨斯没有看到：技术改革的作用如何会介入其间——并不去否定收益递减规律，而是抵消它的影响还有余。他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入口处，没有预见到随后的两个世纪会取得历史上最巨大的科学成果——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实，我们应该牢记不忘，特别是当我们听到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也唱着马尔萨斯式的挽歌之时。

§. 对斯密和马尔萨斯的详细的经济分析

为了理解下几个世纪的世界人口问题——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以后的二十年中的问题——我们必须掌握上述古典模型。这一模型对于世界的将来意义可能要大于它对马尔萨斯以来的西方的意义。另外，当我们考察资本形成对于德国、日本、美国和世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同样的图形分析工具

也是适用的。

第 37-1 表和第 37-1 图简要表明：当工资高于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时，人口增长的倾向如何会：(1)结束土地数量充足和自由使用土地的黄金时代，以及(2)在最低限度生活水平导致出接近于静止的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道路。让我们先来看第 37-1 表。

第 37-1 表说明：当固定数量的土地使产量不能和劳动按照相同比例增长时，工资率将下降。第(1)栏表明不变数量的土地。第(2) 栏表明增长的劳动。第(3) 栏表明由此而造成的产量(Q 或 GNP)的增长。由于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产量增长的比例小于劳动增长的比例。其他各栏的数字均可单纯根据上述生产函数计算出来。

劳动和土地同产量的关系						
	(1) 土地 英亩数	(2) 劳动的 劳动日数	(3) 食品 产量	(4) 以食品计 算的 日工资	(5) 劳动在 GNP 中的份额(%)	(6) 以食品计算 的每英亩土 地的地租
A	1,000	500	4,000	8	100	0
		501	4,008			
A'	1,000	1,000	8,000	8	100	0
		1,001	8,008			
B	1,000	3,000	20,000	5	75	5
		3,001	20,005			
E	1,000	6,000	33,600	4.2	75	8.4
		6,001	33,604.2			
Z	1,000	8,000	39,000	0	0	39
		8,001	39,000			

第 37-1 表 由于人口增长而造成的收益递减结束了经济发展早期的黄金时代

较高的劳动—土地密度减少按人平均的产量，降低根据边际产品计算的工资；因此，越来越稀少的土地的每英亩地租变为具有越来越大的正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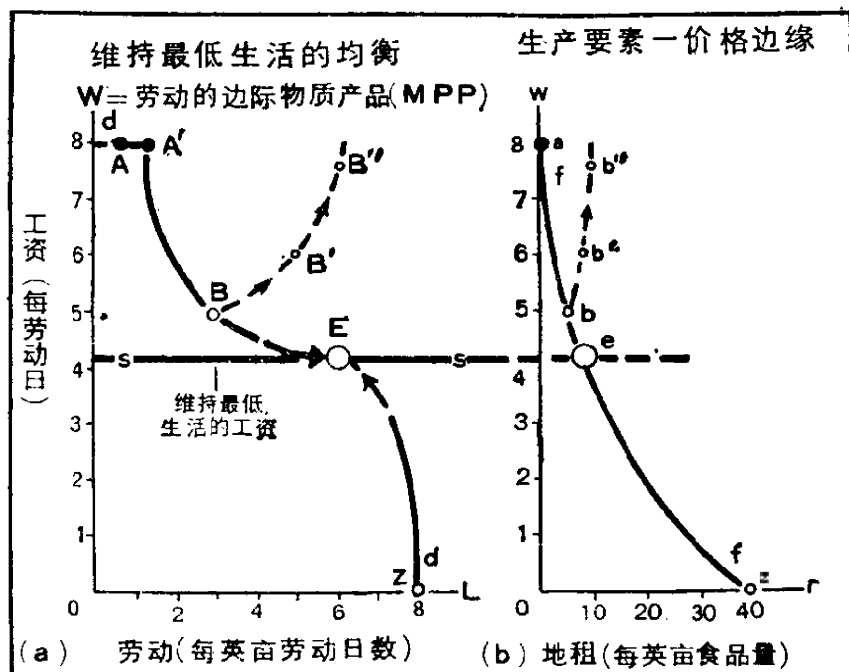
为了得到第(4)栏的下降的工资率,我们必须重复第二十七章关于最后一个劳动者所添增的总产量的计算。(回想一下:这被称为每一完全相同的劳动者的边际物质产品。)在 A' 点,我们在现有的 1,000 个劳动者之上再添增一个。可以看到,产量由 $Q=8,000$ 增加到 $Q=8,008$ 个单位。这使每增加一人所添增的产量为 8;因此,边际产品和实际工资率必须为每个劳动者 8 单位的产品。读者检验一下:以后在 B 点,添增的产品和工资下降到 5.0;在 E 点下降到 4.2;最后,在 Z 点下降到零。在该点,土地上拥挤着如此之多的人,以致不论增加多少劳动者,他们也不可能添增任何产量。

为了得到劳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相对份额,我们用劳动者的人数去乘工资率。然后,我们用国民生产总值去除工资开支 ωL 。可以看到,第(5)栏中的劳动的份额很快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百下降到百分之七十五,最后下降到百分之零。谁得到剩下来的份额?根据假设,我们的劳动-和-土地的模型中并不牵涉到资本因素,因此,一切剩下来的份额必须为土地的地租。由于土地总面积不变,我们简单地用不变的英亩数去除土地在总产量中所占有的份额。很显然,随着第(4)栏的工资率的下降,第(6)栏的每英亩地租因之而必然上升,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提醒我们的那样。

§. 马尔萨斯的发展图形

第 37-1 图描述所有这一切。在第 37-1 (a) 图中,我们看到:由于收益递减规律使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沿着 dd (该线通过 d 、 A' 、 B 、 E 和 Z) 下降,工资率持续降低。使得工资在这个对劳动的需求曲线 dd 上不致下降到零的是什么?实际上,当 dd 与人们能维持最低生活和刚好能再生产自己的最低工资所规定的水平供给曲线

ss 相交时, 工资便不再下降。马尔萨斯式的最终的均衡点 E 是一个悲惨之点, 绝对不带有黄金的色彩。



第 37-1 图 人口不断增长, 一直到马尔萨斯说的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情况出现时为止

人口的增长使我们从黄金时代的 A 、 A' 和 a 点沿着收益递减的边际产品曲线 dd 下降, 一直到该曲线与最低生活工资的 ss 供给曲线相交于马尔萨斯的均衡点时为止。实际工资从 a 到 b 到 e 的下降, 意味着地租率沿着“生产要素—价格边缘 ff 上升。由于新发明使 dd 和 ff 向上和向右移动, 实际工资在过去从 B 上升到 B' 、到 B'' 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 地租也从 b 上升到 b' 、到 b'' 。

不论悲惨与否, 该点确实代表一个稳定的均衡。读者可以自 733 己检验这一点。假设瘟疫暂时减少人口, 使我们处于 E 点的左方。实际工资便因之而高涨(正如 1665 年的大瘟疫以后的情况那样), 处于 dd 曲线上的高于 E 之点。但是, 均衡点不能停留于此。由于工资高到使人口增长, 我们再度逐渐回复到 E 点的均衡, 如指向 E 点的箭头所示。(可以看到, 由于偶然的连年丰收, 人口的增长暂时超过 E 点。这会很快造成远低于最低限度生活的工资率来减少人口, 一直到箭头使我们沿着 dd 回复到 E 为止。)

第 37-1(b)图说明:随着每小时工资率的降低,每英亩土地的地租率上升。在可以被称为“生产要素—价格边缘”(在图上为 ff) 的线上,可以看到:地主在高地租的马尔萨斯最低生活的均衡点 e 要比他们在早先的黄金时代的 a 点处于较优越的境况。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某些地主心情愉快地欢迎引种白马铃薯,因为它使人们能依靠较便宜的热量生活,从而在实际上使原有的 ss 曲线降低并且提高均衡地租。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某些只顾自己的地主们把节育知识的传播看作是对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威胁。有人受奴役,另一些人才能过舒适日子^①。

§. 劳动价值论的终结

简单的劳动价值论认为物品的价格比例可以单独根据劳动成本得以决定,而与导致对物品需求的效用无关。由于必须照顾到土地的稀缺性这一事实,这一价值论必然要被放弃。现在,生产成本包括地租以及工资的支付额。两种物品,如食品和衣服,现在每一单位物品可以具有相同的劳动成本。但是,如果每单位食品比每单位衣服具有更多的土地成本,那末,它们不再能按照一对一的比价出售。

① 李嘉图主义者实际上夸大了阶级利益的冲突。虽然人口增长可能意味着较高的每英亩土地的地租,但他们错误地认为,它必然意味着较大百分比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变为地租。在第 37-1 表的第(5)栏中可以看到:即使当工资率从 B 下降到 E 而地租从 b 上升到 e 时,劳动继续得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五。

从历史上看,纯地租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净值中的比例持续下降。E. 丹尼森在他关于美国经济成长的研究中估计:地租在今天仅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为百分之九。C. 克拉克对世界不同国家的估计也表明:工业化的国家可以用资本和劳动来代替稀缺的土地。E. 丹尼森:《美国经济成长的根源》(经济发展委员会,纽约,1962年);C. 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57年,第三版)。虽然现代科学使我们能从空气和普通物品如煤与石油中提取硝酸盐和尼龙,而不需要支付高额的租金来使用智利的稀缺的天然硝酸盐资源或日本的育蚕设施,但自然资源仍然得到高额稀缺性租金;它们代表大自然赋予的固定数量土地这一较简单的古典概念的推广。最近有关资本的统计数字不包括土地。

就极力主张劳动价值论的人而言,比上述还要糟糕的情况是:假定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改变了他们的需求,倾向于较多食品和较少衣服。这会提高相对于衣服的食品价格。为什么?因为食品比衣服生产要求为每一劳动者配备较多的土地。因此,当人们需要更多的“土地密集”的产品时,固定数量的土地变得更加稀缺,从而地租会作出相对于工资的提高。

无论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是在依靠市场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都不能单独地按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的价格,而不考虑爱好和需求的型式以及它们对稀缺的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的影响。^① 734

有人说劳动者应该得到全部产品,这种说法怎么样呢?劳动是唯一的属于人类的生产要素并且能够流汗、欢笑、啼哭和祈祷。确实如此。然而,即使泥土不能出汗或啼哭,它还是有助于马铃薯的生长,而当它处于稀缺状态时,良好的社会必须以最经济的方式利用它。

企图论证劳动者受到“剥削”的人没有必要受到简单的劳动价值论的牵制。他可以对自称为地主的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地主得到地租的权利,提出异议。他可以宣称,只有农民才应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且得到地租,或只有国家才应拥有土地所有权。谁应得到地租是一个伦理或法律问题。然而,不论解决方案如何,合理地使用土地总是要求对购买土地产品的消费者以及最适宜和土地相

① 本章前面的一个脚注指出,在自由取用土地的黄金时代,社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是一条直线,其斜率单独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现在,当土地变为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在食品生产上比在衣服生产上较为重要时,生产可能性曲线会向外鼓出,其原因在于第二章所论述的(相对的)成本递增规律。现在,决定竞争的价格比例的 $p-p$ 边缘(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斜率取决于人们的需要。(因此,上述可以说明:李嘉图错误地认为,他可以通过使用无地租的贫瘠土地这一“外部边缘”来“消除掉使问题复杂化的土地因素”,因为在无地租的贫瘠土地之上,产量是如此之低,以致全部生产成本只能包含劳动。实际上,当需求改变时,那个外部边缘也要改变!)

配合的生产要素支付地租成本。(回想第二十七章关于剥削的论述和第三十二章附录关于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的价格决定的论述。)

第三十九和四十章将回到剥削和种族歧视问题; 第四十二章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作比较公正的论述。

§. 技术进步和古典的经济成长论

如上所述,从历史上看,实际工资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人口并没有稳定下来。每英亩土地的地租出人意料地增长很少,而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而言,在实际上已经下降。很明显:生活的现实并不是沿着一条不变的生产要素—价格的边缘或沿着一条不变的边际产品曲线下降。科学、工程和管理技术方面的新发明已经使第 37-1 图的曲线向右和向上移动。表示进步的线段—— $BB'B''$ 和 $bb'b''$ ——可以说明历史的实际过程。读者可以在第 37-1 图中自行作出通过 B' 或 B'' 的已经移动的 dd 曲线以及通过 b' 或 b'' 的已经移动的生产要素—价格的边缘。这种曲线的移动已经补偿收益递减而有余,使得马尔萨斯的维持最低生活的均衡点迄今与西方经济的现实不相符合。

并不是所有的新发明都同样程度地有利于劳动和土地。例如,排除沼泽积水或使劣等土地生产较多粮食的发明可能对工资比对地租较为有利。某些经济学者会称此为“节约土地的发明”。相反,任何趋于提高地租多于提高工资、从而增加地主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的发明可以被称为“节约劳动的发明”。^①在其间,使两种生产要素的报酬作同比例增长、从而使它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相对不变的发明可以被称为“中性的发明”。在西方

① 近年来的新的小麦和水稻品种这一“绿色革命”似乎在节约劳动和节约土地之中较为倾向于前者,从而,亚洲的贫苦农民不象有能力灌溉和有能力取得信用来购买化肥的地主那样得到较多的好处。

的历史中,发明就其总体而言是节约土地的类别;但是,很少有发明节约土地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使地租除了作出相对于工资的下降以外,还要绝对地下降。

卡莱尔如果死后有知,应该得到安慰,因为无论如何,经济学并没有成为“沉闷的科学”——至少在先进的世界中是如此。

§. 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①

迄今为止,我们所强调的是古典学派致力于研究的稀缺的土地问题。在本章的以下部分,我们将略去对发达国家说来较不重要的土地,进而考察比较重要的资本与劳动的模型。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同样简化的两个生产要素的模型。

资本-劳动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 相对于另一生产要素而言,一个生产要素增长较快。我们首先把人口看作是非经济变量,看作是静止不变的(或由于社会原因增长很缓慢)。积累使资本成为一个变动的因素。在一个过分简单化的产品由一个数量相对不变的生产要素和另一个数量相对变动的生产要素来生产的模型中,收益递减规律会发生作用。

数量扩大的生产要素的收益会下降;相对稀缺的劳动的收益会上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逐渐接近于一个均衡的静止状态。

有关资本的概念。现在,相对于劳动(L)而增长的生产要素是资本,资本用 K 来表示。^② 资本品包括大量各种各样的东西: 各种

^① 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麻省理工学院的 R. 索洛赋予了拉姆赛-克拉克的新古典学派的成长模型以新的生命。堪培拉大学的 T. 斯旺和剑桥大学的 J. E. 米德对类似的经过改动的李嘉图-马克思古典模型加以分析,引起了剑桥大学的 J. 鲁宾逊的批评。

^② 第三十章及其附录论述了资本以及难于解决的资本计量问题。

机器、厂房与库房、工具、原料和半制成品(种子、地里的庄稼、已收获的庄稼、面粉、生面团、烘烤中的面包、已包装和运送的面包)以及罐头和冷冻食品。

社会可以把这些实物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以便得到财富总量或资本总量;但是,它不能命令一百万元的发电机转变成为一百万元的炼油设备。当然,当发电机被磨损掉以后,应该用于生产重置发电机的资源可以用来增加炼油设备的生产。这一物质转换过程在金融方面的表现是发电机行业的投资者用该行业的折旧费用增加炼油设备的投资。结果,虽然货币资本的帐面净额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虽然国民收入统计工作者只是用一方面的负投资去抵消另一方面的投资,社会仍然得以改变它的资本的物质构成,而不改变目前的物品消费的数量。

736

为了使理想化的和合乎常规的经济发展的故事能自由无阻地叙述下去,我们将象统计学者和经济史学者那样使用过分简单化的办法:我们将使用实际的资本品(K)的指数,同时假设它的收益即为利息率或利润。

资本深化的作用。当资本相对于劳动而增长时——即当资本“深化”时,按人口平均的产量会受到什么影响?回想一下,当劳动相对于土地而增长时,每英亩土地的产量会受到什么影响。产量增长的比例小于变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增长的比例,从而,该生产要素的价格(工资)必然下降。在我们过分简单化的模型中,当一种生产要素(如资本)的增长比另一个(如劳动)快时,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同样的收益递减规律便要发生作用:

1. 产量将不和资本作出同比例的增长。
2. 资本的收益,即每年的利息率——也即利润率,如果我们略去风险和技术改变的话——会随着资本的深化而下降。
3. 现在,社会可以以较低的利息和利润率提供较多和较复杂的资本品,因而每个人拥有较多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会如

何变化？正如在第 37-1 图中相对稀缺的土地所获得的地租要上升一样，在这里，相对稀缺的劳动所获得的竞争的工资也要上升，因为人手对于资本家来说价值有所增加，从而市场工资率不断提高。（注意：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竞争，而不是利他主义。）

4. 较高的工资率和较低的利息率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所占有的份额的比例会由于资本所占有的份额减少而增加。为什么？因为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增长可能抵消（甚至抵消之后还有余）利息率的下降和实际工资的上升。^①

5. 最后，由于产量（按人口平均或总额）的增长比例小于资本（按人口平均或总额）的增长比例，因而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产量之比将上升（例如，资本价值从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3 倍上升到 $3\frac{1}{2}$ 倍）。

这里有一个最终的总结：

资本的深化（技术水平不变）：

资本/劳动之比上升；利息率或利润率下降；工资率上升；
资本/产量之比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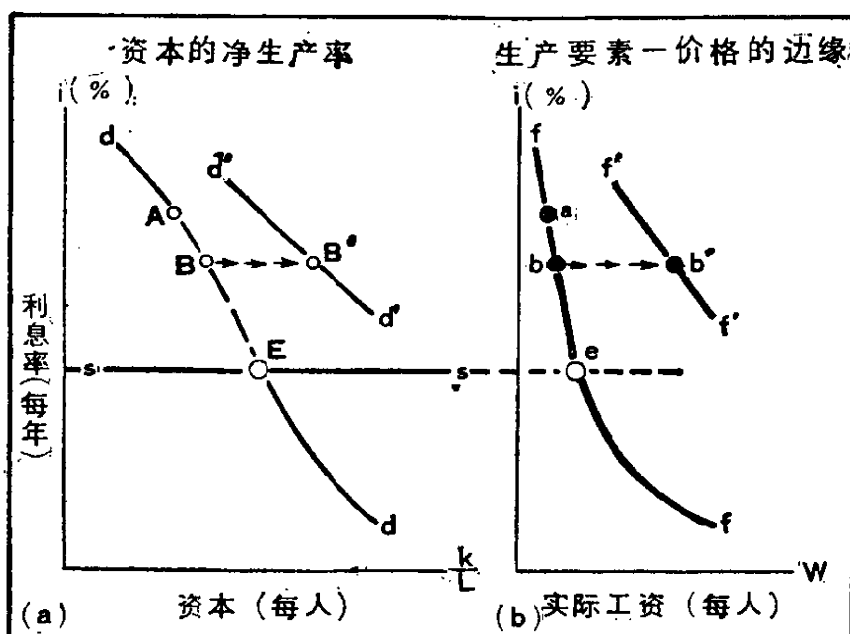
§. 用图形表示的资本的深化

第 37-2 (a) 和 (b) 图类似第 37-1 (a) 和 (b) 图；然而现在，资本是相对增长的生产要素。在 (a) 图中，横轴表示按人口平均的资本数量，资本的利息和利润则由纵轴表示。在 (b) 图中，劳动是相对不变的生产要素，劳动的工资则由横轴表示，正和地租在第 37-1 (b) 图中一样。

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会使我们沿着 dd 曲线从 737

^① 例子：假设资本从一百万元加倍到二百万元，而劳动者仍然为 30 人。又假设利息率从百分之五降低到百分之四，而工资从每年 \$ 5,000 上升到 \$ 8,000。这样，工资总量的份额继续为资本份额的 3 倍，因为每一份额均从各自开始时的每年 \$ 150,000 和 \$ 50,000 增长百分之六十。

A 到 B , 也许最终会到达李嘉图的均衡点 E 。在该点, 人们不再愿意为了将来的消费而储蓄任何比例的收入。在第 37-2 (b) 图中, 在生产要素—价格边缘 ff 之上, 社会可以持续地处于 a 点, 或处于 b 点。在 b 点, 资本数量的增加(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拥有较多的每一种机器)意味着较高的工资率和较低的利息率。或者, 社会也可以处于资本—产量之比和资本—劳动之比还要更高的 e 点。前面用文字表达的资本深化的影响现在被图形所证实。



第 37-2 图 积累会提高实际产量和工资并且压低利息和利润率

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在固定数量的劳动加上数量较多的和品种较多的资本品会使总产量的增加越来越少, 并且使获得的利息率沿着 dd 从 B 下降到 E 。 E 点为李嘉图的停止储蓄的均衡点。在 ff 曲线上, 利息率由 b 到 e 的下降必然会由于劳动的较高的生产率而提高实际工资。

在历史上, 技术改良使 dd 和 ff 向右移动, 其速度快到足以抵消收益的递减并且使利息和利润率几乎保持不变, 如 BB' 和 bb' 之间的水平箭头所示。

§. 技术进步和工资

现在, 我们重新引入技术改良。这会使 dd 和 ff 曲线向外移动, 例如, 移动到 $d'd'$ 和 $f'f'$ 。社会不但没有从 B 点移动到 E 点,

反而发现收益递减已被抵消，而社会所经历的实际过程可能是从 B 到 B' ，从而抵消或掩盖李嘉图-马克思的资本深化造成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在第 37-2(b) 图中可以看到：只要利润率保持不变或者下降，不论是否存在技术改良，实际工资率都必然上升。^①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上升归之于：(1) 工会的压力、(2) 政府对垄断的控制以及 (3) 民主政府由于群众的压力而采取的福利和调节方面的干预措施。这一可供选择的假设不能被认为毫无根据而被否定，因为我们在本书中都 738 看到，政府的行动确实具有好的和坏的两种后果。然而，过去一个世纪的工资上升的幅度和型式，使我们怀疑工会的政治压力是否为工资上升的重要原因。例如，在 C. 柯立芝总统领导下的二十年代的美国，政府的干预是有限的，工会弱小，而垄断在该年代中肯定没有减少；虽然如此，实际工资却猛烈增长。同样，日本和西德的实际工资的猛烈增长也是与劳动生产率的猛烈增长相关联的，当时政府偏袒的似乎是企业，而不是工会。

随着技术的进步，随着资本品数量的日益增多，只有真正的魔法才能使实际工资不致由于竞争而年复一年地提高。没有看到这一事实也就是没有理解经济史的真实史实。不符合这些事实的经济理论必将被送进历史博物馆而为符合这些事实的其他理论所代替。

§. 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致史实

让我们总结一下上面的理论研究。

我们首先研究了数量有限的土地和数量不断增长的劳动

① 确实如此。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看到：除非竞争性行业中的新发明是如此的“节约劳动”，以致大幅度提高利润率，否则，新发明肯定要使工资率上升。在现实生活中，垄断者的新发明可能不会带来上述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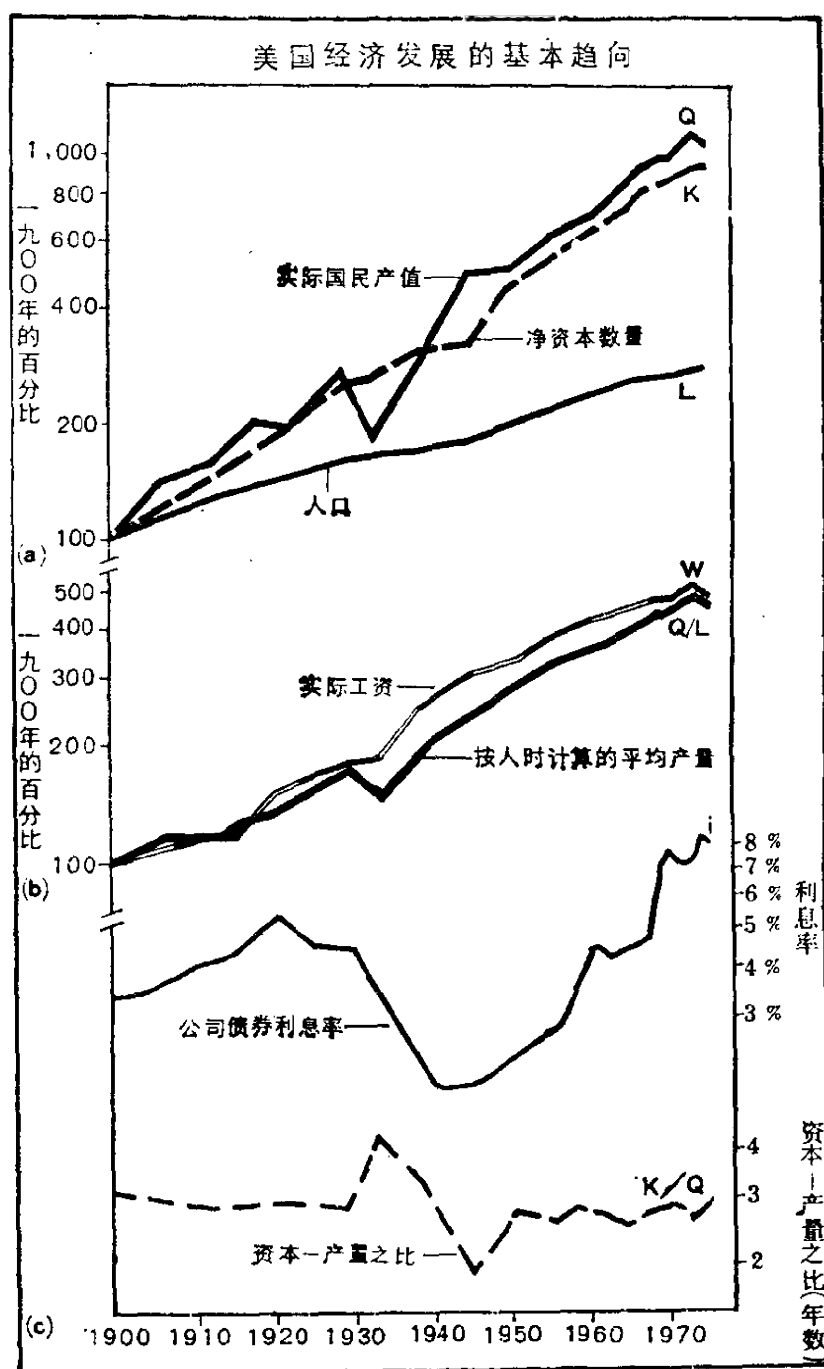
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然后,我们从斯密-马尔萨斯的劳动加土地的世界转移到资本相对于劳动不断增长的世界并研究了资本积累的作用。最后,但远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强调指出了技术改革和新发明的作用。对事实的考察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目前的经济学者认为,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进步从数量上说是先进国家经济成长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 S. 库兹涅茨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取得的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①,由于该所的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由于 R. 索洛和 E. 丹尼森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美国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找出某些共同的规律。第 37-3 图的表明比例的图形说明了美国在本世纪中的巨大的经济发展趋势。类似的结果也适用于其他先进国家。第 37-3 图极其重要。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张图。

最上面的图形说明劳动、资本以及实际产量自从 1900 年以来的增长。在七十五年的稳定增长中,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如果考虑到每周工作时数的缩短、人口年龄的分布以及计入劳动力的人数,劳动人时的增长总量比这还要少。)与劳动增加约为一倍的同时,物质资本的数量增加了七倍多。因此,按劳动力平均的资本(即: K/L 之比)的大量增加确实表示相当大程度的“资本深化”。

产量的增长情况如何?产量是否象略去技术变革的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其增长的比例小于资本?不是。 Q (产量)曲线并不位于两种生产要素的曲线之间,而实际上处于接近于资本曲线之上的地方,这一事实说明: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存在着技术变

^① S. 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的资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61 年)一书中,提到了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些最早的研究者的名字,如 A. F. 伯恩斯、D. 克里默、S. 法布里肯特、R. W. 戈德史密斯、J. 施莫克勒。并参阅 J. W. 肯德里克:《美国生产率的趋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61 年),这本书是该局的一本最早的研究性著作。



第 37-3 图 经济成长具有显著的长期规律性

(a) 资本数量的增长快于劳动的供给。然而，总产量还是完全按照自然增长率扩大。

(b) 实际工资率在稳步提高，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按人时计算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大量的工资统计数字中，看不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c) 如果没有技术发明和革新，相对于劳动的资本深化会压低利息率，提高资本-产量之比。然而实际上，技术革新似乎正好抵消了资本积累所造成的收益递减。（因此，第 37-2 图的静态曲线必然已经向右方移动。注意：如果从偏高的货币利息率中去掉物价上涨的影响，那末，利息和利润率的没有任何长期上升或下降趋向的波动会更加明显——从而否定了利润率递减规律。）

革。产量与资本曲线的接近一致说明：资本—产量之比并没有象简单的资本深化模型所说，其数值上升；而是象最下面的斜率最小的曲线所表明的那样，该比例一直明显地接近于3年的数值（即：740 资产平衡表上的一切资本品的当年的价值大致等于3年的总产量）。①

工资不断增加，利润保持不变。随着与劳动合作的资本工具的增长和技术的发展，实际工资确实象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在稳步增加。利息率——或者风险较大的投资实际获得的利润率，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全面的统计数字的话——并没有呈现出简单的资本深化和收益递减所应造成的下降趋向。利息率和利润率在经济周期和战争中波动很大，但在整个时期中，却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上升或下降趋向。不是由于巧合，便是由于某些有待于研究的经济机制，技术变革大致抵消了收益递减。②

在第37-3图的中间的图形中，有一条按人时平均的产量曲线。正如人们根据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所预计的那样， Q/L 之比稳步增长。此外——而这一点也代表一种异乎寻常的巧合或代表某种有待于研究的机制所造成的后果——每小时工资率的上升的百分比几乎完全等于每人时的产量增加的百分比。这并不象华尔街的算法告诉我们的那样，意味着劳动获得了生产率增加的一

① 许多图表都表明：在这一段时期的末期，资本—产量之比具有较强烈的下降倾向。这种 K/Q 的下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系由分子所造成。人们企图从分子中剔除资本品价格的相对于其他价格的上涨。在第37-3图中， K/Q 的分子、分母的数值为用同一的价格指数去矫正其当年的数值而得到的结果。

② 我们并不认为收益递减规律没有发生作用，因为如果该规律丝毫不发生作用，而不是其作用没有直接表现出来，那末，实际利息率会单纯由于技术变革而猛烈上升。（如果我们从利息率中去掉价格变动的影响——例如，从近来的高额的债券市场利息率中减去近来价格上升的百分比，如以前的章节所示——我们会发现“实际利息率或利润率”甚至还要更加稳定。）

切成果。它意味着：在整个时期中，劳动在总产量中占有相同的份额；财产收入也占有相同的相对份额。（对于中间的图形的较仔细的考察表明：劳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份额可能缓慢地向上爬动，而财产的份额则逐渐下降。然而，劳动的份额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投资于教育的资本的收益。）

§. 经济发展的六个基本趋向

先进国家的经济史中的这些基本事实可以大致上归纳成下列的趋向：

趋向1. 人口在不断增长，但其速度远远慢于资本数量的增长，从而造成“资本深化”。

趋向2. 实际工资率具有强烈的上升趋向。

趋向3. 根据所谓鲍利规律，在长期中，工资和薪金相对于财产总收入的份额基本上保持不变（但是，劳动的份额也许稍稍有所上升）。

趋向4. 没有观察到利息率或利润率的下降。我们实际⁷⁴¹观察到的是：在本世纪中，它们在经济周期中上下波动，但却没有强烈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向（特别是：如果我们从利息或利润率中去掉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且使用实际利息率或利润率的话）。

趋向5. 没有观察到由于资本深化而引起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而造成的资本-产量之比的稳步上升。我们所发现的是：在本世纪中，资本-产量之比大致不变。

趋向6. 储蓄对产量之比在经济周期中上下波动——而在各个周期的充分就业的阶段达到同一水平。或者，把资本-产量之比大致不变的性质考虑在内，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投资与收入之比大致不变的事实：国民产品一般每年按大致不

变的比例增长。^①

§. 对于混合经济的运动规律的分析

虽然这些趋向仅仅是大致正确的真理，而不象物理学的不可推翻的规律那样，但它们还是描述了经济成长的基本事实。如何对它们进行解释？

趋向 2 和 1——资本深化时，工资率升高——非常符合于古典的和新古典学派的生产论和分配论。趋向 3——鲍利规律所说的工资份额大致不变——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巧合事件。只要处于一个把 L (劳动) 和 K (资本) 按照特殊类型的生产函数和 Q 联系在一起的新古典学派静态模型(在第二十七章中被称为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函数的生产要素的相对份额为常数)之中，这一巧合事件可能在一切情况下毫无矛盾地成立。

然而，趋向 4 和 5 却提醒我们，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在静态的形式下是不能成立的。稳定的利润率与稳定的资本-产量之比是与资本深化时收益递减这一基本规律不相容的。因此，我们被迫而在静态的新古典学派的分析中引入技术改良来解释这些动态的事实。我们确实应该引入技术改良，因为大量证据表明，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第 37-2 图的分析中，为了考虑到上述所有趋向，我们被迫使 dd 和 ff 曲线向外移动。例如，在第 37-2 (a) 图中 dd 线上的 B 向右移动到 $d'd'$ 上的 B' ，相当于第 37-2 (b) 图中从 b 向右移动到 b' ，从而符合于全部六个趋向。收益递减的倾向正好为技术改良所抵消，其结果为利息率仍然处于同一水平，而工资率的上升正好等于按人口平均的产量的增长。不能在图中很容易地看出来的资本-产量之比必然保持不变，如果

① 例子：第 37-3 图说明， K/Q 大致为 3 而资本每年增长的百分比则几乎为 $3\frac{1}{3}\%$ 。只有在净资本形成每年约为产量的百分之十（等于 $3\frac{1}{3}\% \times 3$ ）时，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存在，如下一个脚注和本章的附录所阐明的那样。

资本的利息收益占有同以前一样的相对份额的话。^①

索洛教授使用他自己的分析方法证实了国家经济研究局和其他研究机构的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得到了下列使人惊奇的结论：742

美国按人口平均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只有不到一半可以归之于资本本身的增加。生产率的增长似乎一半以上是技术改良的“余留额”，也就是说可以归之于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进步，归之于工业的改进，归之于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对劳动者的培养训练。

这一重要的发现需要加以进一步的解释。

首先，虽然我们习惯于衡量和谈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率的增长（不论是增长的多大部分）来源于劳动者较大程度的努力，或来源于较大的劳动强度；也不意味着来源于劳动者较大程度的努力和教育，或来源于劳动大军的较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此而论，也不意味着来源于精力旺盛和聪明灵活的管理机构。任何简单的解释都不能概括全部事实。

其次，不能人为地把资本形成和技术改良完全分开。新的技术总是倾向于体现在新型的设备之中。我们也许可以设想出一个没有净储蓄和净投资的静止状态——如约翰·S. 穆勒的乐观的静止状态——然而，当使用折旧费来更换已磨损掉的设备时，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技术进步使更换的设备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虽然如此，仍然没有人会否认：在一个除了重置设备的总投资以外还能有净投资的社会中，技术革新会以较快的速度被引入使用。我

^① 本章的附录说明：趋向 3、4 和 5 不可能是相互独立的，因为在数学上，三个数量 (iK/Q 、 i 、 K/Q) 中的任何两个保持不变意味着第三个保持不变。（为了解释这些趋向，可以建立假说，认为新发明使劳动的效率增加的程度正好使资本/用效率单位来衡量的劳动这一比例保持不变。因此，重新解释的模型可以预测 i 和 K/Q 均保持不变，如本章正文最后一个脚注和本章附录所阐明的那样。）

们全都要从实干中学习到东西，勇于尝试新事物的社会必将远远超过很少储蓄或不储蓄的社会。

§. 新发明是节约劳动还是节约资本？

在竞争中能够被应用于实际的新发明必然提高工资率或利息率，或同时提高二者。^①

然而，由于它们本身的性质，某些发明倾向于增加劳动的相对份额；另外一些一般说来则倾向于增加资本和财产的份额；而其他一些对于两种因素具有相同程度的影响。这就有必要下这样的定义：

定义：一件发明是称为“节约劳动的”，还是“节约资本的”或是“中性的”，取决于它是倾向于降低劳动的相对份额，还是降低财产的相对份额或是使二者的相对份额保持不变。

743 节约劳动的发明的一个极端例子是：无人操纵的机器制造出能够完成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机器人。这肯定会急剧降低竞争性的工资，从而使劳动在国民净产值中所占有的份额从目前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左右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以下。节约资本的发明的例子是：一个能减少必要存货数量的廉价的计算机；或者，发明一种纸巾来代替耐用的手帕；或者，发明一种易于发射的可以反射电波的人造卫星，从而可以取消海底电缆。^②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举出

① 根据第 37-2(b) 图的生产要素—价格边缘， ff 必然向外和向上移动，否则，新发明不会在竞争市场中成功地得到应用。正如我们在第四十二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卡尔·马克思误解了这一点。人们不能正确地宣布“利润率〔或利息率〕下降的规律”而同时又宣布“工人阶级贫困化的规律〔实际工资下降〕”。除非人们以马尔萨斯的方式去援用土地的收益递减——而把马尔萨斯当作一个富人的辩护士和“剽窃者”加以痛恨的马克思对于这种现象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否则，人们必须在竞争的模型中放弃马克思的“两个规律”中的一个或两个。

② 在第 37-2(a) 图中，节约资本的发明趋于使图中的资本生产率曲线向下移动，使该曲线趋于垂直，趋于缺乏弹性，其总后果为减少牺牲目前消费和资本积累的果实。中性的技术改良会使第 37-2 图的曲线一般向外和向上移动。高深的著作论述节约劳动的各种不同的定义。我们在这里的论述是一般性的，既符合于 J.R. 希克斯的定义，也符合于 R.F. 哈罗德的定义。

大量的节约资本或节约劳动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性发明的例子。

许多经济学者认为，工资率的稳步上升会诱使雇主使用节约劳动的发明。这种倾向往往被用来帮助解释为什么利润率和利息率没有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就是用这种解释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能够成功地抵挡工资的上升，能够成功地造成一个由失业者组成的产业后备军。在我们的时代，牛津大学的 J. 希克斯爵士提出类似的论点来论证：技术改良总是偏向于节约劳动的方面，而耶鲁大学的 W. 费尔纳则整理出了有利于这一论点的某些证据。

不论这种论点的优劣之处究竟为何，我们必须看到，任何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发明都能使首先采用该发明的第一个竞争者得到好处。而且，由于一个世纪以来工资在总成本中占有的份额基本上未发生变化，所以，任何计划将来年份的研究费用的雇主都应该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不论节约来源于哪个方面，都应为了在将来节约一元的成本而在目前投入同样数量的研究费用。^①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分析对于说明混合经济的运动的规律是

① 一个引致技术变革论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解释和统一经济发展的全部六个基本趋向：(1)假设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任何增长趋于提高劳动的相对份额。(2)假设当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的份额增加时，会导致人们努力提高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而不那么卖劲“加大”资本的力量）。(3)最后，假设收入的一个不变的比例总是被储蓄起来并且被用于投资，同时，劳动人口以不变的比例缓慢增长。那末，经济最终会按照“黄金时代的均衡”速度来增长：(a)资本和产量会按照同样的高速度增长， K/Q 之比保持不变；(b)劳动人口会按照较为缓慢的速度增长，但是，由于引致的技术上的发明，“以工作效率或效率单位来衡量的劳动”会按照与资本和产量完全相同的速度增长；(c)现在，由于 Q 、 K 和以工作效率来衡量的 L （劳动）均衡地增长，资本的收益递减便不存在，从而利息率保持不变，劳动的相对份额保持不变；(d)最后，实际工资将会增长，因为引致的技术改革提高了每一个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我们到此已经得到我们要证明的东西。几位经济学者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对此作了精确的证明，而并没有使用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本章附录所示。

非常有用的。当我们考察沃顿商学院和其他计算机模型对美国1975—1985年的经济情况所作的预测时，我们看到，这些趋向仍然存在。

我们承认，成长理论仍然是经济学的新领域，专家们对于过去经济发展的原因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式也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在本章的附录中，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理论。在下面各章，我们将研究不发达国家的、先进国家的和象苏联那样的集体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经济成长问题。

总结和复习

1. 许多著作家想从经济史中得出直线运动的结论，而且认为这种运动要经过一些不可避免的阶段，例如，原始经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实际发生的事实并不符合于这种时间表；特别是，未经社会预言家的允许，出现了统治西方世界的混合经济。

2. 斯密和马尔萨斯的古典学派的模型用不变数量的土地和不断增加的人口来描述经济发展。只要土地非常充裕，简单的“劳动价值论”便能适用；在这个劳动得到全部国民产品的黄金时代，产量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稳步增长。

3. 在没有技术变革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最终使自由取用的土地不复存在。由此而造成的人口密度的增加使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土地数量的固定使得产量不能和人口作同比例的增长；由于具有越来越少的土地与之发生作用，每一个新的人手所添增的产品越来越少；而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下降意味着得到的竞争的实际工资下降。随着每英亩土地具有越来越多的劳动与之发生作用，它的边际产品和得到的竞争的地租上升。基本的生产要素-价

格的边缘描述地租率如何随着工资率的下降而上升,但是,没有人能够预言土地和劳动在国民产品中所占有的相对份额。

4. 当工资下降到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时,我们便处于马尔萨斯所说的均衡水平,低于这一水平,劳动的供给便不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技术变革不断使劳动生产率的曲线向上移动,从而使得西方的经济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5. 李嘉图-马克思-索洛模型强调资本深化,即:各种资本品的积累过程快于人口和劳动时数的增长。在没有技术变革的情况下,由于收益递减的缘故,按人口平均的资本的增长不会伴随着按人口平均的产量的相应增加。因此,资本深化会降低利息率(如果略去风险,利息率和“利润率”是一回事),沿着生产要素-价格的边缘提高实际工资并且提高资本-产量之比。

6. 在历史上,上面提到的趋向 1 和 2—— K/L 之比和 ω 的增 745 加——可能符合于静态模型。趋向 3 的劳动和财产相对份额的大致不变——用 $\omega L/Q$ 和 iK/Q 来衡量,其中 $Q = \omega L + iK$ ——并不是静态模型所必需的,但却符合于它的一个特殊事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然而,趋向 4 和 5——利息率和利润率没有下降以及资本-产量之比没有上升——清楚地表明在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技术变革。(技术变革的作用似乎在于增加以效率单位来衡量的劳动,其增加量正好补偿资本的增长:用效率单位来衡量便不出现收益递减,从而不出现资本-产量之比的上升,也不出现利润率的下降。)趋向 6——投资-收入之比或储蓄比例的大致不变——和不变的资本-产量之比在一起,在数学上意味着产量按固定的比例增长。

7. 事实说明:同技术变革相比,资本积累是解释生产率上升的第二位的因素。但是,技术革新和投资是相互发生作用的,因为新技术会体现在新设备之中,而新投资的过程使人们学到新技术。

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方便地用劳动生产率——即： Q/L ——表示出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劳动。

8. 新发明被分为节约劳动、节约资本和中性这样三个类别，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取决于新发明在国民产品中是减少劳动的相对份额，还是减少资本的相对份额，或是使份额保持不变。工资持续上升的事实使厂商希望这个趋向继续下去；不论厂商是否试图应用节约劳动的发明并且获得成功，厂商总是要减少成本开支（劳动、自然资源、资本方面的成本）。

或是由于偶然的巧合，或是由于作用相反的趋向的抵消，或是由于有待于研究的经济机构的原因，^①新发明的步伐大致可以抵消资本的收益递减对利息率和利润率的影响；技术革新也并没有过于偏向节约劳动或节约资本，因而劳动和财产的相对份额变化不大。

附录：目前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讨论

经济学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它本身仍然处于发展之中。虽然人们对本章所论述的经济发展的概略史实并无争论，然而，不同的学者却对史实作出不同的解释。在本附录中，我们将简要介绍已故的 J. A. 熊彼特、牛津大学的 R. 哈罗德爵士、哈佛大学的 W. 里昂惕夫、剑桥大学的 J. 鲁宾逊和 N. 卡尔多教授以及其他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

虽然一本入门的教科书不能奢望解决高深的问题，然而在今天，如果一本入门的物理学著作不在某些章节中使读者了解该学科的尖端问题：原子理论，基本粒子，广义相对论等等，那末，这本著作便会被认为是过时的。

同样，许多初学经济学的学生想要了解目前经济分析中的尖端问题。即使不掌握本附录的各种繁难之处，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从中粗略了解一些不断发展的经济思想。特别是，许多对本附录所论述的其他理论不感兴趣的读

① 例如象上一个脚注所描述的那样。

者,仍然可能要翻阅本章最后论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W. 里昂惕夫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分析这一令人着迷的和有用的主题。

§. 熊彼特的技术革新

维也纳和哈佛大学的 J. 熊彼特(1883—1950)是两本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作者^①:《经济发展论》(英译本,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34年)以及去世后出版的《经济分析史》(牛津大学出版社,费尔劳恩,新泽西州,1954年)。

熊彼特强调技术革新者——即:发明者、试制者、创业者,也就是在技术上能看到和开创革新并且把革新成功地付诸实施的人——的作用。正象卡莱尔相信伟大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样,熊彼特的理论把革新者当作推动资本主义的力量。革新者只是暂时居于有利可图的统治地位,他的利润很快地将为模仿他的竞争者所分享。

第 37-2 (a) 图描述了熊彼特认为技术革新停止后将会出现的情况。竞争和资本积累会很快地使社会沿着收益递减曲线 dd 下降。熊彼特确实认为长期 ss 水平线将处于利息率和利润率为零的水平,认为在这条水平线上新储蓄的供给将消失。在第 37-2 (a) 图中,该线会处于横轴的位置。(他的在没有技术革新的静止状态中利息率为零的理论经常受到攻击,但如果用一个正数值的最低利息率代替零值利息率,这不会对他的周期性发展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

然而现在,熊彼特亮出了他的王牌。技术革新周期性地使 dd 曲线向上和向外移动。提琴的弦受到技术革新的拨动。没有技术革新,琴弦会逐渐处于静止状态,然而,新的技术革新会拨动它,使它再次处于活动状态。在经济生活中,利润率也是如此。

① 读过他的激励人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哈珀和罗公司,纽约,1942年)一书的人都可以看到,熊彼特不仅是一位经济学者。熊彼特认为经济制度本身是稳定的,他为其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消亡提出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高效率本身造成资本主义的灭亡,因为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会厌恶市场的意识形态并且以福利的名义引入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府干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由于自身的癌症而死亡,而熊彼特则认为资本主义将由于心理方面的原因而自杀。自从熊彼特以欢乐的态度提出他的悲观预测以来,混合经济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似乎背离了他的历史进程表。但是,在大学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富裕的人们的不满情绪可能证实了熊彼特的有洞察社会能力的预言。

我们已经说过，来源于技术革新的利润会由于模仿革新的人的竞争而消失；在其中，劳动者和消费者会很快地从价格下降中得到好处。技术革新所导致的利息率的上升也会很快地诱导出储蓄和资本形成，一直到积累所增加的资本造成收益递减、“利润压缩”和最低利息为止。然而，这时会涌现出一批新的技术革新——例如，铁路、电力、自动化、半导体——来再度拨动琴弦，使经济制度回复到活动状态，从而，我们开始重复一个新的过程。

略去熊彼特的关于经济周期的具体理论，我们看到，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完全符合经济史的头两个趋向：实际工资率不断上升以及资本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虽然他的一般理论并没有具体指出相对份额的不变、利润率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向、不变的资本—产量之比或平均消费和储蓄倾向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向，然而，所有或任何这一切仍然是和熊彼特的一般理论基本一致的。

§. 静止状态中的失业？

李嘉图、A. 马歇尔以及熊彼特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作者凯恩斯勋爵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如果没有技术变革，利润率会降到最低水平。但是，李嘉图等人都相信：当这一世界末日到来时，经济制度会自愿地消费掉它的充分就业收入的百分之百；虽然正数值的投资为零，但人们的消费支出将足以维持充分就业。（如果用第二编的图形来表示，在李嘉图的静止状态下， $C + I + G$ 曲线会和 45° 线相交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不过此时的 $C + I + G$ 实际上为 $C + \text{折旧} + G$ ，因为在静止状态下，净投资等于零。在本章的以下部分， I 代表净投资，而不是总投资；净储蓄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凯恩斯担心，这种对于有风险的企业的最低利息率和利润率可能造成一个具有长期失业的停滞的静止状态。

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当未来的利润率低到不足以使人承担风险时，人们可能仍然愿意储蓄，但却不会有相应的实际投资。当短期的优质政府债券的
748 利息率低到使人们对储藏多一些或少一些闲置的现金都无所谓的时候^①，中

① 这个利息率和利润率的最低水平可能有助于解释上面趋向 4 所谈到的利润率的不变的历史趋势；特别是，如果有人能为利润率的最高限度提供理由的话。这样，当利润率被认为是在两个限度之间活动时，它的长期不变的趋向就不能被认为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也回想一下第十八章附录的论述：当“灵活陷阱”或“萧条时期的极端情况”由于风险而加重时，利润率也许会降到这种最低水平。）

央银行的政策就很难防止停滞状态的出现。

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并没有使这种关于静止状态的说法消失。关于在混合经济中,资本深化是否有可能和充分就业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凯恩斯在剑桥大学中的杰出的追随者,如 J. 鲁宾逊和卡恩勋爵,持有严重的怀疑态度。至少,他们强调指出,在局限于正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国家中,这种情况不会自动出现。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非常怀疑:“管理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或者是否会采用新古典学派和后凯恩斯分析的成功综合所意味着的那种非正统的货币和财政扩展政策。

想要继续研究高深的经济学的读者可以参阅这些剑桥学者的著作。^①在这里,我们仅就其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方面简要指出真正代表双方意见的某些争执之点。对于哪种思想属于哪个经济学者,我们并不特别仔细地加以区别。

§. 不改变的资本—产量之比?

在第一个斯密—马尔萨斯的经济发展模型中,土地—产量和劳动—产量之比并不是不变的。在第 37-2 图的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模型中,资本—产量之比也同样没有被当作技术常数。在没有技术改革的情况下,社会所完成的资本形成使得产量增长;由此而出现的收益递减,使资本—产量之比随着资本的深化而稳步上升。按照这种观点,动态的技术变革在历史上似乎提供所需要的额外的生产率,以抵消静态的收益递减,从而使衡量到的资本—产量之比保持不变。

许多现代经济学者——西北大学的 R. 艾斯纳、已故的哈佛大学的 A. 汉森、剑桥大学的 L. 帕西纳惕以及其他——认为,资本—产量之比非常接近于一个技术常数,从而,任何超越年产量增加所需要的速度的资本积累会很快地不能实现。在象 1955—1957 和 1964—1972 年间那样的资本投资的高潮之后,企业设备的利润和租金会大幅度地下降。多余的生产能力会随之而出现,而结果所造成的利润的紧缩会减少私人投资,正象 1973 年以后的停滞时期出现的情况那样。因此,他们论证道:任何长期的经济理论都必须使用第 37-3 图的史料所显示出来的那种不变的资本—产量之比。

① J. 鲁宾逊:《经济学的哲学》(阿尔丁公司,芝加哥,1962年),第五章;《资本积累》(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56年);N. 卡尔多:《价值和分配论文集》;《论经济稳定和成长》;《论经济政策》(达克沃思公司,伦敦,1960年)。

§. 哈罗德—多马的经济成长模型

上述概念可以用英国的 R. 哈罗德爵士和美国的多马教授建立的平衡的复利（或“指数”）成长模型来阐明。^①这一理论涉及这样两个问题：长期的“自然增长率”以及所谓“有保证的增长率”。

自然增长率。第 37-3 图的历史资料有助于说明哈罗德的推算方法；而反过来，简单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也给这些历史趋向提供过分简单化的“解释”。

749 假设劳动时数 L 按照每年大约百分之二的比例稳步增长。^②为了极端简单化起见，假设技术变革在实际上使每一个劳动者的效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可能由于较为科学的生产方法，也可能由于较好的教育，98 个人在今年所做的工作等于 100 个人在去年所做的工作，而这一方式无限地重复下去。用专门术语来说，虽然按人时单位计算的实际的 L 每年增长大约百分之一，但按“劳动效率单位”计算的 L^* 却以每年百分之三的比例增长，因为效率每年提高了百分之二。由此我们得到了有关自然增长率的概念。

定义：简单化的哈罗德理论体系中的自然增长率是以“效率单位”（意思是：由于每小时劳动技术上的有效性质的增加而得以扩大的自然劳动单位）来衡量的劳动供给每年增长的百分比；作为平衡增长的一个条件，产量和资本也必须每年按照自然率增长。

当国民生产总值（或 Q ）和 L^* 均按照每年百分之三的自然率稳步增长时，资本数量 K 也必须按照同一的每年百分之三的自然率增长，以便使增长的步伐保持平衡。要想使 K 按照这个百分之三的自然率增长，每年所需要的净投资为多少？或者，换句话说，人们要在充分就业的产量中每年稳定地储

① R. F. 哈罗德：《趋向于动态经济学》（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48 年），E. D. 多马：《经济成长论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费尔劳恩，新泽西州，1957 年）。在这里，第十四章所论述的加速数—乘数相互作用的模型被应用于经济发展的趋向，而不是应用于经济周期背离长期趋向的情况。

② 通过利用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来扩大工业部门是和 A. 刘易斯爵士的名字分不开的。此人是牙买加的第一位卓越的发展经济学者。观点迥然不同的经济学者，如瑞典的保守的 G. 卡塞尔和非保守的卡尔·马克思都提出过类似的李嘉图的想法。

蓄和投资多少,以便使增长很好地保持平衡?

很显然,所需要的储蓄—收入,或储蓄—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取决于资本—产量之比 K/Q 乘以自然增长率所得到的数值。^①

我们现在可以写出把三个历史变量综合在一起的数字公式:哈罗德的每年为 0.03 的自然增长率,或在一般情况下,为每年百分之 g ; 历史上的资本—产量之比,譬如说, $3^{1/3}$, 或在一般情况下为 K/Q ; 所需要的 .10 的储蓄—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或在一般情况下为 s 。我们得到:

$$s = g \times K/Q \quad \text{或} \quad .10 = .03 \times 3^{1/3}$$

这一公式决定:如果哈罗德的自然增长率处于均衡状态,那末,所需要的自愿的储蓄和投资为多少。^②

对于趋向的解释。这个简单化的哈罗德—多马平衡的自然增长的模型能否解释上述六种基本趋向? 能解释,正象本章正文最后一个脚注所暗示的那样。现在,我们逐个考察每一种趋向。

该模型肯定表明:相对于实际的 L 的人时而言,存在着资本深化,因为 K 按照百分之三的比例增长,而 L 仅按照百分之一的比例。〔然而,在这个简单化的模型中,单纯观察 L^* (以效率单位衡量的劳动) 的人会看到不变的 (K/L^*), 并不存在着资本深化,为了使 K 与 L^* 保持平衡,显然只有“资本广化”。〕

趋向 2 也得到了证实。工资率上升——实际按每年百分之二的比例。为什么? 因为每一实在的人 (L , 而不是 L^*) 得到他所含有的增加的效率单位的边际产品,而这些单位和它们所应分摊到的全部资本份额共同发生作用。

趋向 3 得到证实,从而不再是一个巧合事件。由于技术变革的中性的性质达到如此程度,以致使每个人的“效率的增加正好等于资本数量的增加”,所

① 例如,假设 Q 每年为 \$10,000 亿,而资本数量约为其 $3^{1/3}$ 倍,即为 \$33,333 亿。那末,为了使 K 在本年中增加百分之三,我们必须有净投资 \$1,000 亿 (等于 $0.03 \times \$33,333$ 亿)。这就是说:人们必须正好储蓄和投资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十 (等于 $3\% \times 3^{1/3}$)。〔在这种情况下,当自然增长率为百分之四时,所需要的储蓄—收入之比为百分之 $13^{1/3}$ (等于 $4\% \times 3^{1/3}$); 而当自然增长率为百分之三时,如果 K/Q 之比仅为 2, 则所需要的储蓄—收入之比为百分之六。读者自行证实上述的数字,以检验自己对于问题的理解。〕

② 这实际上是第二编用曲线表示的 $I=S$ 。因为在这里的自然增长率的情况下, $g=I/K$, 或者, $I=gK$; 因此, $I/Q=S/Q=s=g(K/Q)$, 即为哈罗德的条件。

以 K 与 L^* 的平衡的增长意味着两种生产要素在收入中所占有的份额和以前一样。(回想一下: 单纯观察 L^* 的人只看到资本的平衡的广化, 而不是深化; 因此, 可以看到, 并不需要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假设。)

趋向 4 的利息率的不变性质现在完全得到证实, 既不是大致如此, 也不是巧合事件。每一单位的 K 正好和以前相等数量的 L^* 相配合, 收益没有递减, 而是得到了和以前一样的竞争的利息率。(如果风险的程度相同, 利息率的不变则意味着数值稍高一点的利润率的不变。)

750 趋向 5 当然也得到了证实, 因为哈罗德的平衡的自然增长率从一开始便假设 K/Q 之比不变。根据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模型, 即使资本—产量之比可能有些改变, 当 K 的和 L^* 保持平衡的广化意味着没有收益递减从而使 Q 和 K 按照完全相同比例增长时, K/Q 之比也不一定会改变。

趋向 6 的不变的储蓄—收入之比也从哈罗德的基本公式中得到了证实, 因为平衡的自然增长率每年均为同样的复利比例: $s = \text{不变的 } g \times \text{不变的 } K/Q$ 。

各种趋向的相互依赖的性质。正如本书第 145 页的脚注所指出的那样, 六种趋向在逻辑上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为了节省时间, 在趋向 3、4 和 5 之中, 我们检验其中任何两个而知道它们的正确无误便可以保证第三个也是正确无误。其理由是: 如果财产所有者总是得到同样比例的产量, 譬如说四分之一, 如果利润率又保持不变, 那末, 第三十章所论述的一系列收入的资本化的过程将表明: 资本总量的价值必然为产量的一定的倍数。[也就是说, K (资本) 在产量 (Q) 中所占有的份额被利息率去除等于资本—产量之比: $i(K/Q) \div i = K/Q$ 。例如, 如果资本得到 \$10,000 亿的 Q 的四分之一, 而这笔 \$2,500 亿的财产收入可以用 $i = .07\frac{1}{2} = 3/40$ 去除而加以资本化, 那末, 所决定的资本的价值为 \$33,333 亿, 或产量的 $3\frac{1}{3}$ 倍。]

哈罗德的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系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发展的课题。对于与此有关的更加偏重于解释周期出现的不稳定性而不是解释长期趋向的另一概念, 我们只作如下简单的介绍。^①

如果社会的实际的储蓄比例和使自然增长率保持平衡所需要的储蓄比例有所不同,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就是说, 假设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人们实际愿意储蓄的比例 $S/Q = s_a$ 大于或小于根据 $g(K/Q)$ 而计算出来的 s_o 。我们在第二编中已经看到, 储蓄曲线的位置太高会造成失业。相对于投资曲

^① 本小节和下一小节可以略去。

线而言,储蓄曲线的位置太低会造成通货膨胀的缺口,从而价格膨胀的倾向。

在上述情况下,经济制度所能实现的不再是自然增长率 g 。现在,平衡的增长已经与题无关。然而,哈罗德仍然能够提出一个颇为古怪的问题:

从足够的失业资源出发,从而,劳动和其他资源的自然增长不会受到瓶颈状态或最高限度的束缚——从这种情况出发,什么样的产量增长率 W (如果它能够实现并被维持得住的话)会(通过第十四章的“加速原理”)导致出足够大的投资数量使得(通过第十二章的乘数分析)增长率 W 能够继续下去? 由此得到的 W 被称为“有保证的增长率”。

简言之,为了得到 W , 必须重新解释原有的哈罗德公式: $s = g(K/Q)$ 。在公式中,我们不把 g 当作已知数,而按照相反方向行进,去寻找 Q 的增长率。具体步骤如下: (1)用实际的储蓄比例,即 s_a 代替 s 。(2)用未知的有保证的增长率 W 代替由劳动力的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所规定的 g 。(3)假设资本—产量之比(K/Q)是一个全然不变的常数,假设确实存在这种情况。(4)把 K/Q 移项到 S/Q 之下作为分母来求得 W 的数值。

我们以下列方式从自然增长率改变到有保证的增长率:用 $s_a = W(K/Q)$ 来代替 $s = g(K/Q)$,从而,

$$W = \frac{s_a}{K/Q}$$

我们可以举例加以说明。当 $g = .03$ 和 $K/Q = 3^{1/3}$ 时,哈罗德为了他的自然增长的过程而需要使 $s = .10$ 。然而,假设人们想要储蓄 $s_a = .13^{1/3} > .10$ 。这种过度的节俭会导致失业。但是,假设哈罗德能以某种方式使 Q 以较快的比例,按照每年为 W 的百分比扩大,而在扩大时总是能从失业人口中找到所需要的劳动力。那末, Q 的扩大必须快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导致足够的 I/Q 使之与 $S/Q = s_a = .13^{1/3}$ 相称? 如果每扩大 1 元的 Q 需要 K 扩大 $3^{1/3}$ 元,那末,我们的答案是: $W = .13^{1/3} / 3^{1/3} = .04$ 。 Q 的增长高于 $W = .04$ 会造成 $I/Q > .13^{1/3}$, 正象 Q 的增长低于 $.04$ 会造成 $I/Q < .13^{1/3}$ 一样。

有保证的增长率是一个古怪的概念。它并不告诉我们实际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仅仅告诉我们多大的增长率——如果通过人为的手段或由于运气而出现的话——会具有自己保证自己的性质。这种产量增长率 W , 如果以某 751 种方式得以实现并被维持住的话——会保证投资正好等于它自己收入的增

长所造成的自愿的储蓄。

周期和不稳定性。关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所牵涉到的周期性的不稳定性，我们应该说明两点。

1. 一旦所有的失业者均已全部就业，自然增长率 g 必然会成为一种最大的限度。这种最大限度很不幸地最终要和增长较快的有保证的增长率相撞。例如，每年为百分之四或五的 W 和每年仅为百分之三的 g 最终意味着哈罗德的有保证的经济扩展很快就达到充分就业。正如关于经济周期的第十四章所说，某些经济学者^①认为，经济制度碰撞到自然增长率下的最大就业量会被弹回来，他们根据这种看法建立了崩溃到萧条的理论。

2. 即使在最初能使有保证的增长率得以实现，它在受到干扰后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在哈罗德模型中，它必然是不稳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实际的增长率暂时超过 $W=4\%$ ，这一新收入所造成的投资将大于 $13\frac{1}{3}\%$ ($=4\% \times 3\frac{1}{3}$) 的应有的储蓄——从而加速增长率，使它进一步超过 W 。(读者自行说明：小于百分之四的最初的增长率会同样地造成相对于 $13\frac{1}{3}\%$ 的自愿储蓄而言的自愿投资的不足，从而降低增长率，使它进一步小于 W 。)

一辆无人骑的自行车，如果受到垂直方向的干扰，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但稳定性和补偿性的人类之手却可以把它转变成为一个稳定的体系。正和这种自行车一样，在自由放任之下，哈罗德—多马的增长道路是不稳定的，但在混合经济中补偿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却可以使它保持稳定。

§. 新古典学派的动态经济学

李嘉图—马克思—索洛的劳动和资本可以随意代替(即：用劳动来代替可供选择的许多不同种类的可以人工制造的资本品)的模型要比把资本—产量之比假设为不变常数的模型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概念具有较广程度的联系。然而，使用哈罗德—多马的概念来解释象第 37-2 图那样的新古典学派的模型是有益处的。

简单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成长模型”系指这样一种模型，在其中，国家使用货币政策来保证节俭不致导致失业，从而使节俭成为办不到的事情。这

① J. R. 希克斯：《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牛津大学出版社，费尔劳恩，新泽西州，1950 年)。该书概括性地介绍了这种根据加速数和乘数相互作用的原理而形成的非线性的经济周期理论。

种受管理的经济制度(也许通过采取非正统的为风险和不肯定性担保的信用政策)可以使人们在利息率和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获得资金和贷款,从而人为地造成前面描述过的那种资本深化。^①另一方面,可以认为这个新古典学派的模型描述了某种管理效率很高的集体主义社会的技术状况;而这一社会从来不会由于缺乏恰当的有效需求而面临宏观经济的失业或通货膨胀问题。

在这种社会中,由于任何从消费中削减出来的部分都可以变为资本形成,所以任何增长率在本质上都是“有保证的增长率”。其原因在于:(1)不存在储蓄和投资脱节的问题,(2)资本—产量之比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

这里有一个理想化的例子。把一批新增加的 L (劳动)放入具有一定数量的 K (资本)和在过去具有 Q (产量)的经济制度之中。人们可以以任何速度使这一批新 L 和原有的 K 发生作用。由此而造成的 Q 的增长率可以等于新增加的 L 所能生产出来的产量所决定的数值。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新的产量中拿出任何大小的部分来进行消费和投资。不论人们所愿意进行的资本形成成为多少,结果都会使 K 逐渐积累起来,而 K/L 之比可以任意变752大或变小,不会带来麻烦。

上述一切是与固定的资本—产量之比的模型迥然不同的,因为后者的 Q 的有保证的增长率 W 必须具有一个固定的数值。读者可以把上面一段的加着重号的字句和哈罗德的模型对照一下:

经济增长的三个来源。新古典学派的产量增长可以被分解成三个不同的来源:劳动(L)的增长,资本(K)的增长以及技术上的革新。据认为,如果暂时略去技术革新,那末,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的 L 加上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的 K ,会使产量每年也增长百分之一。(注意不要犯这样的错误:百分之一加上百分之一等于百分之二; L 和 K 在生产上是合作的,是相互为用的。)

① 这意味着可能的各不相同的使用资本品的方法是如此之多,以致任何微小的利息率的减少——甚至小到如从 $i=.08$ 到 $i=.079$ ——都可以使某种已知的新方法的应用成为有利可图的。例如,当 $i=.079$ 时,机床可以被制造得较为耐用一些。结果,第37-2(b)图的生产要素—价格边缘在肉眼看来是相当平滑的曲线,但用显微镜来看,它却是由微小的线段连接起来的。当我们把现实的不肯定性引入于模型之中时,我们起先可能认为,微小的利息率的变动只能造成微不足道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如果用概率来代替肯定性,投资函数的微小的线段会转变成为一条连续的曲线:得以长期维持的微小的 i 的变动会使某些可上可不上的投资项目成为实际执行的项目。关于可伸缩的资本总量的另一种解释,见J. E. 米德:《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成长模型》(牛津大学出版社,费尔劳恩,新泽西州,1961年)。

假设 L 每年增长百分之一，而 K 则为百分之五。这时人们往往会错误地认为， Q (产量) 的增长会因之而为每年百分之三，即：1 和 5 的简单平均数。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两种生产要素对产品所作的贡献的份额并不相等：一切产品的约为四分之三作为工资而属于劳动者的贡献，只有 Q 的四分之一作为利息—利润的份额而属于财产所有者。这意味着 L 增长率的权数是 K 的三倍，因此，正确的答案是： Q 将按照每年百分之二的比例增长 ($=3/4 \times 1\% + 1/4 \times 5\%$)。

因此，每年产量的增长遵守下面的规律：

$$\begin{aligned} Q \text{ 增长的百分比} &= 3/4 (L \text{ 增长的百分比}) \\ &+ 1/4 (K \text{ 增长的百分比}) \\ &+ T.C. (\text{技术变革}) \end{aligned}$$

在这里， $T.C.$ 代表移动第 37-2 图的 dd 曲线的生产率的技术变革；而生产要素的相对份额如果以后有所变动，那末， $3/4$ 和 $1/4$ 要被新的分数所代替。

如果我们试图解释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那末，事情还要更简单一些，因为这使我们能剔除掉作为增长来源之一的 L 。现在，根据资本获得产量的四分之一的份额这一事实，我们得到：

$$Q/L \text{ 增长的百分比} = 1/4 (K/L \text{ 增长的百分比}) + t.c. (\text{技术变革})$$

上述关系清楚地表明：如果不存在技术水平的提高，那末，资本深化如何会提高资本—产量之比：按人口平均的产量的增长率仅为按人口平均的资本的增长率的四分之一。这反映了收益递减的一个方面。

这一关系现在可以解释索洛的结论——历史统计数字所表明的产量增长似乎一半以上是科学进步造成的，而不是节俭和资本形成造成的。这意味着：如果用统计数字来衡量，上述关系式中的第二项——即按人口平均的技术变革 $t.c.$ ——似乎肯定应大于代表投资所造成的增长的第一项。当索洛试图把新技术往往体现在新资本品之中这一事实考虑在内时，第一项的相对重要性得以扩大；但是，它显然仍旧低于百分之五十。（虽然技术变革的头等重要性质似乎已经为德国和日本的统计数字所证实，但是，在英国、加拿大和俄国，资本要素还是较为重要的。）

§. 可供选择的理论

对于总量生产函数的否定。剑桥大学的 J. 鲁宾逊教授和 N. 卡尔多教

授怀疑,作为一个总量并且和劳动在一起生产总产量的“资本”是否可以有效地被衡量出来。这一怀疑肯定是有理由的。他们进一步怀疑,根据这种被认为是生产函数的东西而计算出来的边际生产率是否能被用来解释工资率和利润率以及劳动者和财产所有者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相对份额。他们又进一步怀疑:在现实的具有不肯定性和增长急剧变动的混合经济制度中,经济学者面对着大量的种类各不相同的资本品——A、B、C……类型的机器——是否能得到类似新古典学派所说的那种数字结果。^①

不同的意见。关于用什么来代替总量分析,鲁宾逊和卡尔多并未取得一 753
致意见。二者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倾向于一个具有下列性质的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理论:

我们所看到的是财产收入份额高和增长率高的经济制度。如果认为造成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富人(或任何其他入)的节俭,那是很错误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快速的增长造成高额的利润,而不是相反。^②

上述论点看来想要说明的比一般的说法具有较多的含意。一般的说法是:当象日本或西德那样的国家经受奇迹般的生产率的增长时,最易于出现的情况是把增加的收入节约起来并且尽量使实际工资落后于新增加的边际生产率。毫无疑问,这种引致的节俭确实能够加快资本形成并且(以新古典

① 水平较高的读者可以把上面列举的他们的著作和阐明新古典学派观点的高深的著作相对照,如 R. 多尔夫曼、P. A. 萨缪尔森和 R. 索洛合著:《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麦格劳-希尔公司,纽约,1958年)。后者所作的假设和我们在这里所作的一样——即: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大量种类各不相同的可供选择的机器和已知的(或可行的)技术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利息率稍微有所改变,譬如说,从·08变到·079(象前面所说的那样),采用稍为耐久一点的机器通常(但并不必然!)也是有利可图的。因此,正如上一个脚注所说的那样,第 37-2 (b) 图的 ff 曲线用肉眼看来几乎是一条平滑的曲线,但在显微镜下,它却是由微小的线段连接起来的。因此,不论对苏联、美国、印度或中国而论,简单化的 K 的说法都有助于人们了解较为符合现实的模型。

② 在长期的平衡增长中,鲁宾逊和卡尔多把 i 当作 g/s_p ; 在这里,从工资中取得的储蓄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而 s_p 为财产收入的平均储蓄倾向。这种关系来自下列恒等式中的括号中的部分的相等: $I = (\dot{I}/K)K = \langle g \rangle K = I = S = \langle s_p i \rangle K$ 。当利息率或利润率为已知时,如果你认为资本—产量之比 K/Q 保持不变,那末,你可以把财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计算为 $i(K/Q)$ 。事实上,他们说:“财产收入的份额会以某种方式自发地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以致能使有保证的增长率 W 与已知的自然增长率 g 相等。”但是,关于为什么如此,他们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学派的方式)使产量进一步增长,但是,这却是另外一回事。^①(第四十二章将进一步探索这些理论上的分歧在意识形态上的后果。)

整个生命过程的储蓄和财富—收入之比。麻省理工学院的 F. 莫迪格里安尼教授提出了一种与上述各种理论相当不同的理论。莫迪格里安尼并不认为资本—产量之比的固定不变仅仅是偶然的巧合。他不是从本章正文最后一个脚注所提到的生产技术或引致的技术革新这些方面来解释资本—产量之比的固定不变,而是从人们关于财富、消费、储蓄和负储蓄的心理上的决策来加以解释。他最强调的是人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为了年老退休而进行储蓄的型式。

这里有一个例子。某一成年人工作了 40 年,退休后生活了 20 年。为了使生活水平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大致保持不变,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少于他的收入。他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他退休前达到最高点,然后,退休期间的消费逐渐用掉他的资金和年金。在死亡的时候,他剩下很少的财富。〔当老年人动用年轻时的储蓄时,什么使得储蓄比例不致抵消为零?在整个生命过程的模型中,其原因为:(a)正数值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b)正数值的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的自然增长率,而这一增长来源于技术改良在生产率上的作用。〕

当人口增长的比例不变时,人口的年龄分布在不同的时期保持不变。这种稳定的人口增长,再加上实际收入的有把握的上升,使得一切年龄的人的平均财富水平和收入总额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除去公债和土地这种财富外,莫迪格里安尼为 K/Q 之比的不变提供了一个理由:

要想检验莫迪格里安尼的理论是否比卡尔多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家总会作出技术革新和投资的决策以便使 K/Q 之比大致保持不变)正确一些,其办法之一便是做这样的假设性试验,变动公债的数量,观察 K/Q 之比最终是否作出足够的变动以便使财富—收入之比大致不变。我们并不建议去做

① 卡尔多也提出了一个短期的分配论:当 I 在短期中由于外部的原因而下降时,卡尔多否认,这会造成 Q 和就业成倍下降(如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所示)。他认为,这反而会压低企业的需求,使得企业降低价格(相对于工资而言),一直到总利润 iK 下降到使 $s_p(iK)$ 和下降了的 I 相等时为止。鲁宾逊夫人不同意这一萨伊规律的和充分就业必然存在的新的说法,而大多数对于混合经济的利润的统计数字分析也不符合于这一说法。(关于卡尔多的 1955—1962 年的理论,本书在 1964 年的第六版有较多的论述。)

这一试验,然而,该试验确实可以再度提醒我们第十九章中的一个说法,即:公债可以增加目前的一代人的消费并且减少他们为了养老而进行的储蓄。

§. 补偿性的财政政策

假设货币政策——由于国际收支方面的限制、由于汉森发现的资本—产量之比的固定不变或由于其他造成失效的原因——当真不能有效地改变私人投资支出 I 。即使如此,补偿性的财政政策仍然会导致出与哈罗德—卡尔 754 多的简单自由放任模型相当不同的结果。

一旦 I/Q 之比不符合于充分就业的要求,政府可以形成足够大的预算盈余或赤字,以便改变社会的实际的 s (储蓄比例) 一直使它等于 I/Q 时为止。从而,可以使实际的“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任何事先规定的充分就业的自然增长率。

例如,在象 1972 年那样的年份,当 I/Q 趋于超过充分就业的 s 时,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是造成足够大的预算盈余: 提高税率以便降低人民的可支配收入和个人储蓄,以及减少政府对资源的使用和转移支付,或者,二者同时并举。这一盈余在事实上就是政府储蓄; 我们称它为 s_G 而把它和私人储蓄比例 s_{pr} 合并在一起来得到 $s = \text{平均的}(s_G, s_{pr})$ 。这就是说, s 会大到足够的程度,以便使它等于 I/Q ,从而没有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商情不振年份,相反方向的财政政策会发生补偿作用: 当 $I/Q < s_{pr}$ 时,预算赤字会造成政府的反储蓄(或负储蓄)。于是,在充分就业情况下, $I/Q = s$, 即 s_{pr} 和政府的负储蓄比例的平均数。

总之,自由放任条件下的哈罗德式的差额在正确管理的混合经济中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消除掉它的有害作用。

§. 扩大中的宇宙: 脱离正题的论述

已故的 J. V. 诺伊曼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数学家,曾经帮助制造了氢弹并且建立了博弈论。他描述了一个每一物品都能从其他物品中制造出来的经济模型。如果土地和劳动都不再是数量有限的稀缺物品,则收益递减规律便不会再发生作用。除去马匹、家兔、织布机和维持人类舒适生活的费用以外,一切生产成果都再投入生产更多的马匹、家兔、织布机和人。

在上述除了使用资本品以外都和斯密的黄金时代一样的模型中,存在着一个最大的平衡增长率,这一最大增长率——称它为 g , 因为它类似哈罗德

的自然增长率——正好等于利息率 i 。

对于象印度和美国那样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发展论往往以“平衡增长”的概念为先决条件,所以诺伊曼的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工业部门能以同样的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代价从农业部门得到无限人力供应的穷国而论,它的现实意义更大。只要工业部门能够生产出来的资本品和新添增的劳动者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者可以由于外债、援助和出口而得到进口方面的帮助,工业部门仅仅需要少量的土地便能“起飞”,并且每年按照诺伊曼的不变的百分比增长。

如果出现了技术变革,那末,该经济制度可以按照比诺伊曼比率还要快的速度增长。可以这样说,如果经济制度能够制造出新发明,使劳动按照稳定的百分比增加效率,那末,对一个外界的观察者来说,该制度似乎就可以按照比诺伊曼比率更快的速度增长。

一个简单的不断扩大的制度的例子是每投入一只兔子(或人)能繁殖出1.05只兔子的情况。这样,利息率和增长率显然为每期百分之五。其他的例子并不如此简单。

§. 里昂惕夫的部门间的投入—产出

瓦西里·里昂惕夫的重要的部门间的平衡表,实现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F. 魁奈在十八世纪时的美梦。魁奈首先设想出了《经济表》,即经济生活的循环流动。几十个国家——如法国、挪威、埃及、美国、英国、苏联和印度——都已经计算出投入—产出平衡表作为它们的国民收入数字的补充,也作为经济发展计划的可能的有用工具。^①

第37-2表使用农业和工业部门的例子极其简单地说明了政府和里昂惕夫为美国经济编制的包含数百个部门的表格。下面是它的中心思想。每一

① 关于理论和应用的进一步的论述,见W. 里昂惕夫:《美国经济的结构,1919—192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41年;该书第二版:《美国经济的结构,1919—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费尔劳恩,新泽西州,1951年)。或者见:W. 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费尔劳恩,新泽西州,1966年)。里昂惕夫为了使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在经验上可以衡量出来,不得不付出代价,他作出了这样的技术上的假设:假设一切生产要素的比例——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以及和总产量的比例——在生产技术上是固定的或是不变的。(在第二十七章的附录中,我们曾提出理由来怀疑:这种工程技术上的假设是否严格地符合于现实,然而,在这里,里昂惕夫对于固定系数在统计上的巧妙利用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部门在表中出现两次：作为产出量出现于横行，作为所需的投入量出现于竖行。此外，个人和家庭的最终消费被置于单独的竖行，而它们提供的劳动（或它们所提供的其他初级生产要素）被置于单独的横行。这些与个人和家庭有

第 37-2 表 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平衡表透视出经济结构

每部门均在横行和竖行中出现各一次：表的横行列出作为其他部门的投入或作为最终消费之用的每部门总产出量的分配。表的竖行表示为了得到总产出量而需要投入的物品数量。

表中的总产出量包括用作为中间物品的投入量。为了计算国民净产值而又避免双重计算，我们仅仅计入劳动和其他要素这一横行的数字（即计入“加入价值”）。另一种计算国民净产值的方法为仅仅计入个人和家庭的最终消费这一竖行的数字。（读者可以在画有横线的方格中填入正确的国民净产值的数字，并且用两种办法去检验它。）

关的数字构成国民收入或国民净产值，出现于表中的有关个人和家庭的横行和竖行之中。（在实际应用上，里昂惕夫也把政府、外贸、投资和其他具体数字包括在内。）

农业生产的总值被两个 \$1,200（单位：十亿元）的总额数字所表明：其中一个位于农业横行的右方，作为农业产量的去向的总和——作为工业部门的投入量的 \$800 加上作为直接为个人和家庭所消费掉的食物 \$400——其中另一个位于农业竖行的底部，作为农业为了购买投入的工业品而支付的 \$400 的成本（化肥等等）和为了购买投入的劳动（以及其他的有关劳务的项目）而支付的 \$800 的成本。

对于 \$1,600 的工业的总额数字，我们可以作出类似的解释。

该表也具有我们已经学习过的国民收入或国民净产值（也应该是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在我们的简单例子中忽略折旧的话）的数字。在没有政府和投资项目的情况下，国民净产值等于最终消费竖行的总和；另一方面，也等于劳务和其他生产要素横行的一切生产要素的成本或加入价值的总和。（国民净产值肯定不包括部门之间的中间性的购买数量；表中的 \$2,800 的数字肯定

冷战时期的部门间的流动		个人和家庭的最终消费	总额
	农业 工业		
农业	800	400	1,200
工业	400	1,200	1,600
劳动和其它生产要素	800	800	
总额 一切数字单位 均为 10 亿元	1,200	1,600	2,800

含有双重计算的数字。证明: 因为国民净产值 = \$1,600。)

投入—产出表不仅仅是一个过去历史的记录。里昂惕夫和经济计划人员如何使用它? 他们想用它来预测消费需求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例如, 假设第 37-2 表系指目前的冷战的情况; 在其中, 工业部门的就业量和产量大量地被用于生产军事物品。(为了使问题便于理解, 我们假设和平时期的物品, 或“黄油”主要来自农业部门, 而军事物品, 或“大炮”主要来自工业部门。)

现在, 假设“和平已经到来”。如果仍然想维持充分就业, 那末, 我们应该如何安排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 假设我们现在想使农业部门的最终消费量加倍, 即从原有的 \$400 变为 \$800, 正好补偿把工业部门的军用物品从 \$1,200 削减到 \$800。假设投入—产出的系数的数值是固定不变的, 里昂惕夫便能解出反映和平时期情况的各个线性方程并且表明和平时期的情况会如第 37-3 表所示。① 计算表明, 百分之十的劳动者必须从战争物品的

① 略去细枝末节不谈, 关键性的假设条件是: $400/1200 = 1/3$ 的农业部门的收入总是被用于购买投入生产的工业部门产品, 而剩下的 $800/1200 = 2/3$ 则被用于购买投入生产的劳动。同样的, $800/1600 = 1/2$ 的工业部门的收入总是被用于购买生产上所需要的农业部门的产品, 而剩下的 $1/2$ 则被用于购买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

下面简要地重复写出第 37-3 表的数字, 以便说明如何得到箭头右方的固定的投入—产出系数。

0	800	0	1/2
400	0	1/3	0
800	800	2/3	1/2
1,200	1,600	1	1

计划人员可以把该系数应用于其他情况。现在, 如果我们把两个部门的总产量分别称为 X_A 和 X_M , 而称它们的最终消费量为 C_A 和 C_M , 那末, 按照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 总产量具有下列的关系:

$$X_A = C_A + 1/2 X_M \quad X_M = C_M + 1/3 X_A$$

如果使用第 37-3 表的和平时期的数字, 这意味着:

$$X_A = 800 + 1/2 X_M \quad X_M = 800 + 1/3 X_A$$

使用简单的代数方法, 解出上述联立方程, 我们得到 $X_A = 1,440$, $X_M = 1,280$ 。根据这些数字并且使用投入—产出系数, 我们可以得到第 37-3 表上的一切数字。例如, 我们得到农业和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量顺次为:

$$L_A = 2/3 X_A = 960 \quad L_M = 1/2 X_M = 640$$

注意之点: 为了避免对联立方程求解, 里昂惕夫可以使用“乘数”方法。每生产一

生产转移到和平物品的生产。同样,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有助于计算出最终消费物品的改变所造成的影响。

第 37-3 表 投入—产出平衡表可以帮助国家制定计划

冷战的结束使大炮生产转移到黄油生产:农业部门的最终消费上升了\$4,000 亿;工业部门的最终消费下降了同样的数量。使用第 37-2 表的固定数值的投入—产出系数,里昂惕夫可以计算出本表中的总产量的应有的变动,从而,可以计算出劳动量的应有的转移以及中间产品的变动。同样的方法也有助于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和平时期的投入—产出平衡表			个人和家庭的最终消费	总额
	农业	工业		
农业		640	800	1,440
工业	480		800	1,280
劳动和其它生产要素	960	640	1,600	
总额 一切数字单位 均为 10 亿元	1,440	1,280		2,720

附录的总结和复习

757

1. 熊彼特所强调的技术革新以及随后而来的竞争所造成的利润的消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

2. 如果资本—产量之比(K/Q)是一个不变的常数,那末,扩展性的货币

单位的工业品需要投入 $1/2$ 单位的农产品,而每生产一单位的农产品又需要投入 $1/3$ 单位的工业品;从而,每生产一单位的工业品间接地需要 $1/2 \times 1/3 = 1/6$ 的额外的工业品。因此, $[1 + 1/6 + (1/6)^2 + \dots]$ 其总和为 1.2 , 即为每生产一单位的最终消费的工业品而需要生产的新的工业品的总量。同样,里昂惕夫也可以计算农业的乘数,表明为什么每增加一亿元的最终消费要求自己的总产量增加 1.2 (仅仅是由于偶然的巧合) 亿元。为了计算把 $4,000$ 亿元的最终消费从大炮改变到黄油所造成的后果,里昂惕夫必须知道,每增加一单位最终消费的工业品所导致的 1.2 单位总产量的增加需要多少农产品总量和劳动量。答案是不难求得的: 根据第二竖行的工业部门的投入—产出系数可以计算出答案——两个数值均为 1.2 的 $1/2$, 即 $.6$ 。读者现在应该可以证明: 当每增加一单位的最终消费的农产品要求本部门的总产量增加 1.2 时, 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和劳动量分别为 $1/3(1.2) = .4$ 和 $2/3(1.2) = .8$ 。已知本段中计算出的“本部门的乘数”和“泛部门的乘数”——所谓“逆矩阵”——我们可以看出,里昂惕夫如何把它们应用于 $+400$ 的农产品最终消费和 -400 的工业品的最终消费的变动, 以便得出所需要的数字来把冷战时期的第 37-2 表转换成为和平时期的第 37-3 表。

政策不能造成新古典学派的资本深化。

3. 哈罗德—多马的“自然增长率” g 的概念取决于人口增长和技术变革。如果 K 和 Q 均按照这个增长率平衡地增长,那末,自愿的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根据哈罗德的条件, $s=g(K/Q)$,而被计算出来。〔如果实际的储蓄比例 S/Q 超过哈罗德条件所规定的 s ,那末,有保证的增长率将高于自然增长率。在这种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的关系是: $W=s_a/(K/Q)$ 。一旦偏离有保证的增长率,它不会趋于恢复原有的数值。当 $W>g$ 时,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大最终会碰到 g 所规定的上限。值得庆幸的是:财政赤字和盈余可以被用来消除 W 与 g 之间的任何差异。〕

4. 当新古典学派的资本深化使得 K/Q 成为一个具有适应性的变数时,哈罗德条件便不再构成严重的问题。不论人们的节俭程度所规定的充分就业条件下的 s 为多少,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都有希望引致所需的与 s 相适应的投资。这种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加速资本形成以及新设备中所含有的和起源于新设备的技术变革。它们可以帮助经济制度按照比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还要快的速度增长。它们能够稳定可以达到的发展速度,从而,经济制度可以保证做到充分利用一切机会。但是,即使在新古典学派所假设的 K/Q 之比可以变动的技术条件之下,自由放任也不会——如果没有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话——由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而达到上述的理想状态。

5. 新古典学派的模型可以把 Q 的增长来源区分为来自较多的 L 、较多的 K 和技术变革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的因素通过教育和训练而和 L 相互发生作用并且通过新机器而和 K 相互发生作用。而且,从历史上看,技术变革对于先进国家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6. 鲁宾逊和卡尔多都怀疑所谓“资本”总量的概念并且怀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深化是否能顺利进行;二者也都企图寻求决定利润份额的动态的增长。(第四十二章还将论述这一点。)

7. 在学术上,使用“偶然的巧合”或收益递减和技术改变这二种相反倾向的偶然的抵消来解释某些不变的长期趋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赞赏为了解释不变的长期趋向而作出的尝试(引致的发明、整个生命时期的储蓄等等)。然而,如果象本书的作者那样,读者也认为:在将来, K/Q 之比可能下降或上升、工资率可能逐渐上升、或者利润率可能跌落或高涨,那末,读者就应该对“过份的解释”保持警惕。如果某件事真是偶然的巧合,那末,说

它就是如此并不算提供了多少解释。然而,如果胡乱解释,硬把实际上是偶然巧合的事说成是经常发生的事,那就不仅是信口胡说的问题了,而是科学上的犯罪。

8. 里昂惕夫的部门间平衡表非常有用地描述了国民净产值数字后面的各种关系。假设投入—产出系数固定不变,计划人员可以使用里昂惕夫的方法来计算由战争时期转移到和平时期的消费型式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完成任何其他发展指标所应有的计划。

第三十八章 经济成长和发展的问題

我相信唯物主义。我相信健全的唯物主义的一切成果——好的伙食、干燥的住宅、干净脚、下水道、排水管、热水管、卫生设备、电灯、汽车、良好的道路、明亮的街道、远离工作的长期休假、新思想、骏马、畅谈、戏剧、歌剧、交响乐队、流行乐队——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它们。没有尝到这些东西的滋味而死去的人可能象圣人那样的优雅，象诗人那样的精神丰富，但是，那是由于没有这些东西他们也能如此，而不是没有这些东西使得他们如此。

弗朗西斯·哈克特

爱尔兰

我几乎羡慕中国，因为它仍然处于汽车出现前的走路、骑自行车和呼吸新鲜空气的阶段。

保罗·达德利·怀特医生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已经学到的所有经济学原理来探索今后二十五年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①世界人口约为四十亿，而目前其中有一半人处于饥饿之中——即使没有饿肚子，营养也肯定是跟不上的。只有那些曾经每天靠热量不足1,500卡的食物生存而企图维持正常生活的人才知道：为

① 关于这一主题，三本有用的论文选为：T. 摩根、G. 贝兹和 N. K. 考特莱：《经济发展文选》（沃兹沃思出版公司，贝尔蒙特，加利福尼亚州，1963年）；A. N. 阿札瓦拉和 S. P. 辛：《不发达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费尔劳恩，新泽西州，1960年）；B. 奥肯和 R. W. 理查森：《经济发展研究》（霍尔特公司，纽约，1961年）。P. 巴伦：《成长的政治经济学》（每月评论出版社，纽约，1957年），该书强调了经济成长过程中对殖民地的剥削的作用。

什么食物是梦寐以求而且是在醒着的时候时刻想着的东西。

为了良心，我们必须提供援助。此外，历史也告诉我们：人并不总是一声不响地饿死的。

§. 不发达的定义

人们曾经使用“落后”国家这一名词。这自然使那些地区的人感到不快。为了避免使人感到不快，联合国有时使用“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模糊的名词。今天，大多数人使用“不发达”国家这一名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词的定义有很多，其中大多数似乎包含下面的意思：

不发达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其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远远低于目前某些国家，如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一般西欧国家。人们乐观地认为，不发达国家是能够大幅度提高其收入水平的。

当然，在不尽完善、从而还可以进一步改进的意义上，每个国家都是不发达的。根据大多数定义，即使现在的所谓“先进”国家，过去也曾经是不发达的，也经历过发展过程。第 38-1 表说明了不 760 同国家目前所处的相对发展阶段。

世界上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高度发达的 A 组国家，这类国家按人口平均的收入高于 \$3,500 (以 1976 年美元计)。稍多于八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水平的 B 组国家。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不发达的 C 组国家。

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现在属于高度发达的 A 组，但却刚刚合格。至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它们属于何组？回想中国的大量人口，共产党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二属于最低的 C 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到处存在的现实问题；不仅对西

方,对东方而言,也是如此。

§. 不发达经济的特点

为了对照说明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的差别,设想你是某一不发达国家普普通通的年满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不论是否居于海地、印度、尼日利亚、肯尼亚或孟加拉。

你很穷。即使从宽估计你所生产和消费的物品,你的年平均收入也只有\$300,而在北美洲,这个数字则为\$7,000。当你想到世界上的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平均得到高于\$2,000的收入时,你也许会感到舒服一些。在你们当中,每四个人中只有一个识字,其余三个象你那样是文盲。你们的平均寿命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寿命的三分之二:你的一个或两个兄弟姐妹已经夭折。虽然你的母亲比你母亲的母亲生的孩子要少,但是,由于医疗技术的进口,较多的孩子得以长大成人,你必须为了生存和他们相竞争。

你的大部分同胞在农村劳动;只有少数人从粮食生产中解放了出来,从事工厂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你们每人分摊到的机器马力是富裕的北美洲人的六分之一。你懂得的科学很少,知道的传说很多。你的耕作方法和工具都很原始。不论是市场规律还是计划委员会的经过考虑的计划,对你说来都没有什么意义。作为亚、非、拉的较为贫穷地区的一个公民,你和你的同胞构成百分之六十的世界人口,但却仅仅分享百分之十二的世界收入。你闷闷不乐地想到,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六的美国享有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收入,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十二的其他先进的非共产党国家消费掉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把各国和地区划分成为不同的组

A. 高度发达	塞浦路斯	利比里亚	洪都拉斯
澳大利亚	希腊	马达加斯加	尼加拉瓜
比利时	香港	马拉维	巴拉圭
加拿大	匈牙利	马里	秘鲁
捷克斯洛伐克	爱尔兰	毛里求斯	亚洲:
丹麦	牙买加	摩洛哥	阿富汗
芬兰	黎巴嫩	莫桑比克	缅甸
法国	利比亚	尼日尔	柬埔寨
德国(民主共和国)	马耳他	尼日利亚	中国
德国(联邦共和国)	墨西哥	卢旺达	斐济
冰岛	巴拿马	塞内加尔	印度
以色列	波兰	塞拉利昂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葡萄牙	索马里	伊朗
日本	罗马尼亚	南罗得西亚	伊拉克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苏丹	约旦
卢森堡	新加坡	坦桑尼亚	朝鲜(北)
荷兰	南非	汤加	朝鲜(南)
新西兰	西班牙	突尼斯	老挝
挪威	乌拉圭	乌干达	马来西亚
波多黎各	委内瑞拉	阿联(埃及)	尼泊尔
瑞典	南斯拉夫	上沃尔特	巴基斯坦
瑞士	C. 不发达	扎伊尔	菲律宾
苏联	非洲:	赞比亚	斯里兰卡
英国	阿尔及利亚	美洲:	叙利亚
美国	安哥拉	玻利维亚	台湾
	喀麦隆	巴西	泰国
	乍得	英属西印度群岛	土耳其
B. 中等水平	刚果	哥伦比亚	越南(北)
阿根廷	达荷美	多米尼加共和国	越南(南)
奥地利	埃塞俄比亚	厄瓜多尔	也门
保加利亚	加纳	萨尔瓦多	欧洲:
智利	几内亚	危地马拉	阿尔巴尼亚
哥斯达黎加	象牙海岸	圭亚那	
古巴	肯尼亚	海地	

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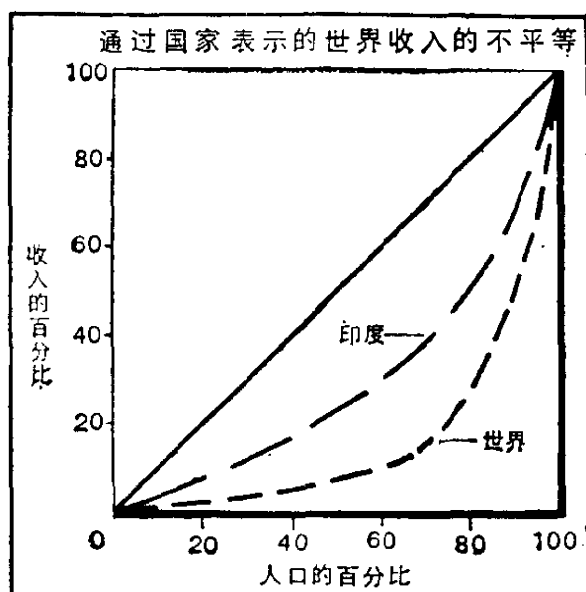
第 38-1 表 大多数国家处于较不发达的类别

(资料来源: 联合国; 国际研究中心, 麻省理工大学; 作者把资料计算到 1976 年。)

§. 问题的紧迫性

穷与富的差别一向存在。为什么特别担心不发达国家呢？下面是其中一些理由。

762 差距的扩大。在先进国家之间,收入的差别正在逐渐缩小,而与此相反,在先进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现在很可能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自从 1950 年以来,美国和西欧的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增加了一倍。许多专家认为,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不发达国家,生活水平自那时以来则没有提高这么多,在某些地区,甚至可能有所下降。



第 38-1 图 各国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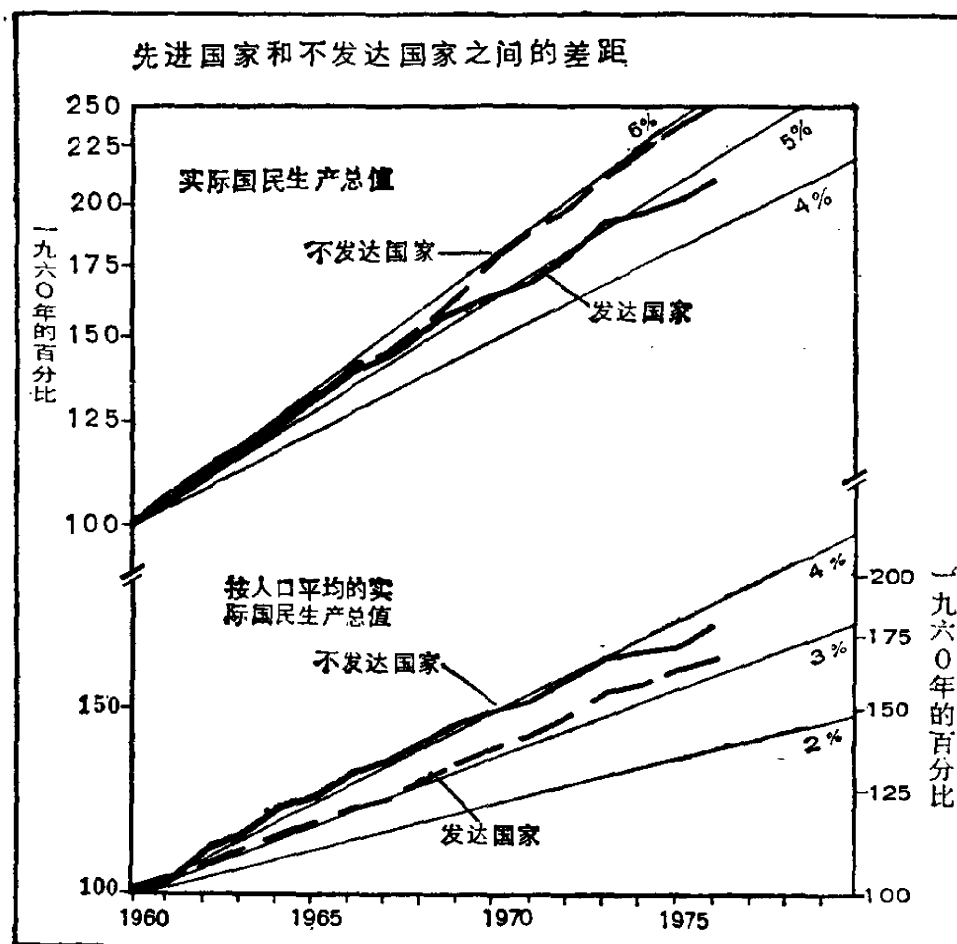
最贫穷的那一半国家仅仅得到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八。生活在先进的共产党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享有世界总收入的大约百分之十八;生活在不发达的共产党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他们仅得到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其按人口的平均收入仅为其他不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

请比较本图的世界不平等曲线和印度的洛伦茨曲线,以及第五章中表明瑞典、美国和斯里兰卡国内的不平等的洛伦茨曲线。(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美国国务院。)

第 38-1 图从地理上说明了实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比较该图和第 5-2、第 5-3、第 5-4 以及第 9-1 图可以看到,在某一国家内部,不论是不发达国家还是先进国家,其不平等程度要小于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最富有的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断扩大的差距,主要是

由前者的较快的实际增长率所造成;因为一般说来,穷国目前的增长速度并不比过去慢,也并不比富国当初的发展速度慢。第 38-2 图说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



第 38-2 图 富国与穷国的经济均在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

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如上半图的左方纵轴的对数数值所示,均被大量的人口增长所消耗掉。结果,不发达国家的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增长(这种收入增长是不发达国家所最需要的)远远落后于后凯恩斯时期实行混合经济的国家。对于某些长期遭受坏收成的不发达国家,如孟加拉国和撒哈拉大沙漠附近的国家而言,本图所表明的情况比它们的实际情况要好一些。(资料来源:国际开发署有关非共产党国家的数字,经过计算而得到最近的数字。)

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在目前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意

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双方都把不发达地区看作是可以实行混合经济制度、也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地带。革命者自然要在“第三世界”进行鼓动。他们肯定要宣扬不发达地区的贫穷，把那里的贫穷和我们的财富相对比，用“殖民主义”的真正的和幻想的罪恶来提醒那里的人们。古巴是一个就近的例子。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则有更多的例子。

经验告诉我们，不能随意得出结论，认为“只要把人们的肚子填饱，他们就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处境十分悲惨的人往往没有力量造反；过去的巨大革命（如法国和俄国革命）往往发生在已经取得某些经济进步的时期。

763 然而，不重视经济发展问题必然招致祸害。哈佛大学的卓越的经济史学家 A. 苟申科，从历史中得出了以下重要的教训。^①

苏维埃政权可以正确地被说成是该国经济落后的产物。如果卡捷琳娜二世在 1825 年废除了农奴制或……那末，农奴的不满，即俄国革命的动力和成功的势头，永远不会达到灾难性的规模，从而该国的经济会以缓和得多的方式发展。……俄国被推迟的工业革命是其政治革命的原因，而在那次政治革命中，权力落入了从长期来看最终会受到绝大多数人民反对的独裁政府手中。……二十世纪的重要教训是：落后国家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落后国家自己的问题。它们也同样是先进国家的问题。为了未能把俄国农奴解放出来并且较早地执行工业化的政策，支付代价的不仅是俄国，而是整个世界。先进的国家不能忽视经济落后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论点，请看第 38-1 表中先进国家的情况。你找不出任何一个当其经济繁荣时革命在那里取得成功的民主政体。

764 企望和“示范作用”。在不发达国家中，目前人民敏锐地感觉

^① A. 苟申科：《从历史上看经济落后》（维尔纳普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2 年），第 28—30 页。

到他们的贫穷以及他们的贫穷与富裕地区的差距。他们厌恶这一切。不仅如此,他们还力图设法改变这一切。

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皇帝写信给英国女王,说他的国家既不需要,也不企求经济上的改善。看看今天中国不屈不挠的努力,就会知道情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根据古老的公式,

$$\text{快乐} = \frac{\text{物质消费}}{\text{欲望}}$$

富裕的西方人不难按照索洛的教导而鼓吹尽量减小分母以便得到最大的快乐。然而,在贫穷的国家中,人们则日益为甚地坚持要增大分子,即增加实际物质收入。

现代通讯工具是如此地接近于完善,以致每一地区的人民都知道——而且往往羡慕——现代西方生活的舒适。他们不再耸耸肩膀而把他们的相对贫穷看作是上帝的神圣意旨。更重要的是:这种日益为甚的觉醒是在政府的作用高度发展的时候到来的。

今天,当人们想达到某种目的时,他们很可能求助于政府,要它实施达到意想目标的计划。他们想缩短历史的进程,马上得到发达国家不久前才得到的东西。

他们要求提高健康水平,进行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改进耕作方法,实现工业化以及人人享有政治权利。不难看出,人们要求得到这些东西,是出于本能的个人主义的动机。但是,经济福利并不是人们要求经济发展的唯一理由。现在人们也为了民族主义的理由而要求发展经济:人们要求他们的国家富强,受到尊重以及——坦率地说——令人畏惧。例如,英国人和荷兰人可能把卫生设备带到了他们过去的殖民地,从而可能延长了那里人民的寿命,增加了他们的物质福利。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建立了排他性的俱乐部,把当地人排斥在大门以外。“不受人轻

视”是亚洲人表达他们目标的方式之一。

§. 肤浅的发展理论

地理。第 38-1 表告诉我们：所有先进国家都处于温带。处于热带的每一个国家都是贫穷的。因此，人们一度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气候。

这种笼统的解释并不符合事实。最早期的文明出现于近东和地中海地区（或者也可以认为出现于中美洲的玛雅地区）。当日耳曼人和撒克逊人还在猎取野猪时，希腊已处于鼎盛时期了。

毫无疑问，气候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却不是压倒一切的重要。没有热带的酷暑和来自丛林洪水的侵蚀有助于发展。没有寒带的大雪也有助于发展。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之一是滴滴涕可以消除热病。奥斯陆和牛津的严寒可以为取暖设备所补偿；得克萨斯州的湿热不再妨碍身心的活动。

765 自然资源——优质土地、降雨量、水力资源、石油和矿藏——的地理分布固然重要，但在一个贸易越来越发达的世界上，这方面的严重不足至少可以部分地得到补偿，正如丹麦、日本、罗得岛和以色列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

种族。① 向先进的国家掷一块石头，你所碰伤的皮肤很可能是白种人的。因此，据说富裕不过是种族问题。

迄今还没有人能在白种人与生产率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埃及、希腊、印度和罗马文明的先驱者一般头发并不黄，个子也不高。毫无疑问，本世纪近十年中最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发生在日本。关于如何把人类划分为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或其他种类，人类学者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① 关于种族歧视经济学的较为广泛详尽的分析，见第三十九章。

看一下历史——埃塞俄比亚和柏柏尔文化、古代中国、原始的西北欧洲以及光辉灿烂的近东文化——便可知道：形成这些文化的因素是很多的，不能把种族这一因素与其他因素割裂出来，把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居住在自己国内的中国人总是被认为缺乏从事企业的精神。然而，细胞中具有同样遗传因子的他们的后代在马来亚和东南亚却受到指控，认为他们太擅长经营企业了。

风俗与文化。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或柯立芝时代的美国接近于任何文化所能达到的那种商业文化的程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一本赞扬耶稣算账才能的传记曾畅销一时。于是，某些人据此而大胆设想，一国想要富裕起来，其人民必须象古典学派教科书中所说的经济人那样行事。（日本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词：当他们谈到他们在最近几十年取得的工业奇迹时，他们把自己称作“经济动物”。）

这种经济人的观点象一幅漫画。它含有一些真理，但却掩盖了更重要的真理。

物质的进步确实取决于用科学技术对因果关系的辨别和对科学技术的信仰来取代对魔法和迷信的信仰。如果一国的传统是厌恶体力劳动或任何形式的劳动，如果它的人民看重死后的、而不是现存的世界，如果他们轻视物质上的富裕，如果他们不尊重与别人履行契约时应有的诚实态度，如果他们的生活方式特别着重目前的消费，而不为将来着想，如果他们的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并且缺乏效率，如果各阶级之间在分配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斗争——所有这一切文化特点当然不是特别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强调非经济因素并没有解释问题，而是提出了新的问题。在

许多国家中，为什么本来可以从事商业的头脑反而在科学或宗教领域发挥了才能？为什么那些强调墨西哥的风俗很难改变的人类学者作出了错误的预测，认为重视金钱的心理不易在那里扎根？

我们不应该仅仅由于新的解释被证实为肤浅、甚至错误，而把它完全否定。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它的肤浅和错误之处。M. 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观”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恰当的例子，他认为信奉新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和后果。这一论点确实符合某些事实：许多先进国家都是信奉新教的国家。约翰·卡尔文以及某些信奉新教的神学家确实打破了天主教反对利息的古老法规。老约翰·D·洛克菲勒既是一个贪婪的追求最大利润的人，也是一个热忱的浸礼会教友。他把他的赢利称之为“上帝的黄金”。然而，韦伯的论点也有许多重要的例外。

意大利北部和天主教盛行的莱茵河地区发展较早。虽然在十八世纪日本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和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观完全相似的说法，但犹太人、中国人和巴斯克人在许多地方却象外籍先驱者那样擅于经营企业。尽管韦伯当真把 B. 富兰克林——典型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孜孜以求的商人——看作是另一个注重物质利益的新教徒，但此人的传记作者却告诉我们，这位宗教态度并不严肃的自然神论者只是徒有新教徒的虚名。现在对德国城市中新教和天主教居民区所作的统计研究表明，正确的统计数字不能证实韦伯论点，而当初韦伯提出他的论点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统计数字为根据的。

韦伯的论点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是否正确，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只是设想一下，如果三十年前相信其基本论点的人进行预测的话，会犯多么大的错误。自从 1950 年以来，取得最大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台湾、朝鲜、新加坡、香港、波多黎谷、墨西哥、巴西、泰国、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意大利、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西德、以色列、奥地利和信奉无神论的苏联。而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相比之下则没有获得那么迅速的发展。

所有这一切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加以证明。

§. 描述经济发展的最新概念

经济学者对经济发展问题发生浓厚兴趣，迄今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了。虽然他们并未能形成不同于第三十七章所介绍的基本成长模型的统一理论，但他们给这类模型增添了一些新特点。

下面简要的论述，概括了最新的文献中提出的最重要的见解。这一论述将为系统而深入地分析决定生产的各种经济因素铺平道路。这些因素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以人时来计算其数量，以技术、训练和努力程度来衡量其质量)、资本形成(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以及技术知识和技术变革。本章的结尾概略地论述现代经济发展计划。

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人类的历史是漫长的，而经济发展则是例外，这主要是最近几个世纪的西方历史造成的。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生命是短促、讨厌和野蛮的。存在着马尔萨斯的残酷的均衡状态；在其中，死亡数与出生数相等。

在几处幸运的地方，战争逐渐减少。先进的生产方法被应用于充足的资源。这时除了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产品之外，出现了多余产品。在通常的情况下，在封建地主和广大人民之间的财富分配是极其不平等的，从而富有者可以节约消费，用储蓄形成资本。于是，经济具备了发展的条件。

起飞。历史学者研究的事实越多，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经济成长过程似乎越具有渐进的和演化的特点。然而，革命总是比演化具有较多的戏剧色彩和新闻价值。因此，许多经济学者喜欢使用“起飞”、“跃进”和“巨大的推动”等名词来描绘加速成长的时期。767

例如,W. 罗斯托^①提出了有别于上一章论述的马克思和其他学者的经济成长阶段。他的阶段之一便是“起飞”,这显然是拿飞机作比喻,因为飞机只有达到某一临界速度才能飞行。

我们并不想在这里象别人那样企图寻找各国起飞的时间:英国在十八世纪、日本在十九世纪晚期、刚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也不打算象莎士比亚把人的生命划分为各个时期那样,把各国的发展划分为若干阶段。我们不讨论严格的时间顺序,而强调起飞所揭示出来的重要的经济原理。

收益递增、社会分摊资本和外部经济效果。第三十七章的成长模型在很大的程度上系以传统的收益递减的经济原理为前提——该原理系指把劳动量的静态的变动应用于相对固定的土地,或指资本品数量的变动应用于变动较为缓慢的劳动量。这种传统的生产模型的假设条件为:在一般情况下,把所有生产要素均增加一倍会使总产量正好增加一倍——这就是所谓“收益按规模固定不变”原理,根据这一原理,人们推断出:变动某一生产要素会使收益递减。

然而,在动态的经济发展中,却会出现“收益递增”的现象。斯密的《国富论》在当时是一本经济发展手册。斯密强调大规模的分工的有利之处。这是整体大于各个分量之和的事例:如果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增加其数量,则产品增长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的增长比例。原始状态的单一地区不可能发展到有效率的规模。一堆浓缩铀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便会突然具有放射性。同样,收益递增可能在经济发展上造成惊人的跃进和加速增长。(正如我们在第三

^① W. W.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剑桥大学出版社,纽约,1960年)。关于 S. 库兹涅茨对罗斯托的论点的强烈批评,见 P. A. 萨缪尔森:《经济学选读》(麦格劳-希尔公司,纽约,1973年,第7版)。

编中所看到的那样，收益递增的很多领域不能听任竞争的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在这里，应该有协同的方案来避免垄断或把它导入最优的型式。）

麻省理工学院的 P. 罗森斯坦-罗丹在三十年以前曾经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与此有关的现象。他认为“社会分摊资本”是极其重要的。要想获得发展，私有制经济必须拥有公共的道路、铁路、灌溉系统和堤坝、消灭疟蚊的公共保健事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牵涉到不可分割的收益递增的庞大规模。在出现市场以前，没有任何小厂商或家庭能有利地从事这些事业，也没有任何私人企业的先驱者希望从中牟利。这些事业的利益遍及整个社会。因此，有人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公共方面和私人方面的责任从一开始就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第八章和第二十四章所说的那样，表达同一意思的另一方式是：

在经济发展中，往往存在着强烈的“外部经济效果”。一个县的农业技术人员可以使该地区所有的农民同时得到好处。铁路可以使一切行业受惠。多用途的堤坝具有类似的外部经济效果。很明显，我们可以找到不牵涉到收益递增的外部经济效果的例子，也可以找到不牵涉到社会分摊资本或外部经济效果的收益递增的例子。但是，肯定存在的事实是：在这三个概念——外部经济效果、收益递增、社会分摊资本——之间，往往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 平衡增长和工业化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人们往往着迷于平衡增长。我们都不愿意头盖骨比头皮长得快。按照相同的道理，人们争辩道：鞋厂要和袜子厂与啤酒厂一同增长，如果人们所要求的较高的生活水

平包括鞋、袜子和啤酒的话。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恩格斯的预算规律（参看第十一章的第11-1图）会对消费的增长施加某些限制。食品会增长，但不与奢侈品保持相同步伐。尽管强调平衡增长，C. 克拉克和其他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发展按照三个阶段行进的明显倾向：第一阶段农业占首要地位，然后为工业占首要地位，而最后，当我们都富裕起来时，则是服务业占首要地位。在过去较为自由的企业制度下，供给和需求自发地造成这种型式。

对于某一发展中的地区而言，经济增长是否必须或应该保持平衡？历史提供了否定的答案：

美国最初通过专业化于农产品出口而得以发展。比利时在发展的早期专业化于玻璃和毛织品生产。第三十四、三十五章所论述的整个比较有利条件论告诉我们，在某一区域内，经济最好不要平衡增长。

这确实提醒我们第三十五章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否存在着“幼年工业”和“年轻经济”的论点，可以被用来正确地批评某一国家过分专业化于几种相对有利的易受影响的行业。如果咖啡的供给和需求变动很大，如果将来的比较有利条件又属于某几种工业，那末，象巴西那样的国家就应该干预专业化于咖啡生产的市场倾向。经过慎重考虑的多样化与真正的平衡增长并不是一回事。

工业化与农业。新西兰、丹麦、荷兰、衣阿华州和阿根廷均为农业生产率并不比工业生产率相差太多的区域。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在大多数地区，城市中的收入几乎为农村的两倍。在富裕的国家，全部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之于工业。因此，许多国家匆促地作出结论，认为工业化是富裕的原因而不是其后果。

我们不能轻信这种推论。正如俗语所说：“富人抽昂贵的雪茄烟，但去购买昂贵的雪茄并不使你成为富人。”虚荣似乎使每一国家需要(1)民航公司和(2)钢铁厂。对目前和将来的比较有利条件的分析表明：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这些都是供装饰用的奢侈品。

上一世纪生产率提高最多的是工业而非农业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回想第二十一章关于农业的论述。)如果孟加拉国的五年计划可以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二十，那会比单纯依靠发展工业腾挪出更多的资源来生产生活用品。

769

本节所说明的论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们在政治性辩论中往往受到忽视。在离开本节主题以前，我们应该指出实现工业化以便加速经济发展这一论点所包含的真理的内核。

城市和工厂生活有利于打破风俗习惯的束缚。人们在密切的接触中可以相互激励。因此，从长期来看，资助工业很可能有利于技术变革。此外，农村往往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因为农村家庭的某些成员可以搬迁到城市，或在农闲季节转入地方工业工作而不对农业产量造成很大的损失。

§. 对资本的需要和有效率的资源分配

为了打破贫穷和不发达的恶性循环，必须要有资本形成。然而，处于饥饿中的农民不会对将来想得很多。在过去的时代中，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很可能帮助解决了社会的节俭问题，然而却是以残酷的方式解决的。象中国、北朝鲜和俄国那样的集体经济已经表明：通过行政命令，它们可以对现有的消费施加同样残酷的限制。

为什么自由经济不能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它们不能用本书所论述的财政措施来减少消费和刺激投资？重要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某些发达国家可以征收累进的所得税而得到税款。但在世界

许多国家，这很可能是办不到的。税务管理部门处于原始状态而且缺乏效率。人民根本不予以合作。当贫穷严重到使官员们贪污时，事情就更难办了。

为了代替赋税和强制手段，许多经济学者（如 H. 拉伊本斯坦）建议：对于肯定会大量投资的团体或公司，应该优待给它们带来收入的项目。他们认为，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会实际造成目前效率的降低，也应该采用这种做法。

资源具有或不具有价格的计划。1929 年以后，苏联制订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今天的大多数国家，包括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的国家，都制订有类似的发展计划。这些计划规定数量目标。计划制订者考察可供选择的各种目标的现实性和是否协调，然后进行比较。最后经过斟酌，制订出一系列总量指标。

这些指标既可以规定得很粗略，也可以规定得很详尽。例如，印度在制订计划时要考虑劳动力人数的增长、国内资本的增长以及它从美国和苏联进口的资本数量。它提出它所需要的堤坝和电力、化肥和钢铁厂以及机器，等等。最后，必须挑选出优先的项目，否则，对于经济的需求会过大，从而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造成大量的进口开支，以致外汇缺乏，不得不使货币贬值或实行严格的进口许可证制度来大力限制进口。

这种计划的很大一部分会以具体的实物数字来表示。然而比这大得多的一部分必须用以卢比代表的价值来表示。更重要的是，计划人员往往发现，市场价格并不真正反映物品在国内的稀缺程度。例如在印度，如果人们得不到工资，就会饿死。然而，在许多方面，劳动力是特别丰富的，因而应该看作是几乎可以自由取用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资本品则非常稀缺，使用拖拉机的代价为使用人力的五十倍，我们也许可以从这里看出拖拉机的稀缺性和

高额的生产率。因此,某些老练的计划工作者(如荷兰著名经济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J. 丁伯根)主张对劳动、资本和进口货采用经过矫正的“影子价格”或“帐面价格”,以便进行较为合理的评价并更合理地分配稀缺性资源。这样,可以使经济以最快的速度增长。

资本-产量之比和审查投资项目。穷国人口众多,资本短缺。因此,人们劝告穷国尽量少搞极端耐久和非常迂回的资本项目,劝告穷国尽量从事资本-产量之比较低的活动。

这一劝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用第四编论述的投资概念来表示的话,它会更正确。应计算出每一计划项目年收益的百分比:只有这样,才能看出年收益为百分之二十的水力发电项目应优先于寿命较短的年收益仅为百分之五的火力发电项目——即使从表面上看,火力发电的资本-产量之比似乎要低一些。^①

上面我们论述了不发达的一般问题,并且概述了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一些概念。现在,我们可以仔细地分析四个经济要素:(1)人口、(2)自然资源、(3)资本形成和(4)技术。

§. 人口问题

仅仅增加人口数量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发展。正如马尔萨斯以来的经济学者所警告的那样,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很可能会使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从而妨碍按人口平均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会造成问题。例如,我们看到,许多不发达国家正在重演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历史:医疗技术的改善(例如,卫生条件以及在我们的

^① 当专家们从资本-产量之比转移到“边际的资本产量之比”时,他们符合于经济学者的正确的计算收益的程序。还有,如果资本在二十年以后不象现在这样缺乏——从而,社会为投资项目计算的正确的利息率在头十年中为百分之三十,而在后十年中为百分之十八——那末,有关计划的计算应把这一点考虑在内。

时代,廉价的杀虫剂)最初减少死亡率;而与此同时,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人口迅速增长。

萨尔瓦多、爪哇以及许多其他例子说明两个教训。

第一,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产量增长的很大部分会消耗于单纯的人口增长。

771 第二,征服疾病快于增加食物的现代科学将来可以使人类不致死于细菌,但人类却会由于食物的不足而受到饿死的威胁。

人口学者提出的严重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将来会象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那样下降吗?会在生活水平下降以前下降吗?

由于现在人们都不想要太多孩子,口服避孕药、避孕环、绝育手术、安全期避孕法以及其他一些节制生育的办法确实已经开始在穷国降低出生率。当你的大多数子女夭折时,你便需要生很多孩子来传宗接代。一旦医药科学降低了死亡率,世界各地的人们便都对避免生第四和第五个孩子感到兴趣——最后,甚至会避免生第三个孩子。

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由于劳动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在劳动力方面有许多建设性的工作等待着去做。当计划人员制定加速经济发展的蓝图时,他们会列出以下具体的人力方面的规划:

1. 控制疾病并且推行保健和营养方案——目的不但在于使人们更为幸福,而且在于使他们成为生产率较高的劳动者。因此,不应把医院和下水道看作是奢侈品,而应当看作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分摊资本。

2. 受过教育的人会成为生产率较高的劳动者。因此,应该为学校和其他方案拨款,以便减少文盲。除了阅读和写作以外,还应

对人们进行其他方面的训练，使之掌握工农业的新技术。应把最杰出的人材送到国外学习，以便带回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但是要留意，不要让他们流向国外！）

隐蔽的失业。促进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较为有效地利用人力。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这些人也可能不被计入于失业数字之内，但却很难说他们是有职业的人。他们与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当经济高涨到来或发展计划实施时，他们被吸引到城市，从事生产性劳动，而与此同时，自己农村家庭的生产并没有多大减少。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在这些地方，当没有生产性的工作可做时，一些人便通过挨户叫卖或乞讨和招摇撞骗来勉强生存下去。

为了满意地解决这种就业不足和失业问题，除了人力方案以外，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在某些时候应该象先进国家那样，采用扩展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即使这种方法会造成通货膨胀问题和国际收支的赤字。

§. 自然资源

在一般情况下，穷国的天赋自然资源也是贫乏的，而且他们拥有的那些土地和矿产又必须分摊给稠密的人口。有人认为穷国拥有未被发现的资源丰富区域，这种看法已经基本上被地理学家驳倒了。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在物产最丰富的地区定居。

地质学家确实仍在寻找新的地下资源；而且事实的确表明：在⁷⁷²亚洲，滴滴涕控制住疟疾后，人们从原始森林中开发出了大片大片的肥沃土地。与这些令人欢快的事例相反的事实是：许多不发达国

家的矿藏、表土层以及不能再生生产出来的自然资源正在迅速枯竭。

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在科学创造的合成代用品的竞争之下,许多热带国家的现有资源已经过时了,因为先进国家拥有大量廉价的原料可以制造出这种合成的代用品。例如,尼龙有损于制丝业并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生计;如果合成橡胶能完全代替天然橡胶,那末,马来亚半岛会受到甚至还要严重的打击。

经济地理学者一致认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主要依靠新发明,取决于人们是否能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那种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曾向古老地区的穷人招手,请求他们移居到富饶的南北美洲大草原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空旷地带的敞开的大门现在已经关闭了一半。

当然,那句俏皮话仍然是有效的:“穷国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发现油矿来解决”。在第38—1表中,原始的科威特处于最富裕的行列可以说明这一点。伊朗、整个中东、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以及现在的阿拉斯加都是石油帮助发展的事例。

土地改革。即使没有创造或找到新的土地,各国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土地。中世纪的田地往往被划分成巴掌大的小块土地,同时每人可能要依靠两三块这种土地才能生活,而这两三块土地往往又不联在一起。同样的情况仍然存在于世界很多国家。英国经过痛苦而被人极端憎恨的圈地运动才消除了公共土地,形成了该国的有效率的大面积土地,这一运动从十三世纪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不得不进入城市贫民窟;类似的例子是俄国农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的残酷的、但并非完全成功的“集体化”过程;中国的集体化方案碰到了某些同样的困难。约翰·斯坦贝克的畅销书《愤怒的葡萄》,生动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沙尘地带的农民被拖拉机取代的情景。在

世界许多国家,这一合并小块土地的痛苦过程仍然有待于完成。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太大,妨碍了土地的有效利用。佃户没有改良土地的积极性,因为他知道,土地随时都可能被地主收回,也因为他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他辛辛苦苦地干一年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地主也同样没有积极性来改良土地,因为他担心不负责任的佃户会滥用经过改良的土地。

正如共产主义者所深知的那样,上述形势是具有爆炸性的。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呼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愿望,这种愿望是不能长期被忽视的。不止一位农业经济学者认为,土地改革与生产率具有密切的关系。

许多成功的使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把沙子变成了黄金”。 773

中美洲和其他地方的人类学者惊奇地发现,小农的生产管理往往是精明而合理的,能打破习惯势力并且注重实际收益。认为租佃经营方式不会大幅度提高生产率或种植园式的经营方式总是缺乏效率,是相当错误的。因此,不能只看问题的一个方面。

开发自然资源的问题和改进技术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也和提高资本品利用与发现自然资源的能力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 资本形成

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手和脑与发达国家人民的手和脑基本上是一样的;然而,先进国家的人民在劳动时却可以借助于多年积累起来的充足的资本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要积累资本,就得牺牲现有的消费。但困难在于:不发达国家已经非常贫穷了,它们经常只能维持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从而它们宣称:它们不能——事实上,它们一般地也不——把它们现有的国民收入的很大部分

用于储蓄。

先进的国家可以把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收入用于资本形成；然而在不发达国家，储蓄和投资占有的比例往往低于百分之五^①。单纯供养迅速增长的人口以及维持现有的原始的工具和住房，就会消耗掉这笔储蓄的很大部分。剩下来能用于发展的还有多少呢？

在我们学会如何避免大量失业以前，许多经济学者担心的是先进国家的过度储蓄。然而，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问题往往是储蓄不足这一古典经济问题：更确切地说，问题是现有的消费不得不与储蓄争夺稀少的资源，这造成了对生产工具的投资不足，而只有增加生产工具才能加快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

投资在质量上的变形。还有进一步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储蓄与投资不仅在数量上很少；同样严重的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投资的质量构成往往也是低劣的。例如，在印度有限的储蓄中，过多的部分被用于储藏合法或非法进口的黄金和首饰，这消耗了大量本来就很缺乏的外汇。

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受到长期通货膨胀的折磨；因此，人们自然要投资于不动产和囤积存货。当你能从囤积存货中赚取本钱的百分之二十时，为什么要费很大劲儿去生产产品而赚取百分之几的利润呢？巴西 1947 年的投资有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用于兴建住宅。许多观察者感到惊奇的是：在许多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在工业不振的同时，豪华的公寓建筑却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① 在具有内部动乱的国家——如乌干达或智利——净储蓄可能为负数。殖民主义的枷锁刚被解除时，收入往往随之而下降——希望是暂时性的。

在不发达国家,对有限的储蓄的另一个质量上的消耗,是富人 774
经常以合法或非法手段把他们的储蓄存放于国外。从而非法地使
这些钱不能用于国内的发展。

国外的资本。如果依靠国内的资金积累资本有许多障碍,那
为什么不更多地依靠外国资本?无论如何,英国在十九世纪不是
曾大量投资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吗?法国在
1914 年以前不是曾大量投资于沙俄和埃及吗?德国不是曾大量
投资于东欧吗?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富国已经使自己的高
收益的投资项目全部上马以后,只要它把投资转移到国外的没有
上马的高收益投资项目,就会使自己和穷国同时得到好处。

事实上,在 1914 年以前,经济发展确实是按照这种自然的方式
进行的。英国在它的全盛时期把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百分之
十五用之于储蓄,并且把其中的整整一半投资于国外!如果美国
今天按相同的比例投资,那末,我们每年应向国外私人出借和投
资差不多 \$1,000 亿,即为马歇尔计划、联邦政府、进出口银行、世
界银行以及其他援外方案总和的许许多多倍。

由于许多原因,我们现在不能期望有如此巨大数量的对外投
资。我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种对外投资型式未必完全
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有可能是历史的偶然巧合所导致的后果。

例如,从欧洲到新大陆的贷款一般都伴随着欧洲到同一新大
陆的移民:可以这么说,英国人带着他们的钱来到了美洲殖民地、
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自治领。同时也应注意:在进口资本的
国家和出口资本的国家,存在着相同类型的法律和风俗。

还应该记住: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具有难以置信的
国际性质。你可以不带护照而到处旅行。你可以自由地从一国移
居到另一国。你不会遇到高关税和贸易限额。由于各国都实行金

本位制,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随意把资本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你知道,你的财产在海外是安全的,不会被政府所没收: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会受到侵犯,对于那些侵犯私人财产权利的民族主义国家,可以派遣战舰到它们的近海进行军事演习,从而把它们吓唬住。最后,你可以收买——实质上如此——许多落后国家的独裁政府并且贿赂它们给予你极端有利的矿山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租让权。

如果这些听起来象一个投资者的天堂,那末,还要提醒一下,过去的史实并不完全如此美妙。对外投资往往遭受破产,因为没有足够的商业活动来支持贯穿新大陆的铁路。此外,从进口资本的国家对这一段历史发表的言论来看,它们对这种投资者的乐园似乎并不那样满意。

尽管如此,这种制度确实起作用。它往往使先进和落后区域共同受益。虽然股息被汇出了国,但由于进口资本而增加的产品却提高了国内的实际工资。

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的遗迹。第一次世界大战775 前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民族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借款者与放款者的看法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一致:不发达国家认为,不论价格怎样有利,也不应把开发本国资源的长期权利出卖给外国人,而发达国家也认为,以过去那种方式从落后国家购买债券和股票是轻率的^①。

这并不是说,对外大量投资的方案是不可取的。为了合乎实际情况,我们必须寻找实施投资方案的新手段。这往往要求政府之间达成协议,要求政府对私人投机资本进行担保。对外投资时

^① 即使在友好的加拿大,那里的人民也讨厌美国大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量投资,因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采取了惩罚性措施。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也正在制订限制外国人权利的新的投资条例。

要考虑到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必须培训所在地区的管理人员，以让它们最终掌管企业。允许所在地区分享分厂的所有权在目前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从国外的追求利润的私人投资者那里进口资本以外，还有先进国家的援外方案以及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各机构的开发贷款等可以获得资本的渠道（关于国际贸易的第三十六章曾经论述过这些渠道。）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目标是使每个富裕国家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贡献给援助不发达国家这一重要事业。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一崇高的目标。（美国的官方援助现在少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五，小于澳大利亚、葡萄牙、法国和瑞典的数字。）

§. 技术变革与发明

除了人口、自然资源和资本形成这些基本的生产要素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第四个要素，即技术。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谨慎的乐观态度。在这方面，不发达国家具有一个可能的有利条件。它们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较为先进的技术而受惠。

模仿技术。不发达国家并不需要培养出未来的牛顿来发现引力定律：它们可以从随便哪本书中看到这一定律。它们不必在漫长而曲折的工业革命道路上一步步攀登：它们可以在任何机器的说明书中发现以往的伟大发明家梦想不到的奇迹。

日本、德国和俄国的经济发展史清楚地说明了所有这一切。日本很晚才参加工业竞赛：十九世纪末，它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并开始抄袭西方技术。日本政府积极主动地刺激发展的步伐，它修建铁路，举办公用事业，并且对由于改良农业而导致的土地价值的增长课以重税。几个富有而野心勃勃的家族被准许与天皇的官僚机

构合作,建立起庞大的工业帝国,与此同时迫使一般民众为了生活而拚命干活儿。日本没有依靠外国资本的进口,在短短几十年中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工业上都进入了先进行列。

776 只是在1848年的革命以后,德国才真正加速它的工业化。依靠政府对大学的资助,德国的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化学和工程方面很快取得了卓越成就。一世纪以前,这些学科——以及历史、经济学和哲学——的美国教授大都在德国获得过大学毕业以上的学位。德国人在有机化学、光学、玻璃制造和电气设备上的非凡技术是无与伦比的,只是两次世界大战才使它丧失了领先地位。俄国的情况也说明: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模仿西方的技术和实践而获得迅速发展。

最后,美国本身也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乐观的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赠给我们许多具有各种信仰的欧洲大陆的第一流科学家,在这以前,我们不能问心无愧地吹嘘我们在纯科学领域已经到达最先进的水平。然而,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应用技术却被公认为是杰出的。这只要看一看有关汽车的一件件发明就够了。它们起源于何处?大多数来自外国。虽然如此,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长期以来却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多。用“美国佬的才智”这个短语虽然不能解释任何事物,但它确实有助于说明一个真实的现象(也是现在处于销蚀之中的现象)。

技术和资本的相互作用。当我们谈论不发达国家抄袭先进的技术时,听起来似乎确实有道理。但是,我们是否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先进的技术不是体现在复杂的资本品的形式中吗?我们已经看到,不发达国家缺乏资本。既然如此,它们怎么能抄袭先进技术呢?

上面的问题问得确实有道理。技术变革与资本投资是携手并

进的；它们往往是不可分离的。即使如此，我们在分析上把它们当作为不同的——虽然是相互有关的——过程仍然正确。这里有一个例子：

农业在许多落后国家中都缺乏效率。你可以看到农民犁地的方法仍然同他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使用的方法一样原始。也许可以找到一种灵巧而轻便的犁——一种很简单的东西，其成本不超过一元而在短时期中所节约的费用可以把成本抵消——既能减少所需要的资本数量又能大大增加产量。这个例子说明，技术改良往往可以节约资本，而不是占用资本。

此外，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随着设备的磨损和置换，总资本的一部分也总是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为什么置换相同的东西呢？为什么让一国资本的很大部分仅仅进行简单的重复投资呢？毫无疑问，把新得到的投资款项体现在更有效率的技术工具上会带来大得多的好处。由此看来，相互关联的资本形成和技术是可以相互为用的。

创业精神和技术革新。不发达国家所要做的听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不是么，为了在短短几年内走完几十年的发展道路，它们所要做的只是：到外国去抄袭较为有效率的方法，把它们带回国并且付之实施，然后坐下来等着产量自然而然地增长。

当然，实际情况不会象想象的那样。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从痛苦的经验中深知这一点。然而，在所谓“先进”国家的人民中，同样的幻想也普遍存在。我们总是认为，派几位技术专家到穷国走一趟，作一个月左右的实地调查，提出改进建议，然后把打字机打好的报告留下来“加以执行”就行了。这样，发展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具体技术问题来说，专家们确实可以采用上述简便方法而取得惊人成就。例如，一位美国的硝皮专家曾被

派往利比亚去解决技术难题，他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实找出了化学上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

然而，技术专家们很快就发现，在有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是不能取得这样迅速而巨大的效果的。典型的情况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在花费几个月对某一不发达国家进行考察以后，专家们得到的深刻印象往往是在文化和经济上存在着许许多多妨碍进步的障碍；障碍是如此之多，以致专家们不得不怀着绝望的心情扫兴而归。这种极端悲观的结论很可能象相反的乐观的幻想那样，同样是错误的。

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是一个艰苦而缓慢的过程——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必须在直接有关的人民当中培养自觉创业和革新的精神。应该记住，许多文化首先是轻视肮脏、辛苦的工作的——这种轻视往往来源于曾经统治它们的殖民主义者上层人士。它们也往往轻视商业——轻视牟利和生产。在它们自己的混合的文化型式之中，它们必须逐渐为自己造就一批具有创造性的生产者。这些生产者应该勇于尝试新的方法，能够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敏锐的反应，而且能够按照风险的大小和报酬的高低作出决断。

为什么要强调创造性的技术革新？因为要使先进的外国技术为不发达国家所用决不是简单的模仿所能办到的。应该记住，先进技术本身被发展出来是为了适应先进国家的特殊情况的。这些情况是什么？高额的货币工资率、劳动力数量不多但却有高度的工业技术、过去遗留下来的充足的资本、大规模的生产，等等。这些条件并不存在于不发达地区。

经验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土耳其或缅甸获得外国贷款而在国内建立一个模范工厂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工厂的设备往往是一件一件地从外国进口，体现着西方最新式的技术。然而，结果是什么？除了赚回成

本外，能否生产和销售大量产品，从而获得适当利润再投入工业建设？能做到这点的工厂寥寥无几！这种宏大的进口项目往往是非常赔钱的买卖。在纽约称得上是最优的投资项目，在安卡拉或仰光却可能一败涂地。

这种创造性的技术革新的任务并不是十足而粗野的个人主义所能办到的。政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在每一地区建立推广站，向农民提供技术指导，以使他们得到最好的种子、耕作方法和农具。通过开办职业学校和机工——还有会计——培训班，政府本身也可以从事创造性的技术革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在完全的自由放任和集权主义之间摸索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 五年计划：如何从这里走到那里

778

先进的国家并不是通过正式计划而得以发展的。从历史上看，英国和美国主要是通过自发和不自觉的方式成长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晚些时候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是这样，如十九世纪末的日本。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则实施了一连串的五年计划。

今天，在整个不发达世界，计划成了时髦的字眼儿。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太小或太落后而不制订自己的五年或十年计划。这些计划有时不过是与现实和执行无关的官样文章。然而有的时候，却是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制订出来的计划，包含有相当详细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发展方案。下面是一个好的计划所应牵涉到的某些因素：

1. 计划应以一国的原有的资源为基础。在制订计划以前，应对本国目前和将来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进行仔细的调查与研究。
2. 计划规定的最终指标或目标应是可以达到的。

3. 计划中包含的政策应是可行的,从而能够利用原有的资源达到最终的目标。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到能从国外进口(通过借款或赠予)的中间性经济资源,考虑到能够利用原有的资源通过国内投资手段而在国内生产出来的中间性经济资源。

计划的程度。一项计划至少应仔细计算出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各个宏观总量数字,也就是说应该平衡储蓄与投资,并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一地区和另一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分配资源。好的计划不应把目标定得过高,以致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降低资源利用效率,也不应把目标定得过低,以致造成停滞和就业不足。除了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外,还应利用价格制度和配给制度,使计划所导致的对进口的需求额不超过可得到的外汇供给量。理想的计划应该考虑到社会分摊资本项目,并且充分注意外部经济效果与生产规模的不可分割的性质。

某些计划仅仅牵涉到微观经济方面的“指示性规划”。这种计划只是使各个行业知道总量的变化以及它们在总量之中的份额的变化,让它们自己决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来赚取最大利润。另外一些计划则把不同的投入量具体地分配于不同的使用它们的产出部门,而在分配时,注意投入量与产出量之间的平衡。这种计划也许要使用 W. 里昂惕夫为分析一般均衡而设计的投入—产出法,从而详细了解部门间的产品流动情况(如第三十七章的附录所示)。这种计划还可能使用另外一些现代技术,如适合于大型电子计算机运算处理的线性或非线性规划。

计划往往会含有错误。气候恶劣造成的歉收也会把计划打乱。过高的指标会造成外汇短缺和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有的时候,以后的五年计划会从过去计划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有的时候,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坏。

愤世嫉俗者可以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编年史中找到无数个政府和私人做蠢事的例子。但是,看到泰国、台湾、朝鲜、波多黎各、巴西、新加坡、墨西哥、以色列以及萨尔瓦多在经济
发展方面取得的“奇迹”,乐观主义者则会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各 779
国有能力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如果给予某种援助的话。

总结和复习

1. 世界大多数国家属于不发达国家,即:相对于大多数先进国家而言,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也即:经济增长率将来可以提高、但现在却落后于先进国家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日益觉醒,再加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渴望帮助它们“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加强了利己的动机来寻找新的相互有利的援助和贸易的源泉——而不是新的帝国主义的强加于人的方案。所有这一切以及利他主义使得经济发展成为意义重大的问题。

2. 地理和气候、种族和风俗、宗教和对商业的态度、阶级冲突和殖民主义——它们都影响经济发展,但其中没有一个以简单和不变的方式施加影响。

3. 收益递增、外部经济效果和社会分摊资本为“起飞”、“冲刺”和“大跃进”的说法提供实质性的内容。对于竞争的市场力量,它们提出一个补充的范围。但是,它们决不会造成任何“平衡的增长”这一简单概念的必然性。

4. 发展的关键在于四个基本因素:人口、自然资源、资本形成(国内的或进口的)和技术。由于其死亡率先于出生率而下降,所以出现了人口爆炸性增长这一社会问题;马尔萨斯所说的收益递减的魔鬼普遍存在于不发达地区。在建设性的议事日程上,提高

人们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应该是优先发展的项目。“隐蔽失业”的大军是增加产量的一个重要的人力来源；“人才外流”到发达的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

5. 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发现新的自然资源或较好地利用现有资源有助于抵消收益递减规律。土地改革引起真正的过渡时期的问题。资本形成的过程——通过投资于水土保持、灌溉、排除积水，等等——是与自然资源相互发生作用的，正和资本形成的过程——通过投资于人的教育——与人口相互发生作用一样。

6. 在不发达国家，生产性资本的形成速度是缓慢的，其原因在于：(a)贫穷，(b)缺少资产阶级的强调节俭和赚钱的伦理观，(c)在质量上把储蓄的用途引入歧途，使它用于储藏非生产性的珍宝和存货以及国外的豪华住宅或其他方面，(d)仿效先进国家的消费水平，以及(e)对进口资本施加民族主义的限制，使进口条件不能为先进国家的投资者和跨国公司所接受。

780 7. 技术变革可以与新的资本品发生作用并且体现在新的资本品之中。不过，技术变革也是独立存在的，不发达国家可以对它寄予很大希望，因为它们可以抄袭先进国家的技术。日本、俄国和美国的经验表明：使来源于其他地方的技术为自己所用并不容易。这要求从事企业的精神和技术改革。经济发展的任务之一便是促进稀缺的从事企业和商业的精神在国内的增长。

8. 许多国家都在制订五年计划，力图根据原有的条件，通过最优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的中间性方案来实现合理的目标。

第三十九章 种族和性别 歧视经济学

781

我做了一个梦……我到达了山顶……我看到了理想世界。

小马丁·路德·金

如果仔细计算一下过去 10,00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那末,在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时期,妇女生产出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

阿尔文·H. 汉森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有色人种。但是,居于少数的白种人确实控制着大部分经济权力,而且确实享有高得吓人的生活水平。在美国这个最先进的经济社会内,占公民人数九分之一的黑人长期以来享有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一直相当低。除去这些经济上的不利之处以外,他们在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也受到了现代良心所不能再容忍的剥夺。

其他少数民族同样也受到歧视,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们在西南部和其他地方一直受到歧视。近几十年来,东部的大城市成了大批波多黎各移民的聚居之处,而对于这些人而言,美国的种族熔炉还未能迅速地把他们同化。本大陆最早的居住者,美洲印第安人,仍然没有完全得到我们在七月四日国庆演说中所夸口的那种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机会。

我们人口的一半是女性。和男人具有相同的学历、具有相同的双眼和双手、具有相同的智力商数和相同的天赋能力测验结果、

具有相同的家庭出身的妇女干一天活儿，为什么只能得到能力相等的男人的报酬的百分之七十？

§. 移民和种族熔炉

有时，人们争辩说，这种歧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也不是永久性的。三百年前，来自英国的移民成了最有势力的集团。人类学者认为，任何集团内的人多多少少是仇视集团外的人的。因此，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铃薯歉收使得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来到我们的海岸时，很自然地存在着讨厌这些新来者的情绪，特别是由于他们往往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应该提醒波士顿的书香世家一件史实：他们的许多美国祖先当年只会画押，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如何书写他们的姓名。）

782 据传说，随后而来的是德国人。他们的奇怪的语言使他们成为地方上开玩笑的对象：“德国人与狗不用申请”的字样经常出现在出租房屋和招聘人员的招贴中。然而，没过多久，正如密尔沃基和圣路易斯城的报纸的社交栏所表明的那样，德国移民的后代就成了最有势力的集团的一部分。当你阅读辛克莱·刘易士的关于明尼苏达州小城镇生活的小说时，你会看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如何被认为是粗鲁的“比欧斯基人”，而在今天，安德森或奥尔森的姓氏在竞选运动中则被认为是一个有利条件。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浪潮。从荷兰和德国来的少量犹太人很早到达美国并且经营商业和投资银行而致富。以后从俄国来的大量犹太移民最初在离上岸地点不远的血汗工厂工作，然而，通过美国种族熔炉的神奇作用，他们的孙子辈已经在韦斯切斯特或洛杉矶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同样，六十年前拥挤在波士顿北端的意大利移民的后代，现在已散居在波士顿和旧山市的各处。以上便是有关种族歧视的一般看法。

当然，这种有关美国历史的罗曼蒂克式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然而，只有幼稚的感情用事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认为歧视仅仅是暂时现象的看法。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一个无阶级的没有歧视的社会；在其中，供求规律公平地发生作用。不同种族的移民已成功地和美国生活的主流结合在一起，这的确是事实，但也仍然存在着美国黑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问题。印第安人的索乌部落并不是昨天才抵达美国的，而自从废除奴隶制度以来，迄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很显然，移民逐渐被同化的过去的历程与种族经济学研究人员的今天的课题无关。我们不但不能心安理得，反而应该采取新的行动。

§. 奴隶制度经济学

我们的历史书籍很少谈到：当高贵的条顿人在北欧缩着身子烤篝火时，黑人的文明和文化已经繁荣于非洲。我们所知道的是，追求利润的动机如何导致了奴隶贩卖：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可以说是使边际收益和成本相等——商人们使用贿赂和暴力等手段来绑架非洲人，以便运送出口，卖到新大陆。只要来源丰富的进口补充是有把握的，每个奴隶就被当作一种可以耗竭的资源。正象某一铜矿可以被开采净尽一样，如果不考虑自然再生产和年老体弱等因素，奴隶会被累死。（西班牙人在南美洲早已发现：被捕获的当地的印第安人往往不能富有成效地从事生产和再生产；他们很快就会累死或病死。）

1800 年左右，当良心使得法律禁止黑奴进口时，在经济上引起了调整。^① 对于奴隶主而言，密西西比州的较新开垦的农田提 783

^① 非法的奴隶进口一直延续到上一世纪很久，正如对利润的追逐使人们非法买卖毒品一样。以此而论，正如联合国的一些委员会所熟知的那样，非法的奴隶买卖在某些国家仍然是个问题。

供高额的边际产品。弗吉尼亚州东部一带地力枯竭的土地已经不再能非常有效地利用奴隶劳动力。因此，那只看不见的竞争之手使得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专门生产和再生产奴隶，以便把他们出卖给西边的土地肥沃的地方。

奴隶制度的自然消亡？在很少懂得经济学的历史学者当中，流传着这样一种神话，即在南北战争前的数十年中，奴隶制度在经济上已经是无利可图的了。根据这一神话，如果林肯稍微忍耐一些的话，南方的奴隶制度会自行瓦解。J. 迈耶和 A. 康拉德等经济学者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上述看法是毫无根据的。比较一下萨凡纳与查尔斯顿城奴隶拍卖市场的价格和弗吉尼亚州东部的食物以及养育儿童的费用可以说明：生产奴隶的利润与生产烟草和棉花的利润一样高。（看不出供给曲线 ss 和需求曲线 dd 的交点会移动到纵轴所表示的奴隶制度为零的点！）

经济分析告诉我们，在南北战争前后的年份，劳动生产率猛烈上升。既然如此，为什么技术革新偏要压低黑人的手和脑的边际生产率呢？如果一个世纪以前，需要瑞典人、波兰人和威尔士人在北部的矿山和大草原进行生产劳动，如果供给和需求把他们的工资提高到远远超过欧洲和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水平，那末，除了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以外，谁能相信奴隶制度会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消亡呢？经济史学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奴隶是懒惰的和在经济上不合算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 推迟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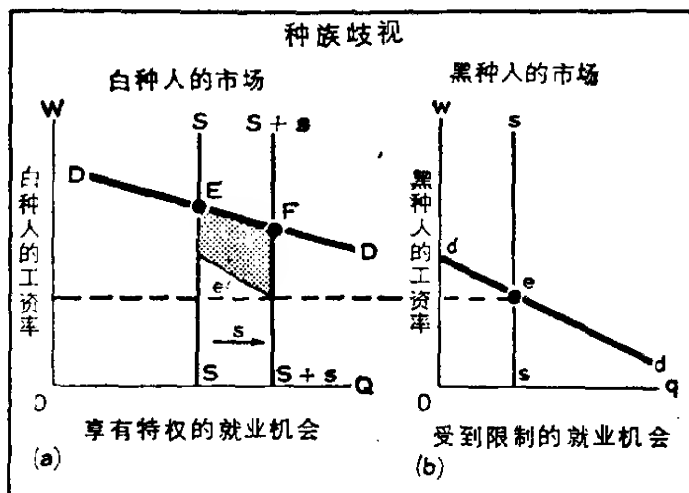
在一次流产的重建时期之后，种族歧视的立法使黑人重新处于劳役等级制度之下。对此，经济学上的“非竞争类别”的概念是非常适用的。大多数报酬丰厚的工作，黑人根本沾不上边儿（而且，

由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也几乎没有干这种工作的能力)。现有的黑人只能按照对他们开放的没有什么技术的工作的需求曲线而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第 39-1 图对这种歧视性的排斥黑人的做法进行了经济分析；不论是对于实行种族歧视的美国，还是对于仍然过分偏袒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信奉新教的白人的保险业和银行业来说，这种经济分析都是适用的。

第 39-1 (a) 图说明了某些好工作的供给和需求。享有特权的白人劳动者的供给为 SS 。对于他们的劳动的引致需求系来自他们在生产较重要物品的行业中的边际生产率，而这些行业是把

第 39-1 图 种族歧视剥削黑人，使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由于被排斥在 (a) 的好工作之外，黑人不得不干 (b) 的卑贱的工作（如家仆之类）。因此，白种人得到 E 点的高工资，而黑种人得到 (b) 中的 e 点的低工资。消除种族歧视后，黑种人会到 (a) 图中去，如箭头所指的供给的移动所示。对于一切来者工资一视同仁的



新均衡点 F 为 $SS+s$ 与需求相交之点。黑人的工资的增加并不来自白人工资的相应降低(只降低很少)。消除种族歧视会增加总产量，因此，得益者(包括现在得益较大的白人资本家)所得到的总是多于受损者所损失的——如 EF 之下的阴暗面积所示。

黑人排斥在外的，如 DD 所示。均衡点处于表示白种人的高工资的 E 点。同时，第 39-1(b) 图说明植物园或低贱行业的情况。黑人使用劣等工具，只容许生产若干种社会不怎么需要的物品，他们的工作需求曲线系由 dd 来表示。供给曲线 ss 与 dd 相交于低数值的均衡点 e 。在该点，他们各自的供给量正好等于需求量。应该注意到两个均衡点之间的差距。

排他性的歧视已经使黑人劳动者的挣钱能力受到不利的影响。他们挣的钱要远低于白人劳动者。如果歧视系由风俗、法律和工会的勾结所强制实行，那末，这便是供给和需求的无情的判决。

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经济效率来看，理想的情况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第 39-1 (b) 图的 ss 供给和第 39-1 (a) 图的 SS 供给加在一起，那末，我们便得到新的 $S+s$ 的没有歧视的供给曲线。现在，在白人工资降低很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黑人工资大幅度增长。工资的增加量来自何处？它主要并不来自黑人向白人讨还的部分。因此白人劳动者现在得到的工资差不多和过去一样，他们工资减少的唯一原因在于轻微的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也就是说工资沿着 DD 稍微有所下降。黑人收入增加的来源在于他们的新工作高于歧视状态下的低生产率所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现在黑人劳动者不再用一把旧扫帚去清理厨房的地板，而是操作一架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填表机，因此而得到优厚报酬。城市中的黑人现在不再为另一个贫民窟的居民理发，而可以希望在市中心经营集体医药保险业务，或者开办自己的信息处理企业。当种族歧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受教育方面的不利条件消失以后，上述情况便是第 39-1 图的含意。^①

① 为了突出问题，第 39-1 图的 dd 曲线全部被画在 DD 之下，其含意为：在歧视被消除以后，一切仆役劳动都不存在。更合乎现实的画法是：使 dd 把 W 纵轴作为一条渐近线而上升。这样，新的没有歧视的均衡会出现于第三张图形，在其中，水平方向相加的 SS 与 ss 和水平方向相加的 DD 与 dd 相交于稍高于 F 的均衡点（而共同的工资低于 E ）。关于在人们坚持偏见、反对雇用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和妇女这一情况下所造成的经济代价的进一步分析，见加里·贝克尔：《歧视经济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1957 年）。

没有种族歧视的那一天还远远没有到来。由于习惯，黑人很少得到向白人发号施令的领导职位。在许多行业中，白种劳动者宣称，他们不愿和黑种劳动者并肩工作。由于反对歧视的法律的力量、教育以及富有战斗性的抗议，这种种族隔离的型式已缓慢地有所松动。进展是缓慢的，但形势确实在发生变化。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据说好工作目前在原则上是向一切种族开放的。确实出现了“装门面”的现象：大公司争相雇佣哈佛商学院的优秀黑人毕业生，以便向外夸耀，它有一个副总经理的助理是美国黑人。

事实是否能证实全体有色人种的相对地位逐渐有所改善？是的，稍有一点。在经济停滞的五十年代，非白人家庭的收入平均为白人家庭的一半。在1961年以后的15年中，该数字已从二分之一上升到约为五分之三。有进步？是的，缓慢的进步。但应该看到，有色人种地位的改善在某种程度上系因为经济状况的变化，经济由衰退中的停滞转变为迅速增长。值得庆幸的是：在七十年代相对停滞的年份，黑人并没有失掉他们在六十年代所得到的全部利益。正如通常在衰退中一样，他们的收入下降最大，但他们并没有失掉他们在较优越的职业中所取得的立脚点。

§. 受教育机会的改善

文盲——不论是白人或非白人——的工资低微，工作又脏又累而且经常遭受失业的折磨。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仅受过八年教育的人。当然，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往往比高中毕业生得到较高的薪金。

由于非白人所受的学校教育比白人少，这就在职业上的种族歧视之外，导致出更多的种族之间的收入差别。如果南部农村和

城市贫民窟的学校比城市郊区白人居住区的学校质量低,那末,种族之间的收入差别还要大一些。最后,如果一个黑人儿童来自不知父亲为谁、书架上无书、而母亲只能依靠有限的救济金照料许多孩子的家庭,那末,即使处于六岁的年龄,那个刚入学的儿童已经在学习态度和成绩上处于不利地位。从六岁到十四岁,阅读能力、解题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如果白人教员使用中产阶级的教学和考察方法的话。(一种据说目的在于衡量“天赋的一般智力水平”的所谓“智力商数测验”对白人儿童说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测验使用的是银行支票,这类白人儿童熟悉的概念,而不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烧猪肠子需要多少时间”。)①

786 慢慢地,第一流大学也在招收黑人学生。各项法律措施的颁布,使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稍有减少;但白人却有能力和从城市中心搬走,而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非白人往往较为贫穷,而穷人往往聚居在一起,这一事实造成了实际上的种族隔离,不需要有意采取歧视措施。虽然如此,下一代非白人仍然有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他们的机会和相对的经济地位。

§. 职业上的和经营企业的机会:“黑人资本主义”

在过去,很少有非白人成为工程师或大公司的副总经理。少数几个成为医生、牙医和律师——其服务对象主要为“难于被白人

① 改善教育和学习方法是费钱的。1966年的科尔曼报告力图用统计数字说明:为了补偿非白人在学龄前的不利之处而在教育上花更多的钱起不了多大作用。(见J. S. 科尔曼等:《教育机会的平等》,美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1966年。)A. 詹森在1969年冬发表于《哈佛教育评论》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该文宣称:黑人的智力商数平均比白人低百分之十五,这在很大程度上系由遗传因素造成,从而较好的办法是给黑人讲授职业上和仅凭记忆而无需思考的课程。然而,众多的批评者的结论是:詹森没有适当考虑环境(而非遗传)因素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导致学龄前黑人儿童处于不利地位。

抢走的”黑人顾客。更多的人，特别是妇女，成为教师——主要也同样为教育黑人学生。

当然，总会有几个以黑人顾客为对象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百万富翁。但是，对非白人企业的调查所表明的情況却非常令人泄喪：男女理发店、干湿洗衣店、小饭馆和食品商店——这些，以及贫民窟中的地产生意构成过去的黑人资本主义的非常大的部分。

将来怎么样？私人企业制度能否自动消除各种族之间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点。在贫民窟，资本稀少；信贷利率高昂而且难以得到。风险很大，企业经常破产和倒闭。由于骚动和盗窃的风险，贫民窟的保险费要比其他地方高几倍，没有政府补贴，根本得不到保险。由于必须把存货保持在最低限度以便减少风险，顾客的挑选受到限制，贫民窟的居住者是穷人，往往必须允许赊购（特别是对同种族的人），因而必须提高价格以便补偿烂账的风险。

作为不发达地区的贫民窟。第三十八章用于分析经济发展的许多工具可以被用来理解贫民窟的问题。贫民窟可以看作是不发达地区，但却是非常倒霉的不发达地区，它与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且不得不与其竞争。正如马来亚的农民讨厌中国商人、肯尼亚的本地人讨厌他们之中的印度商贩一样，贫民窟的居住者自然也讨厌在城市中心经营小商店的白种商人。这些商人往往被看作是“剥削者”；他们每天晚上回到坐落在城郊的舒适的住宅，装满了从穷人那里得到的剩余价值。^① 这些白人小商人的收益的

① 这有助于说明黑人的某些反犹太主义的事件。虽然如此，哥伦比亚大学对纽约所作的仔细研究表明，商人被认为是白人“剥削者”，从而告诉我们：如果商人中的意大利人或爱尔兰人象现在的犹太人那样多，贫民窟中也会出现反意大利或反爱尔兰的情绪。其他研究也说明，在黑人中比在城市其他白人中蕴藏着较少的反犹太主义的情绪。

实际数字表明，他们的利润率小于他们的劳动和投资所应有的份
787 额。只要办得到，白人商人的子女就会离开贫民窟到其他地方谋
生。贫民窟中的房地产主更可能是中下等的白人资本家，而不是
从事金融投机的富翁。（某些贫民窟的房产实际上已被其主人所
放弃，因为其所得还不够缴纳税款。）

用黑人小“剥削者”来代替白人小“剥削者”是否能使解放之日
到来？无论如何，黑人资本主义获得自然发展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法国大革命前，皇后玛莉娅·安通娜达曾经说过：“为什么不让他
们吃蛋糕呢？”今天，如果我们向占人口百分之十一的黑人重复B.
富兰克林的格言：“继续经营你的商店，而你的商店也会使你生
存”，也同样是无济于事和残酷的。

受到资助的黑人资本主义。如果贫民窟正象一个不发达国家，那末，为什么不使用前面提到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发展呢？正如第三十八章所说，这些方法包括从较为发达的国家输入资本以及接受其他国家的福利转移支付和资本赠款。根据提供外援的第四点计划，还包括知识、技能和企业管理方法的传播。正如亚洲把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美国深造一样，市中心的有才华的青年也可以到名牌大学上学，毕业后，返回市区从事城市发展工作，解决种族矛盾。在国内，正和在国际上一样，我们有必要担心出现“人才流失”问题，即最有才华的黑人不返回最需要发展的地区。

具体的政府补贴方案包括以下内容：(a)在贫民窟和城市中心地带设立企业，(b)向黑人经营的企业提供利率较低的投资资本和费用较低的保险服务，以及(c)帮助研究对白人和黑人都有用处的基本的企业管理方法。虽然华盛顿在口头上对此表示支持，但到1973年为止，在这些方面采取的实际步骤却很少。还可以利用税收制度来对增加贫民窟就业量的活动提供特殊的赋税优惠。因为

从城市内的贫民窟到市郊的工厂区往往没有交通工具，又因为失业者不大可能拥有汽车，所以补贴往返近郊的公共汽车业也是有意义的事情。

A. 布里默是一位卓越的黑人经济学者，一度任华盛顿的联邦准备局的理事，现任哈佛商学院教授和许多大公司的董事。他曾经告诫我们，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为贫民窟的顾客服务的小企业，我感到它们将一定对某些未来的黑人企业起某种推动作用。……但我个人深信，黑人的最有前途的经济机会在于完全参加整个的国民经济活动。这对想要经营企业的黑人和其他人都是正确的。^①

三十年以前，黑人青年的失业比例少于白人青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令人惊奇的事实——令人惊奇的原因在于：在今天，贫民窟青年的失业率为白人青年的两倍到三倍。 788

对此，人们提出了如下许多解释：(a)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利于黑人的就业，而那次战争距离现在越来越远了；(b)最近一个时期，大量的黑人从南部农村移居到城市贫民窟，而迅速安置他们却不是一件容易事；(c)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出生率的高涨，所有种族都具有多余的青年人，从而导致一般的工资下降和失业增加；(d)由于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受到大学教育，所以那些没有进入大学的人可能比过去具有更加低劣的条件，而技术较低的人一向失业较多；(e)最后，批评最低工资法的人长期以来就宣称：这种法律恰恰损害了它所要帮助的社会阶层：如果对某个雇主而言，某人并不值每小时 \$2.30；那么，即使此人每小时的劳动值 \$2 并且非常急于得到工作，他也注定要完全失业。^②

① 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社会、后来成为世界第一流经济学家的 A. 刘易斯爵士曾指出：“黑人的问题是：我们在总人口中占百分之十一，但只占有百分之二的最优职位，百分之四的中等职位并且被迫占有百分之十六的最低职位。……衡量我们是否取胜的标准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上升到中等和高等职位。……让聪明的黑人青年进大学，学习工程、医药、化学、经济学、法律、农业以及其他对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有用的学科。让聪明的白人青年进大学，阅读黑人小说，学习非洲斯瓦希里语言并且记载历史上黑人英雄人物的伟大事迹：对这些人而言，上述一切会使他们感到震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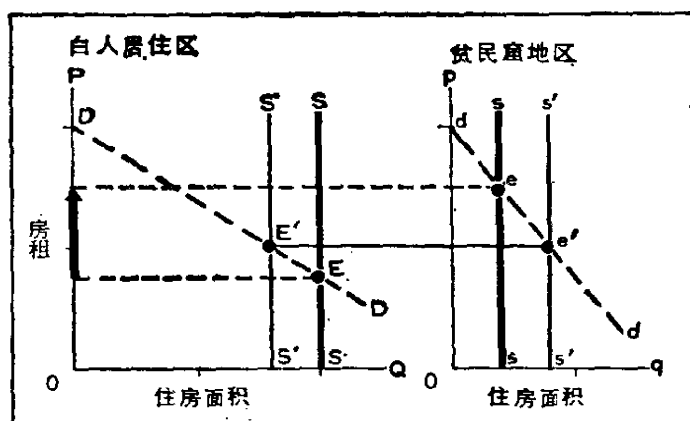
② 例如，参看 M. 弗里德曼对最低工资的强烈批评，载于 P. A. 萨缪尔森：《选读》，同上引书，以及书中的某些相反论点。

如果解决黑人技术水平低的办法是进一步的培养，那政府必须为人才培养方案提供更多的资源。公共政策可以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发生作用。如果雇主们认识到，是否能得到政府的合同取决于他们是否雇用黑人，那末，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使就业的机会较为平等。而且，用乐观的眼光来看，上述的某些困难可能具有过渡的性质。当斗争已经取得胜利，从而不再有必要来在每一场合都坚持自己的权利时，劳动的供给以及它的边际产品便不会再受正在发生的社会革命的影响。

§. 贫民窟住房经济学

种族在区域上的隔离可以增加少数民族在就业上的不利条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贫民窟的生活和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等环境方面的不利因素，可以进而使非白人的经济地位蒙受损失。黑人并不是喜欢居住在烟尘和拥挤之中，而不喜欢郊区的

789



第 39-2 图 歧视使黑人的房租提高

图中假设每人的需求曲线相同，人数较多的白人具有数量较大的需求曲线 DD 。又假设在实行种族隔离的条件下，黑人只能得到每人所应有的住房面积的一半。这样，他们的 dd 与分配给他们的 ss 相交于高房租

的 e 点。白人的 DD 与他们的不公平地得以扩大的 SS 相交于低房租的 E 点。左方图形的箭头表示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差距。（虽然贫民窟房地产主得到了好处，但在这个直线的情况下，整个房地产主阶级实际上蒙受了损失！）

草木丛生的绿色土地。由于种族隔离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在习惯上，人们利用房地产证书中有关种族的条文规定使得某一地区不为非白人占有。在法院取消这种条文规

定之后，房地产公司和房地产主暗中采取的歧视手段几乎全部延续了原有的做法。

在开始的时候，顽固坚持种族偏见并不认为是可耻的。以后，坚持种族偏见变得有点不好意思了。逐渐地，人们开始说道：“我·并不坚持种族偏见。然而，别人却坚持。大家都知道，当黑人在白人居住区占有一席之地时，房地产的价值便猛烈下降”。

这样，上述说法便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者R. 默顿所说的“自我应验的预言”。如果人们相信它并且依此而行，那末，即使在开始时它是错误的，最后它也可以成为正确的。

然而，让我们考察有关种族和房地产的经济上的事实。如果你把两个类似地区——一个有黑人的迁入，另一个没有这种迁入——的各自的售货单据的总数算出来，那末，这种对照试验会说明什么？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很多市中心地区显然处于衰亡之中，即使没有种族因素，其房地产的价格也仍然要下跌；而我们又都知道，黑人居住区往往位于只有穷人住得起的衰亡地区。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者曾对某些类似的城市地区仔细进行了考察，其中包括一些差别很大的城市，如奥克兰、底特律、芝加哥和波特兰^①。研究结果表明：

某一地区的种族杂居会损害房地产的最终·的·价值的说法基本上是没有根据的。所谓“人为地使整个街区房地产价值下降”如果当真会发生任何作用的话，那末，它的作用是最·终·会提高·房地产的价值（正如制造谣言来人为地使整个街区房地产价值下降的人所熟知的那样）。

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结论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恰恰是由

^① L. 洛伦蒂：《财产价值和种族：对七个城市的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为种族和住房委员会出版，伯克利和洛杉矶，1960年）。

于购买和租用房地产的黑人是受到歧视的，所以他对被允许购买或租用的房地产的需求会提高它们的价格。第 39-2 图对于住房方面歧视的经济分析类似第 39-1 图对于职业方面的歧视的经济分析。当房地产的市场被分割成为两个部分，如果黑人所分配到的少于按人口平均他们所应有的份额，那末，竞争的市场会提高从他们那里所能索取到的租金。当种族的界限被取消以后，相同的房地产的租金会趋于一致——造成既是较为平等、也是较为有效率的均衡。

§. 妇女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

如果不分析妇女所处的不利地位，那末，关于歧视的论述就不会是完整的。我们在第五章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论述中看到：
790 妇女的收入平均仅约为男子的三分之二。

例如，过去女性的大学毕业生一生所能享受到的收入完全和男性的中学毕业生处于同样不利的地位。虽然白人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年收入也跟着增长，但统计数字表明：接近三十岁的妇女所得到的平均收入和年龄较大的妇女一样多。

相对说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校的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学生多于该大学的男性优等毕业生——可是在毕业二十五年以后举行返校庆祝会时，正式工作收入的频率分布却表明：女生的最高收入等于男生的最低收入。为什么会如此呢？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教书和图书馆工作对于妇女说来是高报酬的，而对同等条件的男子说来却是报酬低微的。如果你考察大公司、大银行、大保险公司的人事组织名单，你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如此之多庸碌的男子居于副总经理的职位，而如此之少的妇女居于超过助理副总经理（通常在管理女职员部门）的职位呢？

以上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没有必要作过多的说明。即使你把自愿在家中做贤妻良母的妇女排除在外，而把对比限于以职业成就为终身主要目标的妇女，也还是存在着任何心理学者不能用客观条件的不同加以解释的经济地位的差别。

陈词滥调。当然,在长期歧视妇女的社会,总会有一些荒诞的说法来为上述差别辩解。请看下面一些例子。

妇女的自然本性就是在家养育儿女。她们是感情用事的。她们的情绪经常变动。她们不能肩负重大的责任。她们缺乏自信心。男子不愿在妇女手下干活儿。男子与男子的交谈会由于妇女在场而受到限制。每一个妇女都宁可让男医生看病,而不要女医生。妇女缺少想象力和真正的创造力。如果把男子和妇女混杂在一起使用,他们之间会产生问题,以致损害效率,败坏道德风气。等你把一名妇女培养出来以后,她将要结婚并且脱离工作,或者生儿育女;或者,一旦雇用了一位妇女,由于存在着特殊关系你无法将她辞退。如果一位妇女在经济方面确实是一个卓越的工作者,那她将毫无女性的特点。她会苛刻而敢拼敢撞的,喜欢与男子和所有人相斗(从而丧失结婚的机会)。想挣零用钱的妇女会使自己的丈夫丢掉工作。……

恶性循环。上述陈词滥调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正如任何社会心理学者所熟知的那样,歧视会造成更多的歧视而且会导致某些“自我应验”的预言。如果少数人长期被人踩在脚下,那他们会受到周围大多数人的影响,自己痛恨自己,情绪暴躁,怀疑自己的能力。许多男子和妇女试图打破以往的陈规陋习,但在事实面前都碰了钉子,最后不得不说:“我自己并没有偏见;然而,由于我的顾客(或雇员)具有偏见,所以我也不得不带有偏见。”改变这种状况的速度简直太缓慢了——除历史学者外,对一切人都是如此。

§. 从性别上看职业和行业的变动

在经济分析中,历史地看问题是有用的。我们发现,从有记载的历史初期开始,妇女在创造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人类的不同社会中,正如在不同种的动物中一样,存在着许

791 多可供选择的专门化类型，如狩猎、采集、畜牧、种植和播种。只有在打仗作战上，男子才表现出独有的天赋才能——而这一点也是有争论的。在人类学者研究过的许多社会中，几乎全部国民生产总值都是妇女创造的，而男子顶多起着惹人注意的破坏作用。特别是在自给自足的农业中，不论是在旧大陆的旧世界还是新大陆的新边疆，要想分开男子和妇女在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相互合作的作用是不大可能的。象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那样的统治型式已经被证实为与经济组织和经济作用没有密切的关系。

到了把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当作社会规范的十九世纪，逐渐产生了除了在家庭中不会发生任何经济作用的高贵妇女的形象。正如 T.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所讥讽的那样，在一个丰裕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该人的动产除了作摆设之用外完全没有其他用处来证明的。完全没有被阳光所玷污的白嫩的皮肤起着和中国女童缠足相同的作用：你的夫人、也是你的奴隶、也是你的姨太太，公开地表明不会做任何有用的工作——这才显示出你是多么富有的一位绅士。

新趋向。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随着节制生育把妇女一生中的相当多的年份从生儿育女中解放出来，维多利亚的型式（可以说仅流行于资产阶级和贵族之中；他们总是雇用低等妇女作为奶妈、厨子、女仆、女工和妓女）逐渐消失了。统计数字表明的最明显的趋向之一便是参加劳动大军争取收入的妇女数目的增加——其中“争取收入”的字样可以提醒我们，在家庭中不争取收入的工作是最辛苦的工作的一种。

许多妇女现在终生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从学习时开始到年老退休为止。许多人在学习后工作数年，然后为婚姻和生育而离职数年，而当最小的孩子长成以后又重新工作。但是，最近的现象

是:越来越多的妇女甚至在她们孩子不满一周岁时就恢复工作,或根本不离开工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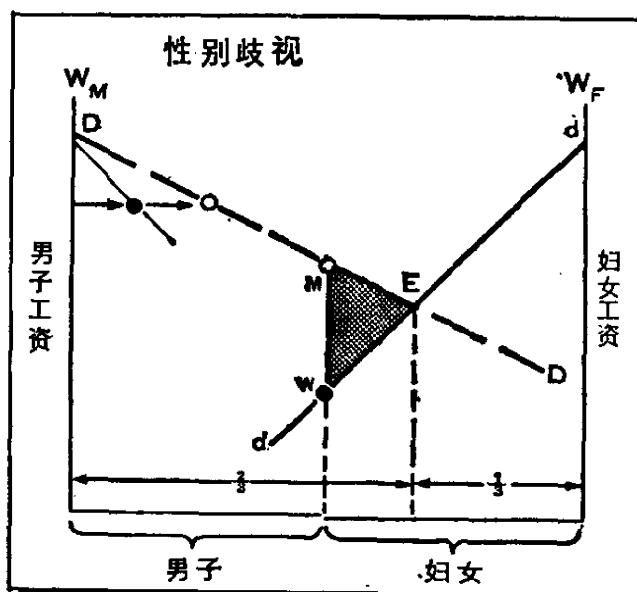
自以为先进的美国从某些方面来说却是解放妇女的落伍者。在印度、斯里兰卡、阿根廷和以色列,都曾有妇女担任过国家元首。在苏联,远较男子数目为多的医生是妇女。去日本、俄国和中国旅行的人吃惊地发现,妇女在路旁干着繁重的劳动。妇女不仅比男子活得长,她们似乎也比所谓两性之中的强者更能在长时期中肩负重任。

§. 有关性别歧视的经济分析:脱离正题的专门讨论

第 39-3 图可以说明性别歧视的事实和不良后果。我们假设

第 39-3 图 性别歧视减少妇女的工资、提高男子的工资,但肯定减少经济总产品

占人口一半的男子垄断了三个行业中的两个,享有广阔的需求曲线。占人口另一半的妇女限制在三个行业中的一个,具有迅速下降的需求曲线 dd (从右向左衡量)。男子的供给数量得到 M 点代表的竞争的高工资。妇女则得到 W 点代表的低工资。如果性别歧视消失,则男女将平等地在每一行业中工作。均衡位于男女两性得到相同工资而每一行业同时雇用两种性别的 E 点。 MEW 的面积表示由于消除不合理的性别歧视而得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均位于男女两性得到相同工资而每一行业同时雇用两种性别的 E 点。 MEW 的面积表示由于消除不合理的性别歧视而得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① 无怪乎目前存在着对日托的需求。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需求并不易于得到满足。如果想给孩子以中产阶级的母亲过去一向坚持的那种单独的、专业化的和慈爱的照顾,那末,目前还找不到任何使成本大大低于母亲的工作收入的组织型式。致力于研究公司、合作社、工会和工厂的专家们应该着手研究这个在数量上很重要的经济问题。

男女人数相等，如图中的括号所示。我们又假设存在着三个相同的
792 的行业，它们对劳动的需求曲线 dd 可以由男子或妇女劳动力来满足，因为对于这些行业的工作而言，男女劳动力具有相同的能力。

但是，现在假设：单纯由于不合理的性别歧视和顽固不化，两个行业仅雇用男子。妇女于是拥挤在第三个行业之中。 DD 表示单纯雇用男子的两个行业的边际产品曲线。 dd 表示“贫民窟式的”妇女行业的需求曲线（从右向左衡量）。应该注意： dd 曲线下降的速度两倍于 DD 。为什么？因为男子在两个行业中就业，从而使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缓减。（把两个 dd 曲线在水平方向相加便得到 DD 。）

性别歧视情况下的均衡点位于何处？对于妇女而言，位于 W 点；在该点，她们所得到的工资仅为男子在 M 点所得到的工资的百分之四十！

如果性别歧视被消除掉，均衡点应该位于何处？应该位于 E 点；在该点，三分之一的男人以及三分之一的妇女在每一个行业中工作并且得到应有的相同的工资。

谁受到剥削了呢？当然是妇女。谁是剥削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男子——他们好象是站在受压迫的妇女之上^①。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

国民生产总值（或经济净福利）将下降。三角形 MEW 的面积

① 还有，在这个直线的情况下，雇主们作为一个整体得到较低的利润：受限制的行业的雇主们由于性别歧视而得到的好处小于另外两个行业的损失。目前的这个图形在分析上是考察歧视的第 39-1 和第 39-2 图的变种。它也可以被用来说明其他种类的歧视——歧视犹太人、天主教徒、同性恋者、中国人、巴斯克人、印度人，等等。（我们提请读者注意：某些直线情况下的结论——例如，歧视有害于总利润或地主的地租总额——不一定总是正确的。然而，被歧视的人遭受的损失大于社会中其他人得到的好处这一基本结论仍然是正确的：象 MEW 那样的代表无谓的经济损失的三角形必然出现。）最重要的——然而，可叹的是：却远不是很显然的——是整个社会蒙受损失这一事实。

表示由于不合理的性别歧视而造成的在总产量或整个社会的满足程度上的损失。整个人类受到损失。也就是说，男子从剥削中所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不如妇女所损失的那样多！⁷⁹³

从这张图形中得到的教益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 限制条件和存在的问题

本章结束时，我们不应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在不同的种族或性别之间的一切待遇上的差别都是由歧视造成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实现平等的前景倒会更光明些。仅仅消除歧视并不能得到理想的机会和收入的均等。

各少数民族内的许多成员所受的教育确实较差。经济学者知道，要想让人们挣得较高的收入，必须进行人力投资。有鉴于此，只要雇主们能够肯定，妇女的就业时间不会象男子那样长，他们便不让妇女得到有助于提高终身收入和地位的在职培训。

我们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同样地热衷于提高他们的收入。某些人宁愿追随反主流文明的步调，寻求丰富的内心境界，而不愿生活于市场之中。

然而，只要在社会伦理观和实际活动方式之间存在着差距，经济分析就可以说明：消除不合理的歧视可以带来巨大好处。

总结和复习

1. 由于历史的偶然性，世界上居于少数的白人男子过着最为丰裕的生活。奴隶制下的赤裸裸的剥削并不是可以自行消失的。通过分析竞争性的供给和需求可以证明，在废除奴隶制度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机会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种族歧视使社会最底层阶级的收入遭受了不合理的损失。

2. 非白种人的经济状况的改进是缓慢的。有人说早期移民的情况也是这样，这种说法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的。只要在教育和其他机会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美国黑人、波多黎各人、美籍墨西哥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就会从其生活环境本身继承贫穷。自发的黑人资本主义迄今还是一张空头支票。补偿生活环境的不平等的开支似乎是必要的，而且不应低估所需要的开支。

3. 住房上的种族隔离导致了事实上的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歧视。对供给和需求的分析再一次表明，种族隔离会使受歧视的人支付较高的租金，从而有黑人居住的地区的房地产的价值会高于没有黑人居住的地区的房地产价值——这与通常的神话相反。教育、居住地点、收入和机会等方面的不利条件形成了恶性循环，只有采取强有力的社会措施才能打破这种循环。

4. 分析性别歧视可以使用和分析种族或政治信仰等方面的歧视相同的经济分析工具。除了其本身就是应有的和合理的目标以外，妇女解放还可以提高对经济资源的利用从而扩大经济福利。人口的一半决不能被看作是少数人，看作是可以被剥削的对象。

第四十章 生活质量问题: 贫穷 与不平等、生态与 成长、博爱与正义

795

土地遭到了不幸，
不幸更加快了掠夺，
随着财富的积累，
人类却逐渐衰亡。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

《被抛弃的村庄》

人类并不仅仅依靠国民生产总值而活着。许多具有道德观点的人会说: 与其要社会生产出来一个较大的馅饼, 把它用于炫耀财富的庸俗目的, 还不如要一个较小的, 把它公平地分配给人民。如果追求 W. 詹姆斯所说的物质财富的代价是摧毁人类的生活环境因而最终得不到幸福和安宁, 那为什么还要追求它呢?

本章所提出的问题超出了狭义经济分析的范围。然而, 它们在全世界已成了争论的焦点: 不仅在丰裕的北美和欧洲是如此, 而且在苏联以及其他即将富裕起来的社会也是如此。

在经济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方面, 是否存在着冲突? 经济“效率”和伦理上的“公平”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 “安全”和“成长”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 还有, 经济是否仍然有可能成长? 如果有可能, 是否仍然值得争取? 最后, 对于非物质的目的——关于博爱与利他主义、关于法律和正义; 关于人们应如何在生与死、结婚与生育子女等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作出抉择以及关于应如何利用我们的时

间这一最宝贵的资源——经济学能说些什么？

过去，经济学教科书不讨论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而现在和将来，经济学则将用很大气力研究生活质量问题。

§. 为了阐明问题而进行分析

上述所有问题都牵涉到价值判断。它们牵涉到人们在爱好和信念上的巨大差异。即使它们超出经济学的范围，经济分析还是可以对问题的阐明作出很多贡献。例如，如果你不知道减轻不平等和贫穷所要支付的代价，你怎么能合理地决定把这一政策推行到什么程度呢？即使你认为手段必须从属于目的，但在象经济学这样复杂的学科中，你怎么能保证你的手段不会造成恰恰与你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反的后果？

796

禁用滴滴涕是否会拯救鸟类和使亚洲人丧失生命？禁止在洗涤剂中使用磷酸盐是否会由于使用代用品而造成更严重的水污染？

规定高水平的最低限度工资是会增加较贫穷的劳动者的福利呢，还是穷人会成为这项出于好意的措施的主要牺牲品？

规定对消费者的小额借贷的最高利息率——譬如说，每年百分之八，这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太低——是会帮助需要借钱和时运不济的人呢，还是正中了为高利贷者进行幕后活动的人的圈套？

许多社会革命——在中东、在拉丁美洲、在非洲——都以帮助工人和农民为目标，但在过渡时期却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许多技术改良——例如，著名的杂交粮食种子的“绿色革命”——曾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而与此同时，也加大了贫富悬殊的差距。

社会改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是轻而易举的话，许多能使善良的人双手赞成的改革也许早就实施了。另一方面，经济分析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主张维持现状的论点是多么华而不实。不论你祖父的经济学教本在过去怎样说，富裕的国家总是能够通过征收赋税重新分配很大一部分收入。罗马帝国衰亡的真正原因

不在于预算的不平衡,也不在于无能的官僚的计划失误。

简言之,对于一心要搞社会改革的人,对于想维护现存制度的人,仔细的经济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 自从伊甸乐园以来: 不平等

第五章总结了关于贫穷和收入不平等的重要事实。在自由放任制度下,收入和财富远不是平等分配的。混合经济制度对自由放任制度所特有的收入不平等作了某些修正,但是,第 5-3 图和第 9-1 图的洛伦茨曲线表明: 经济福利的差别仍然是相当大的。

第五章还说明: 在不断发展的经济中,处于某一固定的、绝对的贫穷标准以下的人数如何会得以减少。当整个国家更加丰裕时,被我们认为是象样生活的最低标准也随之而提高。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永远会处在最低收入水平。但是,一个国家如果能连续数十年使经济获得成功的发展,那它一定会比其他国家更好地改善收入金字塔底层的人们的经济状况。

例如,二十年代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增加的时期之一。然而在这一时期,若以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来衡量,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很可能下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提高平均收入和减少围绕着平均收入的波动的年份是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

有人问道:

当美国的贫穷和国外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时,为什么还担心美国国内的收入的差距? 克利夫兰的一个靠政府救济为生的家庭,生活得比伏尔加格勒城的劳动者要好,比印度的农民要好到不知多少倍。饥饿仍然存在于美国的某些农村和贫民窟地区; 然而,它主要是营养不良和个别情况下的饥饿,而不是世界广大地区和全部历史所特有的那种涉及面广大 797 的饥荒。

知识渊博的人道主义者往往这样来回答上面的问题:

一个丰裕社会有能力为它所有的成员提供象样的最低限度的生活。

印度贫穷得不能为它大多数人民提供良好的食物和住房，这说明我们应该提供更多的外援，而不能以此为理由来支持我们国内的大得惊人的收入差距，认为这是市场在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时带来的必然结果。

§. 沉闷的科学的不能避免的规律？

我们已经讲过帕累托的观点了，他认为“人们对于不平等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造成不平等的基本力量强大到国家干预所不能影响的地步”。

在这一观点上，帕累托基本上遵循大多数古典经济学者的传统说法。牧师马尔萨斯、股票掮客李嘉图以及传播他们著作的信徒们全都认为经济学是关于不容改变的收入分配的沉闷的科学。劳动的工资、土地的地租、资本的利润系为经济规律所决定，而不是由政治力量所决定。如果工会或改良主义的政党试图利用国家来修正这些生活中的现实，那末，最终不会产生效果。在这种尝试中，他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使整个社会生产的馅饼较小一些，而较小的馅饼很可能仍然用同样的方式加以分配。试图用干扰和暴力来改变这种情况只会造成经济混乱和阶级冲突。

§. 福利国家

事实证明，李嘉图和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关于政治和经济运动规律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每一个中小學生现在都知道的那样，1880年以来的世纪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世纪。英国的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以及德国的俾斯麦，上一世纪在欧洲着手做了罗斯福和大萧条本世纪在美国加紧做的事情——即：建立现代福利国家或混合经济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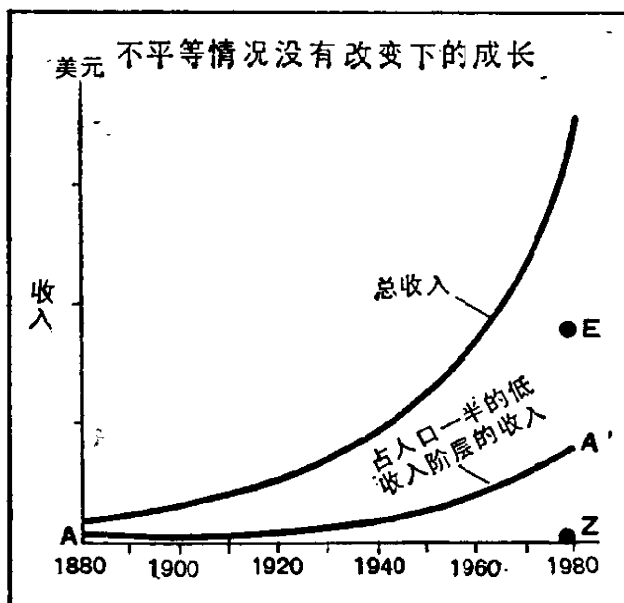
投选票时的阶级利益。回想起来，使用国家机器来改变收入分配这一政治方法并无神秘之处。在卡尔·马克思诞生以前，我们国家的创建者——特别是那些联邦主义者，如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已经是非常相信阶级斗争的人。他们担心：如果所有人都享有投票权，财产所有权会受到侵犯。由于穷人的数目超过富人，所以在所有人都享有选举权的情况下，较低阶层的人会投票反对拥有财产的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宪法要限制和平衡政府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革命以后的半个世纪，普选权受到严格的限制。

上一世纪中叶，欧洲也展开了同样的论争。象历史学者麦考利那样的辉格党人，虽然在他的时代不能算作思想反动，却为了反对普选权而提出警告说：

如果把选举权给予所有的人，自私自利的本能——即亚当·斯密指望在自由放任的经济领域发生作用的那种自私自利——很可能导致国家对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进行干预。〔尽管那时的革命者预言特权阶级决不会让无产者得到选举权，但在一国又一国，良心和宣传鼓动却导致普选权不断扩大。〕

第 40-1 图 所有阶级似乎都分享了上一世纪的进步

在先进的国家中，实际工资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向。随着资本主义让位于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已经缩小——即使只有轻微的缩小。



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或激进的政党可以赢得或者输掉将来的选举,但福利国家的机器却会保留下来:在信奉新教的挪威和信奉旧教的意大利,在英联邦成员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国内的郡县,在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瑞士和实施计划经济的瑞典,在作为斯密式乌托邦雏形的美国,情况均会如此。

一个世纪的进步。第 40-1 图简要总结了上一世纪的经济和政治的运动规律。该图下面曲线上的 A 点告诉我们:在 1880 年,占人口一半的低收入阶层所得到的远远少于社会产品总量的一半。到了 1976 年,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如果帕累托关于所得产品的相对份额固定不变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末,新的相当于 A 的分割点应为 A' 。实际工资应该大幅度增加——来源于财产的实际收入也同时增加。另一方面,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那末,经济制度会下降到穷人处于完全贫困化的 Z 点(从而,流血革命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关于一世纪以前的洛伦茨曲线,我们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C. 克拉克和 S. 库兹涅茨等经济史学者所知道的是:和不发达国家以及象香港那样的自由企业社会相比较,现代化国家和象瑞典或以色列那样的福利国家具有平等程度稍高一些的洛伦茨曲线。因此,最好假设象美国、英国或日本那样的国家现在处于比 A' 稍高的地方。通过再分配性质的赋税以及通过旨在消除条件不平等的教育机会的改善,福利国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经济向更大的平等迈进。但是,应该注意:福利国家的经济仍然远离人口的每一半都得到相同的社会总产品份额的 E 点。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该制度的辩护士说:“好得很;你看看那个圈饼,做得越来越大。”该制度的批评者说:“远不够吃的,你看看圈饼中间的窟窿。”

关于上一世纪的实际工资的长期趋向，我们具有大家同意的事实根据。在上一世纪，实际工资稳步而大幅度地增加。正如第三十七章有关技术变革的部分所说，这种资本主义和混合经济制度的运动规律正符合供求的动态因素所应导致的后果。现在福特公司的工人得到十倍于他们祖父的工资，因为他们目前的生产率使得支付那种工资成为可能。即使在东欧的学术机关，人们现在也同意：在西欧和北美混合经济中，1999年的实际工资很可能高出七十年代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到六十左右。

然而现在“好”的意思是“不够好”。越来越多的现存制度的批评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满足于现有的相对不平等状态呢？为什么在丰裕社会中容许任何饥饿存在？为什么不对贫穷发动全面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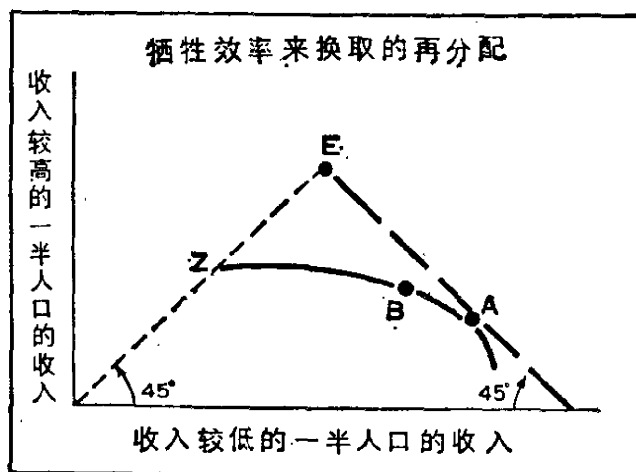
哲学家们参加了上述辩论。哈佛大学的 J. 罗尔斯在他 1971 年出版的有影响的《正义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一书中，以下列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人们可以说聚集在一起来形成一个公道的社会；其中每一人都不知道他在社会中能得到什么；但是大家都同意：如果必须提高处境最坏的人的福利，那人们的天赋权利必然受到侵犯。即使我们怀疑这种设想的社会契约的现实意义并且想对罗尔斯的极端的“极小极大”原理施加限制条件，对公道和正义的论述本身也把“不平等”问题提了出来。

§. 公平与效率

即使我们没有预卜未来的天赋才能，我们也敢打赌，福利国家会长期存在下去。无论福特那样的人上台还是艾森豪威尔那样的人上台，他都会巩固而不是取消其前任的经济改革措施。在挪威、⁸⁰⁰ 澳大利亚或英国，当社会党政府被保守党政府所代替时，情况也是这样。因此，自然要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使收入完全平等或在很大的程度上平等呢？为什么要等到 1999 年才做已下了决心

的选民今天就能做的事情呢？

无谓的负担。第 40-2 图说明其中的方便与困难之处。我们如何从目前的 A 点走到公平的 E 点？如果我们进一步提高所得税率的累进程度，则必然严重影响人们对担风险企业的投资，严重影响人们努力工作的态度。如果我们冻结物价和地租或者为工资规定最低标准，则我们会人为地影响生产和就业。保守主义者无疑地会夸大由此而造成的变形问题，然而，只有忽视现实的人才会否定问题的存在。



第 40-2 图 重新分配整个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

A 点代表在征收再分配性质的赋税以前的自由放任的后果。 E 点表示数量相同但收入完全均等的国民生产总值。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企图往往会损害积极性并且造成无谓的低效率。因此，我们企图从 A 移动到 E 点，然而，却在事实上沿着 ABZ 移动。

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制定税收和其他方案来尽量缩小 AE 和 ABZ 之间的代表无谓损失的差距。

从图形上看， ABZ 曲线向内弯曲，其原因在于国家大规模干预市场机制所带来的无谓的成本或负担^①。经验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干预造成的变形非常严重，以致牺牲一个社会阶级的利益来帮助另一个阶级的企图最终会使二者都受到损害。（例如，L.

① 经验和分析表明：除非新的体制能够有效地利用、维持和增加已经改变了所有权的资本，否则，彻底剥夺所有权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如果没有国家的或私人的创业精神，则资本不会自动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维持、更新或扩大。

艾哈德在 1948 年废除束缚西德经济的配给制和物价管制后,使每一收入阶层都大大改善了其处境——等于从 B 点或 A 点之内移动到了右上方的 $p-p$ 边缘。)

正反双方的论点。第 40-2 图故意地针对某些困难提出一幅阴暗的现实图形。人们对此有何看法? 首先,某些人会说,还是值得为均等付出代价的,因为较大程度的均等比较大程度的丰裕更加重要。(另一些人可能要对此提出异议,或者给他们泼冷水。)

其次,我们可以动员经济学的工具来尽量减少代价和变形。读者可以在 ABZ 和 AE 曲线之间画出一条新曲线。通过精心设计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的方案,无谓的负担肯定会减少,从而社会可以按照这个新的和较好的曲线来行进。例如,同冻结租金这一直接控制手段相比,向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贴从长期来看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城市问题。

§. 不平等的原因

要想减少不平等,我们首先必须找出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下面是一些有关的重要因素。

财产差别。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在 W. H. 赫斯特的父亲发现大量白银后,他的儿女和孙子辈便自动移动到财富和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从历史上拥有巨大财富的家族——其名字往往出现在各大学建筑物的纪念碑石上:例如梅隆、洛克菲勒——来看: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

财产差别在很大程度上系与单纯的运气有关,即是否交好运⁸⁰¹偶然发现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与勇于探索和勇于革新的精神有

关。现在新出现的超级百万富翁往往是象 E. 兰德那样的人。他在三十年代从哈佛退学后,坚持研究制造偏光镜的原料,结果得到几千万美元的制造新型照像机公司的股票。在《华尔街日报》和伦敦的《金融时报》中,这种由于搞革新和交好运而在大约三十年中发财致富的故事比比皆是。由于税法中存在着有利于资本收益的漏洞,认为今天的混合经济不可能使人成为超级百万富翁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个人能力的差别。某些能力可能来自遗传:在每个家庭内部存在着明显的体力和脑力的差别,而在家庭之间,根据孟德尔的遗传理论,能力的不同肯定存在。学者们往往把智力或智力商数看作是重要的因素;然而,当谈到赚钱时,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精明狡黠和目光敏锐等性格特征可能是同样重要的。(正如马克·吐温所说:“要想赚钱的人不一定要能干,但是,却必须知道如何赚钱!”)

虽然遗传能力的差别确实发挥某种作用,但一般人往往比生物学者和社会心理学者更易于夸大遗传能力的作用。我们不仅受父母遗传基因的影响,而且还受环境的影响。到了一周岁时,出身富有家庭并经双亲精心照料的孩子在经济和事业地位的竞争中已经略占上风。到了进小学一年级时,城市近郊的六岁儿童比贫民窟或农村同龄儿童具有更大的领先地位。在以后的十二到二十年中,已经领先的人越来越走在前面。

教育、训练和机会的差别。在上一世纪,减少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是由公家提供受教育机会。这是一种消除自古以来的特权制度的社会主义。在过去,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和无知群众之间的鸿沟曾是不可逾越的。

为全民提供教育的措施也开始使妇女从自古以来的大男子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如果一切就业机会均对妇女关闭,那末,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塑造的娜拉就不可能宣布独立。即使在今天,两性之间在职业上的平等也是罕见的。)

对于机会的阶级障碍。我们在上一章的种族经济学的论述中看到,教育和机会在经济上的作用是如何重要。现代经济学者的分析认为,通过教育和训练而把资本投入于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投资于厂房设备一样的。在过去,读完中学或医学院所需要的投资是穷人家子弟根本支付不起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除了有钱的显贵子弟外,很少有人能在耶鲁大学唱校园歌曲;即使是中西部的州立大学也属于特权阶层的领地。

在择优录取的制度下,接受高等教育和训练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受家庭经济情况影响的。通过领取国家奖学金或生活补助以及借入只需要偿还一部分的贷款,那些有能力从教育中得到好处的人会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不应限于专门的职业训练和高等教育:当阿巴拉契亚山区中学的几个中途退学的学生通过训练而能为计算机设计程序或操作现代化的档案储存机器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量会和以同样的钱用之于训练律师或医生一样多。802
在职人员在焊接、蒸汽锅炉、管道和其他方面的职业训练会使社会得到很大的好处,并且也有助于达到良好社会的目标。

格罗顿、耶鲁、哈佛法学院或商学院等学校的毕业生可以得到高收入,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伊顿和牛津的毕业生。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们的较高的训练水平以及注重个人能力的录取标准。然而,从历史上看,部分原因却在于机会的差别。在过去,经理们所专用的办公室挤满了名牌私立院校的毕业生,其能力并不高于州立院校的毕业生。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随着更多的录

用和升迁的客观标准的实施，企业的董事办公室和政府的内阁办公室中将会有更多的不属于圣公会、眼睛不是蓝色并且配偶不属于美国革命遗属会的先生们(而且我们希望会有更多的女士们)。

虽然在教育上的公共开支对形成较为开放的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性的影响，然而，可叹的是：并不是全部开支都能发生作用来减少不平等。因为大量证据表明，州政府的高等教育开支大都补贴了中产阶级，而不是城市和农村的穷人。对于大学生人数比世界任何地区都要多的加利福尼亚州的计算表明：州立大学(包括地区学院在内)学生的家庭收入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在公立大学中相对地缺少劳动人民子弟的现象同样存在于欧洲和不发达国家。

年龄和健康的差别。即使人们生来一样并且具有大致相同的环境，某些人也会有健康不佳的遭遇。心脏病在任何地方都可发生。精神病和心理病症并不是根据自己意愿能够避免的。饮酒与吸毒在每一阶层中均有受害者。没有人会永远年轻而精力充沛。在自由放任制度下，在经济上最需要照顾的一向总是老年人。

成功地取得充分就业比任何其他方案都更有助于消除经济匮乏和减少不平等。在工人阶级内部，失业时间的长短一向是造成经济差别的最重要的原因。

此外，如果研究人员在七十年代考察社会福利工作者在一个星期中的典型日程，那末，他会发现，所碰到的每一个由于个人健康和性格而引起的问题都因为缺乏金钱而加重。

一个喝酒成性的人可能是极端不快乐的人。但是，如果此人有独立生活的经济来源，那末，他的孩子就不会由于他难于保持一个稳定的职业而挨饿。在一个收入中下等的家庭中，母亲得了精神病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居于收入金字塔最上层的人所感觉不到的经济灾难。

现代福利国家在一定限度内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往日财产继承

权为少数财产继承者所提供的东西。我们将看到，通过直接的公共劳务和转移支付等方案，现代混合经济制度实际上是一个预防生活中最坏的经济灾难的巨型的互助保险制度。当我们看到灾难降临到某些邻居的身上时，我们都在想：“若不是上帝保佑，我也会如此”。由于认识到大家的处境相同，所以我们每四年去一次投票站，投票赞成为我们称之为社会保险、医疗补助和公共福利的互助方案而付出代价。

§. 针对贫穷和不平等的直接的方案

803

政府一向负有帮助穷人的某种责任。例如，伊丽莎白时期的济贫农场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孤儿院曾是一些著名小说揭露的题材。

私人慈善活动。很多年以前，私人慈善活动不得不起重大的、然而却是满足不了需要的作用：对贫民的救济、教会机关和施粥厂、对乞丐的施舍以及免费医疗构成幸运者支付给不幸者的一部分金钱。^①而且，早先在大家庭制度下，每一代工作着的劳动者都要照顾他们的退休后的双亲；代人看管孩子的办法那时很少为人所知，因为家里总会有一个年老的姑妈或祖母。当你在纽约或底特律定居以后，你在爱尔兰、波兰或亚拉巴马州的表兄弟会搬来和你住在一起。不受干扰地生活在那时仅仅是中产阶级的特权。

私人慈善活动从来都是不能满足需要的（不过没有它，会出现非常可怕的情形）。在今天，私人慈善活动的相对重要性已经远低于国家在福利方面的职能。下面仅仅是国家发挥福利职能的几个例子：

^① 关于被抛弃的人在三十年代的生活情况，见 G. 奥韦尔：《在巴黎和伦敦的失败者和被抛弃的人》（伯克利出版社，纽约，1956 年）。

医药保险。实物救济是社会救济最早采用的主要形式。前不久，有人说：“只有很富和很穷的人才支付得起应有的医疗费用。”然而，除了那些住在贫民窟教学医院附近而不惜降低身份、把身体提供给医学试验和示范教学之用的人以外，上面的话当然是一种夸大。如上所述，济贫农场和疯人院是最古老的公共机关中的两个。

在现代福利国家中，人们在进行这样的辩论。一种观点认为：“把钱交给人们，让他们自己去购买所需的保健劳务和食物。”另一派则说：“如果你把牛奶钱给予穷人，他们会用它来买啤酒。如果你提供实物救济，那末，你的钱在减少营养不良造成的软骨病和疾病上会发挥更大的效果。个人所挣到的钱应由个人支配，而社会针对具体困难而向个人提供的钱，则应由社会以仁慈的专制手段把它直接导向具体目标。”

争论双方都没有取得胜利。不论在瑞典还是在美国，不论在中央政府一级还是在地方政府一级，两种形式同时并存。如果没有社会医疗事业的广泛开展，则保健行业就不会在今天表现出如此强大的发展趋向。

食物的分配。美国在六十年代重新发现在这个最富裕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挨饿的儿童和成年人之后，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便大力推行食品券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凡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家庭均可得到食品券，它们可用食品券免费或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食品。由于农业部早已经常使用第二十一章所论述的各种贷款和储存方案来支持农产品价格，因而似乎应该用某些市场不需要的多余产品来赈济饥饿的美国人，赈济不发达国家的饥民。

福利补助。每一个县或城市都有一些救济穷人的机构。救济 804
穷人的计划有些是采取直接补助的形式，有些是采取转移购买力的形式。例如，在一个北部城市，一位合乎福利救济条件的三个孩子的母亲每月可以领取 \$400 现款。其中一部分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而用掉，而另一部分则要受到政府委派的福利工作人员的监督。由该福利工作人员规定用于衣服、家俱等方面的大致比例。

因为现代社会的最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所以福利方案的费用在最近几十年中也猛烈增长。因此，在纳税的公民之中存在着对这些方案的不安情绪。例如，1976 年的一次盖洛普式的民意测验表明，一半公众认为福利补助的办法具有明显的弊端。据说，有些母亲花费几百元为自己镶牙或购买彩色电视机，而这些钱本来是应该为她们的孩子购买维他命 A 的。人们不象宽容少女那样，宽容领取救济金的已婚妇女生私生子。

在福利和社会心理领域内一些掌握情况的专业人员中，也存在着对目前的福利补助的不安情绪。福利补助耗资很大，但往往缺乏效率。它对接受补助的人施加沉重的心理压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促使形成了一个代代都需要得到社会照顾的穷人阶层。对于接受救济的人，往往要求较高标准的性行为和其他行为，而这种标准就是连具有优越地位的福利补助的批评者也是难以办到的。例如，在某些州中，接受救济的家庭中的父亲会发现，他为自己热爱的家庭成员所能做的最崇高的事情就是离开家庭，从此不露面。只有这样，他的妻子和孩子才能继续得到他们非常需要的补助。（否则，他夜晚回来，福利工作人员往往会发动令人讨厌的突然的夜间检查。）

福利补助和经济效率。在许多州中，如果一个接受福利补助

的父亲得到报酬为数百元的工作,那末,接受这项工作可能使他损失数千元的救济金。即使得到的工作是稳定的,报酬高于最低限度工资,在减去他所应有的福利补助以后,也可能使他得不偿失。

从经济上看,以需要和现有收入为准绳的传统的福利补助制度含有大量的以不利于积极性的影响来衡量的隐蔽代价。实际上,数十亿元的国民产品的损失系来源于现有的救济制度的不利于积极性的结构。

纽约市在七十年代中期的财政困难可以表明福利补助方案所仍然引起的对地方财政的负担。

§. 负所得税

考虑到现有的福利方案在减少贫穷和不平等上非常缺乏效率,持不同政治见解的经济学者们一致认为:现代福利国家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自由主义者如耶鲁大学的 J. 托宾和保守主义者如芝加哥大学的 M. 弗里德曼都认为:代替或补充被我们称之为福利补助的那笔糊涂账的较为便宜和较为人道的办法,是实施
805 一项联邦政府方案,利用效率较高的税收机构来使收入与需要相适应。

实施这项方案的时机几乎已经到来了。一段时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者赞成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负所得税的办法。除了它的名称——听起来非常消极——以外,关于负所得税的几乎一切方面都是好的。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称它为“确保积极性的收入”计划。

具体内容。基本设想是很简单的。当我每年的收入为 \$ 12,000 时,我付正所得税(见前面第九章)。当我再多挣一千元时,我将缴纳更多的税款,但其数额仅为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我受到强

烈刺激争取更多的钱。

现在让我们来看处于某一贫困线——例如在七十年代中期，贫困线的标准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6,000——以下的家庭。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家庭被认为是没有能力纳税的，而在目前的关于平等和按能力纳税的哲学思想之下，我们的民主政体认为，它们应该得到政府的补助。简言之，这种补助是一种相反方向的赋税——即负所得税。

以下是负所得税能够保持人们的积极性的原因所在。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只有失业的人才贫穷，或者，只有没有父亲的家庭才贫穷。统计数字表明，很大一部分穷人是有工作的人——即那些不能在市场上挣得今天所谓满足最低需要的收入的人。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孩子被认为有资格得到政府的帮助。

然而，如何向他们提供补助而又不妨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在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负所得税优于一些福利方案。在一些福利方案下，人们即使得到一个劣等工作，也会马上失掉一切补助。（对于这一点，那些得到补助的人当然知道得很清楚，从而不利于他们改善其经济状况。）正象正所得税着眼于使收入在\$12,000和\$13,000之间的人具有积极性来改善其经济状况一样，负所得税也着眼于使穷人在他们利用自己的努力得到\$1,000元的收入或甚至一元的收入以后，能提高自己的收入。即使当他们的总纳税额为负数时，他们的边际税率也总是一个小于1的、数值为正的分数。（第40-1表说明了这一点。）

可能的方案。第40-1表说明典型的负所得税的内容。表中所列举的关于四口之家的数字可以很容易地加以修改，使之适应家庭成员较多或较少的情况。当然，当国家比较富裕，从而有能力 806 较为慷慨时，该方案的起点可以提高，同时，贫困线水平的提高不

但可以用现有的货币来衡量，而且还可以用购买力不变的货币来衡量。

第 40-1 表 负所得税规定
最低收入水平，同时保
护积极性和管理效率

收入高于规定的贫困线，人们自然要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多纳税。收入低于贫困线，则应得到转移支付——即实际上的负所得税。应该注意：第三栏的数字表明积极性受到保护：个人努力挣钱总是有助于提高个人实际得到的净收入。

可能的负所得税方案		
私人挣到的收入 (纳税为+；得到补助为-)	税款的代数值	纳税后的收入
\$ 0	- \$ 3,000	\$ 3,000
2,000	- 2,000	4,000
4,000	- 1,000	5,000
5,000	- 500	5,500
6,000	0	6,000
7,000	+ 500	6,500

负所得税有许多非常值得称道的：

1. 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目前的挫伤积极性的福利补助。
2. 它有助于使各地区之间的最低福利水平趋于相等。
3. 它使穷人较少地蒙受屈辱。
4. 它可以直接由国内收入署管理。^①

§. 新微观经济学

在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经济学仅仅研究能为货币尺度和市场价格所衡量的物品与劳务：玉米、布匹、熟练劳动小时和化肥的数量。于是，正如第三十二章对包括计划经济社会在内的价格决定所作的鸟瞰那样，经济学者学会了如何描述非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

“但是”，有人说：“生命中最可贵的东西是不要钱的——如果要钱的话，那也不能用经济学的若干元、若干分或边际效用计算。

^① 关于负所得税的进一步的论述，见 P. A. 萨缪尔森：《经济学选读》（麦格劳-希尔公司，纽约，1973，第七版）中 J. 托宾和其他人的文章。

母爱的价格为多少？上帝每天只给我们二十四小时，一生只给我们七十岁左右。关于下面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时间、爱情、结婚、子女、犯罪和正义，经济学能说些什么呢？”

在十九世纪，T. 卡莱尔和 J. 拉斯金等道德学者曾一致谴责以牟利为动机的社会。诗人华兹华斯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情感：

贡献出你所能贡献的一切；而崇高的天堂会排斥那种学问
它致力于精心计算出少一份或多一份

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它也越来越能对自私自利的纯粹牟利动机表示不满。在目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正是这些生活的非物质的方面。

时间经济学。第二十二章论述了精明的消费者如何把他有限的收入分配给食物和衣服等物品，一直到用之于每种物品的最后一块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时为止。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曾举了学生们如何把有限的时间用之于各种不同课程的一个例子：只有当用之于英文的最后一分钟所带来的对于英文的理解和分数的边际好处正好等于用之于历史的最后一分钟所带来的边际好处时，你才能达到最优的均衡状态。

芝加哥大学的 G. 贝克尔曾经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试图以最经济的方式利用时间。如果我们已经退休并且养老金很少，那我们会花费很多时间去购买便宜货；同时我们会发现，最好是购买加工不多的食物而利用我们的不值钱的闲暇时间自己动手加工。与此相反，如果你是一位薪金丰厚的职业妇女，那末，你的合理的节约时间的方式是在高级的具有较多售货员的商店中购买物品；你用电话订购食品杂货，为了送货上门而付出代价；你的餐巾用一次便扔掉，早餐用的玉米片使用非常昂贵的一人一份的铝箔包装。你

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计算错误,而是为了适应竞争所作出的合理计算和调整的后果。读者可以自己想出无数类似的合理分配时间的例子:如在家庭仆役的工资很高而且很难找到的时代中使用自动化的耐久家用电器。

这些并不是脱离传统经济学的闲扯。在这些方面早就应该让经济决策发挥效力了,而传统经济学却不涉足这些领域。^①

人力资本。在第五章论述不同职业在训练和收入上的差别时,我们看到:一国的资本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机器和砖头之中。由于教育和在职训练而获得技术的人也是一国的生产资本。在现代经济学中,分析人力资本和分析其他形式的资本形成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虽然人类的命运确实不可捉摸,但它并没有因此而不受经济原理的支配。

关于劳动事故案件的陪审团必须算出某人将来提供的劳务的“现在贴现值”。学生们在决定他们受教育的年限时需要先在心里作一番类似的计算:进入医学院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得不到收入,意味着缴纳高额的学费以及放弃目前生活中的很多乐趣;抵消这些代价的有利因素是,从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可望得到较高的收入。为了综合考虑这些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而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以便作出最优决策,我们需要进行经济分析。

有关人力资本决策的经济分析是一个永远不会得到最后解决的问题。例如,五十年代上大学曾是非常合算的事,但到七十年代

① 本世纪初,T.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当时人们炫耀富有的方式是使自己的夫人和女儿表现出一副什么也不会干而被伺候得好的样子。斯德哥尔摩大学的S.L.波伦斯坦姆在我们的时代写了一本题为《匆忙的有闲阶级》(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70年)的书。在该书中,他指出:虽然我们比过去拥有更多的物品与劳务,但我们每天享受它们的时间还是那么多。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忙得不能得到乐趣,忙得找不出时间和家里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或其他乐趣。

后期上大学就不那么合算了，因为这时大学毕业的教师和自由职业者已有供给过度的趋势。有朝一日，许多年轻人最好应该及早地离开大学，参加工作并且把他们的时间和多余的收入投资于债券和股票，而不是投资于自己未来的教育。

经济人口理论。自从1960年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经济学家现在认为，他们可以清楚地说明人们为什么想要少生孩子。是否看一次电影的决定很难和是否要第一个或甚至第三个孩子的决定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却可以用同一方法来分析人们是否要买一件象住宅或汽车那样的耐用品的决定和一对二十五岁左右的夫妇在婚后第三年是否要第一个孩子的决定。 808

第二十二章附录中的无差异曲线和正文中的边际效用原理能否说明今天的富裕家庭想少生孩子的趋向？许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者认为可以。他们认为：当收入增加时，人们通常想有更多的经济物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会要更多的孩子。然而，其他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收入增加时，父亲和母亲的业务受到干扰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如果双亲很富裕，那他们会希望以较高的质量水平来抚养孩子。然而，双亲的时间是宝贵而有限的。如果只有一个、两个或三个孩子，双亲也许还能给予高质量的照顾，但孩子更多的话，就办不到了。此外，在城市中，孩子不再象在农村中那样被当作经济资产。在现代保健事业大为改善的情况下，人们并不需要生六个孩子来保证两个长大成人，以便传宗接代和照顾年老的双亲。现代的社会保险制度照顾了老年人的生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作出了少生孩子的决定。

也许有人认为，在生与死这样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让边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等出于理性的考虑发挥决策作用是残酷无情、亵渎人类尊严的。一些人的确这样认为。但是，许多敏锐地感觉

到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的学者们认为，集中一切描述方法来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实际行为是有用处的。由此证实了这样一条克雷孟梭式的格言：“社会学重要得不能让社会学者单独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R. 伊斯特林提出了下面一个大胆的假说，来解释出生率的变动：

四十年代中期和末期结婚的年轻夫妇在经济条件上要比他们的父母优越——部分原因是：在五十年代，达到结婚年龄的人很少。所以，他们在战后生育了大量孩子，以致二十年以后，年轻人的供给量大大超过了需求量。这些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穷，经济保障也较少。因此，他们生的孩子较少。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出生率会再次升高。同时你会理解，为什么伊斯特林教授认为，当某一农村地区被开发完毕，从而作父母的不再期望地价上涨，也不再期望有养育众多子女的机会时，出生率会下降。

对于经济学者的人口分析的检验是分析的实用价值，看它是否有助于作出良好的预测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现象作出良好的解释。

法律经济学。连法学也不能免受经济学者的入侵^①。保证不犯错误是好事还是坏事？通过法令来禁止一家工厂在某一区域排放烟尘是较好的办法吗？或者，较好的办法是根据该工厂向大气放出的烟尘量而向它征税？或者，更好的办法是让健康或财产受到烟尘伤害的人具有控告该工厂的权利？

为了弄清上述各种方法的优劣，我们可以进行经济分析。可以利用经济学来解决的其他法律问题甚至关系到生与死的问题。例如，当名叫反应停的安眠药首次在市场出售时，谁也没想到，孕妇服用该药品会生出畸形的婴儿。不论在我国还是在其他国家，

^① 见 R. A. 波斯纳：《法学经济分析》（利特尔和布朗公司，波士顿，1973 年），该书是一本企图把经济分析方法引入法学的有影响的教科书。

人们都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制药公司给予赔偿。于是,颁布了禁止制造和销售该药品的法规。所有这一切似乎都非常简单。

然而,经济学者和统计学者指出,问题要比法官和议员们想象的复杂。当你严格控制新药的销售时,你可以避免有害药品的出售。但是,在避免一种错误的同时,你很可能犯另一种错误:严格的药品管理规章会推迟某些好的新药品投放市场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造成某些人在药品规定不严格时可以避免的死亡与疾病。严格的药品管理规定还可能阻挠厂商研制急需的新药,因为厂商害怕出问题后承担责任。

寓意之所在并不是经济分析要我们制订宽大的药品规定,而是告诉我们:在努力搞好药品管理时必然会犯两种错误,我们应该权衡其轻重。我们必须对不可避免的风险作出明智的计算从而尽可能得到最优折衷方案。每一个对人类有利的事物总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良反应;完全避免风险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听任厂商获得暴利来销售人民群众和医生还没有看到其害处的药物,则是对自由放任的滥用,没有把获得最大利益当作争取的目标。

甚至对犯罪与惩罚也可以进行经济分析。犯罪合算吗?如果没有警察和法庭,也不对犯罪施加惩罚或设置障碍,那末,较多的人会由于从事违法活动而得到报酬。另一方面,如果使用坚固的锁、民间或政府的守夜者警惕性很高,如果逮捕归案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审判迅速而陪审团和法官又被认为能准确地区别真正的罪犯和无辜的人,那末,以取得报酬为目标的犯罪活动则可能完全消失。

仁爱和利他主义经济学。从伦理上研究对与错的经济学流派被称作福利经济学,该流派已对慈善与自私那样的主题作了许多论述。有一句被认为是来自经济学的令人讨厌的和空洞的老生常

谈：“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我们要求人注意：你不能建造一座市政大楼而不消耗掉本来可以用之于别的用途的资源时，上面的老生常谈也还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它也忠告我们，路不相识的人通常不会给你一张百元的钞票。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学说意味着每个人都自私自利透顶，从而管理社会的唯一方法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那它便不是一个可以被经济科学所维护或反对的科学命题。

每个活着的人都曾经是靠人照顾的婴儿。如果在生命的头十年，午餐不是无代价的，那人类便要绝迹。陈旧而错误的达尔文进化论的说法把生存斗争完全强调成为自私自利。现代的达尔文主义者，如哈佛大学的 E. O. 威尔逊在他 1975 年出版的《社会学》教科书中完善了进化论。他坚持认为，有来有往的利他主义在进化中是有其价值的：父亲或母亲会为了救出孩子而牺牲自己，从而，这种非自私自利的行为使他们的遗传基因能存在下去。关系密切的家庭是相互提供帮助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有其实用价值，而且还有其存在价值。由于选民们知道任何人总有可能处于失业、穷困、疾病和年老求助于人的境况，所以建立起了实施全面社会保险的紧密结合的社会，这种社会从长期来看，将压倒那种由自私自利的单干者所组成的社会；自私自利的单干者只要能在竞争的市场蒙混过去便会把沙子掺进食糖里去，他们在整个一生中只考虑到个人的利益。

归根结蒂，不是希腊字的爱情（这是另一回事）而是博爱意义上的爱构成业务关系和经济原理的实质。虽然如此，当已故的剑桥大学的 D. 罗伯逊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他选择的题目是：“经济学者寻求的最经济的办法节约的是什么？”他使听众惊奇地听到他的观点：社会所必须节约的是“爱”，因为它是如此重要而又是如此缺少。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依靠市场和

法律，以便节约有限的被用之于不再重复和短暂的社会需要上的仁爱情谊。

§. 环境污染

在今天的城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现代生活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一般环境的污染。洛杉矶天空上的烟雾是其他城市即将遭受同样命运的先兆。在纽约、巴黎或东京，已经再也见不到碧蓝碧蓝的天空了。

马克·吐温说过：“人类是唯一能感到羞耻的动物——也有必要如此”。人类也的确是唯一能污染大气层本身的动物。二氧化硫和烟尘毒化了每一城市的空气。工业革命使二氧化碳集中于大气层，从而改变了世界气候。某些科学家认为，铅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将越聚越多这一不可逆转的过程很快将成为普遍性的问题。核试验带来了铯 90 和放射性物质。钴弹能够消灭人类，摧毁地球，这并不是老太太为了吓唬小孩编造出来的故事。甚至噪声也污染城市。

外部负经济效果。这里是我们在上面的“外部负经济效果”的标题下所看到的一个事例。最令人失望的诊断是：最终汽车将是造成烟尘的主要原因。工厂可以建造高烟囱并且燃烧无硫的燃料。只要露天开采煤矿破坏自然景观并无法加以恢复，国家就可以禁止采用这种开采方法。对河水的热污染可以通过颁布分区条 811 令和建造昂贵的冷却塔来加以控制。但是，要想剥夺近郊的居民每天驾驶汽车上下班的天赋权利，则显然是现代的选民所不能容忍的。

如果消费者不愿为减少空气污染所必需的附加设备掏腰包，那我们怎么能期望汽车制造商来解决污染空气的问题呢？这就象

要求香烟制造厂自行关门一样。

依靠企业的自发行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无效的？经验给予了悲观的答案。不过有一个事例提供了一线希望。流入下水道的洗涤剂会不断形成泡沫，从而污染一切河流和地下水。环境保护者为此大喊大叫。结果获得了圆满的终结，该行业的同业公会资助了有关的化学实验，最后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该行业自己的规定，每家厂商均采用了新的配方，所以我们在许多年中再也没有听到这个问题。（然而，以后又冒出了磷酸盐的问题！）

但愿滴滴涕对野生动植物的污染问题（已故的 R. 卡森曾非常令人信服地描述过这种污染）也令人满意地得到解决。但愿人们研制出理想的蓄电池或蒸汽机来消除内燃机带来的烟雾和一氧化碳。

§. 政府法令、赋税和计划

由于利润追求者不会自觉自愿地、而且也确实没有力量来解决牵涉到“外部经济效果”的问题，所以很明显，政府应该进行某种干预。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议会威胁要在 1975 年禁止使用一切内燃机，这可能促使汽车制造商采取了行动。对排烟的车辆和工厂，国家应课以重税。此外，消费者也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要老是咒骂发电厂把含硫量很高的柴油作为燃料，而当发电厂由于消除硫质或购买较为昂贵的含硫量较低的燃料而提高电费时就有意见。

无数例证说明，国家确实应该制订交通规则。由于听任污水和化肥流入伊利湖，该湖已经成了死亡之湖。当初为了防止工业和其他方面的污染，国家不仅应该想办法提高沿湖地区的生产成本，而且不应听任农民想使用什么化肥就使用什么化肥——因为残留的化肥会通过小溪与河流而流入伊利湖。也不应容许农民和厂商任意打自流井，因为无限制地使用地下水会使我国许多地区

的地下水位处于危险的低点。

§. 能源危机

一百年来,为了维持先进国家的富裕生活,数百万年中形成的富饶的矿物燃料遭到了掠夺。不能再生的优质的铜矿和铁矿以及其他金属矿藏和森林已经最先被消耗净尽,迫使人们依靠低质原料来源。未来学者曾警告人们,如果不停止这一过程,将无法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但几乎没有人听从这一劝告。⁸¹²

于是,多少由于偶然原因,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在1973年把石油价格提高了三倍。这时人们才突然感觉到确实有必要节约过去大肆浪费的稀缺而不能再生的能源。数十年来第一次,实际收入水平在七十年代中期停止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必须为石油及其代用品支付较高的价格,同时也是因为亚洲、欧洲和北美连年歉收耗尽了世界粮食储量,使粮食价格上涨。

造成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三个具体原因是:一、整个世界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一点五转移给了波斯湾国家和其他产油国;二、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了生产并输出需求量很大的农产品的国家;三、周期性的恶劣气候使粮食减产从而造成了无谓的收入损失。第三世界即不发达国家的粮食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化肥和灌溉都需要大量的能源。

人们适应能源短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短期来看,人们不得不求助于爱国口号,不得不在加油站门口排长队。许多家庭自动取消星期天的驱车出游,降低室内温度并且力图 and 别家合用一辆车上下班。从长期来看,人们不得不忍受较高的能源价格。由于汽油价格升高,较轻便和较省油的汽车将受到欢迎。建筑师们将不再建造绝缘性能较差的房屋,并且将从尽量减少供暖、空调和照明设备的角度来从事设计。

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依靠煤炭——而煤炭的价格也会因此而上涨。在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人们会把老油井打得更深，而且在国内寻找新的油矿将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人们将考虑开发新的能源：在西部露天采煤，从页岩中炼油，从含油沙中炼油，利用风能和太阳能，更多地依靠核裂变原子能，以及加紧研究控制核聚变的方法以获得更多的能源。

甚至生态学标准和安全标准也由于新出现的能源短缺而受到了影响。增加内燃机耗油量的汽车排烟标准往往被降低。发电厂被准许使用含硫量较高的油和煤，即使这会对空气的纯洁造成某种威胁也在所不惜。由于人们要求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核裂变发电厂发生意外事故的危险往往被忽视。迫于能源的缺乏，在人口稠密的近海钻探石油势在必行。

不仅城乡贫民和拥有价格不断上涨的能源的所有者之间的福利分配受到影响，而且某一国家内部的福利分配也受到了影响。类似美国东海岸那样严重依靠进口石油的地区损失最为严重。向大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的方案在政治上受到反对，因为需要较高的价格来诱导出较多的供给，从而打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

政策的选择。取消对能源价格的控制会逐渐减少价格控制造成的痛苦和不安定。正如亨利·乔治向纯粹地租征税那样，政府征收暴利税并不会影响人们探求新油源的积极性。当世界价格相对低廉时，政府应该补贴石油进口和储存，这有助于对付国际政治斗争和经济利润动机导致的石油禁运。

引起人们较多争论的一种意图是：应该以牙还牙，用消费国卡特尔（即经济学者所说的买主独家垄断或买方垄断）来对付卖主垄断。如果美国国务卿在国际会议上和石油输出国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我们同意按照会议规定的最低限价购买石油，而它们则可以随

意以高于会议规定的最高价格出售石油，那末，这种谈判是危险的。

玛丽亚·安通纳特闻名于世，是因为她说过这样一句关于穷人的蠢话：“让他们也吃上蛋糕。”我们今天经常听到这样的劝告：“让那些出口其他原料的非产油国也建立起成功的输出国组织来以较优的价格出售它们的产品。”这种说法同样是非常愚蠢的。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建立和维持一个成功的卡特尔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棉花、可可、食糖、咖啡、铝矾土以及其他产品并不一定象石油那样，也具有建立卡特尔的条件。

某些人可能认为，能源危机也许是将来较大的危机的先兆。世界是否面临着经济增长的极限？对此，现代经济学者必须有所警惕。

§. 困难的抉择和自然的生态学

我们在论述经济净福利（即第 1-1 图和第 10-4 图所表明的 NEW）时看到，我们超过一万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虚幻的。当我们最终不得不为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付出代价时，国民生产总值恐怕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这并不是我们是否有能力用税款来支付耗资巨大的政府方案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非得实施这些方案不可。

正如在一切有关公共利益的事例中一样，这里也有利益冲突。如果达德县在埃弗格赖兹国家公园附近修建喷气式飞机场会影响那里的野生动物，那末，是否允许它修建机场？如果狄斯耐公司在塞拉地区修建一个冬季滑冰和娱乐场所意味着破坏该地区传统的、宁静的自然环境，那末，是否允许它这样做？或者，用一个较小的例子来说明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如果让波士顿附近的一个小城市保持乡村的宁静会使波士顿的拥挤的人群的娱乐活动受到限制并且被迫而拥挤在人行道上或邻近的几个海滩上，那末，是否允许它保持这种状态？

814 我们无法简单而科学地解决这些冲突。现在和将来活着的人总是要评价历史的。摧毁一切优秀历史建筑并破坏田园景色的社会肯定要受到诅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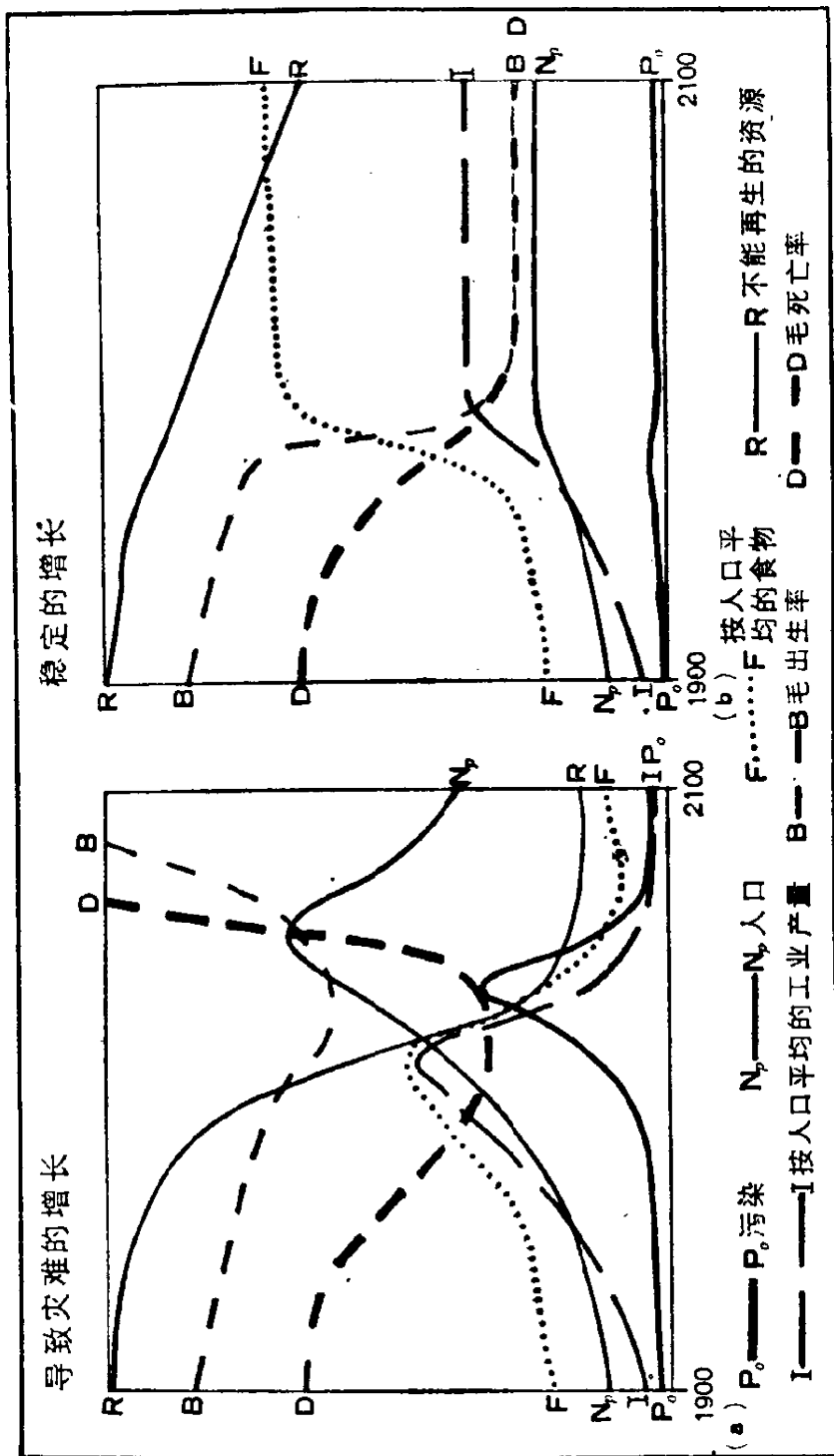
现代经济学告诫我们,人口过多带来的灾祸并不单纯表现在马尔萨斯所说的收益递减造成的食物短缺上。人口过多还使个人生活受到干扰,居住面积越来越小。现代科学技术还没有解决我们全部的经济问题,也没有使稀缺规律失灵。恰恰相反,在本世纪剩下的年代中,亟须解决的问题正是这些有关人类生活质量的问题。

§. 零值人口增长? 零值经济增长?

在各先进国家,舆论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不再鼓吹为增长而增长了。零值人口增长甚或零值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人民的欢迎。R. 卡森、P. 埃利希、B. 康芒纳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家曾警告人们:文明人的生活必须立足于自行维持、循环往返的基础,否则,生态学上的灾难便要降临于人类。

好的育林人边伐树边种树。好的农民使土壤的肥力循环周转而不变。好的采矿者必须使露天采矿破坏的土层复原。同样,现代经济社会必须净化它所弄脏的水和污染的空气。值得庆幸的是:正如 R. 杜波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给予大自然以机会,那它会具有巨大的复元力量。西雅图市附近的华盛顿湖不久前还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但禁止污水和化肥流入以后,已经开始自行净化了。

J. 福雷斯特的《世界动态学》(1971 年)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罗马俱乐部的由梅多斯和其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1972 年)已经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一般群众同意这两本书中的大部分观点,而经济学界则批评其中的很多观点。第 40-3 图是利用计算



第 40-3 图 在自满自得和杞人忧天这两个极端之间,这些计算机的计算结果应该置于何处?

(a) 高出生率 (BB 曲线) 无情地导致资源曲线 RR 下降和日益严重的污染 (P_o, P_o)。结果: 按人口平均的食物随之

而减少 (FF), 工业产量随之而下降 (II)。

(b) 右图通过零值人口增长和零值经济增长得以避免灾难。转移到不消耗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劳务。如果数以十亿计的穷人人口平均分享被稳定下来的世界产量, 那末, 美国的生活水平必须减半和再减半! 象这样的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含有多少伪科学成分和常识成分?

[资料来源: 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1972 年)。原图故意没有标明轴上的数字以表明预测是不精确的。]

机得出的结果,可以表明福雷斯特和梅多斯的方法论和建议。

在这里,马尔萨斯重新出现。但是现在,简单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已经分别变成了有关生物增长的指数微分方程和与之相对立的被假设为固定不变的总资源的最高限量。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C. 凯森的话来说:“那是喊叫‘狼来了’的计算机”。另外一些不太客观的批评者则使用程序编制者的术语,把福雷斯特和梅多斯的计算方法斥为“垃圾进、垃圾出法”(即:不正确的前提导致出错误的推论)。对于这些研究的内容不作公平的和建设性的分析便加以否定,就等于忽视它们对现代头脑所肯定具有的吸引力。

在左方的第 40-3(a) 图中,我们看到所说的污染的增加、自然资源的枯竭以及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的不可避免的下降。这些正好与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第一版(1798 年)中提出的看法相似;在该版中,他认为当时的趋势是不可扭转的。然后,在右方的第 40-3(b)图中,正和在《人口论》以后的版本中一样,我们看到,一旦人类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禁止一切人口增长,禁止一切净资本形成和生产增长,致力于食物和劳务生产以及资源的再循环,人类便能避免自己的命运。

815 有时,矫枉必须过正。杞人忧天可以为自满自得提供解毒剂。很少有人深入了解福雷斯特和梅多斯两人著作中的方程和资料来源以后能够同意,它们合乎事实地描述了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不仅具有概念上的缺点和事实的不准确之处,而且还几乎完全忽视了稀缺会改变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的改变又会推动代用品出现从而减少稀缺的程度。虽然如此,他们的确指出了人类即将面临的一些问题。

利益的冲突。对于那些没有居住在象北美和西欧那样幸运的

地区的人们来说，把他们的实际收入冻结在目前的水平是不能令人容忍的。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说法：美国人和欧洲人会放弃他们目前实际收入的一半以上从而使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提高到能容忍的最低水平。谁都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

在国际会议上，不发达国家把关心污染看作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正如上面所说，它们仍然要发展造成污染的工业。

816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瑞典抱怨俄国人污染波罗的海。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解决污染问题固然幼稚，但认为社会主义助长污染也是荒谬的。使得俄国人认为他们支付不起瑞典人那样的方案的原因，在于前者的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少于后者。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污染问题上并不起重要作用，我们应该指出，瑞典也有理由对芬兰表示不满。后者也是一个较贫穷的国家。

R. 海尔布伦纳非常形象地把问题摆了出来^①：

在我们这个叫做地球的太空船中……生命的延续要求太空船供养生命的能力必须和船上居民的需要保持精确的平衡。……如果有人认为全人类都应达到美国和欧洲按人口平均的资源消耗和排放三废的水平，那我们的需要将远远超过太空船供养生命的能力。坦率地说，如果我们把乘坐太空船北半球的旅客的资源消耗当做头等舱船票的价格，那末，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其他人势必要永远乘坐……二等舱的状态。也可以说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要把该太空船改为无舱位等级区别的旅行工具，那末，头等舱的旅客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生活习惯。

回到简单的生活？象 B. 康芒纳那样的生物学者和象乔治索鲁岑那样的经济学者已在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回到较简单（但仍然舒

^① R. L. 海尔布伦纳：《生态大决战》，载《纽约书评》，1970年4月23日。A. V. 尼斯在《未来资源的利用》一文中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有这些环境方面的外部负经济效果的情况下，必须征收赋税，采取惩罚性措施，划分工业区和住宅区，限制土地利用以及规定废物排放量。W. 海勒提醒我们，成本和效果必须保持最优的平衡。从人类的能力来看，使赫德森河干净到能安全游泳的程度很可能是不经济的。同样，在发明了滴滴涕以后，为了使游隼不致绝种而使数百万亚洲人由于疟疾重新蔓延而死亡则可能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悲剧。

适的)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们依靠的是取之不尽的太阳能,而不是过去的阳光所形成的不能再生的矿物燃料。人们将走路较多,乘车较少,把树当作粮食来种植。最重要的是:人们来到世上时的环境怎样,离开时的环境仍然怎样:原来是灰烬还是灰烬,原来是尘土还是尘土。

§. 稀缺性何时終了?

加尔布雷思过早地宣称稀缺性已经不复存在。实际上,J. M. 凯恩斯在三十年前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1930年,凯恩斯曾对未来作过如下预言。^①

假使一百年后,我们大家的景况……比今天……好八倍。……假设没有大规模战争,人口也没有很大增长,则经济问题便可得到解决……这意味着:经济问题不是——如果我们向前看的话——人类的永久性问题。

817 你也许要问,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其意义确实非同寻常,因为——如果我们不向前看而向后看的话——我们发现,经济问题迄今一直是人类的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仅对人类,而且对包括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在内的整个生物世界都是如此。

在大自然中,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我们不断演化——包括我们的一切冲动和最内在的本能。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人类便丧失了它传统上的目的。……我怀着惧怕的心情来设想普通人对无数世代遗传下来的习惯和本能加以调整,要求他们在几十年之中把传统的习惯和本能抛弃。

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大家是不是都要“精神崩溃”?……这样,人类自从出现以来将第一次面临其真正的、永久性的问题——如何利用他摆脱日常的经济烦恼后获得的自由,如何利用科学和投资的复利带来的闲暇,以便能明智地、愉快而美好地生活。……

我们必须预料到,其他方面也会发生变化。当积累财富对于社会来

^① J.M.凯恩斯:《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转载于他的《劝说集》(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33年),也转载于P.A.萨缪尔森:《选读》,同上引书。

说不再重要时，道德规范便会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将会抛弃二百年来我们死死抓住不放的许多虚伪的道德准则，受这些道德准则的支配，我们曾把人类的某些最恶劣的品质吹捧成最崇高的美德。……爱钱成癖——不同于享乐，为了在现实世界中生活而爱钱——会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它是一种多少有点令人厌恶的病态心理，是一种触犯刑法而由疾病引起的癖好，是人们颤抖着请精神病专家医治的病症。

但要注意！实现所有这一切的时间尚未到来。至少在今后一百年中，我们还得欺骗自己，欺骗每个人，把善说成恶，恶说成善；因为恶是有用的，而善并不如此。在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还得把贪得无厌、重利盘剥和处心积虑奉为神明。

……瞻望未来的命运……我们不要过高估计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经济问题应由经济专家来处理——象牙医那样。如果经济学者能够这样来处理问题，使社会认为他们只是一些平凡而又能胜任自己工作的人，就象牙医所处的地位一样，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总结和复习

1. 当经济上的不平等不能起任何经济作用时，具有伦理观的观察者便批评不平等的存在。即使它起着某种作用，这种观察者也愿意为了减少不平等而付出代价，牺牲很多效率。现在，由于处于在一定程度上超过最低限度生活的丰裕状态，公民们坚持要所有人都享有某种最低生活水平。

2. 与帕累托有关的认为不平等程度是普遍存在的常数并且不能为政府所改变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经验的。从洛伦茨不平等曲线上可以看出，先进国家生活水平的差异要小于不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差异。正如美国的创建者所预料的那样，密斯所说的自私自利再加上普选权导致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实施各种各样的相互保险性质的社会保险计划。

3. 不平等主要是由以下诸方面的差别造成的：(a)财产所有 818

权，(b)个人能力(来源于环境和遗传)，(c)教育、训练和机会以及(d)年龄和健康。正在消失却仍然在我们之间存在的一种信条是：如果人们穷困，其原因在于自己；而私人慈善事业可以帮助人们克服生活上的不幸。

4. 许多世纪以来，公共政策一直提供疯人院和医院、济贫农场和养老院以及饥荒和萧条时期的各种形式的专门救济。但是，只有在现代，国外的混合经济才实施范围广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和医药保健计划。消除贫穷的战斗仍在继续，但要实施某种形式的负所得税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5. “新微观经济学”把对非物质的基本生活问题的研究带到政治经济学之中：对时间和人力资本进行经济分析，利用边际效用和选择等理论工具来解决家庭人数和人口等及其重要的问题，对法律和犯罪活动进行经济分析，研究在社会组织和达尔文式的生存中的利他主义和社会共有。现代经济学超越了金钱的狭小范围。

6. 石油输出国组织使油价四倍于往昔改变了世界上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在较高的价格的压力之下，过度地使用能源让位于节约使用并且使人们利用可供选择的能源——国内的油井、煤炭、原子能以及某些非传统的能源，如页岩油、沙油、风和阳光。如果人类能找到控制核聚变的方法，并重新采取能在较大程度上自我维持的生活方式，则将减缓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枯竭。

7. 为了能在叫做地球的拥挤的太空船上生活下去，有人提出了零值人口增长和零值经济增长。烟雾、空气污染以及水污染使我们留给子孙的地球成了不毛之地。烟雾和空气污染可以改变世界的气候。水污染是由污水、工业三废、化肥、洗涤剂以及原子能发电厂和其他电厂的废热造成的。这种“外部负经济效果”不可能被竞争和利润追求所纠正。因而政府必须把工业区和住宅区划分

开来,颁布各种法令和禁令,实行计划和调整,给予补贴以及采取赋税惩罚措施。国民净福利的计算表明:我们的丰裕程度并不象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数字所表示的那样。

第四十一章 混合经济中的 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

没有任何由经济学专家组成的顾问团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找到医治“停滞膨胀”这一现代疾病的令人满意的方法:许多开出的药方和疾病本身一样不可取。由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哪位年轻的经济学者能够在经验研究或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帮助混合经济较为有效地医治这一造成痛苦的病症,则他将荣获诺贝尔奖金。

保罗·A. 萨缪尔森

从凯恩斯以前的时代以来,现代宏观经济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第二编中,我们看到,为什么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今天可以避免过去那样的萧条。世界已不再为发现金矿的偶然事件所支配;这种事件在一个时期曾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在另一时期则导致国内外流动资金的长期不足。

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许多有可能解决的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例如,不论在列宁和 R. 卢森堡的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是如何真实,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中,混合经济的繁荣肯定不再取决于冷战的开支。)

但是,仍然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经济学仍然有待于解决“停滞膨胀”问题——生产与就业的停滞和爬行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存。专家们还不清楚,制定怎样一种“收入政策”,能够使我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之创造购买力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同时并存。

§. 繁荣与战争开支

我们首先处理掉一个容易的问题，以便为论述困难的问题扫清道路。

“资本主义只能在战时才有繁荣。只能在那时才有充足的就业机会。在正常的和平时期，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总是把太多的钱给予储钱的富人，把太少的钱给予消费大众。因此，即使在和平时期，资本主义也策划一笔冷战开支。它会为了向国外投资而寻找帝国主义的冒险事业，以便尽量维持国内不断下降的利润水平和销售量。不发达世界会暂时为资本主义提供它所需要的延缓危机的市场。”这就是七十年前经常被宣扬的论点。

在今天，甚至克里姆林宫中的专家们也认为，这种论点不再是正确的了。选民们已经吃了有关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智慧之树的果实，从而决不可能回到凯恩斯以前的时代。为了避免一国的银行体系由于挤兑而关门，如果其全部代价仅仅是印刷一些纸币，那么，我们敢肯定，人民的民主政权会坚持做到这一点。弥补巨额预算赤字的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总是能够避免 V. I. 列宁和 R. 卢森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之如此担心的永久性的购买力的停滞不前。 821

回到第十八章。在第 18-1 图中，考察货币政策为何能刺激 $C+I+G$ ，使它达到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水平。同时，复习第 18-2 和 18-3 图。它们说明，预算赤字——降低税率或增加 $C+I+G$ 中的 G ，或二者同时并举——为何能抵消自动化和节约劳动的技术革新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

正确的乘数分析。任何懂得宏观经济学的人都可以理解：在印度支那和中东花钱所能完成的目标都能通过在国内花钱于有用的事业上而得以完成，甚至完成得更好。建造导弹和核弹头不是会提供就业机会和引起一系列次级的、成倍增加的再支出吗？那末，同样的结果也存在于建造新工厂，修建道路和学校，净化河流

以及向老年人和残废人提供最低限度的收入。除了初级的和一系列次级的货币支出额以外,我们还得到干净的河流、有助于生产的学校和工厂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平等持久性的好处。通过进行经济分析和考虑社会的急需,你应该能断定下列哪一个项目会轻而易举地赢得多数人的赞成:(1)甚至永远没有必要飞离基地的轰炸机中队;(2)减少痛苦和延长生命的医院。

为了检验你对这一切的理解,画出两张图形。第一张图形表明“和平到来”的情况。在该图中,使 G 从而使 $C+I+G$ 向下移动。失业会暂时地增长。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表明扩展性的预算政策如何会使 CC 和 G 向上移动,同时也可以表明货币政策如何会使 II 向上移动。简言之,我们画出一条新的较高的相交于 FF 充分就业水平的 $C'+I'+G'$ 曲线,正如第18-3(b)图所示。

结论: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现代混合经济制度是维持得了和平的。自从1950年以来的两个奇迹式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都是战败国,受到条约的限制,不把它们资源浪费于军事开支!这可以说明,每一个混合经济制度都具备宏观经济学的知识来在国内创造充分就业所需要的购买力,而不需要战争。选民们也向政府——不论共和党政府或民主党政府、保守党政府或工党政府——施加压力来使用这些已知的财政和货币的工具。

政治上的限制条件?当这些经济学上的原理被理解以后,人们往往会提出一个问题。“在政治上,把钱花费于有用的和平时充分就业的项目的紧迫性是否会象把钱花费于热战和冷战的目标的紧迫性那样大?”

在五十年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应该的。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从那时以来的经验已经证明,现代的选民对于过去认为

不太严重的失业水平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确实在投票选举时向他们的政府施加有效的压力。

虽然如此,可叹的是:在美国和(在较少的程度上)其他国家确实仍然存在着失业问题。但是,七十年代折磨美国和西欧的失业问题并不属于那种可以正确地被认为起源于不能创造出购买力的类型。我们将要看到,成本推动的(或卖方的)通货膨胀这一新问题造成了“停滞膨胀”这一错综复杂的困境——即: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

§. 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个幽灵在整个混合经济制度中游荡徘徊。一国是否能同时享有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或者,是否存在着必须在高度的充分就业和合理的物价稳定之间作出抉择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充分就业是否一定导致爬行的通货膨胀?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在现代混合经济中,除了人为地造成失业和故意地形成衰退以使经济冷却下来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

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我们是否需要一个被称为“收入政策”的新事物来加强和支持宏观经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如果这种需要当真存在,理想的收入政策又是什么呢?政府直接控制物价和工资?总统公布非强制性的工资和物价控制指标?或者,制定收入政策的目标仅仅是奢谈和幻想?

科学所不知道的东西。存在着问题、问题和又一个问题。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在大多数的篇幅中都能作出干脆利落的论断:那是对的、这是错的;某些问题仍然有争论;等等。但是,任何学科的第一位的职责便是说明真相。处于目前的医学水平,如果某种类型的癌症无法治好或甚至无法控制,那末,一个好医生的第一位的

职责便是面对事实,公开承认科学知识和医疗的限度。

因此,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职责是表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处于目前的关于现代混合经济的知识水平,没有任何由合格的经济学者组成的顾问团能够在如何构成一个可行和最优的收入政策的问题上取得大致相同的意见。

思想的几个极端。顾问团的少数派(主要为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会否定制定收入政策的必要性,否定任何问题的存在;他们坚持认为:即使真的存在这种问题,任何收入政策也不会生效,而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另外一个少数派(主要是J. K. 加尔布雷思的追随者)持有同样简单的观点。“在战时,我们通过制定最高限价和法令来控制物价和工资。和平时期和战时是一样的。对于工资所造成的爬行的通货膨胀以及伴随在一起的寡头的管理价格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永久性的工资—物价管制”。

823 顾问团的少数派并不能构成全团一致的意见。大多数经济专家,包括西欧和北美的在内,承认问题的复杂性质。当他们研究1965年后的情况时,他们感到,应该承认一种新类型的通货膨胀的存在,即:“成本推动的(或卖方的)通货膨胀”,这种类型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别于旧式的“需求拉动的(或买方的)通货膨胀”。新的疾病需要新药方——如果我们能找到新药的话。

在将来的见多识广的经济学家当中,不论哪种观点取得胜利,对于经验所表明的型式加以分析研究都是必要的。

§.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我们在第二编中看到,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把经济推动到充分就业和超过充分就业之点。如果消费加投资加政府支出的总和

超过经济在充分就业时的产值,那末,货币需求会大于可能生产出来的物品和劳务的有限数量,从而会抬高它们的价格。由于劳动是一种劳务,由于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劳动市场是很紧俏的,所以工资的被抬高也是过程的一个部分。

但是,因果关系是很清楚的,是由需求引起通货膨胀。

例如,正是由于德国中央银行在1922年发行了以万亿计的马克纸币,而它们又在市场上抢购面包和住房,所以德国的物价水平才上升了万亿倍。这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极端的事例。但是,这和1849年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和联邦储备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造新货币和银行存款从而使整个经济的支出超过充分就业的支出水平也没有任何区别。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数量公式($MV \equiv PQ$)中 M 的变动是解释宏观经济关系的唯一有价值的因素,他们同意后凯恩斯主义者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结构所作的解释。虽然凯恩斯主义者宁可使用 $C+I+G$ 的方法,但这两个学派一致同意:“过多的货币支出购买充分就业条件下所能生产出来的有限的物品供给”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症结所在。

医治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如果二十世纪最后一段时期具有类似一个世纪以前那样简单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话,那该多好!这样,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知识会使通货膨胀的治疗成为相当简单的事情。略去某些预测总需求量的变动的短期问题不谈,对于消除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缺口的一般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学家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加以简要的复述。 $C+I+G$ 以及其相应的数量 MV ,均可通过下列的办法得以减少:(a)货币政策(通过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证券,或通过提高贴现率和准备率来

降低货币供给量水平或增长率), (b) 财政政策(减少政府开支, 提高税率, 增加预算盈余和减少预算赤字)。对付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艺术是运用适当份量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付失业的办法是: 通过足够的扩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边缘, 而与此同时也留有充足的余地, 以防购买力以通货膨胀的形式漫过这一边缘; 对付通货膨胀缺口的办法是: 通过适当程度的收缩来使经济回复到合理的充分就业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也不收缩过头, 以防退回到衰退和萧条的失业状态。

我们承认, 没有人能完全无误地预见未来。因此, 不能期望宏观经济学药方剂量在每一个短时期均完全准确。然而, 在一个单纯的需求拉动的世界中, 长期萧条或长期通货膨胀没有存在的理由。现在, 我们离开那个天堂, 到目前的冷酷的现实世界中去。

§. 新类型的通货膨胀?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曾经一直在享有(a)充分就业, (b)自由市场和(c)稳定的价格水平。回顾第 15-1 图的价格水平会提醒我们, 我们生活于单一方向的爬行通货膨胀的时期。同样的情况存在于德国和日本、瑞典和瑞士、意大利和法国, 存在于世界上实施混合经济制度的所有国家^①。

现在和过去的通货膨胀的区别是: 在到达可以辨认的充分就业之点以前, 在劳动市场尚未紧俏和设备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以前, 物价和工资已经开始上升。

在现代的成本推动的(卖方的)通货膨胀下, 混合经济制度可以出现“停滞膨胀”——经济增长和就业停滞, 而与此同时, 物价却在上涨!

^① 看一下拉丁美洲, 情况也是这样: 每年为百分之二十、五十、七十甚至二百的长期通货膨胀率长期存在于智利、阿根廷、巴西和其他国家。

很明显,通过简单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混合使用,适用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精心设计的 $C+I+G$ 或 MV 的分析工具不能医治新的疾病。

因为当我们使用货币和财政的制动器时,在限制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率的同时,我们也伤害了繁荣这个金娃娃。许多人会认为,治疗反而比疾病还要坏。

结构上的因素。这可以帮助说明导致采取“过度膨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原因。原因并不在于中央银行和国会中的有关人士突然丧失了理智,象喝醉了的水手那样创造过多的购买力,也不在于他们的经济学知识少于他们的前任。真正的原因是:人民的民主政体把混合经济制度驱赶到结构上的囹圄之中。

如果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展性质不大到足以适应工资和成本上升的地步,那末,结果会是经济增长缓慢和大量失业。选民们很快便要撤换那些保持作为十九世纪的美德的固定货币供给量和平衡预算的中央银行行长或国家领导人。

§. 成本推动的或卖方的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发展经过了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社会保险事业之父贝弗里奇勋爵,预见到了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自由市场之间的困难处境。

仅仅由于工会的推动?工商业者自然要把工资成本的增长当作他们必须提高价格的原因。舆论往往谴责工会领袖,认为他们迫使工资率的上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除非利润率可以无限制地加以压缩,否则这种工资成本势必要引起价格上涨。

一般说来,把工会领袖当作戏剧中的十足的反面角色的观点

不符合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①首先,研究工人组织的专家们指出:普通会员通常比他们的领袖态度更为强硬。当一位工会领袖不能满足其支持者的要求时,他便被赶下台——正象钢铁工人的领袖的情况一样。其次,紧接着1945年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传统的需求拉动的类型,其原因在于战时所积聚的流动资金以及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和投资的需要。有关历史资料的一些研究表明:由于集体协议所造成的时间的推迟,最先上升而且上升最多的是非工会会员的工资。我们可以说:工会减缓通货膨胀的说法和工会加速通货膨胀的说法具有同样的正确性。

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和工会谈判的大公司可以把工资的增长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基本上维持原有的利润水平。

受管理的物价工资的推动。即使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时期,物价指数也持续上升。因此,某些专家们开始怀疑,通货膨胀是否总是价格推动型的和“工资推动型的”。似乎并不需要举行很多次罢工就能使工资随着物价的增长而增长。工资推动也在工会化行业之外发生。关于工会化的部门,某些观察者说:

在要求增加工资时,劳方所推动的是一扇敞开的大门。资方并不象过去那样反对工资的增长。资方似乎心中有数,知道财政部和联邦储备系统会使总需求保持足够高的水平,使他们的成本较高的产品卖得出去;因此,他们同意提高工资,从而使生产成本上升,而生产成本上升又使厂商为产品规定的价格上升。结果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通货膨胀。当联邦储备系统和财政部试图使用通常影响需求的手段来对付这种通货膨胀时,它们造成失业和衰退,象1957—1958年、1960—1961年和1969—1970年那样,特别象1973—1975年的世界范围的衰退那样。从

^① M. 弗里德曼教授是怀疑工会对工资的压力引起物价上涨的主要人物,他认为:这种观点只是在1933—1934年(国家复兴管理局)发挥作用的年份具有某些正确性,当时政府也进行了干预。

1958年到1963年，批发价格是稳定的，但要做到这一点似乎要有百分之五以上的人失业。

解释的重点已经从全然依靠工资推动转移到比较一般性的成本推动。例如，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很大程度上，钢铁价格在五十年代的上涨本身就是造成批发价格指数上升的原因。然而，该委员会还发现，尽管工资有所增长，利润水平在这个实行价格管理的行业仍然是高数值的；它把原因归咎于非劳动方面的压力以及劳动成本。

卖方的通货膨胀。A. P. 勒纳把整个概念扩大为卖方的通货膨胀 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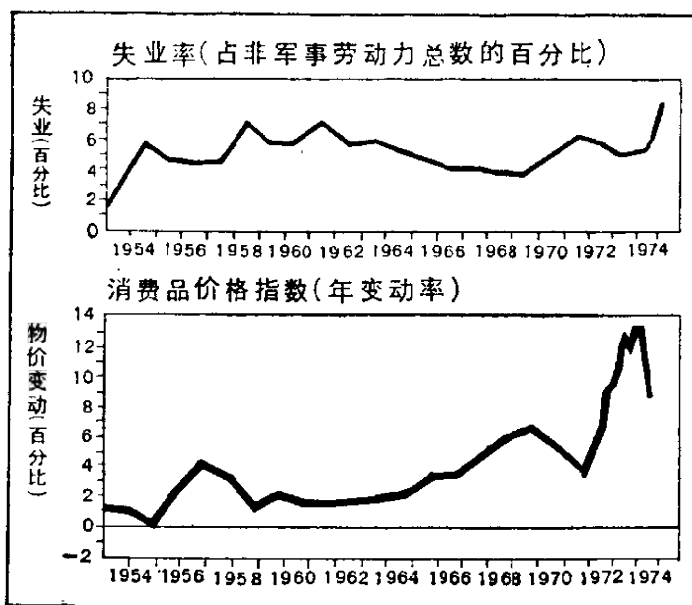
如果所有的卖者，不论是出卖劳动的人，还是出卖财产劳务的人，或是出卖物品的人，通过协议或自行规定他们的价格，以使他们得到的价格超过社会产品总值的百分之百，那

第 41-1 图

“成本推动（或卖方的）”通货膨胀有别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甚至在劳动市场松弛和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时期，物价也趋于上升。特别是在 1965 年越南战争升级以后，工资和物价逐渐上升。到了 1972—1974 年间，整个世界出现了“两位数字的加速通货膨胀”。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最为严重的衰退是人为地制造出来对付这次通货膨胀的。尽管衰退的严重性失去了控制，但却使通货膨胀率降了下来，而且它的代价—利益之比——即：单位失业的损失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程度的下降——似乎也比以往要低。



末,结果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把物价水平令人沮丧地向上推动——即:卖方的通货膨胀的情况。

第 41-4 图说明,较低的失业率——如在 1972—1973 年的高涨时期那样,其平均数值下降到 $4\frac{1}{2}\%$,或如 1968 年的紧俏的 $3\frac{1}{3}\%$ ——总是和物价迅速上涨联系在一起。该图还表明,当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在生产能力和劳动市场上造成某些松弛以便消除经济的过度膨胀时,在随之而来的年份中便出现了停滞膨胀。到了 1975 年,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九。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开工率下降到设备能力的百分之七十。虽然如此,通货膨胀并没有结束,不过仅仅从它过去的两位数字的年膨胀率下降了一些。

§. 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和七十年代的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世界往往在同一时间发生性质相同的经济周期。1929—1932 年间北美和欧洲同时发生的萧条并没有使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幸免。当时的经济史学者对史实的研究也肯定了这一点。

英国和法国最先实现了工业化,它们的经济随之也循环往复地波动。当一国进入工业化的轨道时——德国在 1850 年以前,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十九世纪下半期——我们看到:它的统计指标便随着共同的国际节拍而变动。即使是非工业化的区域也会感觉到这一共同的脉搏:在衰退中,它们出口的原料价格作出相对于它们必须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工业品价格的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同的国际经济周期似乎消失了。一国可以利用它自己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美国在 1953 年出现衰退时,西欧的经济仍然很兴隆。当共同市场国家进入不景气时期时,加拿大和美国继续安享繁荣。

经历过上述两个时期的经济学者宁愿要战后新出现的分散型的衰退。然而,正当某些分析家开始满足于现状时,战前那种同时出现的衰退似乎又露了头儿。

例如,在 1972 年和 1973 年初,整个世界存在着统一的高度繁荣。正是在同一时期,欧洲、亚洲、澳洲和南北美洲的生产指数处于高涨之中。日本和其他国家正在市场上竞相购买供给稀缺的肉类和各种原料。象印尼和新西兰那样的国家发现,不论它们出卖什么东西,都存在着活跃的需求:木材、锡、天然气、羊、羊毛、石油等等。

接着,1973 年春天以后,潮流改变了方向;进入 1974 年以后,更是如此。一切国家同时受到冲击。象日本那样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当实际年增长率从百分之十下降到百分之四就认为是衰退的国家突然在 1974—1975 年间发现:自己正处于绝对的下降之中。

造成通货膨胀的外部因素。整个七十年代,世界各地不断出现严重的歉收。玉米真菌病蔓延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俄国连续两年降雪很少,致使小麦生产受到影响,从而 1972 年和 1975 年不得不在美国市场上购买大量小麦。这使粮价高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旱灾减少了那里的大米和其他粮食作物的生产。对印度的农作物如此重要的季节风消失不见了。撒哈拉沙漠一带由于缺少雨水而一片焦枯。

由于这些外部供给因素的作用,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产生。这在 $MV=PQ$ 的方程中趋于使 P 上升。头脑僵化的古典派经济学者,象故事中的睡了数十年才在目前的时代醒来的人一样,完全误解了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而言, P 的上升永远简单地取决于 M 的变化。要想使这一点仍然正确,情况应该是:当外部的供给因素普遍提高了食品、纤维、金属和能源的

价格时，在整个价格体系中的其他价格应该作出补偿性质的下降——以便使平均的价格(P)保持不变。更重要的是，在上述能自由伸缩的价格中，货币工资水平 W 应该作出相应的下降。

无论那个睡了数十年的人怎样用劲地向四周巡视，他在今天也不会看到混合经济的 W 能自由下降，哪怕是三十年代和更早时期的大萧条中那种有限的下降，他也看不到。

如果 P 上升，那末，在 $MV=PQ$ 的恒等式中，什么必须作出
828 相应的变动？或者，在 $C+I+G=PQ$ 的恒等式中，什么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动？除非联邦储备银行或每一国家的中央银行容许 M 作出补偿性的上升，否则，趋于提高平均价格水平的外部因素势必要使 Q 作出衰退式的下降。产量(Q)的下降就是我们所指的衰退式的停滞状态；因为，在生产率和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世界中，即使产量(Q)停止上升也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

联邦储备系统并不是和行政、立法、司法相平行的政权的第四个部门。中央银行并不象专制的君主那样拥有绝对权力，不受人民的民主政体或专制独裁政体的压力。结果是： M 被人为地按照不符合物价长期稳定要求的百分比提高。

注意：在这里，不牵涉到错误的预测的问题。在混合经济中，这一结果是工资与价格日益严重的刚性造成的。

我们必须对价格与工资的刚性作一简要的经济分析，因为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通货膨胀问题上，刚性将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 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价格总是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因而不可能生产过剩或就业不足。价格或工资会简单地下降，一直到供求相等时为止。回想第四章的对于供给和需求的初

步论述(或第二十章的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回想第三十二章的适用于任何数量的物品与劳务种类的抽象的一般均衡论,回想其中关于使市场供求相等的完善的机构的设想。数理经济学的先驱里昂·瓦尔拉,在一个世纪以前建立了一个最简单的模型;该模型表明:在一切价格和工资均可自由浮动的经济制度中,就业不足和生产过剩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价格和工资可以自由浮动到作为联立方程式未知数答案的一切相对价格和工资的水平,而这种水平的价格和工资可以使一切市场中的供求相等。在这样一个抽象的微观经济学的模型中,凯恩斯在1936年的《通论》中所论述的那种类型的失业,即当时大萧条中的世界所经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经历的那种失业干脆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凯恩斯的重大的突破是:用事实推翻了一个美妙的、然而却有点脱离事实的理论。他不能提供一个优雅的理论来用价格和工资的刚性准确地解释失业和职业空缺并存的可能性,因此,他以不加解释的方式简单地假设:价格的决定会在寻求职业的人和职业空缺之间、在厂商意图销售的物品和它们所能找到的顾客之间造成差距。

只有在过去的十余年中,经济学者才拿出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就业机会情报的不完善的性质。劳动者无法预先知道:如果他接受一件报酬较低的工作,他是否会因之而失掉将很快出现的较好的工作。即使一个劳动者愿意为通用汽车公司工作,他也没有办法在市场上进行拍卖,表示愿意接受比已经就业的那些幸运的劳动者的工资为低的报酬,从而使自己有效地避免失业。一蒲式耳一定级别的小麦总是可以在芝加哥的粮食交易所里卖掉。价格会 829 下降,以便使供求相等。然而,劳动者不是小麦。没有哪两个劳动者是相同的。在短期中,雇主们往往规定一个工资级别,并且按照这个工资级别雇用有限数量的劳动者。工资率在芝加哥或在新罕

布什尔州的汉诺佛市的劳动市场上并不自行上下浮动，以便使就业机会和待业人员完全相等。

你会想到，公寓的供给和需求也是这样。没有哪两套单元是完全相同的。没有拍卖机构可以保证全部住房均能被租出去。对于某些房主而言，较为合理的办法甚至是宁愿维持高租金而把房屋空闲数月以致得不到租金收入，但决不把租金立即降低。结果，也许会出现愿意支付较高租金的房客。

当牵涉到人类劳动时，寻求市场、获得情报和价格调节的不完全性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从劳动者那里所得到的第二十八章所论述的边际产品部分地取决于你偿付给他的工资为多少。如果你减少工资，而他又必须为你所雇用，那你并不一定因此而会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他的积极性会受到损伤，从而他的劳动产品可能减少。^①所有这些考虑对于理解所谓菲利普斯曲线问题的复杂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 菲利普斯曲线的互换：充分就业或物价稳定？

在一个理想的只要有一个失业者压低工资率、工资便不能上升的模型中，理解传统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容易的。在同一个理想的需求拉动的模型中，所有的物品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被拍卖掉；只要存在着多余的生产能力，能以不高于现有价格的（边际）成本生产出更多的物品来，就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升。

简单的需求拉动。在这样一个模型中，我们从充分就业开始；这时，宏观经济的管理人员已经创造出足够的 $C + I + G = MV$ 的支出来吸收充分就业的全部产品。如果管理人员现在把总支出

^① 第二十七章的公式“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不再在它的简单形式下适用。读者可以在较高深的经济学著作中找到关于就业理论的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参考著作，如E.S.费尔普斯、A.A.阿尔钦、A.赖尚霍夫德、R.E.霍尔和许多其他人的著作。

提高譬如说百分之十,那末,在需求市场上出现的货币支出额会多于按照过去的均衡价格计算的物品的可能供给量。我们在这里人为地造成了第十三章的所谓“通货膨胀的缺口”。价格将普遍上升——最终到达所需的百分之十,以便与增加的 $C+I+G$ 支出相等。在价格较高的情况下,雇主行会竞相雇用更多的劳动者,最终也把工资抬高百分之十(从而,也使利润提高百分之十,然而,一切实际工资或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工资仍然完全保持不变。)

在这第一个简单化的模型中,需求拉高了价格和工资。^① 这就是一再使用“需求拉动”这个词的原因。

简单的成本推动。现在,我们转入具有较多现实性的论述。⁸³⁰ 去掉劳动按照伸缩自由的工资率把自己拍卖出去的想法。我们走向另一极端。假设由于工会的力量或由于没有工会组织的领域中的强大习惯势力,不论失业的数量如何,工资率总是每年上升百分之八。由于论述的需要,我们假设劳动生产率每年的上升都正好为百分之三。这样,如果雇主们总是能管理他们的价格以便使利润(或财产的收益)的份额保持不变——譬如说,接近于通常的四分之一的水平——那末,价格水平将如何上升?

通过简单计算,我们得到,价格每年必然增长百分之五——即

① 应该注意:货币工资率的上升比生产率的上升(在我们简单化的例子中,完全保持不变)高出百分之十。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能告诉我们因果关系的方向(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知道,肯定不是从工资上的原因导致出价格上的后果)。只要价格上升而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保持不变,仅仅作为数量之间的必然关系,货币工资率的增长必然超过平均生产率的增长,其差额为价格上涨的程度;而与此同时,实际工资保持和生产率相同的上升。但是,和保守的金融专栏作家们的混淆不清的计算相反,当实际工资和平均劳动生产率保持相同程度的上升时,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占有”或吸收全部技术进步(我们承认,可以来自较好的机器或管理方法以及来自劳动者的较多的努力和技术)的成果。它仅仅意味着:收取利润的人和劳动者的份额在技术进步中和过去保持相同的比例——譬如说,保持通常的(1/4, 3/4)的比例。

为百分之八的工资增长减去百分之三的生产率的增长的差额。实际工资的上升只能是代表生产率上升的百分之三的数值——因为在百分之八的货币工资的增长中，必须剔除掉其中百分之五的价格增长。财产所有者的实际收益的总额的增长也为代表平均生产率上升的百分之三——因为工资的相对份额仍然为四分之三。

应该注意，我们迄今没有提到需求，没有提到 $C+I+G$ 或 MV 所代表的总支出。在这个极端的成本推动的模型中，需求与价格无关——价格纯然由工资和生产率所决定。不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不论是衰退还是繁荣，不论联邦储备系统和财政政策是松动还是紧缩，不论是存在着第十三章的通货膨胀缺口还是通货收缩缺口，价格总是按每年百分之五的比例上升。这样，在这个看起来有点古怪的极端的成本推动的简单模型中，需求起着什么作用？

处于极端的成本推动的情况，需求对价格没有影响。如果 P 的数值已经在其他地方决定，那就只剩下产量(Q)没有决定。需求可以决定 $PQ=GNP$ 在不同时期的大小，因为 PQ 和 GNP 不过是 $C+I+G$ 和 MV 支出额的另一些名称（正如我们在第十五章看到的同义反复的“交换方程”那样）。当 PQ 中的 P 已被决定时，需求所能决定的仅为 Q 。

政策的困境。我们考察一下现在宏观经济的管理人员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充分就业开始，同时，货币工资率的上升为百分之八而不是生产率增长的百分之三，那末，除非宏观经济的管理人员人为地设法使总需求增长百分之八——大到足以抵消工资的增长，即意味着大到足够的程度来支付 P （价格）的百分之五的增长和 Q （产量）的百分之三的增长——否则充分就业会逐渐消失。（工会领袖和企业寡头也许看准了宏观经济管理人员会相应增加

需求。)

这样,假设宏观经济管理人员错误地认为,他们所面临的是老式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而在事实上,他们面临的却是单纯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按照常理,他们可能要使 GNP 的需求总额保持不变。后果为何? 产量和就业每年下降百分之八! 最初,12 个人中有 1 人要失业,然后 2 人……;如果不可抗拒的成本推动的力量碰到僵硬不变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一物体,那末,经济最终会化为乌有;这时,最后一个饥饿的人失掉工作,从而死亡。这一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宏观经济管理人员无疑地会放弃他们的顽固态度,会创造出足够的货币支出额来使爬行的通货膨胀无限地延续下去。 831

不是单纯的极端情况。令人惋惜的是:单纯的需求拉动的模型不符合现实,因为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宏观经济管理也就太容易了,只需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就业充分就行了。然而,令人庆幸的是:单纯的成本推动的恶梦也不符合现实,因为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宏观经济管理人员对于通货膨胀将无计可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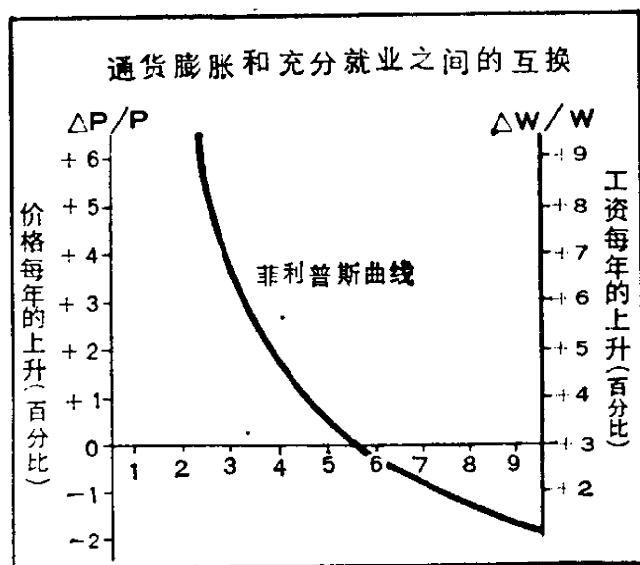
现实世界处于两个极端之间。失业人数的增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低货币工资的增长超过生产率增长的差额。因此,预算盈余和公开市场的出售业务——即第二编论述的所有控制 $C+I+G$ 或 MV 支出总额的宏观经济学工具——可以对物价上涨与工资增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可叹的是:同时也对产量产生影响)。

例如,当越南战争使政府支出增加而没有采取果断而有利的紧缩预算的联邦储备政策来加以抵消时,通货膨胀率便迅速上升。从 1965 年到 1968 年,我们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型的,非工会会员的工资最先、最快增加。但是,连续三年的需求拉动

型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69年至1971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以及1974—1975年再度出现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从某些方面来说,宏观经济管理人员处于非常令人困惑的境地。他们既不居住在一个容易对付的、单纯需求拉动的世界上,也不居住在一个对通货膨胀毫无办法的单纯成本推动的世界。他们居住在一个困难重重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要想把百分之十的通货膨胀率压低到百分之三,至少在短时期内必然造成象1969—1971年或1974—1975年那样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致使失业人数增加,贫民窟发生动乱,以及在已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差额从而造成巨大浪费。

菲利普斯曲线。已故的A.W.菲利普斯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和澳大利亚国民大学。他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试图确定失业和价格-工资上升之间互换的数量关系。第41-2图画的是典型



第41-2图 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失业和工资—价格上升之间的极其重要的互换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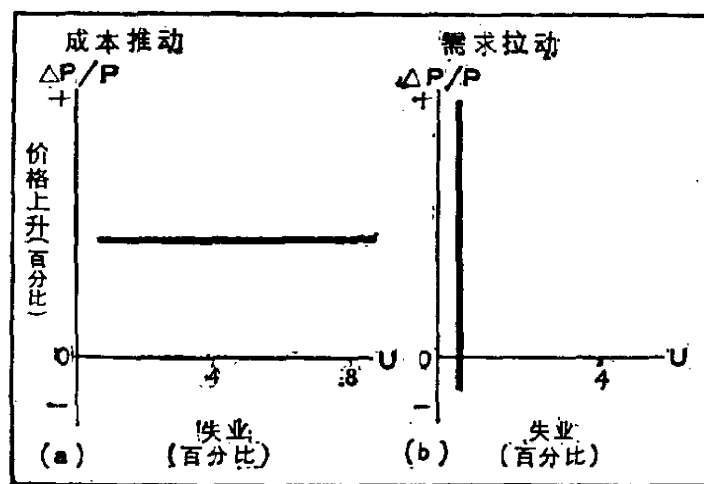
右方纵轴上的标度比左方纵轴上的标度具有较高的数值,其差额代表假设的百分之三的平均生产率的增长。横轴上的失业数字越大,相应的通货膨胀率越低。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似乎逐渐向右方移动。这意味着:目前比过去需要更多的失业来压低通货膨胀率(或者说,比德国需要更多的失业来压低通货膨胀率)。

的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表明:当你沿着它向左方移动来减少失业时,价格和工资的上升就会加快。

该图的横轴表示失业的百分比。左方的纵轴代表平均价格每年变动的百分比。右方的纵轴代表与左方相应的每小时货币工资率变动的百分比。两个纵轴上的数字之间的差额为假设的生产率的年增长数值(因此,如果生产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而劳动者和非劳动者按照原有的比例分享其果实,那末,物价每年变动百分之五相当于工资每年变动百分之八)。^①

我们提请大家注意: MV 和 $C+I+G$ 决定货币支出总量的方法仍然在暗中发生作用,不过此时,我们需要知道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以便把 $P \times Q$ 的乘积分解成为单独的分量。在单纯的需求拉动的情况下,菲利普斯曲线会是一条失业水平最低的垂直线: 这样, Q 总是会处于相当于充分就业的水平,而 P 会在自由劳动市场上浮动到货币支出总量所决定的水平。在单纯的成本推动的情况下,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水平线: 这样,任何数量的失业都不会

① 应该注意到现实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它在单纯的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情况之间的不同之处。处于单纯的成本推动的情况,第41-3(a)图说明,该曲线是一条表明没有互换可能的水平线。处于单纯的需求拉动的情况,第41-3(b)说明,该曲线是一条表明没有必要互换的垂直线。[实际上,在第41-3(a)图中,如果宏观经济的管理人坚持使需求上升大于例子中的工资的上升,他们会把经济推向最低失业率之点,以致使雇主们竞相提高工资率,使它高于工会所规定的水平。这会形成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里所说的“工资的漂浮”,其含义为: 工资总是高于集体协议所规定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 当你移动到接近于纵轴的位置时,水平的曲线实际上已不再具有水平的形状。]



第 41-3 图

使雇主们竞相提高工资率,使它高于工会所规定的水平。这会形成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里所说的“工资的漂浮”,其含义为: 工资总是高于集体协议所规定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 当你移动到接近于纵轴的位置时,水平的曲线实际上已不再具有水平的形状。]

使物价稳定。与二者相比,现实生活中的曲线处于它们之间。

菲利普斯曲线表示在每一个短期中的失业和价格-工资增长之间的互换。

833 即使菲利普斯曲线只能描述现实而不能“解释”现实,它仍不失为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困境的一种极好方法。例如,它使我们能提出一个问题:混合经济制度如何用收入政策来补充宏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便使自己能有一个较良好的菲利普斯曲线?在什么意义上是良好的?较良好的意义为:它能使我们享有较低的失业率,而与此同时,又能避免过度的物价上涨。

较长时期。在论述政策这个难题之前,我们应当再次强调指出,经济学并不是精密的科学。现实的资料并不和含有两个变数的菲利普斯曲线完全相符。更重要的是:可以被衡量到的菲利普斯曲线代表短期关系,而短期关系在较长时期中肯定会发生变化。

例如,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五十年代的许多年份中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则将不会有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工资的要求也不会来得那么迅猛。简言之,长期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口会逐渐使菲利普斯曲线逐渐向左方移动。于是,肯尼迪总统当政时,便可以幸运地享用艾森豪威尔“投资于虐待人们过经济停滞生活”带来的好处,以致他能在六十年代人为地造成 $C+I+G$ 的长期增长,而物价与工资不会增长很多。

由于同样的原因,在 100 个月的不停顿的经济扩展以后,特别是作为越南战争支出的后果,持续的低数量的失业也可以使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造成七十年代非常棘手的政策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人们害怕并且预期物价会上涨,所以他们使各自的有效的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从而导致了停滞膨胀——即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并存。要克服通货膨胀的势头,可能要

象七十年代初期那样连续数年放慢经济发展速度。

§. 所需要的: 收入政策

现在, 我们从理论分析转入混合经济的迫切的政策问题。不仅仅美国没有学会如何避免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不能同时并存的问题, 其他先进国家也是如此。事实表明, 瑞士和瑞典、德国和日本、荷兰和意大利、法国和英国, 目前仍无法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非常棘手的互换问题。

1. 对英国经济的时而使之停滞、时而使之增长的控制已经证明在控制通货膨胀上是无效的。它已经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上造成很大的损失。

2. 和平时期的工资—物价控制已经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广泛采用。虽然在短时期内, 这种控制有时奏效——芬兰在1967—1971年间是一个显著例子, 而美国在1971—1973年间也许是另一个例子——然而, 在较长时期中, 这种控制要么被放弃掉, 要么听任其越来越无效而不了了之。

3. 事实证明: 不论是在荷兰还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时的美国, 公布半官方的工资—物价控制指标总比不公布要好一些。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逐渐失去效力, 变得越来越不公平, 特别是在不伴之以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压低造成过度需求的开支时, 834更是如此。1973年, 尼克松总统在其新经济政策的第三阶段恢复了自愿控制指标。

4. 雇主们经常怂恿政府对工会采取强硬态度。这话说来容易。可事实上, 正如英国的希思内阁在七十年代早期所得到的教训那样, 这往往会加剧阶级冲突, 鼓励罢工和怠工以及促使工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5. 庞大的雇主联合会和庞大的工会联合会举行集体谈判?与

此同时，政府在中間充当调解人。类似的办法早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荷兰实施。然而，在最初的成功年份以后，最后所得到的结果为：工资每年增长百分之十或更多一些，国内物价水平稳步爬行上升^①。

此外，在象美国这样一个权力分散的国家内，姑且不论谁能代表美国的全部企业，谁又能代表美国全国的工人说话呢？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他不过是为了公共关系和从事政治上的幕后活动而成立的联合会的头头。米尼无法迫使某一全国性工会或地方工会签订这种，而不是另一种工资协议。在雇主方面，无论是全国制造商协会，还是美国商会都无权代表某一行业签订协议，更不用说代表所有的企业签订协议了。在某一具体行业之内，譬如说汽车行业，没有任何委员会有权代表福特公司、通用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签订工资协议。

公开的通货膨胀？上述所有医治爬行通货膨胀的办法以及这些办法的各种可能的配合都已使用过了。在失望之余，某些经济学家问道：

不管怎么说，爬行的通货膨胀果真是那么坏吗？它肯定比大量失业和多余生产能力的存在要好些。此外，通过按价格指数随时调整的工资契约以及保证实际购买力的政府债券，预料之外的通货膨胀给人们造成的负担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减轻。

无可否认，这种解决办法优于虐待狂式的降低经济活动水平的办法。后者把医治通货膨胀的负担加在最没有负担能力的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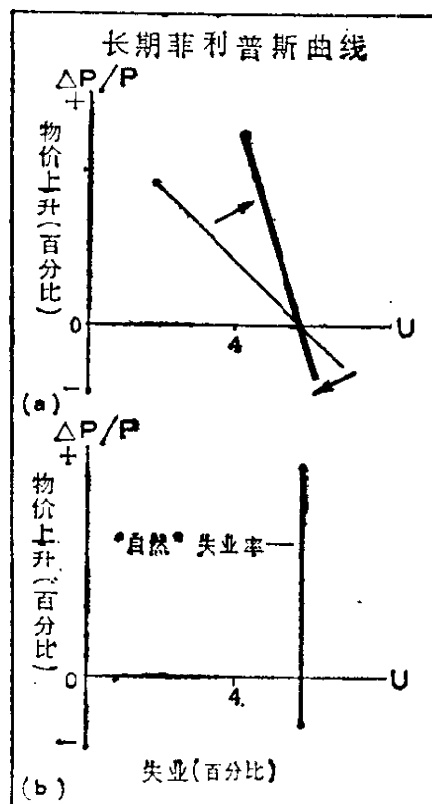
^① L.厄尔曼和J.弗拉纳根在《工资限制：对西欧收入政策的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71年）一书中作了如下相当悲观的总结：“根据本书对[七个]国家的经验的研究，收入政策并不是很成功的。……积累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哪一种已经出现的收入政策，都未能达到所宣布的基本目标，即：使充分就业和合理的物价稳定结合起来。”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注意：虽然其他国家的物价水平比我们的物价水平上升得快，但外国的平均失业水平却比我们低。（此外，其他许多国家都维持双重价格制度——比较稳定的出口价格和上升的国内价格同时存在。）

者身上——年轻劳动者、少数民族劳动者、妇女劳动者以及非熟练劳动者。

一旦我们停止治疗爬行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会加速上升吗？怀疑者警告道：

经济制度实际上并不能永久地在较少失业与较多物价上涨和较多失业与较少物价上涨之间进行选择。它只能在目前的少量失业和以后的大量失业之间进行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一定会大白的。^① 在 835

① 某些经济学者试图通过移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得到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很象在 20-5 图中，我们移动短期供给曲线而得到马歇尔所说的长期供给曲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具有以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倾向，如第 41-4(a) 图所示。耶鲁大学的 W. 费尔纳和 H. 沃利什、芝加哥大学的 M. 弗里德曼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E. 费尔普斯甚至提出一个有力的理论。该理论在实质上说：“菲利普斯曲线中的互换的前提条件，仅仅为人们对没有预料到的物价和工资增长的幻觉。一旦物价和工资的增长率停留在某一点，人们便会记住这一事实，并预期物价和工资将来也会以同样比率增长。因此，这时把工资提高到这一通货膨胀率以上的压力和价格不变时提高工资的压力是相同的。实际上存在着所谓‘自然失业率’，如第 41-4(b) 图中的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所示。如果你暂时使失业处于自然率之下，那末，你的短期曲线会无限制地向上旋转，从而物价会加速上涨。如果你暂时使失业处于自然率以上（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的类型），那末，短期曲线会向下旋转，从而物价会加速下降。为了使人们习惯于某种不会使价格加速上升或下降的物价变动率，你必须处于长期的垂直曲线。”这些经济学者的结论为：“由于在长期中，你总是与自然失业率在一起，所以宏观经济管理人员应该使需求的增长仅仅等于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譬如说，每年百分之三或四，以便使物价 (P_s) 保持稳定。要想降低自然失业率，需要采取不同于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措施——例如，废除最低限度工资的规定或限制工会行动的办法。”对此提出批评的人说：在达到这些人提出的均衡点以前，经济制度很可能会由于选民造反、城市暴乱和失业带来的困苦和不满而垮台。此外，我们目前找不到经验资料来判断第 41-4(a) 或 41-4(b) 图是否更符合现实。



第 41-4 图

任何经济中,都存在着失业守恒定律:如果你现在能消除失业,那不过是使同等数量的失业在以后出现。〔见脚注中的第 41-4 图。〕

目前我们还找不到证实这一观点的真凭实据。即使这一悲观的看法有其道理,许多人也一定会说: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把目前的低失业率抓到手要比等待将来渺茫之中的低失业率好一些。

虽然如此,有关混合经济的大量研究证实了下列说法:

在混合经济中,失业率低于某一临界水平往往使爬行的通货膨胀率加速上升,乃至飞速上升。为了避免通货膨胀率加速上升,我们必须求助于收入政策这一新的工具来改变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互换,而不是仅仅开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机器来使经济沿着暂时看来还不错的不变的菲利普斯曲线移动。

836

§. 为了改善菲利普斯曲线而减少结构失业

劳动市场专家们肯定会同意实施下列方案,来降低所能维持的失业率:

1. 实施人力训练方案以及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从而,非熟练劳动者能符合现有就业机会所要求的条件,同时,技术过时的人也可以把技术翻新。改善就业空额的消息的传播以及迁移企业和劳动者的方案也是有益的。

2. 从雇主和劳动者两个方面来减少对劳动大军中的某些特殊类别的歧视,同时,待业劳动者对于实际就业机会的报酬和条件要采取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具体地说,对于年轻人和残废人,最低限度工资的规定应具有伸缩性,如果他们能找到对竞争性的标准工资率没有妨碍的工作的话。这种办法会有助于菲利普斯曲线的改善,从而降低原来很高的失业率。

把政府当作待业者的最后的雇主的方案仍然处于争论之中，但却日益受到许多经济学者的支持。

§. 人道主义的经济制度

有思想的经济学者越来越相信对停滞膨胀病因的最后诊断。他们衷心希望这一诊断是错误的，因为诊断结果太严重了，牵涉到混合经济和现代福利国家的最核心的问题。

造成物价日益上涨而物价稳定很少见到的根本原因在于：那种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时代被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残酷的经济制度已不复存在了。

过去，资本主义往往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但也是一个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制度。一些幼儿之所以患有软骨病而两腿弯曲，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酒鬼或精神病患者，或抛弃了他们的家庭，或在失业严重时单纯由于运气不佳而未能抢到工作。该制度使失业如此难于忍受，以致人们会一日步行几十里来挣得微薄的报酬，如果有这样做的必要的话。

今天，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残酷行为。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实施负所得税制，但我们却享有失业补贴、解雇费、公用事业就业机会、福利补助等。几乎没有人愿意把时钟拨回到老式的残酷无情的纯粹资本主义。然而，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除了人道主义的优越性以外，现有的新秩序还可能带来有关物价和工资变动的新规律。要想象过去那样控制工资和物价，失业数量必须越来越大。因此，现代混合经济制度陷入了恶性循环，失业人数越来越多。

寓意何在？开始残酷起来？还是拒绝承认：每一种新的改良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必须付出代价？这两条道路实际上都是行不通的。作者认为，经验教训在于：我们应坚持不懈地努力寻找进行结构改革的方法，以便在保持并扩大人道主义的同时，能引导经 837

济更多地受市场供求机制的支配。经验证明，市场供求机制有助于增进效率和稳定。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永无止境的。

总结和复习

1. 在自由放任时期，维多利亚女王可以在温莎堡进行统治，麦金利总统可以在白宫打瞌睡，那时人们担心资本主义会周期性地遭受消费不足和总购买力不足之苦也许有些道理。当时列宁和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的缺乏市场只能通过侵略扩张性的、疯狂的对外投资和战争开支加以治疗。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许有时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不管它们在那时的正确性如何，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每一个混合经济制度都具备有效的知识和能力来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创造出——通过有用的和平时期的开支——足够大的总购买力。货币(M)的创造和预算赤字已经在整个世界成功地消除了对于长期萧条的惧怕。余留下来的是一个新类型的问题——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和停滞膨胀。

2. 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需求者的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的“停滞膨胀”（“卖者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区别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老式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可以通过适当份量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央银行或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以及预算的支出和税收政策——来加以控制。

3. 在现代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中，物价和工资并不自由浮动来使各个市场供求相等。甚至在充分就业和生产能力全部得到利用以前，它们就开始爬行上升。通过收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对付这种通货膨胀只能造成失业和停滞膨胀。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爬行通货膨胀可能发展成恶性通货膨胀。

4.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经济制度中物价上涨和失业之间的互换关系——通过曲线的短期的形状以及其在长期中受到影响而作出的移动。例如,在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五的情况下,假设货币工资率的上升总是比百分之三的生产率的增长要快百分之四,那末,由于各公司会把成本的增长转嫁出去以便保持利润水平,物价水平会爬行上升百分之四。这样,就存在着卖者的通货膨胀。

5. 需要“收入政策”来补充财政和货币政策——以便改善混合经济制度的菲利普斯曲线。但是,专家们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应该使用哪一种收入政策:宽大的不闻不问、政府的控制指标(自愿的或半自愿的)、物价—工资的直接控制、集中进行的集体协议、时而停止时而进行的消除过度扩展的经济控制、旨在降低结构失业的自然水平和波动幅度的人力及其再培训方案——所有这一切都正在研究之中,以便保存现有制度的人道主义的性质而与此同时又能具有效率和稳定性。

第四十二章 趋势的改变： 经济理论的演变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学者。不理解这一点就会犯人们谴责 E. 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书时所犯的错误，即：吉本有时不能把他自己和罗马帝国区别开来。

虽然如此，在一部长篇著作的结尾部分，我们也许可以放纵一下，对作为人类智慧一部分的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作一简要的介绍。我们这样做并不怀有内疚的心情，因为环视一下象牙塔的内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塔外的事情。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那样，无论哪一门客观的科学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主观成分。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制度决定性地取决于我们所戴的用以观察事物的眼镜的质量。一旦经济学的初学者知道他现在热烈信仰的理论如何从过去演变而来，他便能对该理论在将来肯定要经受的修改，有较好的心理上的准备。^①

① 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好书有：R.L. 海尔布伦纳：《重实利的哲学家们》（西蒙和舒斯特公司，纽约，1953年），E. 罗尔：《经济思想史》（普伦蒂斯-霍尔公司，英格尔伍德克利夫城，新泽西州，1972年）。标准的高深著作是 J.A. 熊彼特死后出版的《经济分析史》（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7年）。

§. 经济学的史前史

和婴儿一样，政治经济学在出生以前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从第 361 页上的经济学家谱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的年龄最多只有二百岁；亚当·斯密(1723—1790)出版其《国富论》(1776)的那年可以被认为是它的诞生之时。

从一开始，政治经济学便关心于政策。例如，圣经的新旧约全书⁸⁴⁰均反对利息或高利贷，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也是如此。亚当·斯密以前的重商主义者是王爷们的顾问；从他们所处的地位来看，他们无异于现在的总统经济顾问或英格兰银行的经济研究人员。当重商主义者主张保护关税时，不论他们的看法多么错误，他们确实真诚地相信，保护关税有助于国家的繁荣。

远在 J. 边沁(1784—1832)用社会效用来严格检查英国的每一种制度以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说法已经一再出现。它早已出现于马奇维利和其他作家的著作之中。欧洲大陆上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重农主义者，相信以土地为主要因素的经济生活的循环往复；他们是启蒙学者，也是试图改革法国革命前的古老制度的哲学家。

早在语文教师出现以前，人们已经在断断续续地写出文章来。对于早期的经济分析作出贡献的人肯定不是职业经济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阐明了货币数量学说——哲学家洛克也是如此。(洛克还建立了劳动价值论。)大卫·休谟(1711—1776)的职业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只是附带地对人们理解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作用作出了伟大贡献；他认为贵金属的流入和流出可以起调节作用，并影响价格水平，从而调整国际贸易中的不平衡状态。(休谟还建立了地租理论并且认识到通货膨胀对商业活动的刺激作用。)约翰·劳这个从苏格兰移居到法国的冒险者，是最早鼓动政府创造

货币来制造繁荣的人物之一，此人既是学者，又是流氓和骗子。R. 康替龙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也是对于他所维护的理论不能说没有商业利益的早期著作家之一。

§. 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先知斯密

最早的经济学者不但对经济政策感兴趣，而且毫不掩饰要干预经济的意图。亚当·斯密的最伟大贡献在于他在经济学的社会世界中抓住了牛顿在天空的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斯密所传达的福音是：

你认为，通过动机良好的法令和干预手段，你可以帮助经济制度运转。事实并非如此。利己的润滑油会使齿轮奇迹般地正常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

亚当·斯密远不是不带感情的几何学者。当他阐述他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时，他并不仅仅使用中学教员阐述毕达哥拉斯定理那样的方式。他的一段有名的话是这样说的：

……每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的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国富论》，第四编，第二章。〕

841

斯密从来没有证明这段话的正确性。一直到我在大学本科读书时，还没有人知道如何来证明——甚至恰当地阐明——这一原理的真理内核。斯密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所做的是列举出政府所做的无数愚事。他援用了全部古代和当时的史实来说明动机良好的政府的法规所造成的害处。

他的书是一本杰作。它的笔调是严谨的。它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也可被称为“如何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手册。而且，它为供

求的一般均衡论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的时代精神。当然,《国富论》众多的优点并不能解释它为什么会对以后的一个世纪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上升的资产阶级当时需要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发言人。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理论。同样重要的是:他的自由放任理论能满足他们的自尊心和道德观。这一理论告诉曼彻斯特的商人,只要他们照顾好自已的企业,就是在按照上帝的意旨办事,同时也为王国贡献了力量。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斯密是当时制度的奴仆。实际上,他很不信任工商业者(例如,他说:“同一行业的工商业者即使为了寻欢作乐而相聚在一起,其谈话的内容也往往是如何勾结起来反对社会和提高价格”)。斯密肯定是站在普通人一边的。但是,他深信,正如那时以来的许多经济学者所深信的那样,走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愿望铺成的。他认为,政府使师傅们不至勾结起来形成垄断的企图很可能造成较坏的,而不是较好的结果。斯密的折衷主义和实用主义有助于使他的教义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 古典经济学: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秋

《国富论》出版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人们发现了收益递减规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抵消这个恐怖的规律的可怕作用时,T.R.马尔萨斯牧师(1766—1834)却提出了人口增长必然要把劳动者的工资压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理论。

然而,那个时期的关键性人物并不是马尔萨斯,而是大卫·李嘉图。只有少数著作家才能象R.弗罗斯特那样得到雅俗共赏的好运气,而李嘉图就是那些少数人中的一个。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

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都把他奉为鼻祖。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也是如此。我们将要看到，卡尔·马克思不喜欢古典学派的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然而，李嘉图却是一个幸运的例外。马克思认为可以从李嘉图那里获得真理。

大卫·李嘉图从来没有进过大学。他出生于从西班牙—荷兰迁居到英国的富裕的犹太家庭。由于他和非犹太教女子结婚，他父亲和他断绝关系；当时他身上仅有八百英镑。十二年以后，他赚得了万贯家财，不再当股票经纪人。当他已经地位稳固并且非常富有时，他偶然阅读了亚当·斯密的那本著作。在着迷之余，他相信：斯密的分析犯有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并且在宏观经济学的论述上还有待于补充。如果没有那个早熟的约翰·S. 穆勒(1806—1873)的父亲詹姆士·穆勒的坚持不懈的忠告，李嘉图也许只不过是一个小册子写作者和一个落后选区的众议员。然而，老穆勒怂恿李嘉图写作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从而，李嘉图成了名。^①

由于李嘉图对某问题的论述缺乏逻辑而且含糊不清，所以对他的评价也许过高了。和斯密与凯恩斯相比是如此。和他同时代的马尔萨斯、约翰·穆勒相比以及和他以后的杰文斯、瓦尔拉、马歇尔与魏克赛尔相比也是如此。乔治·J·施蒂格勒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偏袒李嘉图，但他下面的一句话却说得很正确，李嘉图的逻辑思维“从简单化的程度上看是严格的，而从严谨的程度上看并不这样。”

在李嘉图身上，古典经济学的优劣之处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他维护一种过分简单和空洞的萨伊定律。根据该定律，供给总是能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从而，储蓄过多或不足的问题永远不会出现。在他的论述中，似乎在长时期中是正确的结论，在短时期中也是正确的。他对劳动价值论，犹豫不定，忽冷忽热。他的例子诱使水平较低的经济学者试图把经济学变为一个非经验性质的、纯粹推理的科学。许多人会同意杰文斯和

① 我们时代的伟大的学术著作之一，是P. 斯拉法为皇家经济学会编辑的多卷本《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英国，1953年)。

凯恩斯的看法,认为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引入了歧途。

工资停滞的预测和阶级的对立。从1820年到1870年,在整个半个世纪中,李嘉图使经济学者和政治家们着了迷。当工业革命正在避免和抵消收益递减规律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样,赌了收益递减这只落选的马。在即将到来的一个世纪中,当地主的重要性日益消失时(回想第四编引用的丹尼森的话:目前地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不到百分之五⁽¹⁾),李嘉图设想的前景却是:地租会上升而不能扩大的土地会束缚经济的发展。

这种对经济社会的悲秋式的观点——大多数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贫困状态——就是普通人和饱经世故的人从李嘉图那里得到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

对于李嘉图而言,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是国民产品在社会各大阶级之间的分配规律:劳动者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当社会总产品的增长具有一定限度时,分给一个社会阶级的部分必然取自另一阶级。

这可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喜爱李嘉图。他们可以根据他的著作来证明,工会和改良措施不会给广大群众带来什么好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喜爱李嘉图。他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证据来论证:如果劳动者想要得到他们应得的全部产品,则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假设存在的那种利己心,在二十世纪象“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引导无产阶级参加投票选举——以便通过政府的行动争取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赢得较大的份额。

衰弱。托马斯·库恩在他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1962年、1970年)中,分

析了为什么科学以断续的方式前进。旧学派衰亡,新学派兴起。新学派具有新的模型和新的理论——用库恩的专门术语来说,即新的“模式”。新学派可以满意地解释范围广泛的事实。

然而,学派象人一样,会患动脉硬化症。学生从老师和神圣的教科书那里学到的是保存下来的僵死的真理。过去的新思想诞生时的痛苦已经不为众人所知。即使正统理论的不足之处不断被人发现,也会被认为是无关宏旨而被掩饰过去。

古典学派即使没有衰老,也已经开始衰弱了。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此人不仅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其他经济学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即使在技术经济学领域,他的重要地位也往往被人低估。)在他十九世纪中期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写道:“令人高兴的是:关于价值规律,已没有什么需要现在和将来的著作家加以进一步阐述了。……”

需要新鲜血液的时候已经到来。

§. 新古典经济学

正好在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这棵大树分成了两个枝干。一个枝干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另一枝干起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1885、1894年)以及他的被人重新发现的早期经济学著作。

古典经济学者强调成本,却忽视了效用和需求。他们似乎仅仅考虑水平的 ss 曲线而忽视了所有需求曲线。1870年前后,世界上有三个人同时而独立地为较为对称的一般均衡分析奠定了基础,一般均衡分析可以对效用和负效用这两个因素加以综合考察。这三个人是:英国的W·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1840—1921)以及法国的里昂·瓦尔拉。瓦尔拉只能在瑞士的洛桑大学得到教授职位。

效用、边际主义、一般均衡。新古典学派的革命之重要并不仅仅在于发现了分析需求以及效用偏好的方法。除此以外，它还把李嘉图地租论中的关于边际的原始想法推广开来。最后，特别是在里昂·瓦尔拉的深奥的数学分析中，一般均衡的分析得到完成。

已故的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说过多次：在所有伟大的经济学者中，瓦尔拉肯定是最伟大的，因为他发现了一般均衡论。拉格朗日，数学界的莎士比亚曾经说：“在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中，牛顿肯定是最伟大的，因为他发现了构成世界的体系。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能被发现的构成世界的体系只有一个。”熊彼特显然感到瓦尔拉不但伟大而且走运，因为能被发现的经济的一般均衡体系也只有一个。

关心政策。虽然政治经济学越来越“科学”，但它却从来没有对政策丧失兴趣。大多数经济学者在他们的自传中告诉我们，他的之所以成为经济学者，是因为他们有志于改良。不过，当一个人⁸⁴⁴做了一辈子的经济学教授之后，他往往会对这种或那种措施是否会象措施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改善老百姓的景况，采取谨慎的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往往着重考虑“可能性”。也许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在社会阶级中的名声和地位的提高易于使人们变为反动这一原因，可以更多地解释，为什么英国的A. 马歇尔(1842—1924)或美国的约翰·B. 克拉克(1847—1938)会对社会主义逐渐丧失热情。

甚至更为有意思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伟大经济学者 K. 魏克赛尔(1851—1926)。魏克赛尔直到年近五十才得到大学教授的职位。他是一个过早地反对当地文化的不拘习俗的人。在原则上，他不同意按照宗教仪式和他夫人结婚。最后，即使他认为这样做会得不到他的家庭如此需要的教授职位，魏克赛尔还是不愿把瑞典国王正式称为“陛下”。值得庆幸的是：“先生”的称呼使他得到了那个职位。

魏克赛尔认为人类应该节制生育,这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公开否定耶稣的母亲为处女的说法并且在由于渎神罪而入狱后写了一本书。当沙皇陈兵于瑞典边界时,魏克赛尔劝说他的同胞,解散瑞典的军队。虽然他全力支持的往往是一些不受人们欢迎的事业,但他关于社会改革的建议实际上却是瑞典福利国家的前身。他主张重新分配收入,向穷人提供补贴。经过认真思考,他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改革社会的好办法。

垄断竞争的模式。今天的所谓微观经济学是由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逐渐建立起来的。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大量出现的垄断和不完全竞争才过分迟缓地被纳入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模式之内。^①特别是在美国,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德国,许多人开始根据实际资料研究竞争和工业组织的型式。人们还深入地研究劳动市场和工会的活动。

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杰文斯、瓦尔拉和V. 帕累托(1848—1923)已经把数学引入于经济学之中。但是,在1930年以后,这种活动再次出现。^②

计量经济学所使用的工具包括现代概率论、数理统计以及另外一些适用于象经济学这样不能从事实验的领域的特殊技术。经

① 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 E. H. 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33年、1962年)和J. 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33年)。但是,这两位经济学者都以古诺(1938)、J. M. 克拉克(1923)、斯拉法(1926)以及其他许多同时代的经济学者的著作为基础。

② 这场运动的先驱者包括许多国家的经济学者:挪威的R. 弗里希、T. 哈维尔莫和L. 约翰逊;荷兰的J. 丁伯根和H. 蔡尔;英国的J. R. 希克斯和R. D. G. 艾伦;法国的M. 阿拉伊斯和E. 马令瓦德;迁居美国的移民如,J. V. 诺伊曼、T. 库普曼斯、J. 马夏克、L. 郝维兹和G. 德布鲁;美国培养的经济学者,如H. 霍维里、本书的作者、K. J. 阿罗、R. M. 索洛、R. 雷德纳、H. 斯卡夫、H. 库恩、D. 盖尔和J. 托宾。目前的名单可以加倍和再加倍地扩大,可以一直追溯到A. A. 古诺1838年的经典著作,并且包括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学者,F. Y. 埃奇沃思、P. 威克斯第德、L. V. 波凯维兹、G. 卡赛尔等人。

济计量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此外，数量的计量赋予了经济史以新的研究途径。S. 库兹涅茨、C. 克拉克和 E. 丹尼森等一些名家，曾从数量上研究了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史学者（“掌管和衡量史实的人”）在研究奴隶经济学和铁路运输的革命时，也利用了最尖端的经济分析技术。

§. 凯恩斯的革命

845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经济学在描述和分析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在长时期中，却缺乏一样东西。虽然 W. 米契尔、A. 汉森和欧洲大陆的许多经济学者如 A. 斯彼托夫已经对经济周期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但新古典学派的弱点仍然在于，它缺乏一个成熟的宏观经济学来与它几乎是过分成熟的微观经济学相适应。

终于，随着大萧条的出现而有了突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36年）。从此以后，经济学就不再是以前的经济学了。凯恩斯的理论破除了对萨伊定律的盲从。即使是马歇尔、魏克赛尔和耶鲁大学的欧文·费歇尔（1867—1947）所建立的货币和物价论，也可以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概念而得到更有成果的复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者 A. C. 皮古（1877—1959）所痛快承认的那样，运用凯恩斯发明的新方法，可以更为生动地阐述充分就业理论。

如果上面所提到的托马斯·库恩致力于研究经济思想，那他会发现，往往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使新思想成为传统的智慧。这可以再次说明：科学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葬礼而前进的。

§. 主流经济学

本书的全部致力于阐明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即：流行于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流行于英国和荷兰而又日益流行于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西方世界大多数地区的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得的成果，是使混合经济制度的作用得到了改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中，世界的产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史无前例的（不过也日益受到“停滞膨胀”的破坏）。

然而，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宣扬过去的成就。正如第四十一章所说明的那样，混合经济的太平盛世还远未到来。我们还没有找到完善的收入政策，使我们能够避免在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作出抉择。

我们在这里所要做的是，承认对流行于过去和现在并且肯定会流行于将来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正确性。因为，正象托马斯·库恩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果一门学科不永远使自己更新、联系现实和接受正确思想，那末，它就会被新的模式和新的成见的竞争所排挤。正象文明演变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罗斯福新政以后的永久性的政治制度一样，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一出幕数一定而其终场为肯尼迪的理想世界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官僚体制的戏剧。

§. 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排斥

十九世纪的美国虽然还很年轻，但正在蓬勃发展，它不能同意李嘉图经济学的悲观预见。人们只要向四周环顾一下便会看到经济进步，生产规模在扩大，生活水平在提高。亨利·C. 凯里（1793—1879）拒绝接受收益递减规律，而同意朴素的劳动价值论，从而

作出推论,认为技术变革会使实际工资持续增长_·的规律发生作用。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于美国。按照这种理论,无情的自由放任下的竞争会造成起伏不平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象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生活会下降到最低水平。

歌德时代的德国仍然是欧洲的不发达地区,落后于发达的法国和英国;它也不能同意古典经济学的悲观预见。瓦格纳式的对人种和种族的看法和黑格尔式的对历史阶段的想法结合在一起,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并且否定了对于启蒙时期所作的牛顿式的综合。F. 李斯特(1789—1846)虽然是德国经济浪漫主义的民族学派的创始人,但他形成性格的时期却是在美国度过的。虽然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一书是在德国出版的,但他关于保护关税可以加速经济发展和保证经济结构多样化的想法却是在美国形成的。

德国历史学派。我们将要看到,黑格尔的时代精神一方面集大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导致出德国历史学派。该学派的成员公开否定一切经济理论,而认为:应该让各个方面的事实表现出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这一学派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结合在一起。后者相信普鲁士国家的立法以及国家对市场的有成效的干预。

我们将要看到,历史学派对美国批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随着德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崩溃和它自己在学术变革上的创造力的枯竭,历史学派慢慢衰落了。

§. 制度经济学和凡勃伦

由于许多美国人在一世纪以前进入德国大学的研究院学

习^①，历史学派在美国扎根也就不值得奇怪。这次扎根后的名称为“制度学派”（大约 1890—1935）。R. T. 伊利(1854—1943)在创建美国经济学会时发表了当时的所谓异端邪说，声称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②。在威斯康星大学，他和 J. R. 康芒斯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注重实际、着眼于政策的经济学，使得该大学人员的才智能用于进步的拉福赖特的州政府，并最终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帮助国家建立了失业和社会保险制度。

847 凡勃伦。T. 凡勃伦(1857—1929)有时被称为美国的马克思并且肯定是 J. K. 加尔布雷思以前的最伟大的不崇拜偶像的人。他站在制度学派一边反对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凡勃伦的著作的名称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个定居在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州边缘地带的拘习俗的挪威后裔的一些思想风格：《有闲阶级论》(1899)、《企业论》(1904)、《从事劳动的本能》(1914)、《德帝国和工业革命》(1915)、《美国的较高的学术水平》(1918)、《工程师与价格制度》(1921)、《缺席所有权制度》(1923)。

虽然凡勃伦和制度学派在美国学术界拥有追随者（例如 W. 米契尔，此人是国家经济研究所的创始者，而且是试图避开理论而对经济周期进行分类的人），但作为经济学中的有效的不同派别，制度学派已经在四十年前消失了。当一种运动消失时，谁又能说

① 令人感兴趣的是：当时美国受奥国学派的影响较少。该学派比较注重推理，比较保守，比较接近新古典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门格尔、E. 庞巴维克(1851—1914)和 F. V. 维塞尔(1851—1926)。以后的奥国学派代表人物有熊彼特、L. V. 米塞斯、F. 海克、G. 哈勃勒和 F. 马克卢普。

② 根据 J. F. 肯尼迪的《勇者的画像》一书制作的电视剧涉及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伊利在威斯康星大学由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而受到攻击。该剧说了有关当时学术自由的一些话。在最终宣判伊利无罪的审判中，伊利否认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同意：如果能证明他确是社会主义者，则可以以此为正当理由，把他赶出威斯康星大学。

出其原因所在呢？也许它代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美国的主流经济学一向比奥国的或英国的或法国的经济学更注重实际和经验，从而，它似乎能以优越的分析和计量工具把制度学派的描述和制定政策的任务接管过来。

以上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概述了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概述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对它们所进行的不成功的反抗。本章的其余部分将简要介绍一些目前仍然十分活跃的、对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学派。由于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对世界十亿人口的意识形态英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思想有所了解，所以本章自成系统的附录将专门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学。

§. 保守主义者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攻

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致意见的理论目前正日益受到几个方面的攻击^①。首先是来自保守主义集团的反对，虽然从真正的政治意义来看，这一集团的反对可能是最强大和持久的，但这种在历史上一向存在的反对不含有学术的成分。你要么感觉到应该反对，要么感觉到应该赞成，因而在学术上没有多少辩论的余地。

芝加哥大学的新自由主义。大致说来，从右到左算来，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第二种攻击来自经济学领域之内的新自由主义者——即：自由放任的信徒们。F. 奈特(1885—1972)、H. C. 西蒙斯、F. 海克和M. 弗里德曼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②。该学派所起的一

① 下几节材料取自 P. A. 萨缪尔森的《自由主义者的困境》，G. 科姆纪念论文，新社会研究学院，载《社会研究》(1972 年春季号)，第 16—31 页。

② 在与学术界无关的群众中，在 A. 兰德和公开承认的自私自利的旗帜之下，一个新的极右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学术运动结成了联盟。看来古怪而稍加思索也许便不足为奇的是，极左派和极右派往往联合起来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攻击。这不仅仅是由于

个重要作用,是经常提醒我们:应该让市场价格制度发挥作用,如果忽视市场价格制度的作用,社会将受到惩罚。

例如,目前对租金的控制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此外,二十年前,弗里德曼曾只身一人大声疾呼:在一个各国均不按照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降低或提高汇率的世界中,布雷顿森林会议所规定的固定汇率制度是极其错误的。

持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这本书。^①该书对一种重要的观点,作了非常严密而仔细的而且往往又是具有说服力的阐述。在你阅读以前,你可能会问:

今天真有人反对社会保险吗?反对水灾救济?反对农业法案?反对保证食品和药物成分的规定?反对颁发医生营业执照?反对颁发汽车司机营业执照?反对援外?反对公用事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理规则?

反对邮政局的垄断?反对有关最低限度工资的规定?反对征兵?反对物价和工资控制?反对补偿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反对汽车安全驾驶标准?反对强迫性的免费教育?反对禁止贩毒?反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严格规定外籍工人的标准?反对限制高利贷者的最高利息率?反对要求说明借款条件的法规?反对政府的经济计划?一个善良的人能反对教皇保罗六世的训谕,不相信中央经济计划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吗?

如果你读一读弗里德曼教授的著作,读一读他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的集子,你就会发现,对上述引起强烈争论的各个问题的每一种否定的观点都得到了有力的论证。我们在思索之后,同意他的地方虽然可多可少,但我们的感觉正象人们经常说的那样:“如果世界上没有弗里德曼,则有必要把他创造出来”。

战术的原因,象希特勒成功地取得政权以前的魏玛共和国的情况那样。事实是:极端的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无政府主义。除了崇拜市场以外,它和新左派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没有多大区别。

①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1962年,精装和平装两种。也可以参阅 M. 弗里德曼:《一个经济学者的抗议》(托马斯·霍顿公司,格伦里奇城,新泽西州,1972年),该书是他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的集子。第十七章曾经论及他反对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货币主义观点。二者好象是在经济学大家庭之内进行论争。

§. 加尔布雷思的批判

对主流经济学的第三种挑战来自 J. K. 加尔布雷思。现在,即使是中学生也知道他的以下几部著作:《丰裕社会》(1957)、《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以及《货币》(1975)^①。

十五年以前,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说中,我对经济学界内的同行们说:非经济学界的人过于认真地看待加尔布雷思,而经济学界内的人又对他重视不够。关于加尔布雷思和主流经济学的分歧之处,目前给予评价为时尚早;在将来很可能也是如此。然而,我们却可以发表如下看法。

作为艺术家的学者。许多学者认为,文笔优美即使不是罪大恶极,也是一种罪恶,一种不法行为。他们认为:优美的文笔往往会夸大其辞。因此,加尔布雷思便必然受到怀疑:一个人的著作如此畅销,那他必然是肤浅的。

849

也和马克思的情况一样,学者们说加尔布雷思的思想并不是首创的。《丰裕社会》甚至连名称都套用 R. H. 托尼的《贪求社会》;“技术专家体制”不过是 J. 伯纳姆的经理革命中的官僚体制的另一名称;广告操纵消费者的爱好是重弹拉斯金的老调;强调公共部门的需要是 A. 汉森的思想的推广;大公司的自主权不过是伯利和米恩斯在四十年后的重现;歌颂公司的巨大规模是熊彼特式

^① 加尔布雷思本来是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苏格兰人,最初是一个农业经济学者。他早年曾在战时的物价管理局工作,赢得了卤莽的物价管理人的名声,后来他成为编辑、哲学家、政治演说撰稿人、政客、顾问、小说家、艺术鉴赏家、大使(在肯尼迪任内驻印度)、回忆录作者、国际游历者以及滑雪运动员。他是 A. 史蒂文森、J. F. 肯尼迪和 G. 麦戈文的重要顾问。除了上述著作外,他的第四本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霍顿米福林公司,波士顿,1956年)象征着他已从一个主流经济学教授的成功生涯中解放了出来。他的兴趣之广泛可以从他的另外一些著作的名称中表现出来:《物价控制理论》;《经济学与论争的艺术》;《大崩溃,1929年》;《经济发展》;《苏格兰人》;《大使日记》。

的赞歌；军事—工业综合体来自艾森豪威尔告别时提出的警告。

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在技术上，发明者并不是革新者。同样，在思想史中，只有那些创立新的思想体系并生动描绘新时代的人才真正的思想家。

不崇拜偶像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尔布雷思没有门徒。在他的著作中，很少有能以博士论文或学术论文的形式来加以检验和研究的命题。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怎么能够证明他的态度和见解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

然而，加尔布雷思却提供了一种人们非常需要的东西，即：对流行的正统经济学的批判观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反对“传统的智慧”；用凡勃伦的话来说，就是反对“已被接受的知识”。他的批判本身并不具有杀伤力。但是，它象细菌一样，起着腐蚀的作用，为新左派及其激进的职业经济学者的较为致命的批判创造条件^①。

§. 新左派和激进经济学

正象对加尔布雷思的持久影响作出最终评价为时尚早一样，对一个新学派现在施加于主流经济学——即：所谓后凯恩斯折衷主义的新经济学——的批判的最终的重要性作出判断也是为时尚

^① 关于加尔布雷思、R. 索洛和其他经济学者之间的论争，参阅 P. A. 萨缪尔森编《经济学论文集》（麦格劳—希尔公司，纽约，1973年）第七版。激进经济学派的代言人 R. 菲奇说，如果有谁认为加尔布雷思是激进派而不是反动派，那他就犯了非常可笑的错误；菲奇还说，加尔布雷思是非常幼稚的，因为他认为电子计算机专家可以向亨利·福特第二（或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发号施令。研究结果并没有证实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即：技术专家经营的现代大公司是操纵市场的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但是，正如第四十一章所说，由于混合经济还没有找到可以消除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收入政策，所以加尔布雷思所主张的和平时期的永久性的价格—工资控制有时仍具有很大影响。高深著作的一个主题是加尔布雷思—鲍莫尔—马里斯的假说，即：决定公司行为的是取得“最大的增长”，而不是取得“最大的利润”。

早。这一新学派的成员骄傲地称自己为“激进经济学者”，其数目至少占美国经济学者的十分之一。

攻击。为了使人对这种批判稍许有所了解，下面我们引用该学派最著名的成员斯坦福大学的约翰·G. 格利的一段话。此人早年曾与爱德华·肖共同研究分析货币，一度成为著名的主流经济学者，而近年来则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和能言善辩的激进经济学者。^① 850

〔这是一个〕以前几乎从未有过的时期：经济学的假设条件和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经济学者的非难，同时也受到许多年纪较大的经济学者的非难。某些攻击反映了人们不满意于经济学者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许多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另一些人则对经济学者所广泛接受的经济目标表示怀疑，特别是因为某些经济学者只注意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而很少从生态体系这一较大的范围来考察这一问题。

人们攻击当代经济学时，常常过于偏激地分析美国帝国主义——分析在组成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富国和穷国的等级结构中，美国如何从它的领导地位得到好处。激进学派的其他分析则考察美国国内的某些集团如何从维持一个有等级的阶级结构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一阶级结构造成穷和富、压迫和特权。这些分析的一般结论是：这种社会地位上和经济上的差距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够（也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

可以这样说，这些研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考察了财富和贫穷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考察了决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一般社会、经济和政治

① 下面的引文以及索洛的答辩系取自“经济学的现状”，载《美国经济评论》第61卷（1971年5月，论文与记录），第43—68页。也可参阅P. A. 萨缪尔森：《论文选》，同上引书以及P. M. 斯威齐：“走向经济学的批判”，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70年春季号。该文批判正统经济学缺乏现实性，“……把现存的经济制度当作为不变的事实……〔寻求〕利益的和谐……趋向于均衡……〔关心〕次要的和日益失掉其重要性的问题……致力于分析的技巧并使它复杂化。”关于P. 巴伦、P. 斯威齐、S. 海默、S. 鲍尔斯、H. 金蒂斯、J. 奥康纳、A. 戈兹、A. 麦克尤恩、H. 马格道夫和其他人的著作，也可参阅R. C. 爱德华兹、M. 赖克、T. E. 韦塞柯夫：《资本主义制度》（普伦蒂斯—霍尔公司，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新泽西州，1972年）。

因素。它们全都触及了传统经济学的要害，其中许多研究是激进经济学者联盟的青年经济学者搞的。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者〕不顾所有这一切向当代经济学的基本教条进行挑战和表示不同意见的著作。结果，无辜的读者从来不知道经济学领域之内的许多成员正在进行深刻的再思索。事实上，读者会从阅读中得到相反的印象——即：经济学的情况一切良好；对于本学科的基本点存在着几乎一致的意见；经济学者已作好充分的准备来解决被他们称之为（虽然似乎难于令人置信）“新近产生的问题”如贫穷以及“时髦的主题”如城市的衰败。占统治地位的调子是极大程度的自满和自信。

我现在要说的是：这种调子是没有根据的。

反应。攻击自然要引起防御。麻省理工学院的 R. 索洛反驳道：

激进经济学可能是将来的潮流，但是，我不认为是目前的潮流。事实上，如果实事求是地看待激进经济学的实践，那末，我认为，它比传统的经济学更多地诵念经文，而不是更少；更多地重弹老调，而不是更少；更少地面对事实，而不是更多。简言之，我们忽视激进经济学，因为它是可以忽视的。

851

首先我要说：我认为激进经济学者亵渎了 T. 库恩关于科学模式的说法；他们认为这种说法只会使人们以此为借口不进行严密的思考。如果你观察一下库恩所举的例子——当然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你会看到它们都是发展完善的思想模型或体系，如牛顿的力学、哥白尼的天文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很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一个科学模式。它可能是一个坏模式，或是一个过时的模式，或是一个曾经增进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模式，但它却是库恩所说的那种东西。以我能看到的而论，激进政治经济学不是那种东西。它更多地是一种姿态或修辞学，根本不是什么科学体系。……用库恩的话来说……一个科学模式应该为“规范科学”提供体系。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激进政治经济学能够发展成规范科学，它是否打算这样做，都是成问题的。

这里有一些例子可以说明我的意思。格利教授说：“按照激进经济学者的看法，国民收入属于劳动者和财产所有者的份额主要取决于二者

力量的对比,虽然二者相对的供给量规定了力量对比可以回旋的限度。”我是否能据此而认为,有关时间数列的研究表明:分配份额的短期波动反映了社会力量对比的短期波动?这是否又意味着大批人失业时的劳动者比失业人数减少时具有较大的力量,因为萧条时期工资的份额最高。或者,在许多国家中都已经发现:分配份额的长期变动符合于独立衡量到的社会力量分配的长期趋向?或者,对于各个行业的横剖面的研究表明:在劳动者力量最大的行业中,工资在该行业的加入价值中占有最大的份额,而在资本家的社会力量最大的行业中,劳动者占有最少的份额?或者,是否能够证明:收入分配的份额在国家之间的差异或多或少地符合于劳动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力量对比在各国之间的差异?

§. 新左派思想

激进经济学者目前仍在从事人们只有在将来才能作出评价的研究。毫无疑问,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新左派是当代的一种重要思潮。关于这一思潮的周密考察,可以参阅现代瑞典学者德托克维尔的著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A.林德贝克作为客座教授来美国访问期间,撰写并出版了他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旁观者的观点》(哈珀和罗公司,纽约,1971年)一书。他指出,一个从匈牙利或东欧任何地方来的经济学者会吃惊地发现:新左派往往同时批判市场机制和官僚体制,而且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渴望建立乌托邦式的自给自足的集体农庄,正象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地位优越的大学生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观地设想为整个世界的的生活方式一样。他实际上对这种幼稚的感情用事的态度表示了极端的不满^①。

不应该夸大老左派和新左派之间的差别。在他们的圣人和英雄的神庙中,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顺序,斯大林的名字已经被毛所代替。在格拉姆西、巴伦、斯威齐和曼德尔的名字之上,又 852

^① 关于对林德贝克的分析的反响,参阅P.斯威齐、S.海默等人在1972年的答辞。这些答辞转载于P.A.萨缪尔森:《论文集》,同上引书。

添了马库塞、弗罗姆和 P. 古德曼。然而，决定性的特点不是马克思的传统——不仅仅就成熟的马克思，而且也就年轻时的马克思而言。

本章的结束部分将对马克思作一个一般性的论述，他的纯经济学的方面被放入本章附录之中^①。

§. 卡尔·马克思传略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生于李嘉图发表了他的《原理》之后的那一年。正象牛顿生于加利略去世的那一年，马克思于凯恩斯和熊彼特出生的那一年去世。从表面上看来，马克思一生过着平凡的研究生活，其中很大一部分系在流亡伦敦时于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中度过。但是，他的影响目前存在于莫斯科和北京；存在于外蒙古和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存在于哈瓦那和皮奥利亚。

早期生活。马克思出身于世代犹太教士家庭，他的父亲后来改信耶稣教的新教，为的是在拿破仑后的反动年代从事律师职业。卡尔总是一个圈子外的人物，即使是在普鲁士的莱茵地区，在这一地区，天主教徒大大超过居于少数的资产阶级新教徒。在聪明的孩子通常所经历的优异学校成绩之后，马克思到了波恩和柏林的大学去学习——最初学习法律，一直到哲学的迷人之处使他消除了对其他职业上的兴趣。那时，黑格尔的哲学正在席卷德国。在

① 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学派。J. 罗宾逊、N. 卡尔多、P. 斯拉法和 L. 帕西纳惕——即：所谓意大利—英国剑桥学派（这一学派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有卓越的追随者，包括印度）——反对边际生产率分配论，认为该理论(a)只不过是在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进行辩护，认为(b)该理论依据的生产函数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具有缺陷，因为它假设投入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可以随意变动，错误地使用了其净生产率被认为是利息率的抽象的资本总量。本章附录还将谈到这一科学的批判。第二十七章已经提到卡尔多的另一种宏观经济分配模型，而第三十章和第三十七章也曾提到“再转辙”的现象与过分简单化的节俭寓言及其提高生产率的能力是不相容的。

最初的抵抗以后,马克思顺从了黑格尔主义,但是,却用自己的物质高于观念去代替观念高于物质的说法,并且用共产主义为历史发展的最高点去代替普鲁士的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制为历史最高点的说法。

当大学教授的职业由于马克思的与世不合的本性和激进的思想而成为不可能时,他便转入新闻界。他所编辑的每一种激进的报纸都遭到了破产或普鲁士的查封。后来他流亡到巴黎和布鲁塞尔,最后流亡到伦敦。他的贵族出身的童年时的情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作为他的妻子和伴侣,和他苦乐与共地站在一起。这位一无所有的激进的学者之所以在生活上没有吃到更多的苦头,完全是由于他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恩格斯是马克思终生的合作者和资助者。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一切科学和革命的编年史中,不可能有比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之间还要更加不平凡的友谊。他们在一起写了《共产党宣言》(1848)以及许多其他著作。当马克思逝世后留下他的三卷《资本论》的两卷没有完成时,恩格斯编辑了没有完成的笔记和手稿,即使他当时也已经衰老并且眼睛越来越不好使。

以他自己的成就和才华而论,恩格斯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界的人物,而当他写道:“马克思是一个天才……我们这些人顶多不过 853 是有些才能”时,我们决不能根据他对自己的谦虚的评价去看待他。然而,这种对马克思的谦虚态度无疑地使他与那个非常好斗和难以相处的人的终身友谊成为可能。

有关性格的非本质之点。马克思在思想史和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是由于他的思想和著作。他的性格表现——如他经常被认为是专横的,经常和普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以及革命运动中的

其他中坚分子进行争吵——是无关紧要的。I. 伯林在他写的文笔流畅的《卡尔·马克思》这本传记性的小册子(牛津大学出版社,伦敦,1939、1948年)中,开头所说的话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象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此。这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认真听取马克思的意见并且对他作出公正的裁决。

§. 马克思的体系

恩格斯曾经恰如其分地把马克思的体系的特点说成为德国黑格尔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结合。最后一点我们在这里必须加以研究——他相信,他的推断是科学的,即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不过在这样做时,我们并不否认,后人可能最终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他的经济学是最不持久的部分。

预言。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评价其前人。人们过去一向认为,马克思的最伟大的成就是他的一百多万字的《资本论》,因为该书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死亡这一运动规律。

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劳动者阶级贫困化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将日益扩大,受压迫的无产者的阶级觉悟将逐渐提高。由于生产规模不可避免地一步步扩大,竞争最终将消失而形成垄断资本主义。随着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和购买力缺乏,经济周期和危机日益严重,一直到一次最后的灾难性的萧条给资本主义敲响丧钟。帝国主义者绝望地企图通过剥削殖民地、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和对外投资等冒险办法来推迟末日的到来。

最后,在最终的不可避免的那一天,象一颗熟透了的果实准备从树上落下那样,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托拉斯,可以为劳动者在一次突然的、必须是暴力的革命中拿到手。

上面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庸俗的看法。当你阅读老左派成员乃至新左派成员的传略时,你会发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只读过《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几章。他们读这么多就够了,因为已经得到了斯宾诺莎式证明,即资本主义的衰亡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科学到来。

§.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在1900年,《资本论》在1867年出版后的三分之一世纪,即使是最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面对实际工资在西方世界正在绝对地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一事实。1936年凯恩斯出版《通论》之后,⁸⁵⁴日益扩大的失业后备军和日益恶化的经济周期显著收缩。面对这些事实,怎么办呢?下面我们来看他们采用的几种办法。

1. 对事实置之不理。否定事实。或掩盖事实。^①

2. 象E. 伯恩施坦那样,把你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为费边式的肖伯纳和韦伯类型的进化社会主义。把你的希望寄托于工会以及

^① 很少有羡慕马克思的人具有象J. 罗宾逊那样的毫不畏缩的坦率态度。她的《论马克思主义》(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42、1964年)也许是对成熟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最好的简短介绍。可以作为解毒剂而坦率态度较少的介绍为P. 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43年)。关于劳动者绝对贫困化的错误预测,罗宾逊教授写道:“象耶稣相信世界很快要到达末日一样,这一错误对整个理论而言具有如此核心的地位,以致我们很难相信:没有这一预测,整个理论怎么能站住脚……‘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一幢近郊的住宅和一辆汽车’不会成为一个革命运动的适当的口号”。正如我在《资本论》出版一百周年时所说的:“如果有一个象这样的朋友,那末,就没有必要有一个敌人”。平心而论,谴责马克思具有机会主义思想是非常错误的。不论是否正确,马克思相信:他已经通过令人信服和创新性的经济分析推论出被他预测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本章附录将简要概述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创新。只有当我们公平地研究了马克思的逻辑推理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的预测的破产并不仅仅由于运气不佳(谁能说预测一个世纪以后的事不受运气的影响?）。马克思经济学的内部的逻辑在核心上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根据新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来推测,英国或美国的失业后备军在1867年或1967年究竟占有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五十;也不能推测,资本主义的实际工资究竟按年平均率百分之-5,百分之+3、百分之0或任何其他数值来变动。

在议会中取得多数,从而保证得到偏向于劳动者的立法。

3. 象列宁那样,承认劳动者中的特权阶层可以成为资产阶级并且分享剥削到的赃物。但断言,这些无产阶级的叛徒的生活来源完全来自对欧洲和北美宗主国以外的殖民地的剥削。同时断言,繁荣必将消失,无产阶级需要革命的先锋队来领导。

4. 重新考察并重新建立马克思的论点。从而发现:预言马克思的真正的意思并不在于预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同时提高你对混合经济的经济表现的及格标准。

§. 新左派和年轻的马克思

今天,人们的研究重点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登峰造极之作《资本论》了。用流行的话来说,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马克思,即1844年以及写作《共产党宣言》以前的年轻的马克思。人们发现了马克思1858年为写作一部巨著而作的笔记,即所谓《大纲》,他本来打算《资本论》只是这部巨著的一部分。我们从《大纲》中可以看出:认为卡尔·马克思已经超越了黑格尔,不再受黑格尔的影响是错误的。

855 异化。因此,让我们来看异化这一引起我们时代巨大兴趣的重要概念。在马克思坐在英国博物馆中掌握李嘉图和剩余价值理论很久以前,他的黑格尔式的批判使他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已变成了异化的机器零件这一事实。当我们带着这个观点来仔细地重新阅读《资本论》时,我们看到,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异化的概念。

H. 马库塞、E. 弗罗姆或C. 赖克认为,没有必要否认美国1976年的工资高于1776年或1876年,而且也高于印度、列宁格勒、北京或哈瓦那。在缺乏电视机、汽车或青霉素的意义上,劳动者可能

没有绝对贫困化。但是,他们论证说:劳动者在精神上却存在着绝对贫困化,因为他要照管单调的装配线,要遵守工头的纪律和每星期固定的工作时间。广告宣传使他的爱好俗不可耐。报纸杂志给他洗脑,使他投票赞成巨额军事开支,来杀戮其他国家的人民,赞成各项政府计划,而使大公司受益。这种压迫制度设计得如此精巧,以致它能,用马库塞的话来说,通过对于劳动者的容忍来进行压迫。

平等的愿望。以冷酷的经济事实而论,姑且承认实际工资有所上升。

但是,批评者问道:工资上升的幅度是否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幅度一样大,从而财产所有者占有的份额没有增大?

或者,即使计入实报实销的因公而支付的个人开支以及赋税轻微的资本收益以后,劳动者在混合经济的不断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份额仍然没有下降,批评者也还是要问:在道德上有什么理由允许显而易见的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继续下去。“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劳动者所得到的不应少于他所应得到的百分之百的产品”——这被规定为不能让步的最终目标。他们认为:只有合理的计划经济,才能消除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造成的浪费。

此外,当我们转而考察第三世界时,社会主义者宣称: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经济才能迅速发展。国家所导致的强迫储蓄要远远超过穷人按照自发的原则进行的自愿储蓄。不理解这些愿望,就不能理解批评“资本主义的”人。

§. 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动态学

那些想欣赏成熟的马克思的传统经济学的人可以阅读本章附录。在离开马克思以前,我们应该看到,他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革命家。毫无疑问,他

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为了贬低马克思,学者们有时指出,他的所有思想并不全都是他首创的^①。当然不是。思想从来都不是完全新颖的。正如怀特黑德所说,每一种伟大的思想都是由不是首先发现它的人创造出来的。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如何综合、形成和推广他的思想。同时,这些思想又如何被人们接受!

856 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的经济解释也许可以被列入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中。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决定我们的行为的说法,已经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什么决定我们的意识形态?工商业者投保守方面的选票。工会领袖投票赞成最低工资的规定以及失业补助的立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观点和意见并不是由钻牛角尖的逻辑分析所决定的。属于上层建筑的信仰、法律和意识形态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和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反映。

在这里,我们推广了亚当·斯密的自私自利的概念,把它从日常生活中在市场上用货币投票,推广到在竞选时用选票投票以及在攻占路障时用子弹投票。一旦我们的眼界得以开阔,还能怀疑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威胁吗?还能不看到,在一段时期中实行普选权必然要导致下一段时间中的再分配性质的赋税制度吗?

归根结蒂,权力的计算和金钱的计算并没有很大的差别。J. V. 诺伊曼的博弈论中关于联合和斗争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分析在相互争夺的市场上出售钢铁的寡头,而且也适用于分析阶级斗争及其宗教教义。

总之,阅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永远不会陷入辉格党人对历史

^① 正如伯林所说:“成为首创性的东西并不是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把各个部分结合起来的中心假说”。这样,斯宾诺莎和费尔巴哈较早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圣西门和古索特较早提出阶级斗争学说;西斯蒙第较早提出经济危机理论;摩西·赫斯和巴贝夫较早预见到无产阶级的兴起;傅立叶和某些李嘉图后的人物,如布雷、汤普逊和霍吉斯金较早提出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想法;这些都无关紧要。

所持有的错误看法——认为麦考利时期的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顶峰，或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福利国家会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或甚至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最后胜利必将结束阶级斗争史。^①

卡尔·马克思的最终论点是：“那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总结和复习

1.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强调自由放任的益处和秩序；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悲观地预言收益将递减，预言工资劳动者、土地所有者和牟利的资本家将争夺有限的社会收入。

2. 衰亡的古典学派在一个世纪以前让位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对效用与负效用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把边际主义从李嘉图的地租分析推广到一切生产要素；在计量经济学中使用日益复杂的数学和数理统计工具；用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来代替理论上的完全竞争和垄断。

3. 对于发展中的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的革命增添了人们期待已久的精心建立的宏观经济学。后者最终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把失业的周期趋向和通货膨胀综合了起来。（然而不要忘记，人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收入政策来治疗混合经济中的 857 停滞膨胀。）

4. 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德国是李斯特和历史学派；在美国是

^① 十年前，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传着这样一个讽刺性笑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人剥削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况则相反，即把两个人字调换一下位置，结果还是人剥削人。”只有非常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想出这样的笑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制度经济学和 T. 凡勃伦。

5. 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攻击来自右和左的方面: 来自奥国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海克、奈特、弗里德曼)的保守的自私自利的主张和经过周密思考的新自由主义; 来自加尔布雷思关于在丰裕工业国中具有自主权力的大公司和技术结构阶层的非偶像崇拜的说法; 来自新老左派以及激进经济学这一新学派。

6. 在世界范围, 来自李嘉图古典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枝在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以黑格尔式的肯定性预言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 剥削和贫困化、阶级斗争和阶级决定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周期性的危机、无产阶级的胜利。人们对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资本论》的兴趣逐渐减少, 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特别是马克思年轻时作为黑格尔左派论述异化问题的著作。

附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

在他的成熟的三卷本著作《资本论》(1867、1885、1894年)中^①, 马克思试图(a)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性质, 以及(b)说明经济发展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他认为他在这方面提出的关键性概念是有关“剩余价值”的概念。

本书的篇幅只容许我们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对于经济学的贡献的核心部分——马克思相信: 他已经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新的工具说明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现在我们假定, 一个工人每天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平均量需要六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但是, 这个人是个雇佣工人。因此, 他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这样, 资本家就迫使这个工人, 例如说, 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工人还必须额外工作六小时, 这六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时间, 并且

^① 特别是对于第一卷, 即马克思 1883 年逝世前唯一完成的一卷而言,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许多版本。

这个剩余劳动将体现在剩余价值上面……①

如果正确的话,这看来是对资本主义的罪行的一个严重判决。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创新,恩格斯在 1891 年继续说:“伴随着每一个新的……发明,这一[劳动的]剩余产品每天超过其成本的部分会增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如此重要,以致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用类似的话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方面的组成部分:

劳动者把工作日的一部分用来补偿维持他自己和他家庭的费用(工资),而在工作日的其他部分,他从事无偿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即: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马克思在劳动上找到一个表示价值的共同标准。现代的观点是:在解释两种物品——例如亚当·斯密所举的著名例子:鹿和海狸——的相对价值或相对价格时,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供给(取决于生产的困难程度)和需求(取决于爱好和财富)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我们在市场上所观察到的交换或价格比例”。

但是,应该记住,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他认为,需要一个价值的绝对衡量物,以便使不能相互比较的鹿和海狸成为可以相互比较的东西。

他认为:“社会必要劳动”可以为绝对标准提供答案。②这样,大卫·李嘉图以及甚至还要早一些的亚当·斯密就为马克思发展“古典经济学”铺设了道路。

斯密把劳动价值论用于历史萌芽时的伊甸乐园:

在先于资本积累[即:对于资本品的需要]和土地私人占有的那种早期和原始状态的社会……为了得到不同物品而需要的劳动量似乎是能给物品之间的交换提供准绳的唯一办法。如果……猎取一只海狸所用掉的劳动为猎取一只鹿的两倍,那末,一只海狸自然可以换取两只鹿或值两只鹿。③

① K.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转载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八部分(国际出版社,纽约,1968年)。恩格斯和列宁的引文取自同一著作。〔译者注:译者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符合和完全符合于此小注所指的内容的引文。对萨缪尔森在本小注中所涉及的引文,译者按照萨缪尔森的原文译出。〕

② 剑桥大学的 J.罗宾逊,资本主义的卓越批判者和羡慕马克思的人,曾经说过,“……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取决于劳动价值论。”见《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42、1964年),第22页。

③ A.斯密:《国富论》(1776年),第一编,第六章。

纯粹的劳动价值论。我们用比较现实的煤炭和小麦的例子来代替打猎。假设在12个小时的工作日中,需要4小时来生产一单位煤炭,需要4小时来生产一单位小麦。那末,“社会必要的”劳动成本分别为4和4。

如果交换存在的话,竞争会使交换比例处于“一单位煤炭等于一单位小麦”,即:

$$\frac{\text{劳动价值}_{\text{小麦}}}{\text{劳动价值}_{\text{煤炭}}} = 4 \text{ 小时} / 4 \text{ 小时} = 1$$

859 直接和间接劳动。现在,使情况稍为复杂一些。假设煤炭仍然象过去那样需要4小时。然而,现在假设每一单位小麦除了需要4小时的直接劳动外,还需要一单位的煤炭作为原料。

现在,如何计算劳动成本总额?显然,

$$\frac{\text{劳动价值}_{\text{小麦}}}{\text{劳动价值}_{\text{煤炭}}} = (4 \text{ 小时} + 4 \text{ 小时}) / 4 \text{ 小时} = 8/4 = 2$$

现在,一单位煤炭或小麦中具有4小时直接(或“活”)劳动。然而,在小麦中,还具有额外的4小时间接(或“死”)劳动——即:在较早的阶段用来生产小麦所需要的煤炭的4小时。

在纯粹的劳动价值论中,一切物品的竞争的价值等于它们所含有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直接劳动加间接劳动)。^①

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马克思赋予活劳动和死劳动以新的名称。他称直接劳动成本——即:预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使他能在生产的物品完成以前取用——为“可变资本”并且以 v 来表示,如 $v_{\text{煤炭}}$ 或 $v_{\text{小麦}}$,或 v_1 、 v_2 和 v_i ,其中1、2、... i ...表示不同的行业和部门。

马克思称死劳动为“不变资本”——即:劳动在较早阶段所生产而又为这一阶段的活劳动在生产时所需要的原料。他把不变资本写成为 c : c_1 、 c_2 ... c_i ...^②。

① 为了简明起见,马克思假设所有的劳动都是完全相同的。或者,譬如说,如果妇女的劳动生产率在每一部门或行业中均为男人的两倍,那末,马克思就把妇女的劳动小时计算为2个具有最小公分母的男人劳动小时。这一简化并无害处。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如果妇女在焊接时的生产率为男人的三倍,在开矿时的生产率为男人的两倍,在蒸馏时为男人的四分之三倍,那末,就不能使用这种过于简单的方法。此时,必须使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和马克思一样,我们在最初也略去土地。

② 比较复杂的例子会牵涉到机器——例如,犁——以及生产小麦所需要的原料。这样, c_2 也会包括生产一单位的小麦所消耗掉的犁,即它的“折旧”。

下面是马克思为煤炭和小麦写下纯粹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₁ = $c_1 + v_1 = 0 \text{ 小时} + 4 \text{ 小时} = 4 \text{ 小时}$

劳动价值₂ = $c_2 + v_2 = 4 \text{ 小时(煤炭)} + 4 \text{ 小时} = 8 \text{ 小时}$

应该注意:在按照纯粹的劳动价值论办事的伊甸乐园中,没有剥削。劳动者得到全部产品。没有利润、没有利息、没有地租、没有在劳动成本之上的加值、没有剩余、没有剩余价值。

马克思把施加于 $c + v$ 之上的加值或“剩余”写成为 s : 例如,对于煤为 s_1 、对于小麦为 s_2 ……对于 i 行业为 s_i 。因此,在我们原始的伊甸乐园中, $s_1 = 0, s_2 = 0 \dots s_i = 0$,而在

任何行业中, $c_i + v_i + s_i = c_i + v_i + 0$

如果每一个劳动者每天劳动 12 小时,那末,他仅为自己,完全不是为了剥削别人的资本家而劳动。(例如,他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实际工资可以是很舒适的水平:他可以每天消费 $1\frac{1}{2}$ 单位的小麦,在小麦行业中直接劳动 6 小时,而在煤炭行业中间接劳动 6 小时。也许如果没有这样舒适的每天 $1\frac{1}{2}$ 单位小麦的配给,劳动者就不会养活足够多的孩子来把劳动供给量再生产出来。)

§. 剩余价值和剥削

现在,我们离开伊甸乐园。劳动者需要小麦来维持生活和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但是,如果要从事劳动,他们就不能等到收获季节来得到他们现在就需要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同时,如果某些资本家不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煤炭(以及劳动者自己的直接劳动),他们也不能从事小麦生产。

简言之,一小群拥有“资本”(作为原料的煤炭以及作为食品预支的去年的小麦)的节俭或幸运的资本家现在可以收取一笔剩余——一笔利润、利息率、或如马克思所说,一笔剩余价值。

只发生于活劳动之上的加值。在这里,马克思抛弃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假设:剩余或加值 s ,只发生于直接劳动之上。(记住:人是一切物品的衡量物,而不是象神那样地被崇拜的商品!)

假设条件:在马克思的“价值”体系中,每一个 s_i 的加值都代表每一种可变资本 v_i 的同一比例的数值——而不是代表每一种总资本 ($c_i + v_i$) 的同一比例的数值。这个同一的 s_i 和 v_i 之间的比例被称为“剩余价值率”。我们把

它写成为 m ，即代表一切行业的相同的 m 的数值。如果各行业的 m 为： $m_1, m_2, \dots, m_i, \dots$ ，那末，它就是：

$$m = m_1 = m_2 = \dots = m_i = \dots$$

$$s_1 = mv_1, s_2 = mv_2, \dots, s_i = mv_i, \dots$$

860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假设剩余价值率是200%，即： $m=2.00$ 。我们每天劳动中的4小时系为了我们自己，8小时系为了资本家。现在，我们的价值的计算结果为(从煤炭开始)：

$$\begin{aligned} c_1 + v_1 + s_1 &= c_1 + v_1 + mv_1 \\ &= 0 + 4 + 2.00(4) \\ &= 12 \text{ 即为每单位煤炭的价值} \end{aligned}$$

我们如何计算小麦的价值呢？很清楚，我们必须把作为原料的煤炭加到小麦的直接劳动和小麦的加值剩余上，从而得到：

$$\begin{aligned} c_2 + v_2 + s_2 &= c_2 + v_2 + mv_2 \\ &= 12(1) + 4 + 2.00(4) \\ &= 24 \text{ 即为每单位小麦的价值} \end{aligned}$$

注意：小麦的价值仍然为煤炭的两倍，

$$\frac{\text{价值}_{\text{小麦}}}{\text{价值}_{\text{煤炭}}} = 24/12 = 2$$

但是现在，分母上的24和分子上的12都三倍于往昔，因为剩余价值的加值为200%。^①

以前，当 $m=0$ 和没有剩余价值时，12小时给劳动者带来 $1\frac{1}{2}$ 单位小麦。现在，他只得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即：(工作日的12小时)/(作为小麦成本的24小时)=每天维持最低生活的 $1/2$ 单位的小麦。

最低限度生活的剥削的工资。显然，剩余价值率 m 越高，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越低。什么决定剩余价值的限度？

根据马克思的最简单的说法，正如小麦和煤炭具有把它们再生产出来的成本一样，劳动力只能得到它的[再]生产的成本，而不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总额。

能够把劳动者从失业后备军那里招雇来而又能使劳动者再生产出来的

① 这在每一生产阶段中均以同一数值出现。每一行业的直接劳动的“加入价值”都以同一的百分比加值：因此，通过象第10—2表那样的仔细计算，我们会看到：所有最终物品——煤炭或小麦或……——的价值必然作出相对于每小时工资的增长。由于200%的加值，实际工资已经被剥削到等于伊甸乐园的水平的一半！

最低实际工资,决定剥削的剩余价值率 m 。

我们过去的例子仍然有效。假设每天需要 $1/2$ 单位的小麦来使劳动者生存并且再生产自己。那末,我们应该可以推算出: 剩余价值率为 200%, 即 m 为 2.00, 而每个劳动者每天为剥削的资本家劳动 8 小时, 为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只劳动 4 小时。

回想一下,这造成了第一卷的公式:

$$c_1 + v_1 + mv_1 = 0 + 4 + 2.00(4) = 12$$

$$c_2 + v_2 + mv_2 = 1(12) + 4 + 2.00(4) = 24$$

劳动者必须支付 24 小时的劳动来购买一单位的小麦。他每天劳动的时数只有 12 小时。因此,我们证明,他得到的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小麦的数量为

$$\frac{1}{2} \text{ 单位的小麦} = \frac{12 \text{ 小时的劳动日}}{24 \text{ 小时小麦的价值}} = \frac{1}{2} \text{ 单位的小麦}$$

矛盾之处? 马克思知道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会反对他的假设,即剩余价值率在所有行业中均相同。他预计他们会以如下的方式进行争辩:

“仅仅由于它们用于劳动的支出相等,为什么煤炭和小麦行业便满足于相同数量的利润? 当和大得多的 $(c_2 + v_2)$ 相比较时(理应如此),小麦的利润则太低。当和不大于 $c_1 + v_1 = 0 + v_1$ 的数值相比较时,煤炭的利润则过高。”

“事实上,竞争会使一切行业的利润率 $s_i/(c_i + v_i)$ 相等,而不仅是 s_i/v_i 相等。我们应该用利润率 π 的相等,即:

$$\pi = s_1/(c_1 + v_1) = s_2/(c_2 + v_2)$$

来代替剩余价值率的相等。”

马克思如何回答? 他实际上会说:

“我同意: 相等的剩余价值率意味着不相等的利润率,因为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会得到较高的利润率”。(也就是说,“相等的利润率”意味着“不相等的剩余价值率”。)①

马克思可能继续说:“请等到我的第三卷出版的时候;那时我将说明,如何用以利润率相等为基础的‘价格’公式来代替我们以剩余价值率相等为基

① 马克思指出一种利润率相等和剩余价值率相等不发生矛盾的情况。如果“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一切行业中都是一样的,即: 间接劳动的密集程度 c_i/v_i 相等,那末,两种方法的结果相同。如果我们同意于这一无害的(虽然是不现实的)简化,那末,马克思的理论的很大部分是说得通的。

础的‘价值’公式。”

861 利润率相等的体系。关于那个煤炭和小麦的例子，我们现在可以写出它的第三卷中的资产阶级的解决办法。由于 π 是根据 $c + v$ 而得到的，而 $c + v$ 又大于 v ，所以利润率一定小于剩余价值率的200%的水平。

即使我们碰巧猜测利润率为100%，即： $\pi = 1.00$ ，计算结果也一定相同，即每一12小时的工作日得到1/2单位小麦这一仅能最低限度生活的剥削的工资。现在，煤炭的价格可以用 $C_1 + V_1$ 表示出来（在这里，应该说明：我们还是用大写字母来表示资产阶级的价格体系，以便使它和第一卷“价值”体系中小写的 $c_1 + v_1$ 相区别）。价格公式的起首部分为：

$$\begin{aligned}(C_1 + V_1) + S_1 &= (C_1 + V_1) + \pi (C_1 + V_1) \\ &= (0 + 4) + 1.00(0 + 4) = 8\end{aligned}$$

即为煤炭的价格。

现在，价格公式中小麦的价格是：

$$\begin{aligned}(C_2 + V_2) + S_2 &= (C_2 + V_2) + \pi (C_2 + V_2) \\ &= [1(8) + 4] + 1.00(8 + 4) = 24\end{aligned}$$

即为小麦的价格。〔注意：劳动者每天还是得到仅够维持生活的1/2单位小麦，其来源为（每天12小时）/（小麦的24小时的成本）=1/2。〕

剥削的“解释”。哪一种公式较好一些？“价值”还是“价格”？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回答为“价格”。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

但是，只要在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中花费一个月的功夫便会使任何学者相信，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剩余价值的概念为什么较好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应该记住：马克思是在完成并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以前去世的。因此，不得不由恩格斯来编辑出版未完成的手稿，而当时恩格斯年事已高，视力又不好，还受到政治活动的牵制。

由于本附录试图以同情的态度介绍马克思的概念，而把赞成和反对的意见留给高深的著作去讨论，所以我们只提供一种赞成剩余价值论的说法。

1. 剩余价值提供一个较简单的方式来向初学者解释剥削。它集中于说明受到直接剥削的人类劳动。（同时应该指出：对于十九世纪的读者来说，它所使用的代数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求 $\pi = 1.0$ 只要解二次多项式就行了。）

2. 马克思主义者宣称：按照《资本论》出版以前资产阶级关于利润率相等的法则（相同的 π ，而不是各行业相同的剩余价值率 m ），无情的竞争确

实会在微观经济中围绕着一个既定的平均水平把剩余分配给各个行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剥削的平均利润水平以及该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提高，可以通过剥削直接劳动的剩余价值这一加值概念而在宏观经济中以最简单的方式得以确定。

我们怎样想呢？如果我们同意第一点，即：剩余价值论能够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解释剥削，那末，我们也许用不着担心第二点，因为一百年以后由马克思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不分彼此地组成的审议团，最终会使第二点成为没有必要争论的事情。^①

§. 节约劳动的发明和失业后备军

上面概述了马克思的 $c + v + s$ 的概念。下面我们列举一些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关键性的长期趋向。

1. 资本家具有积累的强烈愿望，正如癌细胞具有增多的强烈愿望一样。作为一种自卫的办法，象垄断者需要日益增大的生产规模以便生存那样，资本家被迫而进行积累。马克思曾说，“积累啊，积累！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的规律”。

2. 积累趋于降低利润率（并且具有提高实际工资的威胁）。因此，节约劳动的机器的发明便被采用以便维持高额的利润，阻止工资过度上升。

结果：“造成失业后备军”、工资的下降和困苦。

3. 资本主义的这些运动规律都是令人讨厌的。因此，在垄断得到加强 862 和经济周期不断加深之后，工人阶级最终会发动一场暴力革命。“剥夺者将被剥夺！”

4.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认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会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帝国主义的剥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繁荣取决于对石油、铝矿、铁矿、铀矿以及其他自

①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编第九章中，马克思本来应该使价值体系中的 8 与 8 的剩余和 $(0+4)$ 加上 $(12+4)$ 的 $(c+v)$ 的总量发生关系，以便得到 $16/20$ 的平均利润率，而不是正确的 $\pi=1.00$ 。但是，他认识到，他对“转换（从‘价值’到‘价格’）问题”所建议的答案并不十分正确，因为在价格体系中，他应该用价格体系中的 C_2 ，而不是价值体系中的 c_2 来表示生产小麦所使用的煤炭。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斯威齐、多布、温特尼兹、约翰逊）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波凯维兹、塞顿、森岛、萨缪尔森……）已经证明：他的转换办法只需要微小的改正，如这里所做的那样。本书作者曾经在 1971 年的《经济文献杂志》上论述过这一问题。

然资源的开发。为了维持国内的购买力和避免大量失业以及为了延缓由于国内积累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恣意进行大量的对外投资并增加冷战开支。

目前的现实。前面我们结合第 37-3 图，已经较为详尽地列举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实际趋向：实际工资趋于上升；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保持不变或略微有所上升；利润率从长期来看既没有明显的上升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人口按复利增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资本数量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这些是有待于解释的被卡尔多称为“合乎成规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肯定不符合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向。

还有，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中，没有必要更多地说明这一事实，即：财政政策（赤字，如果有必要的话）和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政策使得卢森堡和列宁关于只有帝国主义才能缓和失业的说法丧失了现实意义，尽管这一说法在本世纪早期 W. H. 塔夫脱总统执政时期和英王爱德华七世的时代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不符合逻辑之处。正如本章正文中的一个小注所说，卡尔·马克思在他所预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上不仅仅是运气不佳的问题。他所声称的规律——例如，利润率下降规律和劳动者贫困化的规律——并不能令人信服地从马克思自己的概念体系中推导出来。剩余价值率的水平 m 和它所意味着的实际工资（在我们的例子中为每天 $1/2$ 单位的小麦）——以及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根本不是能从马克思的体系之内推演出来的。理由如下：

和马尔萨斯不同，马克思并不把生理上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工资看得很重。他诉之于“失业后备军”的支配作用（关于失业后备军，他并没有提供决定其数量的理论以及它与实际工资水平的数量关系），诉之于节约劳动的发明的支配作用，以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描绘出一幅足够阴暗的图景。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卡尔·马克思生活在 J. B. 克拉克的时代，那他可能在克拉克-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中仅仅假设足够程度的节约劳动的发明，便能同样容易地建立贫困化的说法。或者，如果他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斯拉法时代，那末，即使没有剩余价值的概念，他也可以简单地假设低工资和高利润，从而，再一次不需要相等的剩余价值率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的帮助。

§. 对于边际生产率分配论的否定

在1976年,对马克思1867年提出的概念的有用性质提出疑问并不能证明:在工资、地租和利息被宣称为取决于普遍适用的边际生产率理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世界中,一切都是完善的。我们必须注意J. 罗宾逊对主流经济学的分配论的批判。

前面煤炭和小麦的例子可以说明她和斯拉法所强调的地方。

批评者说,“每一个不同的利润或利息率都造成一个不同的实际工资率。只要劳动和煤炭不能自由地根据象第27-3图那样的等小麦产量曲线而相互代替,经济学者便缺少一个有效的方程来确定稳定状态时的利润率和用小麦表示的实际工资。(经济学者缺乏一个能解释非稳定状态的情况的分配论就更不用说了!)”

可供选择的理论。罗宾逊以及卡拉斯基和卡尔多提出了可能代替边际生产率的分配理论。例如,假设劳动按照每一期为 g 的复利增长。同时假设 δ_s 代表利润收入中被储蓄起来的比例,而所有的工资收入全部被消费掉。那末,在长期平衡增长的均衡中,我们必然得到如下计算利润率 π 的方程:

$$\pi = g/\delta_s$$

例如, $20\% = 4\% / .2$ 。

一旦知道了 π ,用小麦表示的实际工资便可以通过利润-工资和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转换关系而计算出来^①。 863

权力决定工资水平?自从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出版以来,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工人坚持得到较高的货币工资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得到较高的实际工资。那些否定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率理论而赞成这种或那种宏观分

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反对新古典学派寓言的说法,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第三十章关于“再转辙”的可能性的述论。新古典学派认为,节俭总会提高某些资本-产量之比并且降低利息或利润率。假设我们投资4个劳动一年(两个六个月)可以生产一单位煤炭。这符合于我们例子中的技术水平。但是,假设我们还能用另一种方法来生产一单位煤炭;在其中,需要投资24/7个劳动6个月(即:一个6个月的时期)以及8/7个劳动18个月(即:三个6个月的时期)。那末,如果利润率很高或很低,高时每6个月超过100%,低时每6个月不到50%,则竞争会使人们在开始和最后的时候采用4个劳动的方法。然而在二者之间,人们会使用“24/7和8/7”的方法。新古典学派的寓言如何解释:在利息率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以前,降低利息率首先会减少经济中可以消费的国民生产总值;显然,通常的新古典学派的寓言是过分简单化了。

配论(例如,卡尔多-卡拉斯基的理论)的人仍然可以宣称——象庞巴维克在七十年前的一篇有名的文章《经济规律或力量?》中所推测的那样——资本主义会成功地阻止利润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份额迅速下降。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永无止境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在下一章关于法西斯主义经济学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工会和知识分子采取强硬态度的专制政府有时可以在短期内使实际产量“奇迹般地”增长,而且甚至可以在短期内使实际工资有所增长。(巴西的专制政府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例子。)

如果要使马克思主义、新古典学派以及宏观经济的各种分配理论的所谓不足之处不在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上造成空白,那末,必须从事进一步的研究。老百姓并不知道,也不关心经济学者是否已经对分配作出了“解释”。但是,认真严肃的经济学者却应该关心这个问题。

§. 简单和扩大再生产

不论成熟的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下的实际工资的动态所作的解释最终会失败到什么程度,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卡尔·马克思确实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对于建立今天的所谓诺伊曼-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

简单再生产。我们的煤炭-小麦的例子很适用于这里的论述。但是,为了更加符合马克思的原著,我们添增一个纯然生产奢侈品的第三部门或行业——譬如说,生产仆役劳务,需要1个劳动小时来生产一单位的第三种物品。

由于这是一个简单再生产的模型,我们假设:资本家的储蓄为零,即: $\delta_s = 0$,他们把所有利润均花费于奢侈性的仆役劳务。劳动者把所有工资花费在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必需品小麦上。由于没有净资本形成,所有生产出来的煤炭均作为原料反馈到经济中去。

舞台已经布置完毕。下面是物质变动的事实。

三分之一的劳动会用于生产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小麦。假设我们的经济具有,譬如说100个劳动日,即为1,200劳动小时。这样,生产必需品的400个劳动小时的一半会作为活劳动来生产小麦;另外一半会作为死劳动来生产50个单位的煤炭,以便为50个单位的小麦提供原料。另外800个小时则为剥削的资本家服务,在生产奢侈品的第三部门生产800单位的仆役劳务。

静止的均衡将永远被维持下去：劳动者得到他们的最低生活必需品；资本家的净储蓄为零；剥削以稳定的比例进行到世界的末日。

“价值”和“价格”体系会有什么内容？我们从哪一个体系开始都成。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100%的资产阶级的利润率，即： $\pi = 1.00$ ，而煤炭、小麦和仆役劳务的“价格”为(8、24、2)。或者，我们可以使用200%的剩余价值率，而每一单位的三种物品的“价值”顺次为(12、24、3)。

掷个硬币来决定，结果是正面朝上，因此，我们先谈价值体系——即第42-1(a)表的内容。（注意：马克思的“400 v_1 ”的意思是“400个 v_1 ”，而不是数学家的“400乘上 v_1 ”。整个体系中的符号均具有同样的意义。）

简单再生产体系 ($\delta_s = 0$)	
价值 ($m = 2.00$)	价格 ($\pi = 1.00$)
$0c_1 + 200v_1 + 2.00(200)s_1 =$ $= 600 = 12(50)$	$0C_1 + 200V_1 + 1.00(0 + 200)S_1 =$ $= 400 = 8(50)$
$12(50)c_2 + 200v_2 + 2.00(200)s_2 =$ $= 1,200 = 24(50)$	$8(50)C_2 + 200V_2 + 1.00(400 +$ $+ 200)S_2 = 1,200 = 24(50)$
$0c_3 + 800v_3 + 2.00(800)s_3 =$ $= 2,400 = 3(800)$	$0C_3 + 800V_3 + 1.00(0 +$ $+ 800)S_3 = 1,600 = 2(800)$
(a)	(b)

864

第 42-1 表

表中的数字说明：工资总额 $(200 + 200 + 800)$ 显然等于小麦的总消费量 $[1,200 = 24(50)]$ 。剩余总额 $[2.00(200) + 2.00(200) + 2.00(800)]$ 确实等于奢侈品的总额 $[2,400 = 3(800)]$ 。不变资本总额 $[12(50)]$ 确实等于生产出来的原料煤炭的总额 $[600 = 12(50)]$ 。

在资产阶级模型中，物质变动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是，价格及其组成部分的数值却发生了变化——如第42-1(b)表所示。

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两个模型中的物质总量相同：同样单位数量的仆役劳务、同样单位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小麦、同样单位数量的原料煤炭。两个模型的各个相应的可变资本的数量相等，而且小麦的价值和价格相等，其原因在于：我们在两个模型中都使用劳动小时作为单位。另一个原因是：两个模型都假设每一个12小时的劳动日得到1/2单位的小麦作为生活必需品，从而，只有小麦的成本为24小时的劳动时，我们才能正确地得到最低限度的剥削的工资。

扩大再生产。现在,为了强调说明问题,让我们走向另一极端。假设资本家把他们的收入全部储蓄起来,而不象在简单再生产中那样,没有任何储蓄。只要经济中的劳动按每期100%的速度增长(以便与V. 诺伊曼的100%的利润率相适应),马克思就能证明:平衡增长的均衡可以永远存在。^①

下面是新的物质变动的事实。

象以前一样,在开始时,存在着,譬如说,100个劳动日(或1,200劳动小时)。这样,我们仍然必须为每人准备1/2单位的小麦,即:总计为50单位的小麦作为100个人的最低限度生活的必需品。

但是,由于经济中的一切方面在下一时期中均为目前数量的两倍,我们在目前必须“作出计划”来生产两倍于50个单位的小麦作为下一时期的生活必需品。(“作出计划”带有引号,因为发生作用的机制可能是市场力量,而不是官僚体制或计算机。)

为了在下一时期生产100个单位的小麦,我们现在必须从目前仅有的1,200小时中分配400小时给第二个小麦行业。同时,我们现在必须分配给小麦行业100个单位煤炭作为原料。

生产出来的仆役劳务为多少?等于零,因为资本家实际上把一切都储蓄了起来。他们的全部剩余被用于增加煤炭和小麦的产量。

现在究竟应该生产多少煤炭?为了满足下一时期加倍的原料需要,我们现在必须分配800小时给第一个行业,以便生产200个单位的煤炭。舞台已经布置完毕。

再掷一次硬币。这一次表明:首先应该计算价格体系——如第42-2(a)表所示。

现在,各个数量之间的关系不象上面那样简单。右方数值为2,400的期终小麦的备消费之用的产量是左方的工资总额的两倍。为什么?因为经济每个时期都加倍扩大!同样,右方的煤炭产量必须两倍于左方的投入的煤炭总额;这就是为什么200/2总是处于第二行的起首部分的原因。^②

① 《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编,第三部分;第三卷,第七部分,第四十九章[原文如此。——译者]。读者会看到,第三十七章附录和第37-2表中的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的很大部分已经为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所预见到。

② 剩余额的总和($800+800+400=1200$)不再等于奢侈品的总额(等于0)。可以证明,当 $\delta_0=1$ 时,剩余额总和等于净资本形成,即:从上期到本期之间的200/2单位的煤炭的增加和100/2单位的小麦的增加。读者可以把第42-2表的相应数字减半,以便得到上期的扩大再生产公式。这样,读者可以证实:本期的剩余总额确实等于上期与本期之间的小麦和煤炭数量的差额之和。如果把第42-2表的相应数字加倍和再加倍,那末,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

在离开这些再生产的体系以前，我们可以稍提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可以 865 使用它们来否定洛贝尔图斯和卢森堡的论点：即限制消费的体系最终一定缺乏购买力。马克思很早就觉察到哈罗德在今天所证明的事情：如果一个模型增长得足够快，那末，它自己可以形成一个有保证的自然增长率，如加速数-乘数的模型所示。（当然，在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则无法确保这种增长率。）

扩大再生产的体系 ($\delta_s = 1$)	
价格 ($\pi = 1.00$)	价值 ($m = 2.00$)
$0C_1 + 800V_1 + 1.00(0 + 800)S_1 = 1,600 = 8(200)$	$0c_1 + 800v_1 + 2.00(800)s_1 = 2,400 = 12(200)$
$8\left(\frac{200}{2}\right)C_2 + 400V_2 + 1.00(800 + 400)S_2 = 2,400 = 24(100)$	$12\left(\frac{200}{2}\right)c_2 + 400v_2 + 2.00(400)s_2 = 2,400 = 24(100)$
$0C_3 + 0V_3 + 1.00(0 + 0)S_3 = 0 = 2(0)$	$0c_3 + 0v_3 + 2.00(0)s_3 = 0 = 3(0)$
(a)	(b)

第 42-2 表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凡俗化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卡尔·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警句被 R. 阿伦颠倒过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是麻醉知识分子的鸦片。”虽然机智的风趣较差一些，我们却能认真地说明这一点，即：在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是麻醉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的事例实在太多了。

在什么意义上的鸦片？如果你寻找马克思的原话的意思，那他的真意所在很可能会使你吃惊。马克思并不是说，宗教是统治阶级为了减少无产者的不满情绪和痛苦而贩卖的万应灵丹，而是说：宗教是能给贫苦的人民带来安慰的鸦片。

同样，马克思的不可避免的革命将很快到来这一黑格尔式的观点，也对马克思主义者起着安慰的作用，起着使长期推迟希望所带来的痛苦比较易于忍受的作用。

不幸的是：“鸦片”这个词还有第三种含义——即：某种能麻痹思考力量的东西。当我们研究东欧、亚洲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时，我们不得

不承认：一直到最近为止，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往往把那些真正想理解西方制度的现实运动规律的人的头脑搅昏。

修补的条文。如果一种宗教——不仅如此，如果任何一种库恩所说的模式体系——在情况发生变化时还坚持老教义，那它必须具有某种伸缩性，以掩盖显著的矛盾之处。

“为了在表面上过得去”，托勒密天文学总是能添增补充条文，以解释新观察到的违反理论的现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适应改变了的情况而得以存在到今天。我们可以举出某些人所共知的辩证地重新提出来的说法。

1. 无产阶级革命是黑格尔式地不可避免。但是，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使其加速到来。

2. 革命应该最先出现于已经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和腐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最先进的国家。但是，沙皇俄国可以越过一次革命和资产阶级阶段。(E. 威尔逊甚至认为：斯大林手下的官僚可以说是俄国的资产阶级！)

3. 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无产者。但是，在1917年的俄国、1960年的古巴和1976年毛的中国，农民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4. 革命必须是暴力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观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所想到的那样，革命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和演变式的。同时，工会和政治行动(带有S. 冈珀斯的改良主义者的色彩)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后期改善劳动者的处境。

5. 劳动者阶级绝对贫困化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推论。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马克思的原话时，我们会发现：师傅的意思不过是(a)劳动者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的相对份额下降，或(b)这一份额上升得不象劳动者或平均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快，或甚至仅仅是(c)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

866 的劳动者会感到日益受到“异化”。

我们可以继续举出事例，其目的并不在于表明外界的批判有何高明之处，而是由于每一代最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其内部深入地讨论过上述每一个问题。决不要误解。与其象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子里，否定天王星的存在，还不如添增补充条文对它加以解释。然而，既能保存又能吃掉的科学糕点，可能是既不值得保存又不值得吃掉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很大，我们不能听任它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支配。它是一面可以用于分析批判的稜镜。通过这面镜子，主流经济学——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毫不留情地检验其理论。

第四十三章 各种可供 选择的经济制度

你们老年人
做着昨日的旧梦，
你们年轻人
则憧憬着未来。

旧约全书

§. 资本主义的危机？

867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成立了新政府。到了1925年，一个公正的观察者可能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看来是平静而稳定的。

然而，不到十年，一个又一个国家屈服于独裁政体之下；集权主义的法西斯政府覆盖在欧洲地图之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萧条最后以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世界被划分为巨大的集团。北美、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混合经济属于一个共同的类型。共产主义大国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另一共同的类型。最后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它们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并且在大国的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中冷静地进行抉择。

在先进国家之内，情况已经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维多利亚时期大为不同。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纯粹的资本主义已经逐渐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的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历史的

时钟有时移动得如此缓慢，以致移动中的钟针看来并不在动。新政以后，美国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和西欧一起合流成为混合经济。

每一篇新闻报道都提醒我们，混合经济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考验。它的表现不仅要过得去，而且要好上加好。极其重要的是社会对它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它在自己的年轻人的头脑中的印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西方的信心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动摇。

868

§. 新面貌

于是，象哈佛大学的 J. 熊彼特那样知识渊博的社会哲学家认为：他们可以预言社会主义在 1945 以后的年份中代替资本主义。即使知识渊博的哲学家也会作出很错误的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鸣锣开道的情况下，现代混合经济的“新经济学”开始占有统治地位。如果凯恩斯死后有知，那他会说：“我已预见到了现在。果然如此！”^①

在西德，出现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奇迹。一般说来，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荷兰、法国、意大利以及欧洲共同市场国家。通过私人的主动性和国家计划的结合，日本开始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跃进。以色列——固然由于从海外得到赠款和贷款——一连几十年奇迹般地发展。即使老大难的希腊、奥地利和巴西也能从混合经济制度中找到一条能迅速而持续发展的道路。台湾、墨西哥、泰国和朝鲜都已经向前跃进。

在阳光普照之下出现了某种新事物。被预言为必然的时间表——野蛮状态到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暂时变成了一种神话。

^① 这重复了 L. 斯蒂芬斯的话。斯蒂芬斯在访问 1917 年革命以后的俄国时说：“我已预见到了未来。果然如此！”

但是，神话、传说和愿望是能影响人的思想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的传统形式作一简要论述。它们本身就是有兴趣的主题。作为人类思想史的一部分，它们也具有意义。同时，它们还可以使我们的头脑摆脱某些轻率的结论的束缚，而这些结论，正和大多数轻率的结论一样，是根本经受不住实际经验的无情检验的。

政治自由是否不能和经济自由分开？例如，没有物品和劳务的自由市场便没有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和政治上的公民权，这句话对吗？经济学界的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事物。他们的看法对吗？

在另一极端，许多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认为：如果国家不抛弃“以利润为目标的生产”，不用“以使用为目标的生产”来代替它，不保证一切人享有“公平的份额”，那末，“政治上的民主”不过是虚伪的东西。他们的看法对吗？

特别是 F. 海克（此人曾在奥地利、英国、美国和德国任教）的观点正确吗？海克在他的那本有说服力的学术著作《走向农奴制之路》（1945 年）中认为，任何脱离市场经济和走向福利国家的改良步骤，最终势必导致建立一个既无效率又无自由的集权主义国家。罗斯福、丘吉尔和尼赫鲁等进化论者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一步步地实行改革是避免通过革命而一下子转变成共产主义独裁政体的唯一办法。正如后面的第 43-2 图所表明的，如果进化论者是正确的，那海克就是错误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各种不同的主义。

§. 一系列不同的主义

869

人类总是向往更加完善的社会：柏拉图的“共和国”、T. 摩尔

爵士的“乌托邦”、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数不清的想法。考察目前具体的不完善之处而把它们和某种含糊不清的乌托邦的理想特点加以对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除了一致认为目前的制度具有缺点以外，各个不同的改良学派往往没有什么共同之点。

在一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任何政府。另一极端的人们则主张万能的、集体化的、集权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第一人称的单数几乎已经全部被第一人称的复数代替。在社会主义这一名称的范围内，又存在着不同的分枝：基督教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社会主义、工会社会主义、费边（演化的）社会主义以及很多其他类别。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社会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聚集在地下室中，借着插在空酒瓶上的蜡烛发出的光亮，密谋发动流血的革命，或至少策划把炸弹放在洗好的衣服中，送还给政府官员和资本家。“社会主义者”这个词还常常用于毁谤人的声誉，谁要是主张社会保险、累进赋税、银行存款保险、公害控制或自由恋爱便给他扣上社会主义者的大帽子。

不论激进的政党在外国具有何种力量，在美国，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任何政党迄今为止都未能获得真正的发展^①。美国社会党提出竞选总统的候选人——禁酒党和保守党同它站在一起——但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选票。美国共产党不论是用它自己的名称还是改名换姓，都未能赢得大量选票。

如果看一下欧洲，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政党的名称都带有

^① T. 罗斯福 1912 年建立的布尔穆斯党主要是共和党的一个分枝。R. 拉福莱特 1924 年建立的进步党是最成功的第三党；虽然如此，也只能在它自己的威斯康星州取胜。H. 华莱士 1948 年建立的进步党是一个彻底的失败。G. 华莱士着眼于地方主义、种族情绪、对大企业的不满和保守主义。他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他对选举团在势均力敌时所施加的影响，并且寄希望于小资产阶级和害怕地位受到损害的特种工人在谈判时力量的增长。

“社会主义”这个词。但是,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诸如法国的激进社会党那样的政党实际上毫不激进,而是保守党。甚至希特勒的法西斯党也带有“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名称。

但是,欧洲的一些主要的改良政党却往往具有“社会民主党”的特征。例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很多国家的执政党都宣称:它们主张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法,不采用革命手段来逐渐扩大社会主义。

因此很显然,要了解当今的世界,并不需要详细了解所有的“主义”。只要了解下列主义的一些情况就够了:(a)相对的自由放任(混合经济正是由此演化来的);(b)社会主义;(c)共产主义;以及(d)法西斯主义。

上面各主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仅有程度的不同。此外,我们甚至不能把它们排成一行,把法西斯主义置于极右翼而把共产主义置于极左翼。在某些方面,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具有许多共同之处,虽然二者都不承认这一点。新左派的无政府主义和H. 斯潘塞的新自由主义联合起来对于自由主义的国家表示不满意。工团主义者赞成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方法。

纯粹的自由放任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已经在维多利亚女王去世 870 以前灭亡,而本书大部分的篇幅系用于论述埋葬纯粹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因此,下面我们可以简要论述其他几种主义。

§. 法西斯主义

说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特征比说明它的经济特征要容易。不论是在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萨拉查的葡萄牙、庇隆的阿根廷、希腊、巴基斯坦、秘鲁或军人当权的智利,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不外乎是个人独裁、一党专政、其他所有政党遭到取缔以及《人权法案》所规定的自由权的丧失。法西斯主义

运动总是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时竭力鼓吹意思模糊的“优等民族”这一概念，主张压迫少数民族。用墨索里尼的话来说，法西斯主义者应该“过危险的生活”——把战争和国家力量当作目标本身。个人应从属于国家。

在经济方面，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牵涉到“辛迪加”或“公司”国家的想法；每一行业和每一劳动者集体都被组成为一个辛迪加，以这种辛迪加为单位召开会议，达成协议并制定经济方针。然而，除了它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形式以外，这种辛迪加主义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也不是其他法西斯政权的特点。法西斯政权几乎全都反对自由和斗争性的工会；几乎全都赋予中央政府以调节经济生活的巨大权力。某些法西斯政权与宗教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些则反对教会。法西斯主义往往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是浪漫主义和违反理性的，并且特别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在通常的情况下，资本家和中下等阶级有助于形成法西斯运动的最初的力量；然而在以后，当法西斯运动开始带有——正如其中某些运动的实际情况所示——革命的色彩时，资本家可能后悔帮助了魔鬼。

唯一使人感到安慰的是：法西斯政权的标记之一是反对共产主义。一般说来，法西斯主义往往通过夸大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现实可能性来夺取政权，而在它取得政权以后，共产主义的威胁又被当作镇压民主的借口。

法西斯主义产生于仇恨而好斗的情绪。它借助于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崩溃而泛滥。其领导人物往往是转变为反动派的革命者。它的追随者为军官、破产的农民和小商人、失掉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阶层或仇恨新兴阶层的人——如仇恨大企业、黑人、外国人、依赖政府福利补助为生的人。大企业也插手进来，一方面想在政治上取得靠山，另一方面也由于惧怕共产党当权。

秩序和经济效率。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国家的经济会出现爬行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混乱。因而很显然，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是互不相容的目标。不容置疑，工会会员提高其工资率的斗争目标在于改善劳动者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份额。但实际上，由于企业为了保持财产所有者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份额而进行反击，较高的工资率会导致较高的价格。依靠讨价还价的集体谈判、怠工、罢工、静坐罢工、总罢工等等单方面的行动，实际工 871 资不会有多少增长，甚至毫无增长。

有人（凯恩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常常引用被认为是列宁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我们将使资本主义的货币贬值，以此消灭资本主义。”没有证据表明列宁曾说过这句话；至少我们找不到引文的出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警句修改成下面一段话。

“摧毁混合经济制度的最好办法——消除它在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增长以及加剧它的阶级斗争——是一夜之间使工资率增长百分之四十（正如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所做的那样）。结果会是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企业倒闭、罢工、崩溃、破产以及社会动乱。”

当一个人民的混合经济制度运转不佳，同时存在着通货膨胀和失业时，人们是否会要求法西斯分子当权——以便恢复“秩序和促进经济增长”？可叹的是：回答往往是肯定的。

独裁政权，或铁腕人物治理的国家，在短期内偶然也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例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巴西的军人政权对于教授、知识分子或新闻自由也许是严厉的，但正如在墨索里尼时期人们经常说的那样，“至少火车准点。……”我们查阅一下联合国《统计年鉴》就会发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巴西是名副其实的拉丁美洲的日本，其平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每年百分之十。

历史表明，仁慈的专制政权很少能长期仁慈下去，甚至从来不会长期具有效率。墨索里尼未能兑现他的许诺。根据缴获的文件，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经济管理是很糟糕的。如

果巴基斯坦的一个独裁者在一段时期中似乎使农业有所发展，那末，下一个独裁者会使国家陷入一场被人肢解的战争。

无情的事实表明：即使以法西斯的标准来看，法西斯政权所绘制的蓝图也很少得以真正实现。但这并不否认：社会动乱会妨碍经济发展。

§. 社会主义

在说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时，我们能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作为例子。社会主义却不这么容易描述。当然，我们可以论述瑞典的社会党政府或英国工党的纲领，但是，这些和我们的制度之间并不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它们代表一种中间道路，更多地类似我们的“混合经济制度”，而不是象苏联和中国那样的制度。

社会主义似乎具有下面几个共同的特点：

1. 政府拥有生产资源。随着铁路、煤炭乃至钢铁等部门的逐渐国有化，私人财产的作用逐渐减少。来源于地价上涨的不劳而获的利润受到限制。（在西德和英国，对于国有化的热情已经减退。）

2. 制定计划。引入相互关联的计划来代替完全自由的利润动机的作用，如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示。有时提出“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而生产”的纲领；减少新产品的广告费用；培养工人和专业人员热爱本职工作和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从而使他们受到不同于我们的“牟利社会”的动机的指引。

3. 收入再分配。严格行使政府征税的权力来减少继承的财富和过高的收入。同时提供社会保险、免费医疗以及另外一些从一生下来就可以享受的福利待遇，以便增加贫苦阶层的福利并保证最低生活标准。

4. 和平而民主地演变。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往往主张以和平的方式逐渐扩大政府的所有制——用选票而不用枪弹来革命。这一目标往往不仅是一种战略手段——而且是一种坚定信仰的哲学教义。

英国社会主义。对英国社会主义作一简要论述有助于说明目前人们正在争论的问题。正当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从先于它的重商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取得胜利时，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自由放任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人物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受到的启蒙教育来自一位十八世纪的功利个人主义者(即他的父亲，詹姆士·穆勒)，但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他开始转向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以后，在二十世纪早期，费边社的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的教义赢得了大学和夜校的知识分子。肖伯纳以及韦伯夫妇这些人的社会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工会运动的观点。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表面化。战后，自由党消失在保守党和工党的对立之中。工党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真正开始掌权。它的早期目标包括：(a)大规模扩大政府的福利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保守党政府所默许；(b)征收再分配性质的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被保守党所默许；(c)实施范围广泛的中央计划，包括对土地使用和区域划分加以严格的规定；以及最后，(d)制定并执行范围相当广泛的国有化方案，从煤炭、动力和铁路开始，而按照该党左翼的意见，除了钢铁以外，还要包括批发和分配、工程、军工和一些最大的公司等许多部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工党内部意见很不一致，对于把传统的社会主义推进到何种程度犹豫不决。这反映在工党内部的辩论

上,辩论的内容是:应该把国有化推进到何种程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市场机制。在思想方面,由于《费边论丛》在多年以前提出的目标大都已经实现,理论上的重新思考正在进行,而写出新的费边论丛并不那么容易。“仅有新政那样的旨在使资本主义发生良好作用的主义”是否已经足够?混合经济制度能否象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改革运动那样激发出人类的巨大热情?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已经使好斗的穷人上升为心满意足的中产阶级?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是否已经使穷人的优秀子女可以上名牌大学读书并进入政府部门或大公司工作,而使他们脱离了激进的工联主义?寻求平等是否妨碍了物质进步?

这种疑虑的存在并不限于英国。在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和新西兰,所谓有节制的劳动社会主义的“中庸之道”掌握政权已873 经有半个世纪了,或者正在试图掌握政权。不过,上述每一个国家都越来越象五十年来经历了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之后的美国。J. K. 加尔布雷思和 J. 丁伯根不免有些夸大地说,目前整个世界正趋于形成一个单一的现代工业国——它实行的不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混合经济制度。

法国的“指示性计划”。从意识形态上说,法国实施的国家计划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相距甚远的。无论是在戴高乐执政以前还是执政以后,法国许多重要的行业都是由政府经营的,例如,铁路、电力和矿业。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按照边际成本原则确定电力价格,用成本-利益分析法来确定国有行业投资项目的优劣——对于法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在 1950—1975 年间的显著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

甚至私有企业也被纳入了全面的国家计划之内。不过,这种

计划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方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法国的混合经济中，参与国家计划与否基本上是自愿的。（但是，正如现在普遍存在的情况那样，由于政府控制着资本市场的出入大权，哪一家厂商敢于触怒政府当局呢？）

法国制订国家计划的方法是：由国家计划官员召集各行业的代表举行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们得到将来数年可能实现的国民经济指标，他们根据这些数字估计本行业将发生的变化。反过来，政府将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重新计算国家计划中的总量数字和分量数字。

结果，每一个行业都知道，市场的扩大是肯定的。由于组成各行业的所有厂商都从事满足这些指示性目标的活动，所以它们确实可以造成国家计划所规定的生产、收入和需求的数量。

这个办法执行的效果如何？按照取得的成果来判断，还是相当好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许多英国的社会改良者想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某些“不能充饥的画饼”来换取指示性计划的某些实际效果。为了仿效法国的方法，英国建立了“全国经济发展理事会”。后来威尔逊的工党政府又设立了经济事务部来促进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一致性不应掩盖多样性。埃及、缅甸、加纳以及其他许多新近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也有许多国有化企业。但是，迄今为止，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得到了迅速提高。同样，象阿根廷那样的经济，尽管具有许多穷国所羡慕的资源和技术，却在独裁者庇隆实施的国家控制下处于停滞状态。恩克鲁玛统治下的加纳和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悲惨的成就表明：由伟大的国家领袖统治的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本身，并不足以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等经济问

题。恩克鲁玛、苏加诺和庇隆这三个例子使我们感到在毛泽东的身上确实有新的值得尊敬的地方——对于亚当·斯密也是如此。

874 §.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苏联：历史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对较早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运动的背离，也是对上一世纪演进社会主义运动的背离。在上一章中，我们概述了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的理论原理。在这里，我们考察一下这些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成果。

1917年，重大的时刻到来了。沙皇俄国被德国战败。马克思的追随者列宁躲在一辆贴有封条的铁路货车中，路经德国而进入了俄国。在托洛茨基（此人曾一度是纽约居民）的帮助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从推翻帝制的温和的克伦斯基政府那里攫取了权力。在印有铁锤和镰刀图案的红旗之下，列宁的追随者宣扬和平、农民有其田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项主张。他们在海军和陆军中赢得了支持者，从而以武力夺得了政权。

接着便是哈佛大学的J. 里德（以后安葬于克里姆林宫）所说的“震惊世界的十天”。在民主气氛浓厚的立宪会议中，由于只有少数几个选举产生的代表同情布尔什维克，因而它被禁止举行会议。托洛茨基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军队，革命军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往往只要占领发电站和自来水厂就行了。随后在红军和白军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内战，白军得到了波兰和西方国家的支援。最后，大部分白军军官逃到了巴黎。他们在那里开着出租汽车兜风，为了纪念尼古拉沙皇而畅饮伏特加酒。

革命的完成。整个世界期待着俄国的垮台，但共产党政权坚持了下去——并不是没有经历可怕的饥荒，确实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贵族和资产阶级受到无情的清洗和屠杀。共产党是唯一允

许存在的政党；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加入这个高级集团；它选出各工厂和农场的地方“苏维埃”成员。这些被选举出来的代表选举更高级的苏维埃成员。一直到最高级，管辖着全部加盟共和国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苏联领导人没有可以依据的蓝图。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的缺陷，很少预言天国究竟是什么样子。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尚未完全摆脱封建主义而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的落后的俄国，居然会在头重脚轻的工业化国家崩溃之前爆发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和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妥协。但在1928—1929年，却制订了旨在实现制造业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便开始实施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资本形成的速度加快，备战工作的加强以及当时俄国技术水平的低下，消费在这些年份中均处于严格的配给之下。政府发给劳动者配给卡，劳动者只能在指定的商店按配给卡规定的数量购买货物，但人们仍然使用货币。多余的货币收入只能按照高于配给品的价格用于购买特殊物品。不同职业之间仍然存在着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差异，同时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制越来越普遍。

斯大林主义。列宁的助手之一斯大林，在列宁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逝世之后，最终在权力之争中赢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和其他老革命者受到指控，说他们里通外国，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了对红军将领和政府官员的大清洗，最后在莫斯科对所谓里通外国分子进行了耸人听闻的审判——之所以耸人听闻，是因为被告们争先恐后地公开承认自己有罪。在张伯伦—希特勒的绥靖条约之后，纳粹德国和苏联在1939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一直维持到希特勒——由于在波兰和法国的胜利而得意洋洋，进而觊觎乌克兰的农田——进攻苏联时为止。

在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驱使下并在美国租借法案的帮助下，俄国人同德国人进行了浴血奋战，最后把德国人赶出了国土。轴心国被战败后，在西方之间的同志关系随之而结束；整个世界受到氢弹的威胁，处于冷战的阴影之下；苏联企图在欧洲和亚洲扩大影响，我们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则决心制止苏联的扩张行为，而中国也试图扩大其影响。

战后，斯大林实行个人统治，偏执狂越来越严重。1953年他去世后，人们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其政权的厌恶。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之下，开始出现解冻，批判的嫩枝也开始发芽。然而，波兰人、匈牙利人和列宁格勒的学生得到了冬天尚未完全结束的教训。和平共处与缓和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官方路线，而在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的集体统治代替以后，官方路线继续如此。面对中国的竞争，苏联无意容忍捷克斯洛伐克的出版自由和选举自由，更不用说容忍国内不同意见的分子和少数民族的好斗分子了。

§. 左翼的多样化：南斯拉夫

我们现在从历史转入目前的现实。留下苏联经济稍后再谈，我们现在考察两种极端型式：分权的南斯拉夫和集权的中国。

南斯拉夫的分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铁托领导下的共产主义抵抗运动取得了政权。从1945年到1950年，按照传统的斯大林路线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很糟，无论以计划指标来衡量还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份相比都是如此。1948年，和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政治上破裂以后，南斯拉夫开始走一条新的“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主张“分权和群众的参与”。这个试验在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其原因不仅在于试验本身是“分享民主制”的例子，而且在于它是成功地脱离苏联控制的

唯一事例。

实质上,铁托主义是要更多地依靠市场价格,依靠利润动机和人的积极性。它并不想放弃社会主义和一党统治,也不想放弃中央计划。但是,它认为: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中,工厂可由工人自己管理。请看下面一个例子。

在工厂中,二十个到一百个工人可以组成一个工人委员会。在名义上,工人选举自己的经理。(他们甚至可以用广告征聘受过训练的经理!)他们从集中的资金库中“借来”资本。(有的时候,资本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厂商可以生产自己认为有销路的产品。它可以从国外进口原料,有时甚至可以向国外借款。它可以降低成本,目的在于:当它支付了所得税和土地税以后,剩下的部分能够被用作劳动者的奖金或再投入企业的资金。

事情的结果为何?从1950年到1976年,进展是不平衡的,有时侧重于集权,有时侧重于分权。但是,这个制度是有生命力的,该制度下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早期的斯大林主义时期。虽然一些南斯拉夫人有理由对工人到底能够行使多少权力表示怀疑,但这种工联主义制度确实抵消了官僚主义者的一些权力,米洛凡·吉拉斯称官僚主义者为“新阶级”。⁸⁷⁶

§. 毛主义的中国

中国在苏联左方的距离和南斯拉夫在苏联右方的距离相等。中国和苏联各自宣称:对方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发展的正统路线。(参阅第361页上分为两枝的家谱图)

整个世界对中国具有特殊的兴趣,是由于它的领土广阔,人口众多。中国在历史上一向处于贫穷状态这一事实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如果农民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成功地在如此贫穷的地区消灭贫穷,那末,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将会仿而效之。自从列宁时代以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领袖和先锋第一次面临着严

重挑战。

古巴一般要求教授和白领工作者都要参加砍甘蔗的劳动，而中国则要求所有人都要参加体力劳动，在这一点上，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地方。比乒乓球和针灸变化更大的，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明显转变。根据曾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看过病的著名心脏病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的看法，性病已经在中国绝迹了。老中国通非常熟悉的肮脏的街道和人们嘴里的污言秽语似乎也奇迹般地消失了。所以无怪乎那些相信人类本性可以改变的人——他们象韦伯夫妇那样，往往在苏联的生活中看到奇迹，一直到斯大林主义的真相最后泄漏出来为止——会以崇高的希望来看待中国的试验。

随着毛的继承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越来越紧密。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象征着一个新时代，其最初的信号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成员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新的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但是，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究竟怎样呢？

1960年，凡不带偏见地考察中国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人都会认为：中国同这两个国家相比，其实际经济增长率在以后的十余年中将提高得最快。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被动员起来从事集体的努力和牺牲。人们甚至认为中国可以依靠数以千万计的土高炉来生产钢铁。“大跃进”似乎即将到来。

从1976年回顾过去，我们发现，现实与期望多少有些不相符合。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发展很不平衡——取决于季节风和外援。独裁统治下的巴基斯坦，在镇压措施造成国家分裂以前，由于在农业方面获得了大量外援，化肥和粮食产量有所增长。中国的突出成就，是制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然而在这一时间，强调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对技术专家的仇视态度导致了经济的停滞不前。

俄国的统计数字一般要经过仔细检查,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⁸⁷⁷而中国的统计数字则不然,中国最初宣布的产量增长数字,后来经过仔细核查,证明是大大夸大了的数字。康乃尔大学的两位专家甚至认为^①:

从1958到1961年,国民产值下降了大约百分之十五……只是到了1965年,经济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400,000名专门人才的损失……经济主义,即:效率,成了最坏的形容词之一……革命群众的热情代替了专业管理。……

和上述悲观的评价相对照,这里有一篇斯坦福大学的J. 格利教授的总结。他是对中国经济持同情态度的学者;这一评价是他1972年访问中国以前作出的,他的中国之行似乎证实了他的乐观的估计。^②

……中国人民在过去二十年中几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经济进展(虽然进展并不稳定)。关于中国的基本的主要事实是:在二十年中,它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且使大多数人受到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和街道上并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中国在医药和公共保健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许是最令人难忘的。

A.G.阿什布鲁克,一位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美国政府专家,把1975年的观感总结如下:^③

……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一个有效的机制,能够满足人民的最低需要,能够使工业部门实现现代化,能够维持一个令人生畏的国防体系……由于尽量压低消费水平,进行有目的的投资,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实行严格的领导,中国轻而易举地把其他不发达

① W. 盖伦森和刘大忠教授在1969年6月17日给《纽约时报》的信。

② 引文取自J.G. 格利:《资本主义和毛主义的经济发展》,载《每月评论》(1971年2月),第15—35页,特别是第26—27页。

③ A.G.小阿什布鲁克:《中国:1975年经济概况》,载于联合经济委员会:《关于中国的摘要》,1975年7月10日。

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很显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和萨哈洛夫对于苏联官僚政权的批判，减少了世界各地的过激主义者对苏联的向往。因而毫不奇怪，中国，这个在意识形态方面第一个成功地与列宁以后的俄国相抗衡的国家，将成为世界各地左翼运动的楷模。

§. 苏联经济

现在我们来深入考察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苏联的经济。苏联是如何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大问题的？

878 概括地说^①，情况是这样：几乎所有生产要素均为国家所有，包括工厂、矿山和土地。劳动者一般以工资维持生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但是，苏联公民并不能不受任何限制地在任何地区和行业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职业。

生产什么。政治上的决策是：应大力推进国防建设和资本形成，只有剩下来的资源才能用于消费品生产。虽然俄国人可以通过使用收入的方式来表示对不同物品的偏好，然而，只是到最近才允许任何由此而造成的货物短缺和货物积压来影响价格的高低，以便自动产生利润和亏损来促进资源的重新分配。在物资非常短缺的年代，中央计划当局可以很容易地知道人民需要多少食物、鞋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只要有货，总是被抢购一空。即使附近商店里的鞋和你的脚不是正合适，你也会买一双稍大一点的鞋，而不愿没有鞋穿。

① 参阅 F.D. 霍尔兹曼：《苏联经济论文集》（兰德·麦克纳利公司，芝加哥，1962 年），该书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并参阅 P.A. 萨缪尔森《经济学论文集》（麦格劳—希尔公司，纽约，1973 年，第七版）中哈佛大学专家 A. 伯格森的论述。

现在,苏联开始供应某些生产舒适品——甚至奢侈品,仅仅考虑人民的“需要”已经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计划便遇到了困难。目前某些物品根本卖不掉,因而计划人员开始认识到,必须减少生产。在苏联甚至出现了广告宣传和推销活动:要想知道人们需要什么比知道他们不需要什么还要困难,而市场研究仍然处于最初的发展阶段。苏维埃的委员们尚未积累起足够的经验来决定:如果人民能加以选择,那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但是,委员们发现,一个有效的方法便是观察美国和其他外国人所喜爱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引入国内。这样做的结果是,个别能够得到汽车的人发现,他们的汽车总是落后于我们的汽车。专家告诉我们:这种决非不合理性的(因为它假设受到一人喜爱的东西也会为另一人所喜爱)仿效他人的做法正越来越普遍地被人们所接受。

资本品和军事开支,由国家直接作出决策。工业化得到大力推进:电气化、交通运输、矿业发展、化学工业和化肥工业的大发展、农业集体化和种植计划——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由有意识的政治决策确定的。

如何生产。私有企业的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苏联的典型工厂是国有企业。

正如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只拥有该公司股票的很小一部分一样,这个国有企业的资本完全不为它的经理所有;但是,他的工作报酬高于平均水平,而且还享有实报实销的旅行开支、免费汽车以及其他特权。加尔布雷思所说的这种“技术结构阶层”的成员甚至可以得到奖金,而他升迁到较大企业的机会取决于他的企业完成指标的程度。他象任何上司一样地发布命令,并且要求下属遵守,正象他遵守上面的命令一样。(为了避免完不成指标而受到惩罚,他可以囤积钢铁和其他原料,而不把它们交给其他企业;许多事例说明,官僚们常常设法使他们的企业在表面上看来生产能力很高,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他们必须隐瞒他们的工厂的

潜在能力。例子：企业可以玩弄欺骗手法，以便得到易于完成或超额完成的低指标。据传说：有一家运输企业曾把大量的水运来运去，为的是上报完成了规定的实物指标。）

近年来，毫无意义的实物指标开始被“利润”准则所代替；采用这一准则，确实要对不同物品进行经济评价——从而向西方的价格决定方法和数学规划迈出了有限的一步。

如何把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机械化的不同程度——配合起来，看来既取决于纯技术方面的考虑，又取决于各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苏联在这方面正在不断摸索。观察者会发现，苏联各部门之间产品质量的差异大得惊人：一方面，他可以看到导弹军工厂生产的产品可以和世界上质量最高的产品相媲美；另一方面，他也可以看到一些苏联人仍然以不可置信的原始方法进行生产，其产品的质量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例子：一位苏联农村妇女仍然会被分配看管一头牛；而在威斯康星州的机械化奶牛场，一对夫妻可以照料50头牛，此外还要做无数其他日常工作。在集体农庄，私人自留地往往比集体的农田具有远为高的，而不是低的生产率。）

苏联的一切经济生活是一个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在各行业和各地基层企业单位之上，有一个地区经济委员会。在地区委员会之上，有部长会议，和部长们并列的是经济计划人员。专家们告诉我们，只研究某一时期的特定情况是很难得知真相的，因为集权和分权的比例总是在不断变化：有时强调命令的作用，有时主张权力下放，有时又鼓吹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有时开空头支票进行奖励，有时又以开除和坐牢房等手段进行惩罚。

在某些方面，各地和各单位的情况大致上是相同的。企业的头头几乎肯定是共产党员。一位成功的官僚有时很象我们这里的成功的“有组织能力的人物”：他必须服从命令，但还要有机智，必须卑躬屈节地逢迎，同时又傲慢自大地对下，既要精力充沛又要冷酷无情。我并不是说坏人在步步高升，而是说在一般情况下，能力确实起作用，但是，仅有技术能

力而不善于与人相处是不够的。在美国的底特律和在俄国的伏尔加格勒都是如此。苏联报纸经常抱怨一些人虚报个人因公出差的费用,指责一些人设法在黑海的避暑胜地和高加索山区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业务会议。

专家还告诉我们: 如果认为苏联有一整套精细而正规的计划制度, 从而认为可以象深入论述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那样写一本论述纯共产主义经济学的著作, 那就太天真了。

为谁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俄国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未来。目前一代俄国人的私人消费量主要并不取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开支和从事劳动的决定。当然, 他们确实挣取工资(如果购买公债的话, 还可以得到少量利息或中签奖)。而且, 工资并不是相等的, 精力旺盛和受过教育的人的所得肯定高于需要钱用和身体残废的人。熟练劳动者的所得远远高于非熟练劳动者。我们心目中的自由工会并不存在, 但是, 激怒全厂工人来反对他的厂长必然要倒霉。经常采用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 同时大力号召人们为祖国和“人类的兄弟情谊”而努力工作。(许多苏联小说的故事情节, 往往是一对优秀的青年男女如何粉碎一个反社会的坏蛋的诡计, 以及他们如何开着高效率的拖拉机征服僵硬的土地。在这里象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 青年男女终于结成眷属, 其教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苏联不一定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所看到的那种社会阶级, 但却存在着某种类型的社会和政治的等级化。穷而聪明的孩子可以成为物理学家并且生活得很好。对他说来很重要的事情是在选择少数人进大学的考试中名列前茅。(他读大学费用由国家支付, 正象他的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掷铅球的同志系由国家支付工资来从事那种职业一样。)毕业以后, 他希望他的分数能

高到使他在莫斯科继续研究物理学，而不作为一个技术员或工程师被派往乌拉尔山或其他遥远的地区。作为一个报酬丰厚的教授，除了对高级官僚以外，他可以昂首自得：他可以有一辆汽车，一座乡村别墅以及设备完好的实验室。当然，他死后不能把它们带走，但他至少有可能使他的孩子在激烈争夺教育机会的竞争中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苏联可以采用各种经济方法来确保为谁生产的问题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解决——它非常重视工业化和军事安全。

首先，物品在每一个生产阶段都必须缴纳沉重的赋税（即所谓“周转税”；该税与施加于真正的加入价值上的赋税不同）。由此而造成的价格相对于工资的提高可以保证：群众只能消费他们所能生产的总量的一部分，这很象我们的经济利用赋税来把资源从私人那里吸入公共渠道。不仅我们需要宏观经济的均衡，苏联也需要。

另一个办法便是把消费品的价格规定得远远高于其成本，以此保证消费品的价格以其真正的经济成本而论远远高于军用品和资本品的价格。第三种办法是，某些消费品，如舒适的住宅，除了少数几个享有特殊政治经济地位的幸运者以外，根本不能为任何人以任何价格所买到。

苏联当局正是利用上述各种方法，来与物价上涨进行斗争的，否则，当劳动者用他们的收入购买供应有限的消费品时，物价便会上涨。凡研究过现代经济学的人都清楚，苏联就是利用这些方法按照社会的决策来确定为谁生产物品的。

§. 东欧经济学的新趋向？

共产主义经济学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近年来，无论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在苏联国内，人们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辩论的焦点是：是否应该以价格和利润作为经济准则，尽管这种准则多少有些类似于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提出的一些概念，似乎被专门用于青年人的意识形态教育，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所谓解释和揭露。

高级计划人员对这种问题不屑于浪费唇舌。与高级计划人员不同，E.利别尔曼在他的引起很大争论的著作中，不主张以实物单位来规定粗略的数量指标。他认为，重点应放在产品的质量上，以产品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来衡量其价值，只要求工厂经理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促使经理们试制新产品，采用新方法以及节约生产所必需的投入物，而不把精力用于为他们的工厂争取低指标上。某些东欧国家正准备搞一些小规模的市场方面的试验。 881

数学方法，如哈佛大学的里昂惕夫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已经从斯大林的禁令中解放了出来。人们正在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这一工具帮助计划人员分配现有的资源。卓越的苏联数学家（康托洛维奇、朋托里亚京……）发明了更为先进的数学方法，即西方世界的所谓线性规划和一般数学规划。人们还提出了贴现率的许多变种，希望它们能象混合经济中的利息率那样，筛选掉不重要的投资项目。

虽然我们不能说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人员依靠的主要是第三十二章附录所论述的那种价格制度，但他们似乎越来越多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把实际核算和经济计划结合在一起。同时要记住，分权和集权是相互交替的。

如果有谁认为大多数东欧国家的人民过着悲惨生活，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不容置疑，西方国家的公民几乎谁也不愿意抛弃舒适的经济生活和高度的政治自由来过苏联的那种生活，然而，同样正确的是：苏联公民认为，同中国以及他们过去的的生活相比，他们现

在生活在天堂中。应该记住,在沙皇统治时期,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不那么称心如意;对于来自贫穷的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旅游者来说,俄国不断提高的富裕程度确实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 经济的相对增长: 未来

今天,我们已掌握了有关俄国经济的许多实际情况。我们的许多经济专家在仔细研究苏联的统计数字。虽然他们往往发现数字不完全而且有时故意失实,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可以根据这些数字对俄国经济作出基本正确的客观估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持有那种极端的观点,认为苏联人的工作效率低得连最原始的汽车也维修不好,或者认为俄国人是身高七尺的巨人,在生产率上很快要超过任何人。^①

现在的状态。被无数无党派的国内外学者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似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我国国民
882 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三之间,这要看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比较中是使用美元价格权数,还是使用卢布价格权数。^② 为了得到

① 即使不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连年歉收考虑在内,俄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是办得很糟糕的。这些农庄和农场似乎大得影响效率,它们的平均耕地面积为7,000到22,000英亩之间,而我们的效率很高的商业性农场的平均耕地面积为400英亩。一刀切、缺乏知识和政策摇摆不定使一地区的每一人受到影响。一方面拖拉机设备、零件、化肥和除草剂的供应相当有限,另一方面农民不很好地干活,不充分利用所得到的拖拉机和化肥。尽管有气候的不利条件,但今后大幅度提高效率似乎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② 我们仅需提出,其中牵涉到指数这一技术上的问题。在我国和必需品相比,奢侈品是相当充足的,而苏联的情况则相反,这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苏联的小汽车价格和黑面包价格之比高出我国同一价格比例很多倍。结果:如果我们用他们的卢布价格之比来计算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则我们的为数众多的汽车会具有很大的权数,而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会是我们的三分之一强。由于同样原因,如果用美国的价格来计算,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会比我们的一半多出很多。

大致的数字,我们可以取二者差额的平均数,从而得到以下合理的估计数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苏联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三,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二分之一那个数字稍高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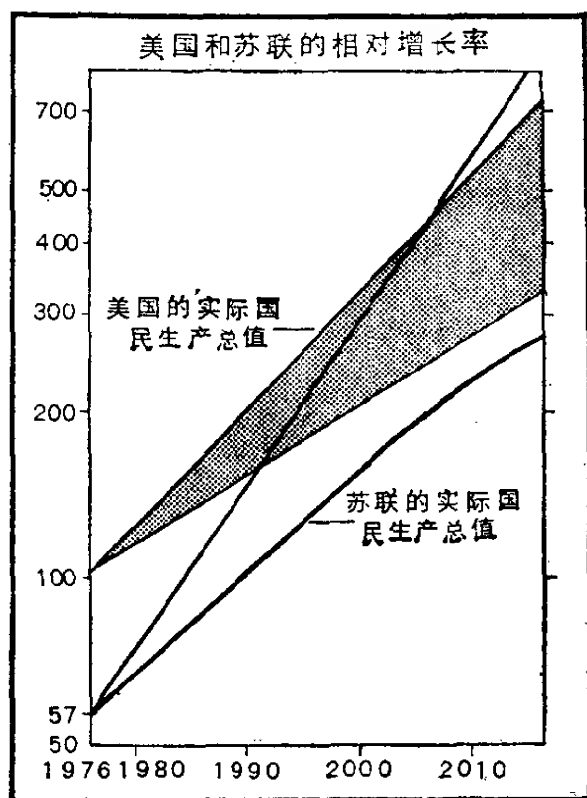
由于苏联的人口比美国多,由于它用于消费的国民生产总值较少,所以它的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消费量和我国相比甚至更少——也许是我国的百分之四十八。专家们的这一结论已经为到苏联访问过的人的一般观察所证实。

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然而,争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目前两国经济力量的对比,而是一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是否比另一国快得多,以致可以在今后几十年中缩小或消除两国间的差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十年前出现了所谓“利用经济增长作宣传来捞取政治资本的技巧”。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由此而出现了大量毫无意义的著作和言论,而且专家们毫不讳言他们所做的仅是大致的估计,但却有一些基本的客观经济事实值得我们进行公平的分析。

虽然各个时期之间有差异,但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率约为每年百分之四或略少一些。虽然人们常常把百分之六的增长率作为美国的目标,但向持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经济专家们进行仔细调查后所得到的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在将来的数十年中是可能的。因此,第 43-1 图提供的从 1976 年起的美国经济增长率,既包括合理的悲观估计又包括合理的乐观估计。

苏联的数字比较难于估计。不过,似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一段时期的年增长率远远高出我国的年

增长率^①，虽然它的成就并未超过某些实行混合经济制度的国家，如西德和日本。此外，许多专家认为，生产率的起点较低的经济社会，在开始一段时期会比较容易地大幅度提高其生产率。(无论如何，从零上升到任何正数值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他们推测，当苏联的发展水平更加接近于我们的水平从而较多地强调劳务时，它的
883 增长率很可能会下降并且可能丧失模仿先进技术的有利条件。因此，他们提醒我们，不要盲目地根据过去的增长率来推测未来的增长率。



第 43-1 图 在今后几十年中，巨大的差距会缩小，但不大可能发生突变

图中的估计范围并不是很精确的，但是它们确实代表第一流专家的不同估计。(注意：美国所有指数的基年为 1976 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100，苏联所有指数的基年为 1976 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57。)

虽然这些论点有很多令人信服的地方，但它们也确实会为那

①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两国的增长记录是可以比较的。应该指出：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俄国的两倍，那末，要想赶上我们的绝对增长率，俄国的增长率就应是我们的两倍。专家们在国会和其他地方的证词提供了以下有关苏联年增长率的估计数字：1950—1958 年，6.8%；1955—1960 年，6.5%；1958—1963 年，4%；1963—1964 年，3%；1964—1970 年，5.5%；1970—1976 年，4—6%。

些希望美国永远处于领先地位的爱国者提供诱人的自我论证的理由。而且，在生产率上领先于苏联并且似乎已经进一步领先的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事例告诫我们：不可避免的衰老的论点至少在一段时期中是站不住脚的。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过去认为：社会就好比是一个小孩，要经过某些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然而，现代的学者们决不应武断地认为工业发展必然要经过某些阶段。因此，在第 43-1 图中，有关苏联经济增长率的推测，既包括乐观的估计又包括悲观的估计。

显然，苏联要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我们，将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要在按人口平均的福利水平上超过我们，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西方和东方生活水平的差距将来可能会缩小，正象在丰裕的西方，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缩小那样。但是，经济史告诉我们，比较可能的型式是继续演变，而不是突然的变动。

上面我们比较了两种经济制度的增长型式。最后，经济学者应提请人们注意以下两点：

和平共处。今天的作战能力不能单纯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军事分析人员估计，苏联现在用于军事上的努力大致和美国相同。苏联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我们的一半，但是，它把其中的较大部分用于国防方面。此外，美国和苏联都有无数的原子弹，而且双方在导弹和弹头方面享有均势。所以不能认为：美国通过大大增加国防支出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份额，便可以获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因此，那些关心权力斗争的人不应该因为享有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优势而自鸣得意并采取好战态度。

同时，在许多尚未表态的不发达国家看来，两种制度正在经受

考验。如果我们停滞不前,而苏联的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我们,那末,即使我们大大领先于苏联,中立者在将来的年份中也会仿效“全速前进”的集权主义型式——限制民主和个人自由以及使用集体的决定来无情地削减现有的消费,以便扩大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

§. 最后的观点:企业和人的自由

为了理解经济的运行情况,我们研究了各种经济分析工具。本书大部分章节讨论的是混合经济——不是从未存在过的理想的自由放任世界,也不是尚未出现的乌托邦。随着混合经济制度的改变,分析它的工具以及它的发展方向总是需要加以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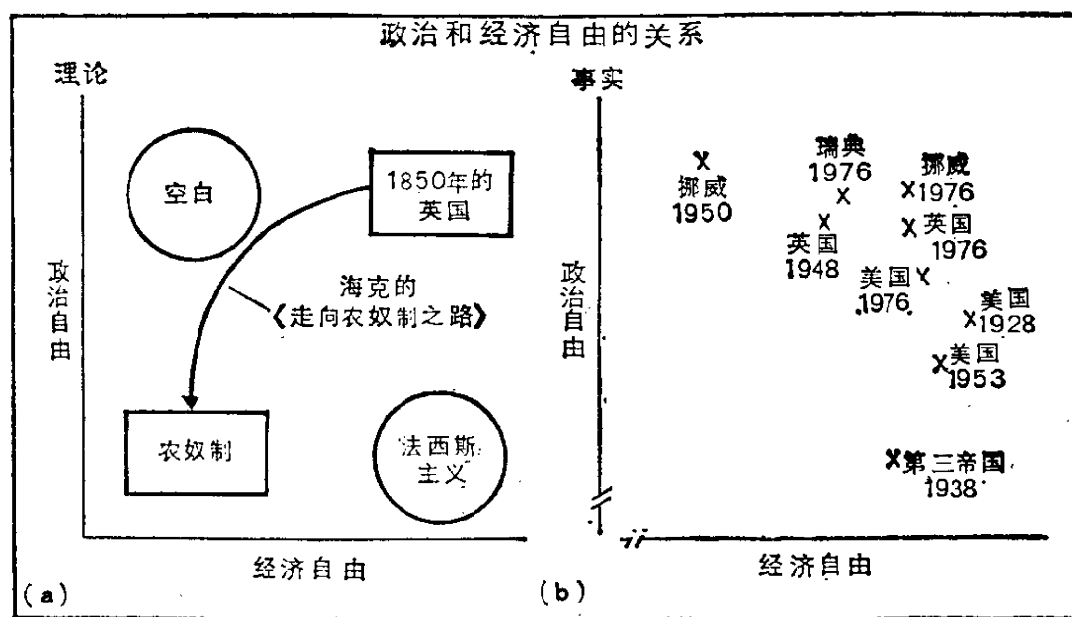
生活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的人们容易自满自足,不但对自己自满,而且也对他们的混合经济制度自满。在论述新经济学的国民收入的决定、微观经济的价格决定以及经济成长和稳定政策时我们看到,即使和 1929 年那样相近的年份相比较,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愿望。但是,与此同时,对事物本身的客观分析表明,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许多特点,而这些特点被关心于此的较年轻的一代认为是在伦理上成为问题的。如果垄断在 1980 年不象在 1900 年那样普遍,但仍然非常普遍,而且自 1945 年以来一直没有多少减少,那末,即使 1980 年的垄断少一些,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穷人不象过去那样多,不象过去那样穷,但经济机会的不平等仍然顽固地存在,而且自 1945 年以来收入的不平等又没有什么缩小,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他们看来,一个仍然支持种族、性别、宗教和人种歧视的制度怎么能令人满意呢?确实,我们现在的经济世界在许多方面要比过去好。但是现在,人们希

望它更好。

这就提出了无法回答的改善经济制度的速度问题。本世纪以来,混合经济制度在不断发生改变。但是,这种变化快到什么程度才算快呢?快到什么程度才算太快呢?对于这些问题,你不能期望阿巴拉契山区的饥饿的母亲和白手起家的大老板给予相同的答案。价值判断的作用是永远不会被所谓“中立的科学”所抢走的。

政治和经济自由。在单纯的经济问题之外,还出现了关于下列二者关系的基本政治问题:(a)个人自由——人身自由和个人权利——以及(b)企业或市场自由——财产权。所谓个人自由和财产自由是指这二者不受最高和最低价格以及配给制的限制。



第 43-2 图 历史和现在的经验对经济改良必然导致农奴制表示怀疑

海克的新自由主义的论点宣称——如左方的(a)所示——政府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的调节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政治上的农奴制。然而,把这一假说和事实——如右方的(b)所表示的那样——相对照,该论点是否得到了证实:

那些想对我们的经济制度进行改良的人,几乎总是向政府寻

求新的方案和手段。那些力图保护我们社会中所谓有价值的东西的人,往往用下面一段话进行反击:“你想较为公平地分配馅饼,但由于扭歪所造成的缺乏效率,反而缩小了馅饼。然而,更加重要的是:个人自由和财产自由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在斯潘塞所说的那种令人十分讨厌的自由放任的社会,人类才能自由地发表言论和选择他们的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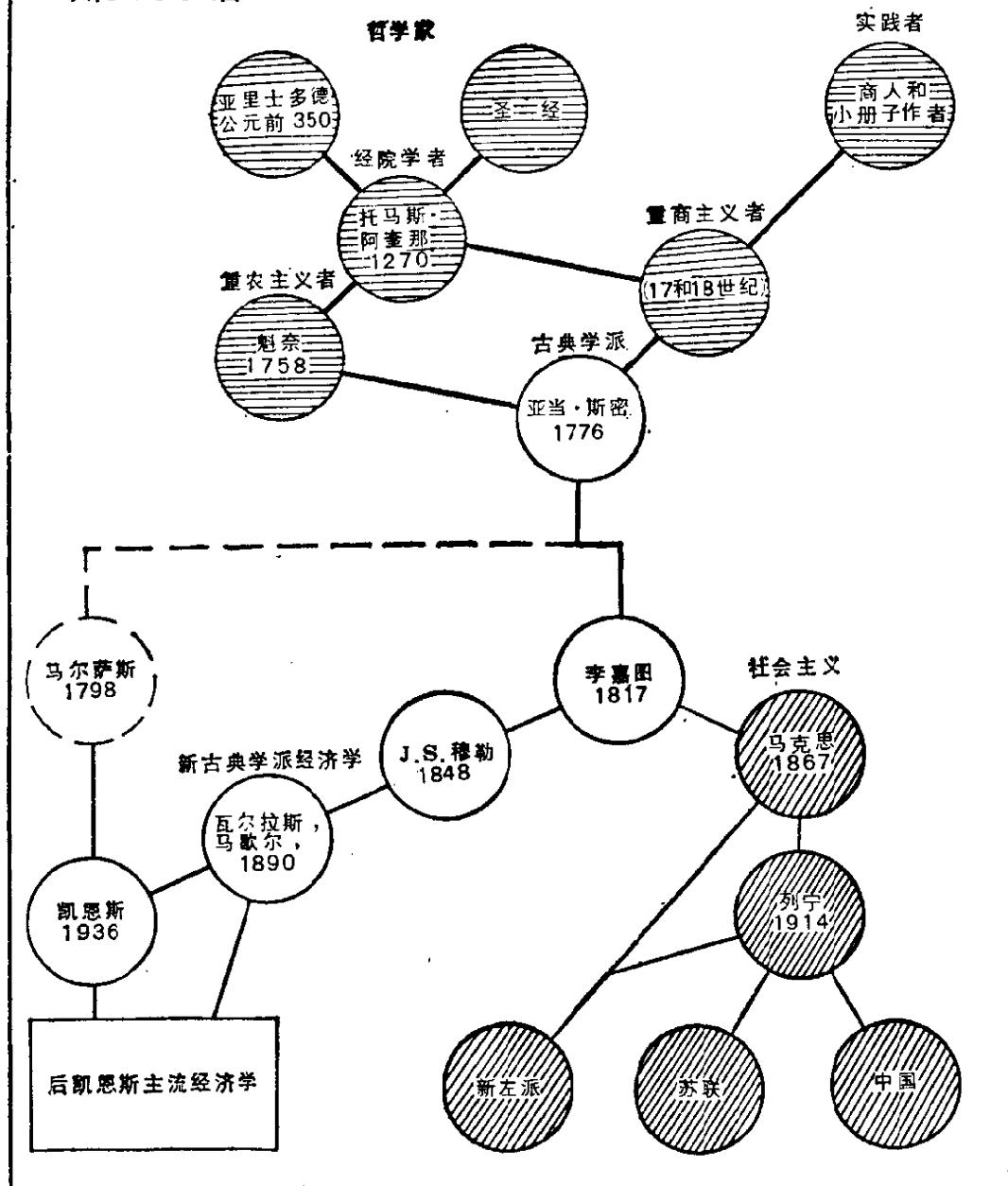
在本书的收尾部分,在分析经济世界这一主要任务已经被完成之后,作者也许可以放宽分析的严谨性而对不可能在科学上取得一致意见的东西进行猜测。

根据经验和似乎是合理的思考,个人自由和政府对于混合经济的干预这二者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

886 第 43-2 图折衷海克的偏激说法和韦伯夫妇的偏激说法,提出了一种新说法。海克认为经济改良是走向农奴制的道路;韦伯夫妇认为,没有经济民主便谈不上政治民主,而经济民主只有依靠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才能实现。

我本人可以从历史的进程中看到比较乐观的信息:我们可以争取做到两全其美,一方面有步骤地改善市场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享有国民生产总值所不能衡量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即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自由地进行批评以及自由地进行变革。

经济学的家谱



英汉人名、机构、术语对照表

A

absentee ownership 缺席所有权
 acceleration principle 加速原理
 accelerator 加速数
 acceptance (金融用语) 承兑
 account payable 应付账款
 account receivable 应收账款
 accounting price 账面价格
 accumulation 积累
 "active" money "经常备用的"货币
 administered price 管理价格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总量
 生产函数
 Aldrich 奥尔德里奇
 Allais, M. M. 阿拉伊斯
 Allen, R. D. G. R. 艾伦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美
 国劳动者联合会(劳联)
 Anti-trust Division 反托拉斯司
 appreciation (用于货币) 升值
 Aquinas, st. Thomas 圣·托马斯·
 阿奎那
 arbitrage 套利者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on, R. R. 阿伦
 Arrow, K. J. 阿罗
 asset 资产
 atomistic Competition 微小单位的
 竞争
 average cost 平均成本
 average payoff 平均支付额
 average fixed cost 平均不变成本
 average variable cost 平均可变成本
 average revenue 平均收益

B

Babeuf 巴贝夫
 backwardation 交割延期费
 Bagehot 巴奇霍特
 balance of payment 国际收支平衡
 表
 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
 bank reserve 银行准备金
 Baran, P. P. 巴伦
 bargaining power 协议力量
 basic deficit (用于国际收支平衡表)
 基本赤字
 basing point 基点
 Baumol 鲍莫尔
 bear market 空头市场
 Bentham, Jeremy J. 边沁
 Berle, A. 伯利
 Bernstein, E. E. 伯恩斯坦
 Beveridge, Lord 贝弗里奇勋爵
 bid (作为商业交易术语) 出价
 bilateral monopoly 对立的垄断
 bimetalism 复本位主义
 birth rate 出生率
 "blue chip" stock "热门"股票
 Böhm-Bawerk, E. E. 庞巴维克
 bond 债券
 bond payable 应付债券
 bond yields 债券市场利息率
 Bortkiewicz, L. Von L. V. 波凯维
 兹
 Bowley, A. A. 鲍利
 Bowley's Law 鲍利定律
 Bray 布雷
 break-even point 收支相抵点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布雷顿森林会议
 broker 经纪人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学会
 budget line 预算曲线
 bull market 多头市场
 Burke, Edmund 埃德蒙·柏克
 Burnham, James J. 伯纳姆
 Burns, A. F. A. F. 伯恩斯
 business cycle 经济周期
 business tax 营业税
 "business unionism" "工联主义"

C

Caesar 凯撒
 Calvin, John 约翰·卡尔文
 Cantillon, Richard R. 康替龙
 capital account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 资本账目
 capital consumption 资本消耗
 capital gain 资本增益
 capital goods 资本品
 capital formation 资本形成
 capital intensive 资本密集
 capital movement 资本流动
 capital-saving invention 节约资本发明
 capital-output ratio 资本—产量之比
 capitalization 资本化
 capitalized value 资本化价值
 Carey, Henry C. 亨利·C·凯里
 Carlyle 卡莱尔
 corporate profit 公司利润
 Cartel 卡特尔
 cash 现金
 Cassel, Gustav G. 卡赛尔
 Celler-Kefauver Antimerger Act 塞拉-凯弗维尔反合并法
 Central Limit Law 中心极限定律
 certainty 肯定性
 certificates (用于公债) 国库证券
 certificate of deposits 存款单
 chain store 连锁商店

Chicago Board of Trade 芝加哥粮食交易所
 Clark, Colin C. 克拉克
 Clark, J. B. J. B. 克拉克
 classicism 古典主义
 Clayton Act 克莱顿法
 "clean" floating (foreign) exchange rate "干净的"浮动汇率
 Cleveland 克利夫兰
 closed shop 限雇原则
 Club of Rome 罗马俱乐部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利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bweb theory 蛛网理论
 coincidental indicator 同位指标
 collective bargaining 集体协议
 collusion 勾结、相互勾结
 commodity futures 商品期货
 common stock 普通股票
 Commons, J.R. J. R. 康芒斯
 company union 公司工会
 comparative advantage (国际贸易) 比较有利条件
 competition 竞争
 complementary goods 补充品
 compromise tariff 调和关税
 conglomeration 混合联合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产业劳动者联合会(产联)
 constant capital 不变资本
 constant cost 不变成本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规模的收益不变
 "constant-sum" game "常数总额"博弈
 constant-sum matrix 常数总额矩阵
 construction cycle 建造周期
 consumer cooperative 消费合作社
 consumer preference 消费者偏好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费品价格指数
 consumer sovereignty 消费者统治
 consumer's surplus 消费者剩余

consumption goods, consumer goods 消费品
 consump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消费可能性边缘
 contrived (or artificial) scarcity 人为的稀缺性
 Coolidge, Calvin 卡尔文·柯立芝
 Copernicus 哥白尼
 corporate income tax 公司所得税
 cost markup 成本加值
 cost of production 生产成本
 cost push 成本推动
 corporate profit tax 公司利润税
 countervailing power 抗衡力量
 craft union 同行工会
 Creamer, D. D. 克里默
 creation of bank deposits 银行存款创造
 credit (用于会计) 贷方
 credit union 信用组合
 creeping inflation 爬行通货膨胀
 crop-limitation program 限制种植方案
 cross-elasticity of demand 泛物需求弹性
 "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 "累积的"优先股票
 convertible (用于有价证券) 可转换的
 currency 纸币、通货、货币
 current account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 经常账目
 current asset 流动资产
 customs union 关税同盟

D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Davenport, H. J. 达文波特
 Davis, Kingsley 金斯利·戴维斯
 death rate 死亡率
 debit (用于会计) 借方
 "deadweight loss" 无谓的损失
 Debreu, G 德布鲁

decision theory 决策理论
 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规模的收益递减
 deepening of capital 资本深化
 deflation 通货收缩
 deflationary gap 通货收缩的缺口
 de Gaulle 戴高乐
 demand 需求
 demand deposits 活期存款
 demand pull 需求拉动
 Demoivre 德莫佛哇
 Denison, Edward E. 丹尼森
 depreciation (用于货币) 贬值
 derived demand 引致需求
 devaluation (用于货币) 贬值
 de Tocqueville 德托克维尔
 differentiation of product 产品差别
 Dingley 丁利
 direct tax 直接税
 dirty floating 肮脏的浮动
 discount 贴现
 discounted value 贴现值
 discount rate 贴现率
 disguised unemployment 隐蔽失业
 dispersion 离差
 disposable income 可支配收入
 distort 扭曲
 distortion 扭曲、变形
 distribution 分配
 disutility 负效用
 dividend 股息
 division of labor 分工
 Djilas, Milovan M. 德热拉斯
 dollar glut 美元过剩
 dollar shortage 美元缺乏
 Dow-Jones Co. 道-琼斯公司
 Dobb 多布
 Drake, Francis 弗朗西斯·德雷克
 duopoly 双头垄断
 Du Pont Company 杜邦公司
 Dupont de Nemours & Co. 杜邦公司
 durable goods 耐用品

E

earning or income approach 所得或收入法
 Easterlin, Richard 理查德·伊斯特林
 economic goods 经济物品
 economic rent 经济租金
 economic romanticism 经济浪漫主义
 economies of large scale production 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果
 economies of scale 规模的经济效果
 economize 寻找经济的办法
 Eden 伊甸乐园
 Edgeworth, F. Y. 埃奇沃斯
 effective demand 有效需求
 efficiency unit 效率单位
 Einstein 爱因斯坦
 elastic demand 需求弹性充足
 elasticity of demand 需求弹性
 elasticity of supply 供给弹性
 Ely, Richard T. R. T. 伊利
 enclosure movement 圈地运动
 Engel curve 恩格尔曲线
 Engel's Law 恩格尔定律
 envelope cost curve 包迹成本曲线
 envelope curve 包迹曲线
 equal cost contour (或 curve) 等成本曲线
 equal product contour (或 curve) 等产量曲线
 equal-utility contour 效用等高线
 European Common Market 西欧共同市场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欧洲经济共同体
 excess capacity 多余生产能力
 exchange control 外汇管制
 excise (tax) 货物(税)
 expanded reproduction 扩大再生产
 expected value 预期值
 exploitation 剥削

export subsidy 出口津贴
 external consumption effects 外部消费影响
 external diseconomy 外部经济负效果
 external economy 外部经济效果
 external margin 外部边缘
 externalities 外部经济效果

F

Fabian 费边
 Fabricant, S. S. 法布里肯特
 factor mobility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factor of production 生产要素
 factor-price frontier 生产要素-价格边缘
 fair price 公道价格
 fallacy of composition 合成谬误
 Farm Bureau Federation 农业联合局
 Farmers' Union 农民联合会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贸易顺差
 "feather bedding" "故意安排多余人员"
 fecundity 生殖力(人口)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联邦电讯委员会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ederal fund 联邦专款
 Federal Home Loan Bank 联邦住宅贷款银行
 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Association 联邦住宅抵押贷款会社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联邦国民抵押会社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联邦动力委员会
 Federal Reserve Bank 联邦准备银行

Federal Reserve Board 联邦准备局
 Federal Reserve Notes 联邦准备券
 Federal Reserve System 联邦准备制度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feed-back (用于货币理论) 回流
 Fellner, W. W. 费尔纳
 "fine tuning" (用于经济政策) 微调
 fertility 生育率(人口)
 "filter-down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经济进步的最终渗透论"
 firm 厂商
 first generation bank 第一级银行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New York 纽约花旗银行
 fiscal drag 财政拖曳
 Fisher, Irving 欧文·费歇尔
 Fisher, R. A. R. A. 费希尔
 Fitch, Robert R. 菲奇
 fixed asset 固定资产
 fixed cost 不变成本
 fixed input 不变入量
 floating exchange rate 浮动汇率
 flow of product approach 产品流动法
 food stamp 食物票证
 Ford Motor Co. 福特汽车公司
 Fordney 福德尼
 foreign exchange 外汇
 foreign exchange rate 外汇率, 汇率
 foreign trade multiplier 外贸乘数
 forward market 期货市场
 franc 法郎
 Franklin, 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free entry 自由进入和退出(自由进出)
 free enterprise 自由企业
 free goods 自由取用物品
 Freud 弗洛伊德
 Frisch, Ragnar 兰格纳·弗里希
 Fromm 弗罗姆

G

Galbraith, John Kenneth J. K. 加尔布雷思
 Gale, D. D. 盖尔
 Galileo 伽利略
 game pay-off matrix 博弈支付矩阵
 Gauss 高斯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eneral Electric Co. 通用电气公司
 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 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equilibrium 一般均衡
 George, Henry 亨利·乔治
 Gestalt Psychology 完形心理学派
 Gimbel Department Store 金贝尔百货公司
 gold bar 金条
 gold certificates 黄金证券
 gold exchange standard 金汇兑本位
 gold point 输金点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Goldsmith, Oliver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
 Gompers Samuel 塞缪尔·冈珀斯
 Goodman, Paul P. 古德曼
 goodwill 商誉(用于会计)
 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政府国民抵押会社
 Gorman 戈尔曼
 Gramsci 格拉姆西
 Grange (The) 农户协会
 Great Northern Railroad 大北铁路
 Gresham's Law 格雷欣定律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国民生产总值
 guideposts 控制指标
 guild socialism 工会社会主义
 Guizot 古索特
 Gurley, John J. 格利

H

Haavelmo, Trygve T. 哈维尔莫
Haberler, G. G. 哈勃勒
Hades 哈得斯冥狱邦
Hackett, Francis F. 哈克特
Hansen, Alvin A. 汉森
Harriman, E. H. E. H. 哈里曼
Harrod-Domar Growth Model 哈罗德-多马经济成长模型
Harrod, R. H. R. H. 哈罗德
Hawley 霍利
Hayek, F. A. F. A. 海克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W. R. 赫斯特
Heckscher, Eli E. 赫克谢尔
hedging 套头交易
Hess, Moses 摩西·赫斯
Hicks 希克斯
Hodgskin 霍吉斯金
holding company 控股公司
Homer 荷马
Hoover 胡佛
horizontal integration 横方一体化
horizontal merger 横向合并
Hotelling, H. H. 霍推里
Hull, C. C. 赫尔
human capital 人力资本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Hurwicz, L. L. 赫维兹
Hymer, Stephen S. 海默

I

implicit cost 内在成本
import quota 进口限额
improvement factor (用于工资协议) 改善条件
incentive 动力
incidence (关于赋税) 归宿
income effect 收入效应
income of unincorporated enterprises 非公司企业收入
income-policy 收入政策

income statement 收入报告书或损益报告书
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规模的收益递增
indicative planning 指示性计划
indifference curve 无差异曲线
indifference map 无差异曲线群
indirect tax 间接税
induced investment 引致投资
industrial union 产业工会
inelastic demand 需求弹性不足
inferior goods 劣等品
inflation 通货膨胀
inflationary gap 通货膨胀的缺口
inheritance tax 遗产税
innovation 技术革新
input 入量, 投入量, 投入
input-output analysis 投入-产出分析
input-output coefficient 投入-产出系数
intangible asset 无形资产
interest 利息
intermediate factor of production 中间性生产要素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交叉董事(制)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国内收入署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 国际收支平衡表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 利息均等税
interindustry input-output 部门间投入-产出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Co.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国际开发署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国际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国际收割机公司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国际妇女服装工会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preference 国际流动性偏好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CC) 州际商业委员会
inventory 存货
inventory valuation adjustment 存货估价调整
investment 投资
invisibles (用于国际收支平衡表) 无形项目
invisible hand 看不见的手
iron law of wages 工资铁律

J

Jevons, W. S. 杰文斯
Johansen 约翰逊
joint demand 复合需求
joint product 复合产品
jurisdictional strike 管辖权罢工

K

Kahn 卡恩
Kaiser Aluminum & Chemical Co. 凯塞铝与化学公司
Kaiser Steel 凯塞钢铁公司
Kaldor, N. N. 卡尔多
Kalecki 卡拉斯基
Kantorovich 康托洛维奇
Kathedersozialisten 讲坛社会主义者
Kendrick, J. W. J. W. 肯德里克
Kennedy Round Reduction 肯尼迪回合缩减
Kerenski 克伦斯基
Knight, Frank F. 奈特
Kodak Co. 柯达公司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kibbutz 集体农场
"kinked" demand curve "断折的"需求曲线
Knights of Labor 劳动骑士团
Koopmans, T. T. 库普曼斯
Kuhn, H. H. 库恩
Kuznets, Simon 西蒙·库兹涅茨

L

labor intensive 劳动密集
labor-saving invention 节约劳动发明
labor syndicalist 工团主义者
labor theory of value 劳动价值论
LaFollette, Robert 拉福莱特
lagging indicator 滞后指标
Lagrange 拉格朗日
laissez faire 自由放任
land intensive 土地密集
Lange, Oskar O. 朗格
Laplace 拉普拉斯
Lassalle 拉萨尔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比较有利条件规律
law of conservation of unemployment 失业守恒规律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 收益递减规律
Law, John 约翰·劳
law of increasing cost 成本递增规律
law of large numbers 大数规律
law of scarcity 稀缺规律
law of substitution 代替规律
laws of mo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运动规律
leading indicator 领先指标
legal reserve ratio 法定准备率
Leijonhufvud, A. A. 赖尚霍夫德
lend-lease 美国租借法案
Leontief, Wassily 瓦西里·里昂惕夫

夫

Lerner, A. P. A. P. 勒纳
Lewis, John L. 约翰·L. 刘易士
liability 负债
Lieberman, E. E. 利别尔曼
libertarian 新自由主义者
Lindbeck, Assar A. 林德贝克
linear programming 线性规划
Lin-Temco-Vought Co. 林-谭科-沃特公司
liquidity 流动性
liquidity preference 灵活偏好
“liquidity trap” “灵活陷阱”
List, F. F. 李斯特
lira 里拉
Litton Industries 利顿工业公司
Lloyd's 劳埃德协会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long term) trend 长期趋势
long wave 久远波动
Lorenz curve 洛伦茨曲线
Lowell, A. Lawrence A. 劳伦斯·洛厄尔
lump of labor fallacy 固定劳动总量谬误
Luxemburg, R. R. 卢森堡

M

Machiavelli 马奇维利
Machlup, F. F. 马克卢普
ma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学
Macy Department Store 麦塞百货公司
mainstream economics 主流经济学
major cycle 主要周期
Malinvaud, E. E. 马令瓦德
Malthus, Thomas Robert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managed floating 管理浮动
managed floating exchange rate 管理的浮动汇率
managerial economics 企业经营经济学

Mandel 曼德尔
Marcuse 马库塞
margin (用于股票购买) 垫头
marginal cost 边际成本
marginal efficiency 边际效率
marginal physical product 边际物质产品
marginal product 边际产品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边际消费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 边际储蓄倾向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边际代替比例
marginal revenue 边际收益
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边际收益产品
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用
mark 马克
markup 加值
Marris 马里斯
Marshack, J. J. 马夏克
Marshall, Alfred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maximin 极大极小
McCumber 麦坎伯
McDonnell Douglas Aircraft Co.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
Mckinley 麦金利
McNamara, R. R. 麦克纳马拉
Meade, J. E. 米德
Means, G. 米恩斯
Meany, George 乔治·米尼
medicare 老年医药保险
Mellon 梅隆
Menger, C. 门格尔
mercantilist 重商主义者
merger 兼并
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军事-工业综合体
Miller-Tydings Act 米勒-泰丁斯法
minimax 极小极大

minor cycle 次要周期
Mises, Ludwig von L. v. 米塞斯
Mitchell, Wesley W. 米契尔
mixed economy 混合经济制度, 混合经济
Modigliani, F. F. 莫迪格里安尼
money stock 货币存量、货币数量、货币总量
monopoly 垄断
monopsony 买方垄断
Monte Carlo 蒙特卡罗
Montgomery Ward Co.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
More, Sir Thomas T. 摩尔爵士
Morgan, J. P. J. P. 摩根
Morrill and War Tariff 莫利尔和战时关税
moving equilibrium 移动均衡
multilateral trade 多角贸易、多方贸易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跨国公司
multiplier 乘数
Murry, Philip 菲利普·默里
Mussolini 墨索里尼
mutual fund 合资基金
mutual savings bank 互助储蓄银行

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全国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国家经济研究所
national income 国民收入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国民收入会计
National Labor Relation Board 全国劳工关系局
natural order 自然秩序
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全国计划协会
national product 国民产值、国民产品
natural rate of growth 自然增长率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自然失业率
natural scarcity 自然的稀缺性
Nehru 尼赫鲁
neoclassical economics 新古典学派经济学
neoclassical synthesis 新古典学派的综合
net borrowed reserve 净借得准备金
net free reserve 净自由准备金
net national product (NNP) 国民净产值
net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资本净生产率
net worth 股本
New Deal 新政
nonliquidity 非流动性
new left economics 新左派经济学
net economic welfare 国民净福利
New York Cocoa Exchange 纽约可可交易所
Newton 牛顿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纽约股票交易所
Neumann, J.von J. v. 诺伊曼
Nkrumah 恩克鲁玛
nondurable goods 非耐用品
noncompeting groups 非竞争类别
no-par share (用于有价证券) 无票面值股票
Nordhaus, William 威廉·诺德豪斯
normal distribution 正态分布
normal science 规范科学
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 北太平洋铁路
notes (用于公债) 短期国库券
notes payable 应付票据
NRA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国家复兴管理局

O

offer (作为商业交易术语) 要价
official settlements deficit 官方清偿

赤字
Office of Price Stabilization 物价管理局
Ohlin B. B. 奥林
oligopoly 寡头
open market operation 公开市场业务
open shop 泛雇原则
operation research 运筹学
opportunity cost 机会成本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资本有机构成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output 产量、产品、产出
“outside” money “外界的”货币
overhead cost 分摊成本
overvaluation 货币定价过高
overvalued currency 定价过高的货币(通货)

P

paradigm 模式
Pareto-nonoptimality 帕累托非最优状态
Pareto-optimality 帕累托最优状态
Pareto, Vilfredo V. 帕累托
partially competing groups 部分竞争的类别
“paper gold” “纸面黄金”
parity 平价
partial equilibrium 局部均衡
partnership 合伙制
Pascal 帕斯卡尔
Pasinetti, L. L. 帕西纳惕
patent 专利、专利权
Payne 佩恩
payroll tax 薪工税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people's capitalism 人民资本主义
perfect competition 完全竞争
perfect foresight 完全预见性

perfect knowledge 完全知识
perfect monopoly 完全垄断
Peron 庇隆
perpetual annuity 无穷年金
personal income 个人收入
Petty, William 威廉·配第
Phillips Curve 菲利普斯曲线
Phelps, E. S. E. S. 费尔普斯
Phillips Petroleum Co.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
Physiocrat 重农主义者
Pigou, A. C. A. C. 皮古
Pigou effects 皮古效应
“Pittsburgh-plus” “匹兹堡加额”
Plank, Max 马克斯·普兰克
Plato 柏拉图
Point Four Program 第四点方案
poll tax 人头税
Pool 普尔
Populism 人民党主义
post hoc fallacy 后此谬误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post-Keynes mainstream economics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Prebisch, R. R. 普雷维什
preferred stock 优先股票
present discounted value 现在贴现值
price system 价格制度
prime rate (用于利息率) 基础利息率
progressive (tax) 累进(税)
profit 利润
propensity to consume 消费倾向
pound sterling 英镑
price discrimination 区别对待的价格
price index 价格指数
primary factor of production 初级生产要素
“prisoner's dilemma” “囚犯的两难处境”

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 生产可能性边缘
 prohibitive tariff 禁止性关税
 propensity to save 储蓄倾向
 property tax 财产税
 Proudhon 蒲鲁东
 public utility 公用事业
 purchase-and-resale differential subsidy 转售差额津贴方案
 purchase-loan storage program 收购借贷储存方案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 购买力平价论
 pure competition 纯粹竞争
 pure economic rent 纯粹经济地租
 pure rent 纯粹地租
 Pythagorean theorem 毕达哥拉斯定理

Q

quantity equation of exchange 交换数量方程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nd price 货币数量论
 quasi monopoly 类垄断
 quasi rent 类地租
 quata 限额
 Quesnay, F. F. 魁奈

R

Radcliffe Committee Report 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报告
 Radio Corp of America (RCA) 美国无线电公司
 Radner, R. R. 雷德纳
 Ramsey 拉姆赛
 random 随机
 random walk 随机行走
 rate of inflation 通货膨胀率
 rate of profit 利润率
 rate of substitution 代替比例
 rate of surplus value 剩余价值率
 reciprocal demand 相互需求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互惠贸易协定
 recycling 再循环
 Reed, John J. 里德
 regional trade 区域间贸易
 regressive (tax) 累退(税)
 Reich, C. C. 赖克
 Reich, M. M. 赖克
 rent 租金, 地租
 rentier 食利者
 replacement rate 替换率
 Republic Steel Co. 共和钢铁公司
 reserve 准备金(用于货币政策)
 reserve and gold assets movement 储备和黄金资产的流动
 resource allocation 资源配置
 "reswitching" "再转辙"
 Reynolds Metals Co. 雷诺金属公司
 rigidity 刚性
 risk 风险
 Robinson, Joan 琼·鲁宾逊
 Robinson-Patman Act 鲁宾逊-帕特曼法
 Rockefeller, J. D. J. D. 洛克菲勒
 Roosevelt, Franklin D. F. D. 罗斯福
 Roosevelt, Theodore T. 罗斯福
 roundabout production process 迂回的生产方法
 Royal Dutch Petroleum 英荷石油公司
 rule of reason 合理的准则(反托拉斯政策)
 Ruskin 拉斯金

S

"saddle point" "马鞍点"
 Saint-Simon 圣西门
 Sakharov 萨哈罗夫
 Salazar 萨拉沙
 sales (tax) 销售(税)
 saving 储蓄
 saving and loan association 储蓄和

贷款会社
 Say's Law 萨伊定律
 scarcity 稀缺性
 Scarf, H. H. 斯卡夫
 Schmookler, J. J. 施莫克勒
 schoolmen 经院学者
 Schumpeter J. A. 熊彼特, J. A.
 seasonal variation 季节变化
 second best measure 次优方法
 second-best solution 次优答案
 second generation bank 第二级银行
 secondary boycott 次级抵制
 secondly reserve 第二级准备金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y (有价)证券
 Seton 塞顿
 shadow price 影子价格
 Shaw, Bernard 肖伯纳
 Sherman Antitrust Act 谢尔曼反托
 拉斯法
 shift (关于赋税) 转嫁
 shift (曲线的) 移动
 short-run 短期
 "short selling" "卖空"
 shut-down point 停止生产点
 Simons, Henry C. H. C. 西蒙斯
 single proprietorship 单人业主制
 single tax movement 单一税运动
 Sismondi 西斯蒙第
 skilled labor 熟练劳动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小
 企业管理局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Smithonian Agreement 史密森协定
 Smoot 斯穆特
 "snake" (用于外汇) "蛇形浮动"
 Snow, C. P. C. P. 斯诺
 social compact 社会契约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ividend 社会股息
 social overhead capital 社会分摊资
 本

Solow, R. R. 索洛
 Solzhenitsyn 索尔仁尼琴
 special drawing right 特别提款权
 specialization 专业化
 Spencer, Herbert H. 斯潘塞
 Spengler 斯彭格勒
 Spinoza 斯宾诺莎
 Spiethoff, Arthur A. 斯彼托夫
 Sraffa, Piero 庇若·斯拉法
 stagflation 停滞膨胀
 Standard Oil Co. 美孚石油公司
 statement of profit and lose 损益
 报告书或收入报告书
 stationary equilibrium 静止均衡
 stationary state 静止状态
 steady reproduction 简单再生产
 steady state 稳定状态
 sterling block 英镑区
 Stigler, George J. 乔治·J. 施蒂格
 勒
 stock of money (M) 货币存量、货币
 数量、货币总量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结构失业
 subsistence wage 维持最低限度生活
 的工资
 substitution effects 代替效应
 substitution ratio 代替比例
 Sukarno 苏加诺
 supply 供给
 surplus value 剩余价值
 Swan, T. T. 斯旺
 Sweezy, Paul M. P. M. 斯威齐
 syndicalism 辛迪加主义
 syndicate 辛迪加

T

tableau economique 经济表
 take-off 起飞
 tariff 关税
 tariff of abomination 被厌恶的关税
 Taussig, F. F. 陶西格
 Tawney, R. H. R. H. 托尼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技术

性失业
technostructure 技术专家体制
terms of trade 贸易条件
Theil, Henri H. 蔡尔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比较有利条件论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st 比较成本论
theory of games 博弈论
Thompason 汤普逊
Thoreau 索罗
“tie contract” “束缚性的契约”
time deposits 定期存款
time intensive 时间密集
time series 时间数列
Tinbergen, Jan 詹·丁伯根
Tobin, James 詹姆斯·托宾
total cost 总成本
total revenue 总收益
Toynbee 托因比
Trade Agreement Act 贸易协定法
transformation curve 转换曲线
Treasury bills 短期国库券
treasury notes 国库券
Truman Doctrine 杜鲁门主义
turnover tax 周转税
trust 托拉斯
two tiered gold market 双层黄金市场
two-tiered system 双层制度

U

uncertainty 不肯定性
undervalued 定价过低
undervalued currency 定价过低的货币(通货)
Underwood 安德伍德
underwrite (用于有价证券) 包销
undistributed profits 未分配利润
unemployment rate 失业率
unfair competition 不公平竞争
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贸易逆差

Union for Radical Economics 激进经济学者联盟
union shop 入会原则
unitary elasticity of demand 需求弹性为一
United Nation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联合国救济总署
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
 美国全国商会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美国钢铁公司
unskilled labor 非熟练劳动
Util 尤特尔
utility 效用

V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money 货币流通速度
value added tax 增值税
value of marginal product 边际产品价值
variable capital 可变资本
variable cost 可变成本
variable input 可变入量
Veblen, Thorstein 索尔斯坦·凡勃伦
(income)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money 货币(收入)流通速度
vertical integration 纵方一体化
vertical merger 纵向合并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退伍军人管理局

W

wage 工资
“wage drift” “工资漂浮”
wage-price guideposts 工资价格控制指标
wage stickiness 工资的黏着性
Wald, A. 沃尔德
Walker 沃克
Wall street 华尔街

Wallace, George G. 华莱士
 Wallace, Henry H. 华莱士
 Walras, L. 瓦尔拉
 warranted rate of growth 有保证的
 增长率
 Webb 韦伯
 Webb, Beatrice and Sidney 韦伯夫
 妇
 Webb-Pomerene Act 韦布-波默林法
 Webb-Fechner law of decreasing
 marginal effect 韦伯-费克纳边际
 影响递减规律
 Webb, M. M. 韦伯
 welfare economics 福利经济学
 Westinghouse Co. 威斯汀豪斯电气
 公司
 Westphalen, Jenny von 燕妮·冯·
 威斯特华伦
 Wharton School 沃顿商学院
 Wheeler-Lea Amendment 惠勒-利
 修正案
 White, Paul Dudley P. D. 怀特
 Whitehead 怀特黑德

wholesale price index 批发价格指数
 Wicksell, K. 魏克赛尔
 Wicksteed, P. P. 威克斯第德
 widening of capital 资本的广化
 Wieser 维塞尔
 Wilson, Edmund E. 威尔逊
 Winternitz 温特尼兹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Wordsworth 华兹华斯
 workable competition 有效竞争

Y

yen 元
 yieldson long term government bonds
 长期政府债券所得
 yields on treasury bills 财政部国库
 券所得

Z

zero economic growth (ZEG) 零值
 经济增长
 zero population growth (ZPG) 零
 值人口增长